

周毓英著

法西斯蒂與中國革命

民族書局出版

周毓英著

法西斯蒂與中國革命

序

革命往往有談論了十年八年甚至百年而一無實際的，又往往有剛剛只團結了極少數的幾個同志便自相分裂自行拆台的。成千成萬的民衆被誑騙，被犧牲，整個的國家民族在革命的前進的道路上受盡了無謂的空虛的浪費。在這「無謂的空虛的浪費」之中，個人縱使也能博得榮譽，獲得利權，但對歷史而言，這種虛榮與物質兩方面的生活上的享樂，都將鑄成生命上的污點！

被空談與自私籠罩着的中國革命，不論是現實的政治舞台，抑是理論的思想的領域，總被一種虛榮與利權的空氣包圍着，人們不肯對社會說真話，甚至也不肯對自己說真話，只追逐着誑騙的風尚，因順苟且，圖一點現成的享樂！這類廢的民族，散亂的民族，怎樣的需要着勇敢，毅力和實踐的團結精神，以拯救我們的衰老的國家啊。

法西斯蒂最富於行動的精神，也最合於組織的生活。如果可以把「科學」二字加到革命這名詞的下面去，我們真敢說法西斯蒂就是革命的科學，或者是科學的革命運動，社會運動。任何思想的體系，革命的概念，再沒有比法西斯蒂更勇於行動合於組織，而有力的排斥着空想觀念和自私觀念。意大利和德意志革命的順利成功而沒有一點浪費，也正足以證明法西斯蒂的科學基礎。

科學沒有國界，我們既大膽承認法西斯蒂是一種科學，就應該相信這個革命的科學正是中國所急需的。革命不能不有行動，不能不有組織，這兩個革命的基本條件在中國試問欠缺到怎樣的程度呢？那些空談與盲動的各黨各派且不必說，即如國民黨那樣，在組織和行動方面也都到了不合理的地步。要校正這不合理的現象，對症良藥便是採取法西斯蒂的技術，表揚法西斯蒂的精神。中國革命在根本的思想與主義上，孫中山先生所遺留的一切我們都應該無批評的一一接受下來，但在行動與組織上却必須灌輸充分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

所以這本小書的刊行，最初我是抱着極度不安的心情，因為這裏面殘缺晦澀的地方實在

太多了。但繼而想到墨索里尼生平從不迷信任何一本書，最好的書也不過當作生活上的參考，好像我們生平所得到的經驗一樣。中國廣大的革命的青年們，爲了革命的實際問題的解決都已熱誠到廢寢忘食，而一時又沒有討論中國革命與法西斯蒂的實際問題的著作出現，我這本小書正好做着最貧薄的資糧，最惡劣的參考，便只好汗流浹背的把牠付印了。

這裏搜集的文稿，多半是作者主編社會主義月刊的時候用不同的筆名發表的。第一輯全是直接討論法西斯蒂的問題，第二輯中則是根據着法西斯蒂的觀點討論中國的經濟文化等問題。最後的三篇附錄，覺得對法西斯蒂理論的了解可以多一點幫助，便也搜了進去。

民國二十三年初冬自記於上海南區

法西斯蒂與中國革命 目次

序……………(一一)

第一輯

法西斯蒂與中國革命……………(一)

獨裁與革命……………(一一)

青年法西斯蒂……………(二一)

中國社會主義之旗……………(二九)

國民黨恢復總理制與中國法西斯蒂的組織問題……………(四一)

中國革命怎樣進行……………(四九)

論法西斯蒂·····	(六七)
人類的自由·····	(七九)
法西斯蒂的技術·····	(八七)
與胡漢民先生論法西斯蒂·····	(九七)

第二輯

革命與文化問題·····	(一四九)
國民黨的文化政策批判·····	(一七一)
國民黨的文化統制運動·····	(一八五)
中國革命的經濟政策·····	(一九七)
中國錢幣革命論·····	(二七三)

中國的土地問題……………(三一七)

附 錄

社會主義的現實……………(三四一)

世界經濟學導言……………(三七三)

Technocracy 與法西斯蒂……………(四二一)

第一輯

法西斯蒂與中國革命



(南)

法西斯主義(Fascism)現在已掀動了世界，不論反對者的詛咒和罵詈是怎樣的尖刻惡毒，法西斯主義並未因此落入地獄。却是那些喜歡詛咒，喜歡罵詈，逃避現實的人一天一天與地獄接近了。事實總是事實，不論反對者怎樣的富有文學的想像力，富有藝術的理想力，堅硬的事實絕不為玄妙的空想所擊毀！人類的腦際今後大半潛伏着一個信念，這信念不是「上帝」不是「佛」，也不是「美人」，「黃金」或者「自由」，而是任何人都看得見聽得到的一句話：「法西斯蒂！法西斯蒂！」

法西斯蒂與爾什維克同樣的具有科學基礎，然而在理想與現實接合的基點上，則法西斯蒂的行動，比布爾什維克就更敏捷更堅決了。把法西斯蒂與布爾什維克同列在一起，或許有人覺得貶損了法西斯蒂的價值。可是我們不那樣想。我們不能承認「法西斯蒂是布爾什維克的右傾。」當把法西斯蒂與布爾什維克並列比照的時候，我們只見法西斯蒂比布爾什維克更具有堅決性和現實性，比布爾什維克更具有科學的基礎！把玄妙的空想送入地獄，把粗糙的事實放在眼前，我們準會知道法西斯蒂的精神。

法西斯蒂是行動的組織，不是吃了飯沒事做的談論的組織。布爾什維克雖也同樣以七百萬（共產黨徒）少數有紀律有毅力的組織統治一萬萬六千萬（蘇俄人民）多數無紀律無毅力的民衆，布爾什維克也同樣以普羅列塔利亞迪克推多的強迫統治打破虛偽的德謨克拉西，但法西斯蒂與之絕不相同。法西斯主義者是最坦白的治政行動員，時時刻刻追逐着粗糙的事實，以事實爲革命的內容，不像布爾什維克那樣脚下踏的是粗糙的事實，頭上頂的却是世紀前馬克斯的空想。他坦白的主張以少數統治多數，毅力的圖謀公共的利益，不像布爾什維克那

標用一套巧妙的手法將浮滑的智識份子冒充工人，將一個政黨的獨裁諱言爲普羅列塔利亞狄克推多。當然，我們公開承認，法西斯蒂與布爾什維克沒有絲毫矛盾，法西斯蒂的志趣，法西斯蒂的精神，都和布爾什維克沒有兩樣，但行動的表演，法西斯蒂是更坦白！更堅實！還可以說是更粗糙！更強力！

法西斯主義本身並沒有固定的內容，牠是以社會的內容爲內容，社會需要國家主義，法西斯蒂便是最活潑的國家主義，社會需要社會主義，法西斯蒂便是最前進的社會主義，總之法西斯蒂是毅力的犧牲的結合，抱着大無畏的精神來拯救社會，拯救人類。

★

★

★

★

法西斯蒂的活動，在意大利是墨索里尼主義，在德意志是希特拉主義，此外在英國日本法國和東歐各小國也已有蓬勃發張的現象。希特拉主義與墨索里尼主義在行動上精神上同樣是毅力的犧牲的鐵血組織，但德意志與意大利的國情各有不同，內容上不免有若干差別。可是這些差別，並不能以之定爲法西斯主義的矛盾，說法西斯主義沒有國際性，實際上，這正證明了

法西斯蒂的活動性。因爲法西斯蒂的產生，純然由於社會的需要，是社會自然產生的。牠不像布爾什維克那樣組織了第三國際去做主義的運販工作，這種運販工作顯然是失敗的。假如一個國家沒有法西斯主義的社會基礎，那末就使把墨索里尼的全部行動都鈔襲了去也沒有用，墨索里尼早已說過了：「法西斯主義不是出口的啊！」

「法西斯主義不是出口的，」却偏能掀動全球，共產主義被第三國際裝箱發賣，却到處都打回票。這證明社會條件已經成熟了的時候，墨索里尼雖然絲毫沒有注意，德意志的希特拉也自然會站立起來，日本的法西斯蒂勢力也自然會暴長起來。蘇俄的領袖們硬要把自己的老文章叫人家去照本謄鈔，結果各國的無產階級暴動都相繼失敗了，只留下一個寂寞的蘇俄巍然獨存！

★

★

★

★

九一八東三省事變突發，老弱的中國被日本實行開刀宰割，亡國的慘痛刺醒了麻痺的慢性病的中華民族，有毅力的志士奮然願以熱血來救國。在這潮流下，那法西斯蒂在中國社會便

蠢然思動，「毅力的犧牲的鐵血組織」如血魂團鐵血團等組織一時有了七八十個，關外與暴敵血戰的義勇軍在五十萬以上。許多從各政黨各組織脫退出來或未脫退而懷着不滿意的青年志士，都躍躍然的要起來組織法西斯蒂，完成一個革囊樣的組織，把四萬萬七千萬的一盤散沙的同胞盛放在法西斯蒂的革囊裏。

中國能夠團結，不要說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就是全世界的帝國主義一致來圍攻，也有力量打退他們。只是中國究竟怎樣纔能團結，却是一個問題。當然我們不能忍受日本軍國主義的「革囊」來盛我們「四萬萬粒的散沙」。二十餘年的革命沒有把中國實行團結，內政經濟沒有統一，軍事上是形合質分，外交上就各有祕密，——張學良不願與日本祕密勾結便有去年九一八事變。有毅力而澈底明瞭事實的志士，都感覺中國必須放棄惰性的民主，實行正義的獨裁。這樣，法西斯主義就成了中國的對症要藥了。

中國法西斯主義的基礎，本不起於九一八。清末同盟會的歃血革命，就有這種精神；不過公開發效法西斯蒂並且受到社會的同情是九一八以後纔有的事。我們應知以中庸求前進，那本

是孫中山先生成功的至道，但一般人却假借「中庸」作苟安偷惰力事保守的工具，中國社會已受盡了「中庸」末流的遺毒。這「腐爛了的中庸」，中國一輩子不得興盛，不使用強力絕不會有挽救的希望。本來，中國能夠永久關着大門中庸下去也是好的，大家中庸着過生活，讓少數會長式的軍閥各霸一方，讓少數有智慧的政客挑撥鬭利，無奈世界不讓我們再迷戀着「腐爛了的中庸」，日本已經動手來侵略，英國法國也想來侵略，舊存的不平等條約更窒塞着我們不能繼續生存。

歷史告訴我們，救中國「五分鐘的熱度」是沒有用的。外患的刺激纔過去，甚至還沒有過去，內部自私的紛爭又起來了。民衆愛國的心理是一致的，士兵愛國的心理也是一致的，但那些自私自利的政客却愛挑撥着軍人來作亂，使中國不能堅固團結，實行統一。這裏，我們就不得不主張採取毅力的犧牲的鐵血的法西斯主義的精神。只有鐵血的法西斯纔能擊碎虛偽的德謨克拉西，纔能醫治中國民衆的慢性病，纔能打倒侵略的軍國主義，也只有鐵血的法西斯纔能救中國。

★
★
★
★

法西斯蒂本身是沒有內容的，牠以社會的內容爲內容。那末，在中國的法西斯蒂除了組織上的有毅力有紀律以外，無條件的是該以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內容。中國社會需要三民主義，但「徒法不能以自行」，必須有堅強的組織來執行，這個組織便是法西斯蒂。孫中山先生爲着執行三民主義，最初的組織有興中會，興中會以後有同盟會，同盟會以後有國民黨，國民黨以後有中華革命黨，中華革命黨以後有中國國民黨。這些組織上的轉變，我們不能說是毫無意義。社會的惰性作用常常使一般參加革命的份子趨於消極腐化，組織上如沒有新的刺激或轉變，整個的組織便會走向沒落，使黨的組織離開黨的立場。孫中山先生之所以可崇拜尊仰，就是他時刻注意着組織，必要的時候便使自己所領導的組織有一個轉變，有一個改革，這樣纔能保持黨的革命性，不致隨着社會的惰性走向沒落。

中國國民黨於十三年改組成立，十六年北伐的時候曾收了鉅大的作用。北伐能夠成功，完全是由於十三年改組的效果。可是黨由十三年改組到現在，快滿九年了，在這九年中間黨所受

到的社會惰性作用使黨內增添了不少的消極份子和腐化份子，使組織漸漸離開主義而走向沒落。中國國民黨的傾向沒落，非但黨外的人有這樣的感覺，就是我們在黨內有志氣的青年也都是這樣的感覺着。國內兩個主力的黨，一個是國民黨，一個是共產黨，共產黨因為主義不合實際着着失敗，國民黨因為組織惰性的作用也無多大建樹，於是一般青年都泣血椎心的呼號着：「共產黨是永久沒辦法，國民黨長此下去也將沒辦法啊！」

共產黨的沒辦法，是根本因為主義上走不通，可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憑着偉大的天才和四十餘年的經驗完成的，國民黨的沒辦法實在由於組織的惰性作祟，絕不是因為主義不正確，九一八事變後，一般捨本逐末的人，居然主張提早結束訓政，主張立刻開始憲政，模仿歐美虛偽的德謨克拉西，非但不要國民黨的組織，連國民黨的主義也不要了。請問憲政是什麼東西，日本德國英國的憲政不是在潰爛得出蛆嗎？美國法國也快要摘下憲政的臉具！離了有基礎的民治，離了三民主義，憲政是沒有地方好求得的啊！要求得真正的憲政，必先完成三民主義的基礎，完成社會主義的社會；這樣，我們非但不主張提早結束訓政，至少還要將訓政延長五十年

年性急而浮滑的智識份子或許覺得五年十年是太長了，可是在我們以紀律與毅力爲生命的政治行動員說起來，五年十年也不過是一個短促的階段罷了。

中國革命不能離開三民主義，更不能放棄黨的組織，而是要以更敏捷更毅力的黨的組織來執行三民主義。那末今後的中國革命便是要：

三民主義十條國策

解釋起來是：

三民主義十條國策

好的社會思想，好的社會主張，沒有組織是一步都不能行動。但是如果永遠被一個病牛樣的組織拖累着就還不如沒有組織的好，因爲一些「莫須有」的罪狀，如九一八時中國民衆對於三民主義的責難，便是受「病牛樣的組織」的賞賜！

三民主義如要求有效的像法西斯蒂那樣的強力的執行，民衆與軍隊的密切聯合是必要的，軍人們排除挑撥，放棄嫌恨，而赤心的團結起來也是必要的。

三民主義下沒有私見！

法西斯蒂下沒有個性！

執行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要注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繼有生路！

一九三二，十一，二四。

獨裁與革命

一 獨裁的社會基礎

人類如都像高等動物下等動物那樣，各自過着獨立生活，意識上不互相聯繫，生活上不互相協力，那原沒有什麼，猿猴永久是猿猴，昆蟲永久是昆蟲，人類永久是人類好了。但人類終究不能像昆蟲猿猴那樣永久受自然界的支配和決定，過着「歷史的循環」的生活，人類要順着歷史向前進步。千百萬年前昆蟲猿猴的祖先過怎樣的生活，千百萬年後昆蟲猿猴的子孫也是過

怎樣的生活，牠們除了死死生生，生生死死的自然現象以外，是沒有歷史的。人類就完全不同，原始人類與部落社會的人類不同，部落社會的人類與古代國家的人類不同，古代國家的人類與現代科學的人類也不同。所以人類是進化的動物，人類能夠創造自己的歷史。

人類的能夠進化，並不是由於上帝的意旨，也不是有什麼特具的「心」和「神」，只是由於生理上的構造不同，意識特別敏銳發達，能夠互相團結，能夠過共同的協力生活，於是人類成立了人類所獨有的社會。社會是人類的羣集而具有組織性的集團，社會存在於自然，但成功於人力。社會不能像蘋果橘子那樣從自然的菓樹上生長出來，須在人類意識發達的過程中逐漸成立。

社會是自然界中一種具有力的實體，沒有力的社會是不能存留的。這個所謂力，不是上帝，不是神，也不是心，而是個人意識經過組織和鍛鍊出來的「社會意識」，換句話說就是「信仰」。孫中山列甯是社會的先知先覺，孫中山列甯的思想和意識便成爲社會的思想和意識，俄國人信仰列寧產生了俄國社會的力，中國人信仰孫中山便產生了中國社會的力，俄國中國因爲有

了這兩個新的社會力量，所以俄國中國都能夠革命，解除了人民的痛苦，而社會也都顯出了新的形態。

講到信仰，講到社會的力，在意義上是團結，是協力，在行動上便是專政，便是獨裁。尤其革命的行動，要從舊社會中改造出新社會，不用斷然的迅快的手段，革命勢力往往會被反動勢力摧毀無餘。在新與舊的戰爭中，若不集中信仰，實行獨裁，革命便只是無謂的流血，無價值的犧牲而已。

社會上就是小到三個人的團結，三個人的協力也免不了要獨裁。譬如甲，乙，丙三人遇到現實的事情，三個人或二個人的同意固然要做，否則一個人的意旨也是要做的。縱使乙和丙放棄責任或者各持異議，但甲能在正義的立場上實行獨裁，把現實應付過去，對於社會仍是非常光明。三個人的團結已需要獨裁，推廣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就更人多意雜，如沒有一個嚴密的組織，執行堅毅的獨裁，便會「道旁築舍，一無成就，結果不被別的民族所淘汰，必為別的國家所滅亡。」

社會愈進步，組織愈完密，便愈需要獨裁。不論是政治抑是經濟，離了組織，離了獨裁，都一步不能行動。社會如一個人一樣，每個個人都只是社會的一個細胞，人體的細胞受一個腦的指揮，社會的細胞便受一個「社會的信仰」的指揮。所以獨裁的理論不單在社會的人力論方面有牠的基礎，就在生理的自然論方面也自有牠的基礎。

二 蘇俄革命與意大利革命

獨裁未必都是革命，但革命是一定要獨裁的。革命離了獨裁，離了專政，革命便永遠是鏡花水月，給大家看看而不得實現。革命不單是理論，更重要的是行動。但革命的行動不是個人的行動而是社會的行動。個人的行動，利害關係簡單，個人要做就去做了。社會的行動，利害關係複雜，一件事情發生，往往甲要做而乙反對，丙要做而丁反對，「權利則猖獗以爭，義務則望望以去。」（陳英士致黃克強書）那末雖然是於社會有利的事情，却也不容易成功。

要社會的事情實現得和個人的事情一樣地容易成功，便須有最勇敢最正確而最堅決的

「先知先覺」把社會的事情當做他個人的事情去幹。把社會的事情當做個人的事情去幹，實際上是為了革命，為了社會，但表面上很容易被人看為個人獨裁，好像個人在自作威福。其實獨裁是義務，不是權利，在鎮壓反動的時候，在執行遠大計畫的時候，一個領袖為了社會的利益，爲了革命的利益，便必須堅決貫徹他的主張。在理論上領導革命的須有煽動的口才，在行動上領導革命的便必須有鋼鐵的手腕。否則任你有怎樣圓妙的理想，理想自己並不能變成事實！

獨裁這個名詞，在中國好像是種恥辱的代表，但在世界，獨裁却並不爲人所厭棄！我們就請考察蘇俄的革命和意大利的革命吧。

蘇俄的革命是先有個列寧的理想深印在俄國人的腦際，然後才有列寧，托洛茨基和太斯林等的堅毅的成功。意大利的革命却和蘇俄完全不同，意大利的革命事前並沒有什麼偉大的理想，只是墨索里尼把意大利的事業當作他自己的個人事業，運用他的鐵腕把意大利拯救起來了。在理論上，蘇俄革命和意大利革命可說是兩個絕不相同的東西，蘇俄的理論裝飾得很漂亮很圓妙，墨索里尼却祇承認事實，不承認理論。但在行動上，在責任上，他們同樣都實行獨裁實

行專政，列寧把蘇俄的事業當作個人的事業，墨索尼里也把意大利的事業當作個人的事業。所以在這裏，我們可以很明白的說，革命的理論可以各各不同，但革命的需要獨裁却完全一致。

列寧主義的獨裁，法西斯蒂的獨裁，本與古代的家長，族長，酋長，君長的獨裁毫無差別。所不同的，就是古代的家長，族長，酋長，君長的獨裁是一種權利，而列寧主義的獨裁和法西斯蒂的獨裁乃是一種義務，或是一種責任。古代的獨裁不是「受命於天」，便是「出於上帝的意旨」，因為「天」和「上帝」把獨裁的權力賦於一個人，這個人便有無限威福，可以為所欲為，甚至犧牲民衆的利益也可以不受阻礙。現代的獨裁却不是「受命於天」，也不是「出於上帝的意旨」，而是由於社會的需要。社會需要革命，一種堅決的革命行動便自然而然的實現了。

一九一四年的歐洲大戰結束後，歐洲各國暴發革命的很多，但能夠保持着得到最後勝利的就只有蘇俄和意大利兩國。這就因為蘇俄和意大利有負責的領袖，能實行專政，實行獨裁，以生命與熱血去保證革命的勝利。別的國家雖然暴發了革命，但參加革命的人都是偶然的利害的結合，不能集中信仰，不能迅速行動，不能實行獨裁，結果革命雖然發生了，却絲毫沒有保障，每

次的革命和暴動，都成了無價值的犧牲流血。

革命需要獨裁，革命需要專政，這不是理想的問題，而是實事的問題。理想上，獨裁與專政不是幸福，但事實上革命不經過獨裁，不經過專政，革命便一天都不能存在。革命必須擁護一個領袖的革命，更必須服從一個領袖的獨裁！我們明白了蘇俄和意大利革命的歷史，我們認識了斯大林和墨索里尼的革命的鐵腕，我們難道還不知道無理由的反獨裁是等於保守派的反革命嗎？

三 中國革命的獨裁基礎

中國革命自民國十六年統一全國，到現在已經六年了。革命成功，全國人民都可出水火而登衽席了。但不幸的，就是全國不能集中信仰，不能實行獨裁，先有國共之爭，接着更有歷年內部的分裂，以致黨有專政之名而無專政之實。

本來革命只有路線正確不正確的問題，絕對沒有獨裁不獨裁的問題。路線正確，獨裁可以

使事情實現得快些，路線不正確，用不着反對，他自己先就倒台，就是想獨裁也獨裁不起來。我們不見那些勇於做反獨裁運動的中國領袖，登了台，他們不也一樣在希望獨裁嗎？

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放逐出國，托洛茨基只是始終忠實於自己的政治主張，從來沒有想到要反對斯大林獨裁。中國領袖就完全不同，反獨裁成了獵官的工具，誰要想做官，只要去反對獨裁就好了。一般領袖只想在權利方面實行分贓，你不允許，他就要反對你獨裁。其實革命只需要獨裁而不需要分贓，托洛茨基曾指出斯大林五年計畫什麼什麼的不對，從沒有像中國領袖的毫無理解，反對斯大林獨裁！從路線上從政策上作批評的是革命，從地位上從資格上反對獨裁的只是想分贓而已！革命與反革命，分贓與獨裁，這中間我們應該有深刻的認識！負起革命的責任，以獨裁的精神執行革命的任務：這正是民衆所要求的！

執行三民主義的任務，現在遇着若干困難也並不是怎樣奇怪的事，就是在孫中山先生生存的當時，也常常同樣的遇到困難：

「於民國建元之初，予則極力主張施行革命方略，以達革命建設之目的，實行三民主義。而

吾黨之士，多期期以爲不可。經子曉諭再三，辯論再四，卒無成效。莫不以爲子之理想太高。「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也。嗚呼！

上面這一段沈痛的話，是孫中山先生在行易知難中說出的。這裏很明白的表示出革命不獨裁，許多良好的時機都被遺誤過去了。革命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功的，但因循苟且，坐誤時機，這却是莫大的罪惡！孫中山先生鑒於過去的缺憾，後來終於建設了「行易知難」的學說，要國人集中信仰，堅決執行革命的任務了。所以孫中山先生後來在廣東長期的艱苦奮鬥，雖然他仍要用偉大的精神向黨員及民衆「曉諭再三，辯論再四」，但在許多緊要關頭，爲保全革命的利益，終於採取了種種斷然的佈置。

孫中山先生創立行易知難的學說，正是爲革命創立獨裁的理論的基礎。不幸孫中山先生因革命的勞瘁而與中國長辭了，黨內共信共立的基礎太薄弱，信仰不能集中，獨裁的基礎便又根本動搖了。雖然有一二信仰較堅力量較強的領袖，忠實於革命，忠實於孫中山先生，遇着現實需要的時候做出堅決的革命行動，一些元老巨勳又便立刻依着自己的資格和地位出來反對

獨裁了。

其實中國革命有中國革命的理想，中國革命的理想便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實業計畫，和錢幣革命。執行孫中山先生的理想的便是革命，不執行孫中山先生的理想的便是不革命。中國如有鋼鐵一樣的領袖，他用鋼鐵一樣的手腕鏟除反動勢力，他用鋼鐵一樣的手腕執行孫中山先生的理想，他用鋼鐵一樣的手腕建立革命的新中國，這樣的領袖我們正是求之不得，這樣的領袖我們應當用熱血去擁護！我們不需要昏庸老朽的領袖，我們不需要土神木偶的領袖，我們不需要滑頭騙客的領袖，我們所需要的領袖是鐵和血，是忠實於三民主義的獨裁的領袖！

青年法西斯蒂

殖民地的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那樣的次殖民地的國家，只有法西斯蒂纔是一條出路。

歷史上的現實思想，不是在無意中種下了嚴重的「階級壓迫」的矛盾，便有意的戴上了兇惡的「階級鬥爭」的面具。社會的階級形態，本是進化上必然的趨勢。社會的分工造成社會的進化，社會在分工的過程中便必然要有組織，必然要有階級。階級爲了協力，階級便是進化的幸福的工具；不幸馬克斯和一輩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者，却定要把階級拉向壓迫，拉向鬥爭，於是階級就變成災禍，變成地獄了。

殖民地的國家，盡全國的力量起來反抗帝國主義，尙不能成功於萬一，馬克斯主義者却偏要以階級鬥爭的面具來分散民族——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力量，這實是自己走上死路。中國革命自經過民國十六年的國共分裂，國民黨固被事實逼迫着在組織上搗和了大批的投機分子，造成了長期的內亂和貪污的局面，使革命減弱了力量。但這次事變也使中國革命得到了一個寶貴的經驗，民衆認識了共產主義的真實的內容；共產主義除了理論上的漂亮煽動外，事實上的表演就只有盲動，流血，犧牲，驅中國入地獄！不說環攻着的帝國主義者要盡着死力來撲滅中國無產階級的勢力，中國的資產階級也不會有那種過大（！）的決心預備着自己受犧牲而參加共產主義的民族革命。

一方面，共產主義既不合於中國的次殖民地的革命；另一方面，投機分子的參加革命也只造成了長期的內亂和貪污。誰都知道六七年來的內亂貪污，三民主義並未實現一絲一毫，然而一批巧於投機的官僚政客們却覺得三民主義已經夠了，現在應該弄別種玩意兒了，於是「憲政」咧，「民主」咧，一古腦兒都陳列起來，中國的政治正好像成了歷史的垃圾箱，什麼過時貨

色都被政客們當作了時髦的政治膏藥。

孫中山先生的主義，是憑着偉大的智慧和四十年的經驗纔創立起來的，在中國民族革命的道路上有其絕對的不能變動的價值。年來雖因共產黨的叛亂和投機主義的陰謀，三民主義尚不能有什麼滿足的成就，但我們決不能因此就對三民主義實行消極怠工，而應當更積極更堅決的去實現三民主義。孫中山先生所遺留下來的主義是永久正確的，但不幸孫中山先生所遺留下來的組織，第一次被破壞於共產黨的反叛，當時幸有英勇領袖的毅力主持，黨的組織總算沒有歸於毀滅，但這次因為暴日侵略的國難。一些「惟恐天下不亂」的官僚政客竟又繼着武漢時代的共產黨起來了。武漢時代共產黨的破壞只是一種外力，國民黨還容易補救，這次官僚政官的破壞，却極嚴重，他們是用的內外夾攻的方式，官僚政客們一方面在各割據的省份植立了與中央對抗的勢力，一方面又混到黨內來主張「開放政權」「實行「憲政，」實行「民主，」使中央減弱了鎮壓反動的力量。在中央處於嚴重的國難時期中，官僚政客們的妙計的確是可售的，但這妙計對於國家對於民族有什麼利益呢？「憲政」不是槍炮，「民主」不是菩薩，

我們憑什麼來抗日呢？我們相信政權開放之後，憲政民主實行之後，國難仍是原封未動，然而各種反動勢力的乘機抬頭，中國剛剛前進了一步的革命，不幸將退後千百步了。

現在，我們如不願坐視着國民黨自然毀滅，我們如不願中國革命再回到循環衰落的路上去，我們便應當在精神上在組織上立刻找出一種新的力量來幫助中國國民黨，幫助中國革命；這種新的力量，正就是現在掀動世界的法西斯蒂。在殖民地革命的條件上，在中國國民黨本身所蘊藏着的幾種矛盾上，法西斯蒂正可說是現在中國革命的對症要藥。普及於大部中國的共禍，沒有法西斯蒂的階級協力主義，便無法消除一般深入民心的階級仇恨，無法使全國一致的參加抗日從事建設。與三民主義糾纏在一起的植基在國民黨黨內的自由主義資本主義與封建勢力，沒有強力的法西斯蒂的組織主義，國民黨連本身的腐化勢力也無法肅清，整個的革命將永久像「病牛」一樣的只有退後而沒有進步了。

中國的需要法西斯蒂，現在已經不成問題了。現在所要注意的，就是法西斯蒂將要實現了，但法西斯蒂將以何種社會層為支柱呢？軍人想出來組織「軍人法西斯蒂」，資本家想出來組

織「資本法西斯蒂」搖筆桿子的空想或半空想的社會主義者想出來組織「社會法西斯蒂」偏狹的國家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想出來組織「國家法西斯蒂」許多懦弱的人們怕遭受犧牲，不敢公然主張，又想迎合着潮流偷偷摸摸地幹，等待着社會的自然變化，這又是一種自然主義的法西斯蒂了。中國剛剛由成芽而進於萌長的法西斯蒂，在大概的區別上已經有了五種傾向，但我們敢說，這五種法西斯蒂都不會有成功的希望。「軍人法西斯蒂」是變相的軍權主義，決沒有力量統一中國；「資本法西斯蒂」是變相的金融資本主義，她在英美日本都不能成功，中國用不着做這拜金主義的好夢；「社會法西斯蒂」是一種相等於無政府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空想，思想不透澈的侏儒們在馬克斯克魯泡特金的旗下碰了壁，便別走法西斯蒂的道路；「國家法西斯蒂」在思想文化進步的德意志意大利可以有成功的希望，在國家意識薄弱的中國却祇能成爲另一種官僚政客的升官發財的工具；「自然法西斯蒂」本不成爲一個獨立的名詞，但在中國的畸形社會裏，這種積極或消極的法西斯蒂的同情者將在較長的時期中佔有勢力，但他們恐怕並不希望法西斯蒂有什麼積極的成功。

如飢如渴的動亂着的中國社會究將實現何種法西斯蒂呢？這裏，我們要堅定的回答說：

「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是『青年法西斯蒂』。青年是勇敢的；犧牲的；只有最純潔的青年纔適合而且忠實於法西斯蒂的生活，纔能負擔起孫中山先生所遺留下來的使命！」

中國青年在歷史上所遭受的犧牲，簡直不是數字所計算得清的。從黃花岡七十二烈士起到現在的散遍全國的激烈的青年抗日志士，中間有「五四」「五卅」「三一八」等種種悲壯的反抗運動，此外被欺騙被煽動或被某種仇視青年的魔王所摧殘的，總計直接流血犧牲的青年至少當在三百萬人以上，目前全國各地被拘禁在牢獄中的又不知有幾十百萬。

中國青年對革命的犧牲是太大了，太悲慘了，太殘酷了。可是中國的青年却從沒有因此而對革命灰心失望，仍是那樣的堅決勇敢，踴躍猛進，前仆前繼的衝殺上去。九一八暴日的侵略事變，形成了中國法西斯蒂的基礎，無私無我的青年們便已在不知不覺中發揮着法西斯蒂的理論和行動；「國家至上主義」性質的抗日與愛國的宣傳，「棒喝主義」性質的做戒政客奸商的行動，這都是根據於偉大的犧牲精神的法西斯蒂而發揮出來的。可惜這種法西斯蒂的發揮，

沒有成爲系統的理論和具體的組織；在官僚政客的欺騙下，在學者名流的播弄下，青年們所據有的理論往往走上曲解的歧途，組織則更渙散混亂，倏起倏滅，沒有持久性。英勇的青年們如要負擔起抗日的使命，負擔起中國革命的使命，首先必須求得理論上的澈底系統和行動上的嚴密組織；這樣，中國青年便將離開一切官僚政客名流學者的依附而形成中國青年自己的理論與組織，這就是背負着世界使命的中國的「青年法西斯蒂」了。

中國的青年們從歷史的悲慘犧牲中應該得到了充分的認識和經驗，在長久的革命的試驗過程中理論水準也早應相當提高了，中國青年將不致再爲任何欺騙與煽動所迷惑，中國的青年們對橫亘在面前的任務大概已有自主的能力了。當然，中國的青年領導了中國的法西斯蒂，並不就放棄其他的一切社會層。中國法西斯蒂需要廣大的勞動者的參加，中國法西斯蒂需要產業家和革命的軍人士兵，還需要有反抗性的商人和中層階級。青年是純潔的勇敢的，他們從社會的各階級中產生出來，但他們的純潔的意識却沒有存留着任何自私的階級的偏見，能夠順利的執行法西斯蒂的階級協力主義；他們從種種的犧牲與挫折中洗鍊出來，但他們並沒

有因此滅失絲毫的勇氣，反而鍛鍊得更沉着，更堅決，更適合於法西斯蒂的組織主義的紀律的生活。什麼「社會法西斯蒂」，「資本法西斯蒂」，「軍人法西斯蒂」，「國家法西斯蒂」，雖也各有其社會基礎和歷史前途，但他們在英勇的青年「法西斯蒂」之前將顯出軟弱無力。青年是智慧的勇敢的，中國的「青年法西斯蒂」將有步驟的擔負起一切「資本法西斯蒂」，「社會法西斯蒂」，「軍人法西斯蒂」，「國家法西斯蒂」以至於「世界法西斯蒂」的任務，而完成三民主義對於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使命！

中國社會主義之旗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長其長；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一

大同主義，在中國已鬧了好幾千年。與大同主義相類似的社會主義，則在世界成爲一種盛熱的實際的運動，自聖西門、傅利葉、歐文各派社會主義運動者到現在，也已有了好幾百年的歷史了。這醜惡的現實，這黑暗的社會，人類不盡是麻木不仁無知無覺的草木禽獸，人類爲着要毀滅那醜惡的黑暗的現實社會，以企求幸福，追尋光明，於是大同主義社會主義便成了人類最後努力奮鬥的焦點了。爲了社會的利益，爲了人類的幸福，先聖先賢以及前仆後繼的革命先烈，不避流血，生死以赴——人類的歷史是何等悲壯偉大啊。

不過大同主義的被人景仰神往，三數千年來始終還只是供人欣賞玩味的幾句空話，社會主義的被人掙扎奮鬥，前仆後繼，二百年來還只是使世界憧憬着的泡影。大同主義沒有實現，社會主義也沒有成功。

一九一四年世界發生了第一次大戰，資本主義的世界已經熟爛崩潰了，世界各部份的社會機構都在醞釀改變的過程中。在這大戰開始，結束，以及到現在的整整二十年的時間，列寧主義在蘇俄首先成功，接着墨索里尼主義在意大利，孫中山主義在中國，希特拉主義在德國也都

先後成功了。俄意德及中國等革命的成功，可說是舊社會舊世界的變革已在實行開始，不論中俄意德各國的革命形式上有多大的差別，內容上有何等的不同，但這一部份的革命後的世界，總已經相當的確立了大同主義社會主義的基礎。

世界是時時刻刻在改變着進步着，人類對大同主義社會主義的經驗一天一天豐富，認識一天一天深刻，大同主義社會主義就使是高懸在天上的東西，在長期的奮鬥與犧牲中，人類最後也能憑着自己的能力把大同主義社會主義的世界建立起來。當然，社會上有了進步的人，同時也就有保守的人，進步的人努力把世界向前推，保守的人也會拚命把世界朝後拉，可是保守的人會隨着時代死去，進步的人最後還是要得到勝利的。世界是這樣的在保守與進步兩派的搏擊毆鬥之中，或快或慢的得到了進步了，而且一天一天的走上大同主義，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了。我們試看那許多革命後的新國家，列寧起初是走着馬克斯主義的路線在蘇俄建立社會主義，最後則放棄了馬克斯主義的機械觀點而採用新經濟政策以穩定了革命的政權，他們至今還是在以社會主義國家自豪着。意大利的首領墨索里尼雖曾以反對社會主義號召意大利

的國民，但墨索里尼所反對的社會主義實在只是共產主義，墨索里尼並沒有要把社會主義的路堵塞起來，墨氏在求得意大利革命政權的根本確立之後，以工團主義的精神建立「協團國家」，藉生產階級的協力以改善舊社會，建立新社會，這很明顯的是趨向着社會主義的前途啊。至於中國和德國，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整個的就是科學的大同主義，同時孫中山先生也曾一再說明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德國的希特勒則很明白的在以國家社會主義向世界與德國呼號，這樣看來，事實上中國德國的革命是離不了社會主義的啊。

二

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在人類沒有深刻的認識到社會主義的時候，這名詞簡直就是一個不可測摸的怪謎，有人對之膜拜，也有人對之狂怒，其實膜拜與狂怒都是無謂的舉動。社會主義是需要人類自己的力量來建立的。因為社會主義不是像鏽物那樣可以從地底下挖掘出來。也不是像動植物那樣可以在地面上培植飼養，而老實只是存在於人類相互之間的一種組織體，

一種制度。這種所謂組織，所謂制度，並不是宇宙間自然存在的東西，而完全是人類自己的創造，是人類爲着本身生存上的需要而創造出來的。這種創造工作的出現和成功，當然各國都自有其不同的歷史條件，列寧墨索里尼希特勒以及孫中山先生，他們都同樣是世界各國唯一的革命領袖，但他們對於現實的改造及新制度的創立，却有着不同的方法和形式。雖然這些方法和形式上的不同，對於根本上革命的意義並沒有什麼矛盾，然而這正是根據於歷史條件的不同而來的，意大利的法西斯蒂不能適合於俄國，俄國的佈爾什維克也不能適合於中國，這便是各民族各國家歷史條件不同的緣故。雖然在較遠的將來，這世界或將歸於統一，由各個國家的社會主義而進展爲整個世界的社會主義，但這也須等到革命的對象完全改變以後才有可能。在目前這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革命，當然不能忽略這一個民族與這一個國家的歷史。當然，國家（民族）革命不能與世界革命作機械的分離，但在人類社會歷史性的發展上看察，革命的對象與任務的轉移，我們是不能不有深切明白的認識。

世界自一九一八年後，因承着第一次大戰的空前鉅大的消費，市場上的商品銷售一空，所

以資本主義世界又能夠得到一個發展繁榮的機會，但可惜這個發展繁榮的機會時間並不長久，十餘年後，到了一九二九年，所謂「永久繁榮」的美國也發生了激烈的經濟恐慌，資本主義的市場又普遍的塞滯起來，資本主義的制度顯然不能再適合於一九三〇年以後的世界了。雖然有極少數的保守派的人們爲着私人的利益，希圖用各種黑暗或殘酷的方法，藉以維持資本主義制度的存在，但這種垂死的掙扎，最後是要失敗的。二十世紀的世界，科學的進步使人類生產力大大的發展膨脹，不改變社會制度以求得生產與消費的協調關係，這世界將永久不會有和平幸福的日子。這騷擾的世界，產業發達，組織鞏固，力量強大的國家如英美法日等國，尚可倚恃着龐大的帝國主義的軍備向殖民地或弱小國家進行殘酷的侵略，以苟延喘息挽救其國內的艱危；蘇俄意德等國則正藉其新興的制度，消除一切國內的矛盾，努力爲民衆建立幸福的基礎；可是像我們這老大的中國，產業凋零，組織渙散，軍備幼稚，至今還是受着世界帝國主義共同宰割的次殖民地，世界一有騷擾的風聲，中國便立刻有被列強滅亡瓜分的禍患。九一八事變東四省的被日本變相侵佔，便是民國以後中國被帝國主義第一次武裝侵略的事實，在這國難嚴

重的關頭，中國如再不急圖奮發自強，亡國之禍實已近在目前了。「和平奮鬥救中國」孫中山先生努力革命四十年，在其生命的最後一剎那間猶頻呼不絕於口，我們這後死者究將怎樣以救中國，救世界呢？我們如願做亡國奴則已，否則救國的急務，實已到了最後的一刻了。

三

封建制度在世界上早已沒有存在的餘地，資本主義制度也在開始沒落了，我們用什麼方法來救中國。用什麼制度來建立中國的新社會呢？封建制度既已成了歷史的遺骸，資本主義制度又已走上潰滅的路中，中國當然只有持最大的決心，決努力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了。也許有一部份保守觀念太深的人，一聽見社會主義四個字便駭怕起來，以為社會主義是吃人的怪物；又有一部份輕率急進的人們，一提起社會主義便搬來了馬克斯主義，以為馬克斯主義才是科學的社會主義，中國受着這兩種勢力的牽累，於是中國的革命便日在反動勢力的破壞與抵消之中。

其實那些封建復古的遺老遺少們，他們讀起「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的文章來，總是讀得搖頭擺尾，在理想上吟味大同主義，可以得意非凡，却不想大同主義如能夠實現，才是更得意的事啊。四千年來被人吟味神往的大同世界，一旦見諸現實，那是何等偉大的事情而且可以歡欣的事情啊。中國保守復古的人們在理想上既愛好着大同主義，爲什麼在實行上一聽到社會主義的名詞便要駭怕，這不是一個極大的矛盾嗎？

輕率急進的人們，迷信馬克斯主義是科學的社會主義，這種錯誤是太可憐了。馬克斯主義如果真是科學的社會主義的話，馬克斯主義早就可以計日成功，不至到現在百餘年後仍舊只是一個犧牲勞動階級的煽動和欺騙的工具。馬克斯的故國德國，至今百餘年並沒有實現馬克斯的主義，就是馬克斯所認爲資本主義先進國的英國法國，應該首先實現共產主義的，可惜也沒有如其所料。倒是生產落後的舊俄帝國，出於馬克斯的望外，首先被標榜共產主義的人們統一一了政權了。俄國的革命，當然完全只是領袖列寧及列甯的主義的力量，所謂馬克斯主義，不過是列寧及其黨人用以號召標榜，藉以獲得社會的同情和響應罷了。在列寧既取得政權之後，爲

了要施行新經濟政策以挽救實際的困難，列寧也就斷然高喊出「不惜犧牲一切的主義」的口號來。馬克斯主義不適合於蘇俄，所以列寧開始雖然標榜了馬克斯主義而得到了政權，但最後在制度的實行上，却終於不得不放棄馬克斯主義了。

中國要想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排除封建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當然只有實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先生依據着中國的歷史和適合着中國的社會，在四十餘年的長期奮鬥的經驗中創造出來的。一般喜新厭舊的人們，在國民政府三民主義的政權下生活了七八年，看見國民黨執政後的中國依然是混亂渙散，貧困衰弱，禍亂頻乘，民不聊生，便對三民主義表示不滿，甚至過去信仰三民主義的，現在竟離黨叛國，實行破壞三民主義，這樣的人顯然是對中國革命，對三民主義，從來不曾有過深切透澈的認識。他們沒有明瞭中國革命除三民主義以外再無第二條路可走，沒有明瞭三民主義在中國是最現實最合乎科學的社會主義，他們又沒有明瞭十六年國民黨統一中國，三民主義未能及早實現的原因。試想國民黨在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勢力的內外交通夾攻中，國民黨雖已取得了政權，然而妨害革命的反動勢力並未

完全清除，革命建設的任務常常要遇着種種障礙而停滯起來，那末三民主義的沒有能在這七八年中便即實現，實是很平常的事情。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起於外，封建軍閥的割據叛亂應於內，中國革命正還在開始着一個長期的浴血奮鬥。若謂三民主義可於立談之間就得實現，恐怕世界決沒有如此輕快容易的革命吧。

四

外強侵凌，內亂紛起，社會矛盾又復千愁百結，究竟何處是中國的出路，現在已成迫不及待，急須解決的問題。中國傳統下來的封建制度萬難繼續存在，資本主義制度也不能適合於中國——前面已經說過，未來中國的社會制度，唯一能夠適合的只有社會主義。中國如要學歐美資本主義國家走資本主義的舊道，那中國的資本主義非但不能成功，恐怕很快的會被環圍四週的帝國主義者瓜分滅亡了去。單純的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在力量薄弱的中國產業中他本身便無從造成雄厚的勢力，內以撲滅封建勢力，外以抗禦帝國主義，甚至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的苟

合密結，中國資本主義反成爲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共同御用工具。我們試看那些以帝國主義爲背景的新舊封建軍閥，他們從事內戰，有帝國主義供給槍械彈藥，他們要擴張私人軍隊霸佔地盤，可以任意加增苛捐雜稅，甚至勒種鴉片，包庇烟賭，在這種形勢下發展資本主義，事實上只是加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榨枯而已。封建軍閥日夜在希望加重剝削，增加稅收，帝國主義也日夜在希望開發中國，擴大市場。中國如單純的去發展資本主義，這不正是投合了封建軍閥與帝國主義者的願望嗎？所以我們熟籌深思，審察一切，要想復興中國民族，要想推進中國革命，只有決心開拓社會主義的道路，揭起社會主義的旗幟，在：

(一) 政治方面需要全體國民的協力團結，實行組織堅強行動活潑的民族獨裁政治，即實行國民黨的法西斯化，強力執行三民主義，對內肅清封建勢力，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實現中國民族的國家社會主義。

(二) 經濟方面立即執行孫中山先生的「錢幣革命」政策，統一全國金融制度及金融組織，解放一切無理的封建的內在的經濟束縛，打破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金融及產業的操

縱劫持，用政府統制的力量發展全國的生產，規定在最短時期內實現孫中山先生的全部「實業計劃」，以造成中國實現大同主義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三) 軍隊方面實行全國革命軍隊的統一組織，軍隊應是最高革命領袖的軍隊，應是國家民族的軍隊，一切私人系統及足以分化革命勢力的軍隊，當以最大的犧牲使之撲滅清除。革命不能沒有武力，但假革命或不革命的軍隊，祇足以虛耗國家金錢，斲喪民族元氣，却是非消滅不可的。

(四) 文化方面應做到一切文化須為國家民族的發揚光大而存在，須加以最大的統制使之為國家民族而努力。文化不是反政府的工具，也不是私人謀利的工具，進步的文化能夠導誘民衆走上革命的大道，幫助政府對於社會主義的建設，絕不能被任何自利主義者用之對現狀作盲目的煽動和破壞。

一切都已陷於絕境的中國，國民如不甘願滅亡，社會主義的時代是一定要到來的，我們謹預祝中國社會主義的降生及其成功！

國民黨恢復總理制與中國法西斯蒂的組織問題

在這民國二十三年的時代，我們便若有其事的來討論中國法西斯蒂的組織問題，也許是一種不必要的或者是一種過早的忙碌吧？中國是否需要法西斯蒂，或者中國祇需要在相當的限度之內採納法西斯蒂的精神，這本來都是另一問題。但至少我們可以相信，在國民黨未決心放棄專政以前，即是國民黨的最高領袖及國民黨的全體中央委員在三民主義的建設未真正完成以前，不草草結束訓政，勉強實行憲政，中國的法西斯蒂可說是沒有單獨起來爭取政權的必要和可能的。中國法西斯蒂暫時既還談不到爭取政權的問題，那末現在就談論起法西斯蒂

的組織問題來，對於事實當然不會怎樣的真切。

中國有一個最可注意的現象，就是一般民衆對於政治的放任忽略與一般政治家（？）對於政治活動的輕率燥急。當世界發生了某種政治思潮或政治運動，這種思潮與運動雖能震動全世界，但中國民衆却能毫不察覺似的放任過去，而那些奇怪的政治家（？）呢？他們不單有了太敏銳的感覺，並且還能憑着他們那種太敏銳的感覺去支配他們自己的行動。世界有了什麼，只要他們的感覺能夠接觸到的，他們便會在中國也照樣來製造什麼。雖然身為國民黨黨員，也不妨預先佈置一個陣勢，留作他日政治變動時圖謀繼續活動的餘步。至於客觀條件和民衆需要的問題，在感覺敏銳的政治家（？）目光中，簡直是一件無足輕重的事情，有錢，找幾個文人，把外國政黨的綱領和理論作藍本，便可在租界上的小洋房裏組黨了。若再找得若干軍人政客互相聯絡，更有一買辦資本家或金融資本家作經濟上的接濟，那就要算是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了。

民衆不知道什麼是組織，而感覺敏銳的政治家（？）則太愛組織，結果任何軍人政客在

高興時都可隨時捧出民衆的招牌，組織的幌子。但實際上這組織是怎樣的內容，與民衆有怎樣的關係，誰都不知道啊。這些感覺敏銳的政治家（？）的投機組織，除對外國作無恥的效顰，而對本國則極盡了製造內亂的能事以外，就只有堆積成山匯流成渠的被害民衆的白骨與鮮血，以及愈加衰弱的民族國家，和一筆征勦討伐的鉅額的國內戰費。

九一八暴日侵佔東三省事變發生後，中國民族如火如荼的反帝情緒爆發起來，老死不問政事的中國民衆受了這嚴重的刺激，現在却也關心國家關心民族不惜斷頭折足傾家蕩產以拯救國家，都成爲堅毅勇敢的愛國志士了。義勇軍的抗禦日軍，「血魂團」的排除奸商，彌漫全國的抗日空氣，加以政府的懦弱無能，外不足以禦強暴，內不足以除奸賊而一般散沙的四萬萬民衆又不能一致行動，在這事實的教訓之下，於是中國感覺到組織與紀律的需要，感覺到中國有容納法西斯蒂的精神的必要了。接着看到德國希特勒革命的成功，以及世界經濟恐慌的陣緊逼，更使全國民衆同時感覺着中國應立刻實行法西斯蒂，「法西斯蒂救中國」幾成了上下一致，萬衆一聲的呼號。

可是革命並不像砌造一隻火爐那樣簡單容易，中國需要法西斯蒂，但中國却不能立時立刻便砌造一隻法西斯蒂的火爐。三民主義是中國革命唯一適合的主義，孫中山先生規定的建國的制度也是中國革命唯一適合的制度，那末法西斯蒂既不能像對待火爐那樣放棄了舊的而另行砌造新的，事實上就只有以法西斯蒂的力量去充實國民黨的革命。所謂法西斯蒂的力量，法西斯蒂的組織與紀律，本來是國民黨所固有的，孫中山先生歷次改組其所領導的黨，沒有一次不是爲了要加強組織嚴正紀律而實行改組，而且每一次改組都有黨員須絕對服從領袖遵守紀律的訓誨發表。可是自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後，國民黨停止總理制，實行委員制，於是組織徒具形式，紀律已等空言，種下了中國革命最大的致命傷。組織渙散，黨便會變成一國三公，什麼事都做不成；紀律荒廢，黨便會立即變成貪污集團，非以救民而反以擾民了。

孫中山先生在親手領導國民黨的時候，國民黨的組織與紀律既早已充滿着法西斯蒂的精神，那末現在在全國民衆的自覺狀態下，只要國民黨恢復當日孫中山先生所規定的制度和精神就好了。國民黨只要恢復總理制，嚴厲樹立黨的紀律，我們相信中國革命在極短的期間內

就可以超過德意志，甚至超過意大利的。國民黨恢復總理制，實在有千利而無一弊，民衆歡迎，全體黨員也歡迎，所困難的就只是那些自視甚高的「革命元老」們，他們深恐自己做不到總理，而又不願向誰低首，就以爲恢復國民黨的總理制是大逆不道了。其實事與人的問題是根本不相同的，對人而論，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擴充到三百萬的數目也不嫌多，因爲這樣就每個小黨員都可以做中央委員，但對事而論，則現在濟濟滿堂的一百七十八位中央委員實在還不敵半個總理，因爲委員多，派別多，力量的牽掣也多，結果除爭權奪利外，反是一事無成。

中國需要法西斯蒂的精神，國民黨需要恢復總理制，這都是我們在國民的立場上，在黨員的立場上，最忠誠的說話。我們做小國民做小黨員的，只要有國可救有力可用，就會不避艱險，勇往直前的去拚死。究竟誰來做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的第一個總理，蔣介石也好，汪精衛也好，胡漢民也好，只要能夠掌握住全部革命的力量，得到多數黨員的擁戴，這個被擁戴的領袖就應該毅然出來負擔總理的重責，完成中國的革命。否則國民黨如不克完成自己的使命，長在領袖的意氣與私鬥之中，不久訓政期滿，中國法西斯蒂也許要毅然起來代行國民黨所未完成的

任務吧？

最近見晨曦載天一君之「論中國法西斯蒂應取之策略」一文，作者與天一君表示同意之處固多，但不願隨聲附和之處亦不少，尤以其中「直接政策」一節爲怪誕不堪。天一君詳道其十人徵求法，一若革命組織祇需要有縱的關係，而不宜有橫的關係，庶免起「分化」及「不復爲我所有」之弊。實則革命根本不能避免縱橫組織之複雜關係，主要者乃在於領袖對內對外之應付方針及權威運用以及領袖偉大人格之表演。若謂法西斯蒂之成功在於領袖對黨員之蒙蔽與隔離，則未免厚誣墨索里尼希特勒矣。又天一君之「直接政策」如真能加強組織而獲得成功，則國民黨中若干領袖之「裙帶政策」豈不更萬歲萬歲萬萬歲耶？

本篇之作，原擬與天一君討論法西斯蒂之組織問題，但在論列國民黨恢復總理制一問題後，深覺國民黨如能恢復總理制，則法西斯蒂之革命精神已有被國民黨充分容納之可能，吾輩祇須誓死努力不避流血以擁戴此最高領袖，（國民黨的總理）實無另起組織的必

要啊。四五十年來中國民衆爲革命而流血，已流至最後一滴，我們難道還希望再有一個與國民黨對立的組織以重吾民嗎？法西斯蒂精神誠然可貴，但法西斯蒂精神如能注射於國民黨那就更可貴啊！中國法西斯蒂既以注射法西斯蒂精神於國民黨爲第一義，本身的組織問題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所以起初預備駁斥天一君組織理論的文章，在正文裏竟未及詳論，只好在此拖一條尾巴以了公案。

作者附識

中國革命怎樣進行

引言

「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行動！」這是革命的格言，也是革命的定律。合乎理論的行動是前進，革命，背乎理論的行動便是後退，反動。二十餘年來的中國隨着理論的顯耀與沮沒，時而前進，革命，時而後退，反動，在歷史的軌道上走盡了「前進一步後退兩步」的冤枉路，結果革命沒有給與民衆什麼東西，却招來了不堪的混亂與黑暗！領袖們未上台，未握到政權，往往愛

高談理論，痛惜民衆，但一上了台，握得了政權，便「爲政不在多言」，於不知不覺間默默地幹後退反動的勾當了。

一八九四年孫中山氏創立興中會，鼓吹民族革命，這是中國革命在理論上的起點；一九一一年南京成立臨時政府，這是中國革命由理論進於現實的開始。可是辛亥革命的成績，祇推倒了國際帝國主義（？）足下的一個御用機關——滿清政府，對內沒有消滅社會矛盾，對外沒有得到民族自由，革命的基本任務仍是原封未動。但一般放棄了「八股」投奔革命的人物，便以推倒滿清政府爲滿足，又去投奔袁世凱投奔黎元洪投奔曹錕甚至投奔大大小小的軍閥；政府很快的回復了滿清政府的反動性，同樣的做帝國主義的御用機關，同樣的壓迫民衆反對革命，所不同的只是滿人換了漢人。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北伐成功，中國國民黨統一中國，這是孫中山氏的革命理論第二次進於現實的境界了。這時三民主義的理論已普及全國，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北伐的成功形式上雖由於軍隊，實際上却是由於人民的援助。這時期，一步一步都在展開孫中山的主張，如

漢口英租界的收回，政府確實由帝國主義的御用機關變爲自主自治的民族國家機關了。不幸冀漢山內部糾紛發生以後，雙方從事於實力的較量，理論成了武力的點綴品，於是理論又來了一個沮沒時期，在不明顯的狀態中，各個軍閥實行割據，中國革命再走入『前進一步後退兩步』的軌道上了。

激烈的內戰的結果，終於成釀了二十年九一八暴日侵佔東三省，二十一年一二八轟炸上海和今年侵略熱河的慘禍。這慘禍的發生，不論在物質方面在主權方面都是民族莫大的損失。中國在這鉅大的犧牲之下所得的可貴的代價，便是『前一進步後退兩步』的歷史現象將在這教訓下有結束的機會，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在去年十一月七日發表的談話中說：

『當去年九月，滬變突作時，余曾預言，內戰時代行將告終。往日軍人間倘發生武裝爭執，中與當下嚴令移軍往討。今則政府知武力統一，既難集事，又非所宜，故欲施行道義之制裁，藉與論之助力，解決地方爭執。』

『武力統一』是軍人的迷夢，同時也是革命的絕大犧牲，內戰的結果縱使不根本推翻革

命，然而延長了革命的破壞時期是不可諱言的。現在宋氏代表政府，聲言「藉輿論之助力，解決地方——當然連其他一切革命的糾紛都在內——執」這顯然是中國革命又推進一個新的階段了。如果我們確定辛亥革命爲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二十六年北伐勝利爲第二階段，那末九一八以後便應該轉入第三階段，這一個新階段的開始，便是中國革命努力於社會建設的開始。在這一時期，武力已不是政爭的工具，誰最有能力建設中國，誰便能在政治上爭得勝利！換句話說，就是誰最能承繼孫中山的革命理論和革命精神來建設中國的，誰便能取得勝利，統一中國。

當然，繼承孫中山的理論，決不單在於形式上的尊崇，也不單在於斷章取義的鈔錄，而要在實際上運用，使理論的三民主義進於現實的三民主義。我們如果虛心檢查一下過去的事實，北伐後的中國除在政治上軍事上有若干形式的改變，經濟上財政上什九還是在摹仿自由資本主義的神髓，民生問題不得解決，民族資本不得發展，國內產業愈趨愈衰落，社會秩序也愈趨愈混亂了。擔負着中國革命的重任的國民黨，如只想倚恃現有武備和既成勢力來維持統治，勉

強圖存，那就算了。如果我們要想求得和平的統治，對內雖撤廢了一切的武備而能不搖動統治的基礎，這種光榮的統治就必須在孫中山的主義中去尋覓。

革命的『前進一步後退兩步』的時代過去了，我們將怎樣利用這機會來展開中國革命的新道路呢？我們試依着孫中山的理論，適應着現實環境，分開經濟，軍事，政治，外交的四個主題來討論吧：一，發展民族資本，二，培植民衆的武力，三，澄清政治，四，確立正義與和平的外交政策。

一 發展民族資本

在世界帝國資本主義的控制下，前年海關入超達六萬萬兩，輸入品除工業品外，農產品亦佔主要的成份，這證明中國經濟的衰落已到頂點了。在這現象下，革命急要的任务自然是挽救衰落的社會經濟，挽救倒懸的民生問題。挽救的方法，國內學者早已在討論，或則在實際努力作種種解除民衆痛苦的運動了。不過在各種實際運動和理論當中，我們認爲『發展中國民族資本』是一件切實而正確的辦法。至於發展民族資本的方法，在孫中山的遺教中早已有明白

的規定了。從「錢幣革命」的短文以至於「實業計劃」的偉著，這都是發展中國民族資本最有效最穩妥的捷徑。也許有一些左傾幼稚的同志們不了解孫中山氏理論的偉大，嘲笑走「捷徑」的革命，可是事實最雄辯，等到把自由資本主義的方法和共產主義的方法摹仿到了無可再摹仿的時候，我想這許多在行動上在口頭上誣譏孫中山氏的同志們總有回頭的一天吧。

在目前談發展民族資本，首先應當顧慮到的：第一，國際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的壟斷，第二，不平等條約的存在，前者使中國民族資本窒息於世界金融潮流之下不得活動，後者則使中國關稅不能自主產業無從發展。第三，資本短少，產業運用不能活潑，第四，農村經濟受封建力限制，生產不容易擴大。綜上四項困難，我們如迂迴曲折地在共產主義或自由資本主義的理論下求解決，那是絕對走不通，如實行孫中山氏錢幣革命的主張，走列寧「社會——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那就一切困難都沒有了。

社會資本主義的理論早已具備於全部孫中山氏的遺著中，列寧在蘇俄共產主義經濟發生嚴重的危機以後纔施之於現實，現在蘇俄計劃經濟着着實現，差不多完全成功了。錢幣革命

這個名詞雖沒有被蘇俄革命領袖和經濟學者所口頭引用，但實際上也早已運用無餘，蘇俄由自由資本主義的銀行改變為社會資本主義的銀行，使金融組織根本改善而得了長足的進步，這正是孫中山氏錢幣革命在實際上的活潑應用。

中國實行錢幣革命，當然不能機械地摹仿蘇俄共產主義的方法，也不能像最近在南京成立的「中華錢幣革命協進會」那樣的摹仿自由資本主義。共產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都站在階級鬥爭的基礎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社會資本主義則站在階級協力的立場上。錢幣革命在階級協力的立場上當然與在階級鬥爭的立場上完全不相同的。

錢幣革命的實行，依照孫中山氏的理論系統，第一是確定錢幣制度，規定錢幣的「交換之中準」或「貨財之代表」的地位，第二便是鞏固金融基礎，擴大銀行組織，使錢幣得以健全地發揮出「經濟紐帶」的作用。（限於篇幅，詳細解釋當另作專文。）中國經濟得有這個順利的流動工具，發展民族資本的困難就都解除了。譬如（一）國際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的壟斷，因為錢幣革命後生產資本已不受金銀的拘束，國際的金元與金磅便不能再在幕後操縱。譬如（二）

不平等條約，因為錢幣革命後產業發展，失業減少，國內市場無形擴大，同時輸出品成本減低，不平等條約的拘束亦已減少效率，各資本主義國家要想獲得產業革命後的中國市場，改正或放棄不平等條約也是必不可免的步驟。在產業沒有發達以前談取消不平等條約實是句空話，在產業發達以後談取消不平等條約，有事實做基礎，那是很容易的。譬如（三）資本短少，因為錢幣革命後國內的金銀和紫銅等都不需要，得有大宗的資本向外國購買機器和原料，國內則有健全的金融制度和銀行組織運用「信用貨幣制度」，資本短少的話決不成問題的。譬如（四）農村經濟受封建力限制生產不容易擴大，錢幣革命後因為有了雄厚的生產資本和嚴密的金融組織作後盾，生產工具與生產技術的改良都不是煩難的事，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也不能再繼續存在，那末殘餘的封建勢力也是不成問題了。

實行錢幣革命，實行社會資本主義，一方面開拓了中國革命和平發展的平坦大道，消除了發展民族資本的一切障礙和困難；一方面還有更偉大的作用，那便是實行錢幣革命後，社會經濟可以永遠不發生「恐慌」，在社會資本主義的基礎上，不問社會進化到如何程度，也不會發

生階級鬥爭和貧富矛盾。

二 培植民衆的武力

一派迷信武力萬能的人總想依賴槍桿子革命，結果歷次的內戰老百姓先遭殃，打來打去革命還是毫無辦法。擁護小軍閥來打倒大軍閥，政客們或可從中取利，升官發財，對於革命對於民衆實在沒有絲毫的利益。大軍閥不革命，小軍閥又何嘗能革命？試觀歷來中國的內戰，政客們拚命在幕後搖旗吶喊，佈置陣線，把小軍閥贊美得孫中山再世，列甯復活，但等戰爭結束，小軍閥上台，還不是「天下的烏鴉一樣黑」，「一蟹不如一蟹」嗎？凡有政治常識的軍事領袖，他們決不願把流血追隨的兄弟做政客賭博的資本，非到萬不得已時不肯輕於用武。可是那些「暴發戶」的富於領袖慾的軍人，把兵士看作不值錢的奴隸，經不起政客們一次兩次三次的挑唆慫恿，便勇敢的內戰起來了。

本來，革命的力量應該建築在多數民衆身上，不應該依賴少數的軍事領袖。十六年國民革

命軍北伐的時候有一個寶貴的口號：

「第一步變軍閥的武力爲革命的武力！

第二步變革命的武力爲民衆的武力！」

這一個口號，實是處置武力最現實最科學的路徑。北伐成功後，領袖慾熾盛的軍人要攘奪地盤，攫取位置，雖於曹吳軍閥既倒之後，還拚命吮吸了民脂民膏來招兵買馬，對名義上初告統一的中央發動內戰。於是「第一步變軍閥的武力爲革命的武力」這半個口號大家都似是而非的在拚命幹，而「第二步變革命的武力爲民衆的武力」的精髓却置在腦後了。貪得無厭的軍人總以爲自己手裏的軍隊越多越好，恨不得把全國四萬萬五千萬的人民都收編爲自己的軍隊纔爽快，却不想兵多了國家財政怎樣維持，國民經濟怎麼得了！

九一八東三省事變以後，「武力統一的」好夢終究打碎了，有如朱子文院長所云：「內戰時代，行將告終。」但我們不要過於深信人類偶然受某種刺激而良心發現的作用，事實上如山東四川等省的軍人雖在國難時期也免不了火併廝殺。軍人們偶然的良心發現既不可靠，那末

所謂「光榮的統治」、「和平的統治」究竟怎樣實現呢？中國喊裁軍或編遣已不止一次，並且也做了不止一次，可是和平的統治終未實現！我們應知中國不單兵多爲害，主要原因還在於軍隊的多頭現象和外抗不足內戰有餘的現象。所謂和平統治並不是要廢除一切軍備，武力；和平統治需要更新式的軍備，需要更堅強的武力，要這樣纔能抗禦外來帝國主義的武裝進攻，掃平國內野心軍人的跋扈行爲。

堅強的能夠永久爲革命服務的武力是什麼？我們如不是健忘或神經昏亂的話，誰都知道這是民衆的武力。社會在動亂時期，政府即使禁止民衆有武力，民衆的武力也自然而要成立起來。人民不許有槍，但人民爲了要「保家衛國」，都蜂然起來辦大刀會紅槍會，有了政治意識的甚至起來暴動編練反政府的軍隊，九一八後又新添了名目繁多的「義勇軍」、「救國軍」。這許多「保家衛國」圖謀自身生存的武力，我們如能使牠普遍起來而積極加以領導，那就外患不足憂，內亂也不足怕。中央受了一二八滬戰和剿共軍事的經驗，對於民衆的自衛事業現在也特別注意了，各省縣市都積極籌設保衛委員會和民團。可是民團專注於

軍事訓練而忽略了政治訓練，這裏面實蘊藏着不堪預想的矛盾。因為我們不加政治訓練，一般野心政客野心軍人自會去暗中訓練；我們現在諱言革命，但將來鬱積而暴發起來，星火燎原也許會弄到不可收拾！雖然民間的武裝惡劣，有異動時不難剿滅，可是那種不教而殺的「痛剿」大兵到處，慮舍爲墟，非但「有傷仁心」，並且也損滅整個的國民經濟，動搖統治的基礎。

現在提倡人民自衛，整頓民衆武力，當然是切要的任务，但必須與「變革命的武力爲人民的武力」的口號聯繫起來，政府除保留若干精良的有新式戰具的中央軍以作國防剿匪之用，無家可歸的士兵撥去築路屯墾，受有政治訓練的士兵軍官便去領導或加入民團。這在政府方面節省了鉅大的餉額，中央軍因改良戰具亦充實了力量。在革命方面因有廣大的民衆武力爲後盾，野心軍人和野心政客雖想作亂，也受着威脅不敢發動了；但這必須民團有深刻的政治訓練，如果民團沒有政治認識，便隨時會被軍閥或政客所利用。總之，培植民衆的武力現在已是急不容緩，但必須抱定「變革命的武力爲民衆的武力」的目的，站在革命的立場上去進行，否則廢什民團，什麼自衛，不是時髦文章，便是新種一些禍根！

三 澄清政治

大革命後，經濟衰落，生產停頓，全國民衆都陷入無路可走的環境中。一部份年壯力強不甘沒落的便去投軍當兵，一部份思想變態的便去做土匪，綁票和竊盜，年老身弱的便只得做乞丐流民。一般黨員和進步的智識份子們因爲有優越的地位和出衆的社會活動能力，用不着去當兵，做土匪，做乞丐，潮水似的湧入政界了。政治須歸黨領導，受黨指揮，本來沒有疑問的，可是政治一旦變爲黨員角逐個人生活的場所，那就不成體統了。

在黨的祕密時代，一些同志們都在工人農民商人中做着鬥士，革命成功，忽然辦政務，自然昏昏然的莫名其妙。於是取巧的同志們貪圖辦事熟手，在手下搜羅幾個舊官僚做祕書科長或「祕密顧問」，那就不得了，一切軍閥時代的怪現象都會在青天白日旗下面復演出來了！從出生入死中奮鬥出來的同志們，誰都不甘心做反動腐化的事情，可是當我們的「熟手」和「祕密顧問」強奸代行了以後，也只好一笑置之，久後竟就同化了。

政治是一切社會活動的總樞紐，政治腐敗而整個社會能夠不腐敗，那是從來沒有的。挽救中國，首先得從政治着手，一切駢枝機關及冗員須痛快裁撤，嚴厲懲罰貪污，善良的官吏確定保障他們的生活辦法，同時以提高民權爲目的，盡可能的推行地方自治。但是整本清源的辦法，須使不專長政治的黨員不再向着政治的路上亂鑽亂跑！據一般調查，住在南京各旅館客棧候補做官的往往有三四萬人，照這數目推算，全國想做官而等待着的至少當有四五十萬，加上一般新舊智識份子失業賦閒的就有一百萬。不把這候補的一百萬安全的處置，而求現任的官吏廉潔熱心，這是緣木求魚。一個現任的位置背後往往有四五人在候缺，在鑽營，稍有不慎或忤逆上方意旨，便馬上有撤職另委的危險，現任的當然都存心五日京兆，專想撈幾個錢壯壯腰了。

所以要澄清政治，必先掃除鑽營候補的隊伍，什麼委員，什麼專員，說好聽些是多了一個駢枝機關，多耗費幾個民脂民膏，說得不好聽。那末普通官吏剝削人民，高級官吏則剝削低級官吏。這樣疊床架屋，層層剝削，你想中國如何得了。

掃除鑽營候補的隊伍，當然不是幾句簡單的話。大批的同志們所以會落入鑽營候補的隊

伍裏，實是因爲沒有出路可走。如有其他的出路，誰願意去鑽營呢？中國物產豐富，鑽藏更多，如果產業發達起來，中國人民決不會沒有出路的。不過發展產業應該有政府和黨去直接領導，單靠民間的自然性的發展絕對沒有希望。黨與政府既須負發展產業的領導責任，那末大羣的黨員，至少那落在鑽營候補隊伍裏的一百萬同志應該立即回到生產隊伍裏去。黨員們大都是有智識的社會優秀分子，只要政府與黨的中央有決心，確定孫中山氏錢幣革命的實行步驟和社會資本主義的基礎，那末現在做着游離分子的一百萬同志便是發展中國產業的生力軍。這樣非但中國的經濟有了發展的前途，政治上的種種腐敗現象也澄清了。

四 確立正義和平的外交政策

在現代的世界，國際關係複雜異常並且任何國家都不能避免或脫離這種關係，有如社會的各個成員絕對不能離開社會一樣。假如一個國家脫離了國際關係，那末牠將喪失了國家的資格，不成其爲國家了。可是所謂國際關係，並不一定要去遷就，要去屈服，失掉了民族自由。立在

正義的基礎上，抱着奮鬥的精神，我們也可以創造新的國際關係。蘇俄自從共產黨革命以後，最初在國際間的關係極惡劣，各國都不承認牠是國家，甚至想聯合起來者推翻牠，可是蘇俄始終不離開正義，經過了長期的奮鬥，現在各國都不得已的要承認蘇俄，和蘇俄做朋友了。蘇俄這種良好的國際關係，決不是從遷就中得來，或是從屈服妥協中得來，而是從正義中奮鬥，重新創造出來的。

中國自從昏潰的滿清帝制政府造成了惡劣的國際關係；滿清政府推翻了後，袁世凱要做皇帝，又和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的亡國條約，國際關係更惡劣了。此後黎元洪等的共和政府也只是勉強圖存，苟延殘喘，沒有改善，却還加借了許多外債。中間廣東獨立政府雖沒有經各國承認，但實質上却表演了自主自治的獨立精神。北伐軍克服武漢，定都南京，國民政府因內部發生糾紛，經不起帝國主義國家聯合的威脅與利誘，不得不將歷來抗爭的態度一變而趨向屈服和妥協，於是出師時所喊的『廢除不平等條約』，現在連修改都很勉強，像二十一條那樣無理苛虐的條約日本還固執着不肯放棄。結果國民黨統治中國六七年，中國的國際關係還依然是惡劣

的。

國際關係惡劣，外交不能獨立自主，非但政府對內漸漸失去信仰，人民時時刻刻在懷疑政府，不能與政府忠實合作，華僑在外國還要受盡壓迫和侮辱，國際貿易的商業損失更不堪計算，於是政治上有形的影響尚小，經濟上財政上的損失更大了。九一八事變後，因受外患刺激，全國民衆如醉如癡的狂怒起來，一方面恨日本的無理侵略，一方面却也怪着政府的懦弱，政府領袖迫於大勢，纔把一些對內的力量轉向對外，注意到外交。各國虛懸着的使領，也逐漸委派了出去。不過我們所不能完全信服的，就是九一八後的中國外交還是被動的，中央死心塌地的信任國際聯盟，完全被國際聯盟支配着，挨延時日，坐誤戎機，這種外交決不會有好的收穫！

中央政府只是害怕着帝國主義的大砲毒瓦斯，以爲帝國主義者一怒便可以亡中國。殊不知事情決非如此簡單，政府只要提出正確的主張來與人民忠實合作，向全世界的人民呼籲正義與和平，中國非但不會滅亡反而得以提高國際地位，創造良好的國際關係。歷史上這樣的前例已有很多，主要的如美國獨立，蘇俄革命，土耳其復興，美俄土如不圖自主自治，努力外交上的

奮鬥，主張國際間的正義與和平，恐怕現在這樣的強盛連做夢也不會想到呢？可憐中國，對內因為個人權位所關，對於維持三民主義的正義，手頭雖然沒有實行，然而口頭總是喊着，對外就比處女還害羞，左右不敢提起三民主義，不敢主張什麼正義——提起正義不平等條約便要廢除的。比起共產主義的蘇俄來，外交上死力維護着列甯的正義，耗鉅額的經費與力量建設第三國際，相形之下，真要令人羞死！

論法西斯蒂

一

法西斯蒂的出現於世界雖只有十餘年，却早已成爲政治上最惹人注意的專門名詞了。

法西斯蒂統一了意大利，法西斯蒂又統一了德意志，法西斯蒂是掀動了世界了，但世人看待法西斯蒂還是和謎一樣，大都不能明瞭。墨索里尼詮釋法西斯主義，他認爲：

「道德的有歷史性的反對個人觀念的生活，在此項生活中，個人不能脫離社會環境及其

傳統。」墨索里尼又認為：

「法西斯蒂與僅為空疏的懷疑主義或物質主義適處於水火地位；蓋法西斯主義顯然為確定積極的主義，為政府與祖國較高的利益計，企圖發揮紀律與個人活動。此二者均係代表道德性的實際，而以能繼續進步為條件。故政府或民族如有一停滯不進，便為覆亡的朕兆。且凡一政府不僅以能施行權威為滿足，更須證明在其生存中，具有精神的力量。」

墨索里尼的詮釋也許是太簡短了，許多人「看了這段文字，不但不能明白認識法西斯蒂是什麼，反而增加了模糊的印象。」但這所謂增加了模糊的印象的原因不在於墨索里尼氏詮釋的本身，而是一般人對這詮釋的理解力的不充分。

墨索里尼在極簡短的詮釋中，確定了社會進化的規律，並闡明了法西斯蒂在哲學或科學上的基礎。人類在道德的歷史性的反對「個人觀念的生活」中，人類所以能夠進化，並產生了種種的組織與文化。在此種進化的人類的生活中，「個人」當然是「不能脫離社會環境及其傳統的。」

人類惟其是「道德的歷史性的」動物，人類所以能夠進化。道德是社會能力的淵源，歷史是社會組織的淵源。道德的能力是最偉大的能力，歷史性的組織是最堅韌的組織，法西斯蒂便是這種道德的能力與歷史性的組織的產物。法西斯蒂有那道德的偉大的能力，有那歷史的堅韌的組織，所以法西斯蒂的戰鬥常是無往不利，隨處都是成功的。法西斯蒂不像共產主義那樣，共產主義的戰鬥能力不是道德的而是唯利（唯物史觀）的，共產主義的組織是情感的而不是歷史的，所以共產主義經過了長期的糜爛和轉換，一直到了天才的列寧手裏才有成功。法西斯蒂却是那樣的有犀利的現實性，她的出生雖只有十餘年，她的成功却已是空前的了。已經被法西斯蒂統治的意大利和德意志，未來奧匈波蘭和中國等國也都有了必須實行法西斯蒂的趨勢。道德的能力，歷史性的組織，不論在任何國家都具着堅強的基礎，但共產主義不能利用這種能力和組織，資本主義也沒有方法繼續保守下去；人類要求發展，人類自然只有走上法西斯蒂的道路了。

個人的生活「不能脫離社會環境及其傳統」，但法西斯蒂並不因此就抹煞人類的個性

發展。在「政府與祖國較高的利益」目標下，人類可以更有基礎的「發揮紀律與個人活動」，人類可以更順利的求得「繼續的進步」。所以法西斯蒂雖然以權威的運用為活動的基本，但絕不以「能使用權威為滿足」，在其存在與活動中，法西斯蒂具有進步的精神的力量，這力量的淵源便是歷史與道德。法西斯蒂的毅力，法西斯蒂的犧牲，她們不像共產主義那樣的建築在自私的利害觀念上，而是植基在社會的道德和紀律上面。個人的利害觀念在社會上既難一致，並且也時時在變遷着，以這樣的力量來改造政治，建立政權，當然沒有絕對成功的把握，所以共產主義的革命，近百年來雖然屢有前仆後繼的無產階級像飛蛾撲火般從事暴動，終究沒有遇着那預期着的好運而獲得「最後的勝利」，道德的與紀律的觀念，這在社會上却比較是一致的，同時她們的變遷是隨着整個社會而變遷，不能為任何個人所左右，革命的力量因此就容易集中而且持久了。

為求簡單和易於明瞭起見，我們可以總括的說一句：

「法西斯蒂是道德的紀律的組織，是實現人類繼續進步的革命。」

本來墨氏的詮釋並不模糊，只是一般人在自由主義的偏見的麻醉下，自身的認識先已模糊着，於是就感覺墨氏的詮釋模糊了。試想在功利主義自由主義唯物主義的潮流下，人們的意識上先種下了自私的偏見的劣根性，愛把成見或偏見去粉飾現實，墨氏却揭出了宇宙的真相，負起了歷史的重任，以道德與紀律的精神來主張革命，這當然會使「唯個人私利是圖」的先生們覺得頭痛，覺得模糊。

法西斯蒂在整個社會的認識上既以社會的道德與紀律的發揮為社會革命與社會進步的原則，那末她在政治經濟以及其他種種社會組織方面當然也不能違背這個原則。現在將法西斯蒂在政治方面及經濟方面的形態略略寫出一個輪廓吧。

二

法西斯蒂最大的特點，便是她在政治上很坦白地主張獨裁，主張實行強力政治。我們可以說，法西斯蒂所以引起激烈的反對與妒忌是在於這一特點，但法西斯蒂的所以能夠成功也在

於這一特點。

在政治上坦白地公然主張獨裁主張專政的，一個是共產主義，另一個便是法西斯蒂。一般人討論獨裁問題的時候說共產主義的獨裁是極左的一派，法西斯蒂的獨裁是極右的一派，其實這種左派右派的分別，只是一種機械的不必要的觀察。政治上只有正確與不正確的分別，現實與空想的分別，如果法西斯蒂的主張是正確的，是現實的，右傾也沒有關係；共產主義的主張是空想的，是不正確的，左傾又有什麼用呢？民衆所希望於革命的是切切實實的利益，是現實的生活的利益，民衆不需要永不兌現的欺騙性的革命支票，民衆不需要取快一時的麻醉性的漂亮煽動！歷史把事實證明給我們看，正確的現實主義並不妨害革命，而空想的左傾却正正斷送了革命啊。

人類是政治的動物，政治的中心便是權威。權威的正當運用抑或濫用，那是另一問題，但人類需要政治，政治需要獨裁，那却是一定的！

墨索里尼說「政治平等不過是一種荒謬的套話，」孫中山先生也說人類的平等只是機

會與增遇的不等，並不要連人類的能力和工作也限制着要平等起來。

在人類組織的過程中，人類的絕對平等是沒有的。「社會的分工」使社會形成了等等不一的組織與等級，這些等級與組織的出現，並不是爲了人類的自相壓迫，而是爲了人類的協力求進。利用等級與組織來實行人類的自相壓迫，那不過是人類的墮落的行爲，但利用組織與等級來實行人類的協力求進，那却是切切實實的道德的行爲啊！

民衆依靠政治的唯一目的，是要藉着政治去保障他們的生活。政治能夠保障民衆的生活，政治能夠維持社會經濟的存在與發展，政治就已經盡了牠的責任，同時民衆對於政治的慾望也已經滿足了。如果民衆的要求超過了政治的範圍，要求道德與紀律以外的自由，要求萬人平等的政權，結果獨裁的現象是沒有了；但隨之而發生的現象，那便是政府的組織紛亂了，社會的組織也紛亂了。可惜這種無政府主義的社會對於人類並不是什麼幸福的生活，在混亂自私與無秩序的社會中，人類非但不能求得「繼續的進步」，人類的幸福反而減少了，甚至消滅了。

政治發展的歷史，從原始時代的酋長制度起，以至未來的社會主義制度止，牠的一貫的共

通的原則，都不外是政治權力的強硬發揮，都不外是實行理智的獨裁。因為惟有強力政治，政府才有普遍地保障民衆生活的權力；惟有理智的獨裁，政府才有敏捷地施行改革或發展社會的政策的機會。歷史上許多掛起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招牌的政治家，當他們在野的時候，從他們煽動的口中發放出不多的政治平等和反對獨裁的說詞，但等他們一上台，自己握到了政權，便也不得不組織地紀律地強硬地發揮政治權力，不得不採用獨裁的方式以維護統治的權威。許多民主政體的國家如美國法國等，他們表面上是民主，是實行德謨克拉西，但實際上真正的政權這是在少數的政客和資本家手裏，或者在三五金融資本家或金融集團手裏，多數民衆何嘗得到什麼自由，得到什麼政權？所謂自由，還不老實是句騙人的鬼話。當民衆在殘酷的壓迫與剝削下，多數民衆失却了生活上的保障，逼得要起來反抗統治階級，統治階級在無可奈何的境遇中，不過利用自由民主的美言來欺騙民衆，用一種巧妙的方式繼續維持他的統治地位罷了。

然而這種假民主與假自由的政治並不能千秋萬世的存在下去，當民衆失了生活的保障，

飢寒交迫到忍無可忍的時候，民衆將毫不顧慮的要起來打碎那不值一錢的虛偽的民主政治。爲着生活，民衆不能再忍耐了，意大利與德意志的民衆都不惜犧牲過去所留戀的自由民主而進展到了獨裁的政體。法西斯蒂能下決心保障民衆的生活，解除民族的痛苦，民衆爲着自身的利益，他們當然要起來擁護法西斯蒂了。所以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的成功，他們雖然是有着偉大的特出的天才，但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爲有了廣大羣衆的擁護，如果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不得到民衆的擁戴，就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是三頭六臂的天神，他們也絕對不能統一意大利統一德意志的啊。

三

政治上實現了道德的與紀律的基礎，經濟上也當然會打消各種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傾向，而走上社會主義的前途。

法西斯蒂在社會經濟方面的努力，主要的還是依賴着政治權力的運用，藉着政治權力來

改造社會經濟，法西斯蒂不希望直接把道德的紀律的力量在經濟上運用，不希望以空口的說詞來威嚇或勸誘資本家讓步；法西斯蒂也不希望直接以暴力作改造社會經濟的工具，在二十四小時內沒收了資本家的一切財產而一步跨進了社會主義。

法西斯蒂的歷史實在太短了，所以在政治經濟各方面的理論還很不完全。尤其是經濟方面，雖如先進國的意大利，也並沒有達到完全成功的地步。不過在一般的發展的途徑上，法西斯蒂對待目前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制度不是仇恨，也不是屈服，她將承繼着現存資本主義的既成基礎建立未來社會主義的經濟。運用政治的和經濟的統制權力，改變「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為「社會資本主義」的經濟。

資本主義在歷史上的勞績，以及資本主義在現實社會上的勢力，這是任何人都不能用意氣或偏見來抹煞的。鼓吹了將近百年的共產主義在蘇俄的現實仍沒有能夠完全放棄資本主義，目前在美國轟動着的技術統治 Technocracy 將更正確的要建築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資本主義經濟在自由主義的社會已矛盾到了極點，但在社會主義的社會却還有其不可忽略的

任務，不論列寧的國家資本主義或美國的技術統治解釋得怎樣漂亮，說得怎樣的打倒了資本主義，可是牠們的全部表演，還不過是在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交替過程中實現了資本主義所應有的新形態。法西斯蒂不懷任何成見，牠對資本主義在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的努力，當然會發揮得更強硬吧。

人類的自由

一

自由自由，這原是人類生活的最高原則。就是人類以外的一切動物，也都愛自由。除非是心甘沒落，或者是一個無生命無智覺的東西，牠纔會不知道自由的可貴，會甘心放棄自由。一個人到了甘心放棄自由的時候，他對現實已經完全滿足，他當然不會再有鬥爭的前進的意志，便整個兒的沒落下去了。

人類各有各的思想，在生活的意識上便各有各的自由。印度的苦行頭陀們一心一意想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於是一切普通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他們可以很歡欣的受下來。歐洲天主教修道院中的羣衆，他們一心一意的歸信上帝，進天堂，現世的痛苦在他們簡直不算什麼一回事。中國歷代所贊仰的隱士，他們提倡「樂天知命」，「隨遇而安」，「菜根」會吃出「香」味來。住破茅棚會覺得比住宮殿安逸，他們死心塌地的崇拜自然贊美自然，以自然的境遇爲滿足，只要「心安」便什麼都是快樂了。當人類的意識已失了生活的向上性，他們就像已經置身於「自由的王國」已經有了自由，不需要再去爭什麼自由了。我們如定要去告訴他們什麼什麼是自由，應該怎樣怎樣去爭自由，那祇會害得他們多去磕幾個頭，或者像許由那樣的累得去洗耳朵。不過我們不要以爲頭陀，隱士們的放棄自由，就已經有了自由。他們祇在唯心的基礎上得了一個生活的滿足，用自己的意志去限制着自己的生活，他們在生活上實在半點自由都沒有。

放棄自由，視生活的頭陀思想，完全是依賴着宗教上的唯神主義和哲學上的唯心主義而來的。唯神主義，唯心主義的社會，人類都只求精神上的滿足，在極度的壓迫與痛苦

中求得一種錯覺的精神上的滿足。社會一般的傾向既只要求精神上的滿足，社會的統治者自然也趨向於保守，順着唯神與唯心的形跡，組成自足的保守的封建社會。

民衆的放棄自由，社會的唯神唯心思想，與封建政治自足經濟，都有互相關聯的連帶性。我們只要看歐洲的唯物主義橫行自由主義抬頭，「產業革命」的潮流如狂風暴雨般襲過來，一切政治制度經濟制度都隨着發生了劇烈的變革，就可以知道這所謂連帶性的力量了。

社會的進步不是單方面的，而是多方面的。但在多方面的社會的進步中自有一定的帶動社會的中心力量，——在歐洲的產業革命時代，歐洲社會的進步的中心的帶動力量顯然就是唯物的自由主義思想。

自由主義思想在十八世紀十九世紀的歐洲曾盡了社會進化的最大作用，牠產生了人類統御自然的物質科學，牠產生了人類發展生產的資本主義經濟，牠又產生了各種活潑的進步的社會組織。現代的歐洲，現代的世界，所以能得有種種的文明和進步，歷史上的自由主義自有不容抹殺的勞績。但我們所不能忽略的，就是人類進化到現在，自由主義的使命已經告終，人類

如再以保守的態度去看待自由主義，以迷戀的態度去擁護自由主義，那末人類非但不會有進步，反而要退步了。

自由主義的主要目的，是要人類對自然界獲得自由，使人類的的生活超出自然的束縛與限制。輪船使人類得到海洋上的自由，飛機使人類得到天空中的自由，郵電印刷使人類得到交互思想的自由，科學越進步，人類所得的自由便越擴大。

人類對自然界的自由是最偉大的自由，科學則是人類爭自由的最銳利的工具，可是現代的虛偽的自由主義者對於這一點認識完全錯誤了。他們把自由曲解了，他們沉醉着無政府主義的偏見，忘却了自然，又忘却了社會，他們刻刻在念的是自私的利益，他們斤斤校量的是個人的自由。於是一個資本家爲了維持商品價格把大量的物品投海或焚燬是自由，一個工人爲報復仇恨毀壞機器也是自由——這自由，難道不是罪惡嗎？

在一種殘酷的封建勢力的壓迫下，自由主義對於當時的社會自有其不可否認的作用。但在資本主義成立了堅強基礎的個人侵略的世界，自由主義便很自然的變成統治階級壓迫民衆的工具，變成自由資本主義的保守勢力的工具。在這時代人類爲要求繼續前進，便只有以社會主義來代替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的成功將使人類獲得更偉大更光明的自由，自由主義已經根本失却時代的價值了。封建時代人類爲爭自由而參加政治，資本主義時代則爲限制民衆在政治上的惰性作用而施行獨裁，這是歷史的事實問題，絕不是空口可以詭辯過去的。

講到政治，人類便不能不承認組織，在組織的過程中，個人是顯然沒有自由的。政治上的「平等主義，」民主主義，」從來只是一句欺騙的術語。歷史上無論怎樣一個澈底的民主主義的領袖，一旦上了台，也只有以自己的意志爲意志，不能實行「政治平等，」不能一個一個的去服從民衆的意志。本來當一個政治領袖的意志已得到了多數民衆的信仰的時候，便必須毫無猶豫的實行堅毅的獨裁，用迅快的手段實現多數民衆所信仰的理想。否則歷史是飛快的過去，民衆的信仰會隨着現實的轉變而發生動搖，太多顧慮的政治家結果是一無所成。懦劣與猶豫

只會斷送革命反而加深民衆的痛苦。獨裁如是爲了民衆，獨裁如是爲了革命，獨裁是沒有罪的啊！

孫中山先生在演講自由問題的時候，他坦然承認中國人是自由慣了，中國人是不寶貴自由的。墨索里尼統治意大利，他立志拯救意大利的人民，但他却絕對不許人民有自由。當然，孫中山先生和墨索里尼所指的自由完全是指政治上說的，他們並不主張要剝奪人民一切生活上的自由，剝奪人民一切行動上的自由。在生活，在行動上，法西斯蒂獨裁成功後，三民主義獨裁成功後，中國民衆與意大利民衆的自由將要大大的擴大了；可是在政治上，在組織上，中國民衆與意大利民衆却要隨着獨裁制度的實行而加重了責任，加重了負擔。

二十世紀的世界，將是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劇烈鬥爭的場所，中國民衆與意大利民衆如不絕對服從三民主義服從法西斯蒂而負擔起政治上組織上國民所應盡的義務，那末在國際自由主義的瘋狂征服了中國與意大利以後，中國人民與意大利人民還有什麼自由可言呢？

虛偽的政客們和糊塗的學者們，他們慣於投合時好，慣於在欺騙與煽動中獲得榮譽滿足

生活。中國的民主領袖可以置民衆生活於不顧，自己却窮奢極慾的去過着浪費。生活歐美的自由主義資本家可以讓本國的民衆去餓死凍死，他們却不得不把大批的食糧布走向外傾銷，甚至投入海中。當然，他們有自由，他們顧不到社會。他們把自由的美名頂在自己頭上，而把自由的糖菓塞住民衆的口舌。自由主義是勝利了，然而自由主義的民衆是一個一個的餓死了凍死了！

在虛偽的政治的自由主義下，資本家富有了，政治家發財了，學者也成名了，可憐我們這窮無所歸的民衆，捧着那飢不能食寒不能衣的「寶貴的自由」將奈何！——歷史在等待着我們，我們必需立刻揭起社會主義的旗幟，向那虛偽的德謨克拉西進攻，我們要求生活，我們要求真實的人類的自由！

法西斯蒂的技術

——論革命的組織與宣傳——

革命是社會的事業，是民衆的事業，也是最艱苦的事業，決不是深夜上方案，祕密草計劃，就可以一觸而成的。一些倣倣求進的先生們，投機取巧的先生們，儘不妨專作攀仰的說客，以革命（？）的計劃或方案作進身的階梯，作謀利的工具，然而這對於民衆的出路，對於國家的前途，絲毫沒有關係啊！

隨着世界的潮流，隨着中國的需要，中國的法西斯蒂革命運動已有必然成長起來的形勢

了。歷史上每一種運動的發生，自各有其現實的條件作基礎，這基礎的運用確當與否，便決定了運動的成功與失敗。滿清皇室對漢族的壓迫，形成了洪楊革命和辛亥革命，洪楊革命、辛亥革命在開初的時候都得到了相當的成功，但因為本身運用的不得當，內部發生了矛盾，忽略了民衆的利益，最後都歸於失敗了。

十六年國民黨北伐，國民革命的勢力很迅速膨漲而統一了全國，國民革命前半截的事業是很順利的成功了，但主要的敵人既倒之後，國民黨的本身卻又繼續不斷的發生矛盾，發生糾紛，統治了六七年的中國仍是四分五裂，外強侵凌，國幾不國，黨亦幾乎不成其爲黨了。

洪楊革命爲什麼失敗？辛亥革命爲什麼失敗？國民革命又爲什麼失敗？這裏而我們都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他們失敗的原因，最根本的就是本身的組織不健全，革命剛剛收到了微小的成效，却已經在組織上發生了極大的矛盾。洪楊革命的佔領南京，辛亥革命的滿清退位，這祇是革命的初步的成功，是很微小的，不幸這微小的成功就已經不能爲革命的本身所容受，一般黨人就都志得意滿起來，不想再繼續努力革命，太平天國的領袖們在關着南京城的自相廝殺之下，

洪秀全是失敗了；滿清退位後的革命黨人各自投奔出路，營求祿位，孫中山先生也只得退讓了。國民革命北伐成功，也和洪楊革命辛亥革命同樣的發生着矛盾。雖幸有偉大犧牲精神的領袖在毅力主持着，相當保存着革命的勢力，沒有蹈洪楊革命辛亥革命的覆轍。然而外患的侵逼與內亂的頻乘，中國革命勢力的存在真是不絕如縷，危如累卵。

暴日強佔了東北四省，全國喪失了重要的經濟策源地，紅軍蹂躪了長江中流四五省，一萬萬以上的民衆都流離失所；而那些唯利是圖不顧國家民族生命的軍閥政客，非但不起來挽救國家，挽救民族，反而乘機挑撥離間，發動內戰，實行割據，中央所能完全統治者，不過數省而已。國民革命造成這種支離破碎的局面，當然不純粹是外力的摧殘，而是國民黨內部的分裂矛盾所造成的。國民黨因爲本身組織的不健全，種種腐化惡化勢力混入黨內，黨的力量不能集中在革命的行動上，而要把大部份的精力去應付黨內的昏庸老朽和頑固自私的領袖了。黨不能以全力應付革命，黨自然要失去革命性而走上沒落的道路。看清了中國革命過去的歷史，看清了中國革命現在的環境，在革命的本身，組織是那樣的薄弱，在人民的生活，生產是那樣的凋落。這裏，

我們如能虛心的探求，我們就會相信法西斯蒂正是中國革命的對症要藥。法西斯蒂主張絕對擁護領袖擁護獨裁，黨員應爲領袖流血，執行嚴酷的組織主義，這正好是國民黨內一般自由主義的遺老遺少軍閥政客們一服良好的殺菌劑。法西斯蒂主張階級調和，由熱心的中產階級協力主持造產運動，這正好給予中國專事破壞的共產黨和買辦奸商以及一切經濟的封建勢力一個大打擊。

法西斯蒂能夠救中國，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但我們所要注意的，就是每一種運動的開始都常常隨帶着若干錯誤。法西斯蒂在中國雖是剛剛成長，錯誤也不能免，這些錯誤目前也許不十分重要，但將來發展下去，輕微的錯誤定會變成嚴重的矛盾性。過去洪楊革命辛亥革命的失敗，原因並不起於失敗的當時，實在在組織形成的當初就已經蘊藏了日後失敗的原因。現在中國法西斯運動的錯誤現象，如不以挑剔過甚爲患，便可以提出下列的幾點請致力於法西斯運動的青年們注意：

第一是許多人對於法西斯運動本身的了解太機械化，認爲法西斯蒂只有行動，沒有理論，

說法西斯蒂就是行動主義。這實在太幼稚太滑稽了。請問整個的社會運動，沒有理論，沒有先知先覺者的指示，什麼會有革命的行動產生出來？難道所謂行動是可以從天而降嗎？孫中山先生說知難行易，是說明正確的理论需要堅決的執行，並不是只叫人們去盲目的「行」。法西斯蒂規定黨員須絕對的服從黨魁，黨員須盲目的服從黨魁，不許黨員自由躲避實際行動而去空談理論。但黨魁指導全黨，黨魁事實上就成了全黨的理论中心和行動綱領。黨魁有偉大的革命的人格，黨魁有偉大的犀利的智慧，黨魁纔能領導全黨，指揮全黨，否則大家只講行動行動，究竟能夠行動出些什麼結果來呢？

第二是一般人不能透澈的認識法西斯蒂，便由迷信觀念而發生一種神秘心理，以爲法西斯蒂是世界的怪物，是個一不可解釋的秘密，於是在理論上不求了解。在行動上在組織上便露出種種神秘的形跡。譬如法西斯蒂在組織上主張嚴密，可是並不主張把組織的份子和團體的綱領都秘密起來。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法西斯黨人穿着莊嚴的制服參加一切集會遊行，絕不隱蔽自己的態度，而以大無畏的勇敢精神公然參加種種行動，進攻一切仇敵。在中國則好像組織

的嚴密是可以從秘密中求得，把綱領密秘着，把份子也密秘着，以為這樣就可以保持組織的嚴密，那是何等滑稽的把戲啊！法西斯蒂在世界的任何國家態度都是堅決勇敢光明正大的，不幸到了中國就像江湖郎中賣丹方，什麼都好像有個不可洩漏的秘訣——革命可以偷偷地做而不給民衆知道，那足何等神祕的怪事啊！

中國的法西斯運動現在正蓬蓬勃勃的發張起來，但在運動的本身如不能立即清除上面這兩個錯誤現象，——機械觀念——和神祕觀念，那中國的法西斯蒂是一輩子不會有出息，是一輩子不會成功的。在神祕的活動下，少數的投機主義者或可藉此混入仕版，升官發財，但國民黨新添了這一些江湖郎中式的法西斯蒂會有什麼作用？中國得到了這一些神祕的法西斯蒂又有什麼補助？這樣的法西斯蒂就使能夠像洪楊革命辛亥革命那樣傲倖得到若干的成功，但誰能擔保不踏上過去半途失敗的覆轍呢。真實的法西斯蒂是沒有失敗的，然而在江湖術士賣弄之下的法西斯蒂將能有怎樣的成功，那就誰都不能知道！

歷來洪楊革命辛亥革命國民革命的失敗，決不是由於社會的背景，也不是由於革命的思

想，而且只是由於革命技術的拙劣。馬克斯的思想有了數十年的醞釀，並且成爲了一種豐富的學說，然而馬克斯到了老死了還不及看見實際方面有絲毫的成功。墨索里尼起初鼓吹社會主義，但後來他却反對空虛的騙人的社會主義，只憑着自己一個人的高尚的意志拯救意大利，不到幾年工夫，意大利的革命竟然成功了。由馬克斯和墨索里尼這兩個人一生的努力看起來，我們就知道思想不是成功的要素，而技術纔是最重要的。革命如沒有良好的技術，那末任你思想如何進步，背景如何成熟，革命也不會成功。洪楊革命，辛亥革命，國民革命，思想未嘗不前進，背景未嘗不成熟，可是這幾次革命的技術太幼稚，太落後，一個一個都失敗了。

講到革命的技術，內容當然是很複雜的。馬克斯列寧一派的共產主義者所講的技術，差不多只指「暴動」而言。其實暴動只是許多革命行動中的一個行動，並不能包括革命技術的全部，暴動如孤立起來，暴動非但不容易發生，就使發生了也一定要失敗。自馬克斯以來，各種大大小小的共產主義的暴動，從歐洲的巴黎公社到中國的廣州公社，總計何止數千百次，犧牲的工人何止數千百萬萬，然而一次一次的暴動都是失敗了。這裏，我們可以明瞭革命單以暴動爲唯

一的技術的時候，結果定是慘酷的痛敗。

革命的技術，除共產主義者死心塌地前仆後繼的迷信着暴動外，一般的革命運動都要以宣傳與組織爲最主要的技術。尤其是法西斯蒂的宣傳，法西斯蒂的組織，是一切革命技術中最前進最完密，而且最切合於社會的實際。慢性病的民主主義的集團，一切都落在社會後面，除了和平的空談與種種形式的組織以外，革命的作用可說是沒有的。共產主義者簡直忘記了實際宣傳離開了現實，組織也離開了現實，不問社會如何，事實如何，就只是盲目的罷工，暴動，形式上似乎革命，實際上却永遠拿不出成績來，社會的秩序和生產被罷工暴動搗毀了，破壞了，廣大的工人也流血犧牲了，此外還有什麼呢？

法西斯蒂的技術，法西斯蒂的組織與宣傳進步的程度，我們只要看意德日本的法西斯運動的無往不利，到處成功就可以知道。在宣傳上，法西斯蒂在任何時候都不忽略人格道德的表現，一切都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爲中心。在組織上，法西斯蒂從不離開實際的社會，爲着國家民族的利益，不分任何階級而嚴密的組織一切積極的進步的社會革命份子。法西斯蒂的組織能夠

在社會上造成巨大的力量；法西斯蒂的組織的嚴密，所以法西斯蒂的革命從不致遭遇內部的矛盾而中途失敗。

並且，法西斯蒂的組織是行動的組織，是人格的道德的組織，在組織的本身也就發生着宣傳的作用。當每一次法西斯蒂的示威遊行，黨員們穿着整齊嚴肅的制服，不怕一切敵人的襲擊與統治者的摧殘，英勇地招耀過市，這又怎樣的引起市民們深刻而莊嚴的信心啊！

組織與宣傳，是革命唯一重要的技術，如果宣傳工作組織工作沒有切實的努力，那末縱使有熟爛的社會背景，有圓滿的革命思想，革命也始終不能實現。中國的法西斯蒂在那種畸形的慢性的發展下面，組織是狹小的神祕（不是嚴密！）的，宣傳則簡直可以說沒有，這樣的法西斯蒂希望她有什麼積極的成功那，真是夢想。

革命不能離開社會，革命的力量要從社會中成長出來，那末革命一方面必須以宣傳得到社會的同情，另一方面便以組織結集羣衆的力量。有了宣傳，纔能組織羣衆；同時有了組織，纔能擴大宣傳，組織與宣傳的交互影響便漸漸成立革命的基礎，可以奪取政權，進而建設社會。過去

的所謂洪楊革命、辛亥革命，組織與宣傳都很薄弱，國民革命雖注意到宣傳，但組織的疏忽，又種下後來的矛盾，先有共產黨的篡竊，繼有各派遣老遺少的作祟，國民黨雖然取得了政權，但因本身組織的鬆散，革命的任務便不得不停頓下來。在外患與內亂的交逼下，國民黨到了這千鈞一髮的關頭，法西斯蒂正成了唯一挽救的方法。以三民主義為體，以法西斯蒂為用，換句話說，就是以三民主義的內容加上法西斯蒂的技術。這樣，中國革命纔能繼續下去，中國民族纔能復興起來。法西斯蒂的宣傳是勇敢堅決的，排斥一切中庸的與投機的動搖的態度，法西斯蒂的組織是活潑嚴密的，排斥一切自由民主妨害集團活動的意識。但這裏我們所要注意的，中國革命所需要的是法西斯蒂的精神，是法西斯蒂的技術，並不是拾了一些法西斯蒂的皮毛，做出一些法西斯蒂的形式就可以期望成功。

與胡漢民先生論法西斯蒂

小引

法西斯蒂在中國還沒有具體地出現的時候，感覺敏銳的國人就已經在鼓起反對的風潮了。這好像栽樹一樣，下種的時候反對的人真多！但反對也沒有用，越反對，種子越成長得快，在那激烈的反對空氣裏，法西斯蒂的樹是高大起來，高大起來，最後連反對的人們也被濃蔭大樹遮蔽着，享受到這株大樹的恩惠了。

在中國，反對法西斯蒂的人有兩種，第一種是什麼東西都要加以懷疑的空頭學者，他們有時候也同情於孫中山先生，有時候也同情於馬克斯，有時候也同情於墨索里尼，希特勒，但對於一件事實的臨頭，一個運動的出現，他們爲要使自己高於一切，就什麼東西都要先來懷疑一陣，反對一陣，好像不如此，學者的生命就要失去了。第二種是有着先入之見的固執的政客和政治家，他們死守着一個成見，凡與他們的成見不相符合的，便要誓死反對，不惜抹煞一切的事實來反對。

那些可憐的空頭學者的懷疑，簡直像糞壤中的蚯蚓在翻爬，自以爲盡了反對的能事，但實際上却正幫助了法西斯蒂種子的成長。我們讓那些蚯蚓，專門做鬆動土壤工作的蚯蚓，由他們永永不息的翻爬下去吧。

現在，我們所要討論的，就是那些大大小小的政客和政治家的反對法西斯蒂，我們從逆流着的大浪潮中捻取了一粒細沫，——胡漢民先生在三民主義月刊中第一卷第五期中發表的那篇「論所謂法西斯蒂。」這粒細沫，的確是最堅硬的一粒了。空頭學者們的反對法西斯蒂，既

只是一種蚯蚓的翻爬工作；那些民主派政客的反對法西斯蒂，也只是在一種事實的打擊之下所發出的失望的悲啼。胡先生的這粒細沫，却就不是簡單的翻爬和悲啼，似乎有一些實際的基礎和理論的根據。雖然胡先生的實際並不可靠，而理論也只是一種掩飾，但我們却很可以把胡先生的言論當作他山之石，切磋琢磨，使敵人也發生友人的作用。

像蛇一般固執的胡先生，他的固執是使他成爲中國一個政治家的因素。但胡先生似乎沒有想到一個政治家除了固執以外還有更重要的因素，這更重的因素就是虛心。不虛心的固執，什麼時候都要推車撞壁，牽牛下井，一步一步的走上死路。胡先生的固執，固然加強了胡先生的政治家的地位，於胡先生個人毫無損失，然而整個的中國却因胡先生的固執撞了壁，下了井，走上了死路啊。

胡先生這篇論所謂法西斯蒂的文章裏，發了誰的姿態，存了蛇的心理，從世界罵到中國，從天上罵到地下，簡直把法西斯蒂說得像一個兇惡的紙老虎，兇雖兇，然而一戮就穿。殊不知法西斯蒂的出現於世界，法西斯蒂的出現於中國，都自有其現實的基礎和歷史的原因，誰也不能無

中生有，誰也不能強行抑止。事實就是真理，真理不能離開事實，頑固的和空想的先生們假如也能有一天顧到事實，顧到實際的中國和世界，那末那些口頭筆頭所煊染着的美妙的真理也許一時一刻都不能再挨下去，而要馬上火化吧。

一 法西斯蒂的本質

「什麼是法西斯蒂？」這句話在中國想問的人實在太多了。

世界上的事情，從來就沒有用兩句三句話就可以解釋得清楚的。除非說：人是上帝造的，地球也是上帝造的，這當然很簡單，而且越是愚夫愚婦越能聽得懂。愚夫愚婦們只要知道人是上帝創造的，地球也是上帝創造的，他們就已經心滿意足，用不着更追求什麼了。至於科學的解釋，現在恐怕還只能由少數人知道，由少數人理解，就是那些不信上帝會創造人類，創造地球的人，他們本身不是專家，也不過有着一個模糊的科學的信念，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越是科學的東西越不容易解釋，也越不容易為大衆所了解。孫中山先生解釋知難行易，說能知必能行，不知

亦能行，這是證明宇宙間有許多事實，不待人類的解釋與了解，而事實總是存在着的。人與地球，在沒有科學家以前固然已經存在着，就是在沒有宗教家以前也早已存在着了。

什麼是法西斯蒂？假如是實行參加過法西斯蒂的生活的人，或者是一般不好歪曲的民衆，他們當然都能夠滿足地了解的。意大利的民衆生活在法西斯蒂之下，墨索里尼就是不解釋什麼是法西斯蒂，意大利的民衆也絕不會起來懷疑法西斯蒂。意大利民衆的相信法西斯蒂，縱不說是像愚夫愚婦們的相信上帝，但至少是像蘇俄民衆的相信布爾什維克，他們有着實在的生活，他們就用不着來追求空虛的學理。列寧解釋從少數變成多數，孫中山先生解釋知難行易，這都是從革命的實際生活中體驗出來的說話。不幸那些空頭的理論家，只想在理論上鑽牛角尖，竟把社會的實際丟在腦後了。如中國的頂頂大名的胡漢民先生之流也居然以鑽牛角尖的精神，不惜以歪曲與胡纏來塗污法西斯蒂。

墨索里尼說：

「法西斯蒂並不是一種主義，而是一種生活的態度。就法西斯蒂的立場來說：生活是一種

奮鬥，每一個人首先克制自己，鍛鍊自己，爲一有價值的工具，足以服務自身，服務人羣。法西斯蒂的生命觀，是嚴肅刻苦的宗教，最反對安樂與妥協。法西斯蒂反對抽象的個人主義，唯物主義與理想主義。在政治方面看，法西斯蒂是一種現實主義，他是要根據實際來解決一切當前的問題的。因爲法西斯蒂主義，都存在於實現中，離開現實，無論人世或靈魂的一切，都不能存在。不過我們之構成此現實，是似個人的資格，並不是以大多數的資格。所以法西斯蒂反對德謨克拉西主義，因爲德謨克拉西主義是以大多數較低下的層級爲標準，而使我人統一於其下的。法西斯蒂不然，她在訓練個人及國家，使臻於一較高的層級，所以她注意紀律，威力和精神的發展，還比注意政治爲甚。」

這裏是說得很明白了，「生活是一種奮鬥，」而且要在有組織的奮鬥中社會纔能得到進步。法西斯蒂要每一個人克制自己，鍛鍊自己，使自己成爲組織的奮鬥中有價值的工具。以嚴肅的刻苦的宗教的精神排斥一切安樂與妥協，以實際主義現實主義排斥一切抽象的自私的個人主義，唯物主義及理想主義。以刻苦的犧牲訓練個人訓練國家，在紀律與威力的統制下求得

進境。實現組織的最高理念，德謨克拉西式的苟且圖利的要求當然是被排斥的。

德意志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革命所以能夠獲得成功，正就是一種嚴肅的刻苦的組織的奮鬥，而且絕不離開現實的奮鬥之下達到了目的。法西斯蒂如果像一般誣衊之口所說的是無原則的獨裁，是回復了古代專制的暴行，那末德意的民衆早已把她打了下去，決不能生長到現在而成爲一切共產主義資本主義民主主義的眼中釘啊！並且德意法西斯蒂的迅速成功，完全是由於民衆的助力，或者是由於民衆的承認。意大利不先出現共產黨的殘暴，墨索里尼雖有心要救祖國，意大利的民衆也未必能信任墨索里尼的獨裁，使意大利得以很快的強盛起來。德意志如不是有了社民黨民主主義的沒落和失業潮流的襲擊，希特勒黨也未必能得到全國選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投票贊同而實行獨裁。事實證明墨索里尼希特勒的獨裁是完全爲了國家民族的利益，爲了民衆的利益，絕不如一般下劣嚙舌者的誣衊把法西斯蒂說得比沙皇專制還可怕的毒蛇猛獸啊！

法西斯蒂既不同於封建專制，也不同於資本主義的惰性民主，可是胡漢先生民却是那樣

的不肯理解，他開頭就先對法西斯蒂下了一陣喪心的誣蔑，說法西斯蒂是「摧毀無產者的革命運動，並提倡狹義的國家種族觀念，以穩定資產者之垂絕的統治。」接着又假裝虛心的引證了一些墨索里尼的說話，但這假裝的虛心並沒有使胡先生增加一點理解，也沒有能夠免強拿出一點像煞正當的駁辯。就只是機械地說墨索里尼的話「是名辭的修飾的潤辭，」好像意大利革命十數年的經驗和事實就可以在胡先生的「修飾」「潤辭」之下抹煞了。墨索里尼的話是「修飾」是「潤辭」，但也還有事實在做根據，絲毫無損於法西斯蒂，可是胡先生不能用正當的駁辯，只能運用「修飾」「潤辭」等等抹煞對方，却反而證明胡先生的假裝虛心的引證墨索里尼的說話是無聊，而武斷頑固的精神倒足以送胡先生入墳墓呢。

二 法西斯蒂產生的歷史

假如我們相信胡先生這篇文章不是唯物主義文牘的槍替而是胡先生於長期抱病中的手筆，那末我們真敢大膽說胡先生的淵博和虛心是太驚人了。胡先生的廣徵博引，胡先生似乎

很想從許多客觀的事實中求得若干了解，不幸胡先生的頑固絕不願有何了解，祇是誇張了淵博與虛心之後，硬生生地加上一些武斷與誣譏而已。

胡先生於其大作的第一節中以不少的篇幅引用了墨索里尼的說話，但胡先生並沒有能力加以反駁，祇能無聊地加一些武斷和誣譏，根本在本質上就誤解了法西斯蒂。本質上誤解了法西斯蒂還不知足，不肯藏拙，還要更高談一談什麼法西斯蒂的歷史因緣與時代背景。

法西斯蒂的產生，當然是有她的歷史和背景的；法西斯蒂不會從天上突然掉下來，也不會從地下突然變出來。不過我們相信歷史是錯綜複雜的東西，歷史至少有主觀與客觀的兩方面的成份，主觀是組織力量（人類的力量），客觀是自然條件。我們如單純的只看見客觀的歷史，而忽略了主觀的歷史，那末人類與禽獸同是從自然中生長出來，為什麼禽獸不能也和人類一樣有同樣的社會的進化呢？胡先生盡着九牛二虎之力，憑其機械的歷史觀念——也許這觀念不是民生史觀的胡先生所固有，而是唯物主義的文氓送把他的——大談其法西斯蒂產生的因緣，大談其意大利德意志以至於日本等國產生法西斯蒂的歷史。胡先生說意大利法西斯蒂

產生的主要原因有三個：

第一是「參加歐戰之失敗；」

第二是「社會黨措施之失當；」

第三是「經濟狀況的凋蔽。」

可惜胡先生這敘述實在太不夠啊！機械唯物主義者的宿命論的公式是：

「什麼，什麼，什麼；就「必然」產生什麼。」

胡先生自命是反對唯物主義的孫中山先生的高足信徒，是國民黨革命任務的獨立擔當者，胡先生當然不能背叛了孫中山先生的觀點而去採納宿命論的公式。但事實上，胡先生竟已踏着宿命論的公式和唯物主義的觀點在大發譎言了。

當然，我們在討論意大利法西斯蒂產生的歷史的時候，我們不能否認胡先生所提出的三個主要的條件，但我們相信還有更主要的條件，這便是（一）墨索里尼的智慧，（二）墨索里尼的毅力，（三）墨索里尼的組織。意大利如沒有墨索里尼的智慧，沒有墨索里尼的毅力，沒有

墨索里尼的組織，那末我們相信意大利的縱使經過十次的「參加歐戰之失敗」，經過十次的「社會黨措施之失當」，更加上十倍的「經濟狀況的凋蔽」，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革命也不一定能夠出現。

意大利當時有了墨索里尼的智慧，毅力和組織這三個法西斯蒂的主觀條件，於是再加上胡先生所說的（一）參加歐戰之失敗（二）社會黨措施之失當（三）經濟狀況之凋蔽等等的客觀條件，所以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革命便出現了，而且成功了。否則參加歐戰之失敗者不止意大利一國，社會黨措施之失當者亦不止意大利一國，經濟狀況的凋蔽者更不止意大利一國，爲什麼其他各國都沒有能夠出現法西斯蒂的革命呢？

意大利革命，正好是和蘇俄革命中國革命有同樣的形跡。蘇俄革命如沒有列甯的智慧，沒有列甯的毅力，沒有列甯的組織，中國革命如沒有孫中山先生的智慧，沒有孫中山先生的毅力，沒有孫中山先生的組織，那末縱使蘇俄與中國的革命的客觀條件怎樣成熟，蘇俄的共產黨革命和中國的國民黨革命也是不能成功的。可憐那些唯物主義的宿命論的論客，老是喊着「什

麼，什麼，就必然產生什麼。」但事實如鐵掌，自馬克斯以來，那些誇大勇敢的預言，宿命論的革命公式，老是左一個巴掌右一個巴掌的被打入地獄裏去了。胡先生不回頭看一看唯物宿命論的地獄裏堆積了多少醜惡的死骸，堆積了多少無聊的預言，却還要勇敢的蹈着這個地獄的死路去估量意大利，甚至還要來估量中國！這是何等可笑，也是何等可憐啊！

胡先生像英雄唐詩訶德似的妄談了意大利革命的生產的歷史，又還更勇敢的談到德意志，談到東鄰日本，但也不過一貫的更暴露了胡先生對歷史的認識的錯誤而已。德意志的法西斯蒂革命，最主要的主觀條件便是：

- (一) 希特勒的智慧；
- (二) 希特勒的毅力；
- (三) 希特勒的組織。

但胡先生不相信，他還是要主張「(一)國勢危急，」「(二)經濟恐慌，」是德國法西斯蒂革命產生的原因。胡先生就不想一想爲什麼蘇俄「國勢危急」「經濟恐慌」產生了共

產黨革命爲什麼中國的『國勢危急』『經濟恐慌』產生了國民黨革命爲什麼當時的蘇俄和中國不也產生法西斯蒂的革命呢？假如我們討論蘇俄革命而漠視了列寧的智慧，漠視了列寧的毅力，漠視了列寧的組織，討論中國革命而漠視了孫中山先生的智慧，漠視了孫中山先生的毅力，漠視了孫中山先生的組織，那種討論是不會有絲毫價值的。胡先生拾了唯物主義的牙慧，在毒罵意大利德意志法西斯蒂的罪惡的時候，恨不得把一切罪惡都放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這兩位惡魔的身上，在討論意德革命產生的歷史的時候却又不知怎樣忘掉了墨索里尼，忘掉了希特勒了。在胡先生的意思，好像就是沒有墨索里尼希特勒列寧和孫中山先生諸革命的導師，意德俄和中國也只要有當時那樣的環境——『國勢危急』『經濟恐慌』——意德俄和中國的革命也是能夠成功的。這種毫無理解的抄襲唯物主義的觀點，一無顧忌的僱用唯物主義的槍手，胡先生的無知，抑是胡先生的無恥呢！

又日本的法西斯蒂，現在還只是在醞釀時期，這種醞釀的成功與失敗，以及畸形的天皇至上主義是否能走上健全的法西斯蒂的大道，這些都還在不可知之數中。但胡先生却也機械地

敘述一番日本的『國勢危急』和『經濟恐慌』好像日本的法西斯蒂也像意德一樣掌握了政權，已經成功了。這顯然又是胡先生的曲解，但爲節省無關重要的爭辯起見，不多費寶貴的筆墨了。

三 社會的前進與後退——法西斯蒂的革命性

資本主義自由主義的社會到了熟爛的程度，民主政治的時代過去了。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一切都陷入了無組織的混亂狀態，社會就好像一切都解體了。政治上資本家在議會中互爭議席，政治不是爲了國家爲了民族，而只是爲了少數資本家的利益。經濟上資本家在市場上互爭銷路，生產不是爲了消費爲了民衆，而只是爲了少數資本家的利潤。於是一切都在私人自由競爭的佔有慾之下，政治動搖不定，國家變亂叢生，經濟塞滯凋蔽，民衆失業充斥國家與民衆都同陷於無法生存的危機中，在這資本主義到了熟爛崩潰的時候，當時的社會可以走三條路：

一 是盡力保守資本主義社會的原狀；

二 是調整資本主義社會的機構，推動社會的進步；

三 是將資本主義社會的機構完全打碎，另行建造一個理想的社會。

上述的三條路，第一條是保守主義的態度用種種方法如「生產合理化」等以維持資本主義的繼續存在，這仍舊是資本主義的制度。第三條是激進主義的態度用種種方法如階級鬥爭罷工暴動等以根本毀棄資本主義制度而另行創立新制度，這便是馬克斯所提倡的共產主義制度。除了保守的資本主義與激進的共產主義外，介於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第二條辦法便是法西斯蒂。

在目前的時代而仍以保守的態度去維持資本主義，這當然只有使社會後退。同時那激進的共產主義，遙望着一個不可實現的空想，不顧一切的要將現實的舊社會打得粉碎，但舊社會雖然被打碎了，新社會却創立不起來，結果也和保守主義的方法一樣，更猛烈的使社會後退了。在社會臨到了大轉變的時代，一切新社會運動的出現及其成功，便是決定這個社會的前

進抑後退的主力。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目前這個世界的階段，都可以說是使社會後退的主力，牠們絕對沒有力量使社會前進的。歐戰後新興的法西斯蒂運動，沒有資本主義的保守性的成份，也沒有共產主義那樣的無原則的破壞，然而她却兼有了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長處，法西斯蒂成功，社會自然是前進了。

社會是人類協力的結晶，是人類組織的產物，社會的一切文物制度，便是爲了經常維持這人類的組織關係和協力關係的。人類那一天割斷一切的組織關係，停止一切的協力關係，人類的社會便可在那一天破滅，而人類的幸福也就在那一天完結了。當然，人類不是傻子，人類決不肯有意識地來自行割斷各種組織關係，停止各種協力關係，可是所謂組織所謂協力，經常是要藉着社會的各種制度和法規而存在的，沒有善良的制度，沒有完備的法規，什麼組織什麼協力都無從談起。

人類的組織關係協力關係經常既都存在於各種制度和法規的活動中，我們就可以知道社會革命運動發生的原因和成功的路徑，原來某種社會存在了若干時期以後，文化基礎及經

這些基礎等等都有了全部的或局部的變革，這時社會的制度和法規便應當隨着社會的環境而有所改變，否則便不能再繼續維持社會的協力關係和組織關係了。

社會的制度和法規有時已失了協力和組織的效能，但社會還能保存着秩序，這便是出於國家機關利用警察軍隊等等的鎮壓的力量。警察軍隊等國家的鎮壓力量，非但能夠保存社會的秩序，有時還能保存失了時代性的制度和法規。當社會的制度和法規已失了組織的協力的作用，使少數人有利而使多數人受害，政府却還拚命維護舊的制度和舊的法規，這便要引起被壓迫民衆的反抗，引起社會的革命運動了。

法西斯蒂的革命，是以社會新興集團的強力來恢復社會的協力關係和組織關係，同時法西斯蒂的本身也就是建築在這種協力主義組織主義的基礎之上的。法西斯蒂主張全體民族全體國家——甚至全體世界——的協力，所以法西斯蒂從來不像資本主義共產主義那樣預存着階級的偏見。法西斯蒂主張社會的健全組織以促成協力主義的穩妥的執行，所以法西斯蒂需要堅硬的組織，排斥一切分散力量的多頭競爭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而以一個正義的賢

明的獨裁來指揮一切，支配一切。

法西斯蒂的革命性，法西斯蒂的進步性，現在除了好懷疑或好固執的人以外，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了。可是像蛇一樣固執的胡漢民先生，他的反對法西斯蒂是只要於一些假裝虛心假裝淵博的引徵和敘述之外，再加上一些武斷的判詞就完了。胡先生在其大作的第三節裏，我們總以為他要怎樣的發揮出多少漂亮的理論，指斥着法西斯蒂的反動性，可是胡先生太笨拙了，他就只是第一句先下了一個武斷：

「法西斯蒂運動，實在是現代政治上最反動的運動。」

於這個武斷之後，胡先生倒也承認法西斯蒂是「時代轉變的產兒。」但接着又說：

「……同時也必會以時代的轉變而轉趨沒落。她的沒落，不是理論的問題，而只是時間的問題。」

胡先生真妙，他的時代的解釋竟含着有那樣多的魔力。一回兒法西斯蒂承胡先生開恩是「時代轉變的產兒，」一回兒法西斯蒂在胡先生的大紅硃筆之下又要「以時代的轉變而轉

越沒落」了。胡先生的「時代」的運用，竟只是販運字句，在讀者面前演遮眼法啊。胡先生做了唯物主義的乾兒子，所以常常倒拜在「時代」的脚下，有時還要以「時代」做掩護逆詞的法宝。可是我們是不怕時代的，歷史是我們的戰場，時代正要在我們的脚下踐踏出來！我們沒有那麼多的閒工夫去等候「時代」，更不會那樣怯懦卑劣地對着「時代」暗暗嘆氣。

鬧過了「時代」的把戲，胡先生又捧出孫中山先生的話：「階級鬥爭，是當社會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而後機械地來一個武斷：「法西斯蒂，也正是當社會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她是政治的變態現象，不是政治的常態的演進。」法西斯蒂與共產主義——階級鬥爭——是兩個絕不相同的東西，即在階級的觀點上說，也是正處於絕對相反的地位。胡先生像一個沒出息的宗教師，捧出孫中山先生的經典眩耀着讀者的眼睛，一套遮眼法，法西斯蒂就變成「也正是當社會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了。至於法西斯蒂爲什麼是「一種病症」，胡先生並不說出理由，好在胡先生學着宗教師的祕訣，只要把廢話和武斷加在一起，任務就已告畢，理由是不用說了。

於生硬的評讞武斷之後，胡先生又信口雌黃的談着法西斯蒂的（一）「在政治上」（二）「在經濟上」（三）「在社會上」（四）「在文化上」等許多問題。這自然又是胡先生假裝虛心假裝淵博的手法，但我們却祇看見這些敘述裏，又全部都是些武斷，評讞，和廢話啊。現在，我們不怕空費時間來依次看看胡先生對於這些問題的敘說和判斷吧。

（一）「在政治上」——我們認為政治是一種組織與威力的產物，歷史上所有的什麼部落統治制度，君主統治制度，民主統治制度，不論這些制度有怎樣的差別和不同，但這些制度的組織形態和威力作用，却是完全一致的。政治上的革命現象，目的可說就是在於求得組織的進步和威力的合理運用。社會在經過若干時期的成長和變遷以後，組織不免發生矛盾，威力不免趨於濫用；組織的矛盾和威力的濫用，當然是政治的退步現象，是社會進化的障礙物。譬如法國在大革命以前，皇室，貴族，僧侶把所謂第三階級的平民排斥出組織以外，同時皇室，貴族，僧侶的威力的濫用亦無所不至，由這組織的矛盾和威力的濫用，於是法國的大革命便產生了。法國大革命的成功。在當時自然是一個極大的社會進步現象，第三階級的平民參加了政治，政府的

威力也不再是壓迫民衆，而是在圖謀民衆的利益了。現在世界都已隨着法國大革命的潮流，打倒了封建政治，建立了資本主義政治。法國大革命成功，社會由封建的組織轉入於資本主義的組織，威力也由封建的運用轉入功利主義的運用，這當然是人類社會史的一個巨大的進步，由於這一個政治的進步，於是一切社會的經濟文化科學都有了巨大的進化的痕跡，而人類的幸福也大大地增加了。

可是法國大革命以後所成立的資本主義政治，經過半世紀以上的成長和變遷，現在又已矛盾叢生，弊端百出，不能適用了。組織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一方面有投諸大海付諸烈火的過剩商品，一方面又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的失業羣衆；威力上議會制度的政權常常移動於少數幾個資本巨頭之手，國家的政權成爲保護少數資本家利益的工具，成爲少數民主政客滿足私慾的角逐之所了。

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現在已充分暴露了她的弱點，社會的施政，若取決於民主，則朝三暮四，暮四朝三，主張時常有變更，實際一無表現，這種落於時代之後的民主政治，實在倒

還不如沒有政治的好。

一個國家的政治，與其由民主的虛名而陷於腐敗，沒落，當然不如由一個材幹和道德高超的領袖去執行獨裁。政治不是一種權利，而是一種義務，這種義務不是有特別高超的人格學問和有能力的人是不能負擔的，所以我們與其把政治的任務仰望於一般盲目無能的民衆，實不如專責於一個英勇賢明的領袖。胡漢民先生昧於事實，以「王權天授」，「教權神授」等語句來諷責法西斯蒂，實則民衆信仰孫中山先生，民衆信仰墨索里尼，民衆信仰希特勒，胡先生是用不着嘵嘵地問主權誰授的。社會的進化與秩序的維持須賴有國家的制裁作用，社會的制裁既由國家爲中心，那末「主權在國家」的說法當然誰都不應懷疑。胡先生提出三個難題：「（一）甚麼是國家的本體？（二）優秀的少數者是否卽足以代表國家？（三）獨裁者任意的主張，是否便是國家的意見？」——以爲這三個難題就可以難倒法西斯蒂。胡先生的意思也許以爲人民是國家的主體吧？請問無組織的人民如猶太民族那樣是否可以稱之爲國家呢？我們承認人民可以成立國家，但必須有固定的活潑的組織纔能成立國家。一羣無制度無法規的烏合之衆，

我們相信怎樣膽大的人也不敢稱之爲國家吧？所以國家的成立第一就在於人民的組織，人民沒有組織是不能成爲國家的。同時在組織的過程上觀察，沒有領袖就沒有組織，所以國家的主權雖淵源於人民，但主權的執行却屬之於賢明的特出的領袖。這所謂「權」與「能」的分別，孫中山先生在演講民權主義的時候已解釋得很詳盡，就是三歲小兒也沒有什麼不明瞭的地方，胡先生爲什麼還要在這裏裝傻呢？須知「獨裁」不是權利，只是一種義務，無「能」者不必癡心妄想，有「能」者逃避亦逃避不了，並且爲國家民族的利益起見，這種獨裁的義務也根本不應逃避啊！胡先生處處都從權利上着想，於是「朕卽國家」、「民族專制王國」等字句都被胡先生搬了過來；其實胡先生應該趕快肅清這些封建思想，再去熟讀一下民權主義，把政治上的「權」與「能」分辨明白了，再來高談法西斯蒂亦不遲也。

(二) 在經濟上——胡先生以「主張私有的經營主義和營利的自由競爭主義」爲攻擊法西斯蒂經濟制度的論點。胡先生沒有能力從理論上對法西斯的統制經濟和組合制度加以攻擊，只是抄襲而曲解了幾條意大利的條文，便閉着眼睛大嚷其「反社會主義」、「反民生

主義。」胡先生大概還不了解什麼是統制經濟，什麼是組合制度，這裏我們就犯不着爲了教訓胡先生的「法西斯蒂經濟學」而多費口舌，我們只要看胡先生的高唱反對私有經營主義和營利的自由競爭主義，我們就可以知道胡先生的怎樣愛唱高調，而實際上是怎樣的糊塗了。

法西斯蒂的政策綱領，本是隨時隨地而異，德國不能相同於意國，中國、日本也未必相同於意德。胡先生咬文嚼字的抄襲了一些意大利的條文，就機械地斷定法西斯蒂是「主張私有的經營主義和營利的自由競爭主義」，希圖以此爲法西斯蒂的罪狀，這實在是心勞日拙的舉動。經濟上的「私有」與「營利」這兩個問題，在經濟組織的活動過程中和前進的過程中是兩個不能避免的現象。「私有」與「營利」如絕對禁止，社會經濟的組織活動便會立即停滯起來，社會經濟沒有了組織的活動，經濟便也就難於進化了。試想以破除私有制度營利制度標榜了近百年的共產黨，在其自身統治之下的蘇俄，尚不得不中途放棄馬克斯主義而實行新經濟政策，仍恢復到利用「私有」「營利」等經濟上進化的因素以發展蘇俄的建設，容許農工各

階級有充分「私有」和「營利」的權利，爲什麼意大利沒有反對「私有」和「營利」就成了罪惡呢？又胡先生身爲國民黨的一個偶像，也曾做過很多日子的立法院長，胡先生所親手造成的那些民生主義（？）的立法，究竟做到怎樣的反對私有的經營主義和營利的自由競爭主義呢？究竟與意大利的立法有多少經濟上的不同之點呢？假如意大利容納了「私有」和「營利」就是反社會主義反民生主義，那末胡先生的糊塗的立法院長難道不也是反社會主義反民生主義嗎？

並且，法西斯蒂的容納「私有」和「營利」只是暫時的過渡的階段，在法西斯蒂經濟的統治與組合方式下，法西斯蒂是要從實際上調整社會的經濟機構，而造成幸福的完滿的社會。

（三）「在社會上」——任何社會，都須帶有組織的性質，沒有組織，社會是沒有的。雖然組織的性質有濃厚和淡薄的分別，組織強固的社會幾乎一個社會就如一個人，行動是活潑的，而且是有力的；組織軟弱的社會，一個社會就幾乎像一羣烏合的羣衆，一動都不能動。譬如國家，這總要算是組織性最強固的一種社會了，可是我們老大的中華，還是那樣四分五裂，組織統一

不起來，發生了內亂外患，中央政府有時也只好手足無措。暴日佔了東三省，攻了上海，胡先生是負黨國重責的人，也會脫離了組織的行動而遠避香港，遙領西南政權，作乘機進攻中央的準備，把抗日的任務責諸別人，無怪乎中國要衰弱了。像胡先生這樣依老賣老不守組織的人，也許正是中國社會的典型人物，他非但做到了「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屋上霜」，還盡了乘機圖利，自推倒牆的能事呢。

社會是有機的組織，社會就應該有形成一個中心的領袖，胡先生的所謂「社會羣體的意志」，顯然就是這個中心領袖的意志。但胡先生似乎沒有懂得社會組織和社會活動的原理，而就胡亂狂喊一陣在法西斯蒂運動下，「抹煞社會羣衆」，「社會羣體沒有意志」了。

（四）「在文化上」——文化是社會進化的精神產物，社會的進化離不了組織和現實。空想出來的天堂不能算作進化，散漫而無組織的社會不能實行進化，那末與進化問題發生密切關係的文化，當然隨時隨地都要顧着社會的實際情況和組織問題，不能充分的追着空想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亂奔狂跑。可是爲着這組織的問題與實際的問題，胡先生的責言又來了：

「所謂法西斯蒂運動乃是一種反進化主義的，復古的，和排他的運動。所以在政治上，她必定摒絕近代民主主義的精神，以回復於古代帝王極端之專制；在經濟上，她必定摒絕近代民主主義的精神，以鞏固剝削的資本主義的壁壘；在社會上，她又必定摒絕近代自由主義的精神，以奉所謂特出的賢者，而以衆人爲芻狗。綜合這三種反民主主義的反民生主義的和反自由主義的精神所產生的文化，無疑的是一種反進化主義的，復古的，排他的文化。」

胡先生要對法西斯蒂盡可能的加以曲解和誣衊，於是不惜完全抹煞事實，口口聲聲高喊着「近代的民主主義，」「近代的民生主義，」「近代的自由主義。」其實民主主義，自由主義這些臭東西，已不是「近代的，」快都成爲過去了。社會要進化，這些妨礙進化的東西——民主主義，自由主義——便不得被時代掉入墳墓裏去。至於民主主義的實現，這是實際的問題，不是空口的吹牛，在歐美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下，議會中的民主已只剩下一個軀殼，一個形式；所謂自由也只是壓迫工人有自由，把過剩生產品投入海中，或置諸火燒有自由；但數百萬數千萬的失業工人要餓死了，何嘗有自由，被困在鉅大數字之下的利息奴隸——全世界幾

千萬幾萬萬的破產農民和中小資產階級等又何嘗有自由？至於民生主義，也應該有切實的把握，不是空談所可了事，國民黨革命六七年來，民不聊生，盜匪遍地，這當然不能算實現了民生主義；像歐美失業充斥的資本主義國家，也當然不能算是實現了民生主義。

民主主義，自由主義，我們只承認是些沒落的臭東西，不意胡先生竟要以這些臭東西來攻擊法西斯蒂啊！社會不能離開現實，社會不能沒有組織，爲了整個國家民族的生存，「特出的賢者」決心爲集團而犧牲，那末「衆人」做了「芻狗」正是革命道上不可免的現象，胡先生借着文化問題而發的狂妄的謬言大可節省了。

四 法西斯蒂勝利的特徵

自命爲「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馬克斯主義，掙扎活動了幾乎近一百年，結果還是一無成效，只產生了一個畸形的蘇俄——產生了一個與馬克斯共產主義相差甚遠的蘇俄。法西斯蒂在人類的歷史中只出現了十餘年，可是就在這短短的十餘年中，她的成功。她的勢力，却已遠遠

的超過了共產主義了。

因為法西斯蒂的無往不利，並且無處不成功，墨索里尼統一意大利在前，希特勒統一德意志在後，日本中國也有迅速成功的趨勢，害得胡先生沒有方法來——胡先生的說辭是「不想——」——「鋪敘實行法西斯蒂的國家之施政的實際，來證實法西斯蒂的沒落的必然性，」於是就只好「舉出法西斯蒂的反動形態，證明法西斯蒂的沒落，」而似乎很有把握地高喊法西斯蒂的沒落，「不僅是理論的問題，而且是事實的問題，亦且僅僅是遲早的問題」了。

胡先生「扼要地說：」「所謂法西斯蒂，只是挽救資本主義的沒落，利用小資產者絕望的情緒，和誇大的歷史的傳統，來鎮壓革命的一種反動的資本主義的最後組織。」

胡生先這滑頭的論調，當他在擁護民主主義，擁護自由主義的時候，他是厚顏無恥地做着資本主義的辯護人，現在他又學會了小丑的跳躍，繞過一個圈子，站在共產主義的立場上來反對法西斯蒂了。「挽救資本主義的沒落，」「一種反動的資本主義的最後組織，」胡先生跟共產主義學舌，學得太逼真了啊。胡先生這樣的學舌，把所有的資本主義的罪惡，完完全全的推在

法西斯蒂的身上了。我們早已說過，法西斯蒂的出現是在資本主義的沒落期中社會轉入另一新時代的革命行動，她絕不同於共產主義，也不同於資本主義，她不苟拘於保守，也不像共產主義那樣的空想激進，用一種強硬的態度和堅酷的手段執行革命，建設社會，把人類從萬劫不復的魔難中救出來。不幸胡先生的頑固不能認識法西斯蒂的真面目，於是胡先生對「法西斯蒂的發展」所舉出的「四個顯著的特徵」——「必須是絕對擁護資本主義的利益的」、「必須是絕對消滅社會主義的力量」、「必須是絕對厲行獨裁專制的政制的」、「必須是絕對實現其狹隘的國家觀念的」——一切的話也都說到反面或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法西斯蒂的特徵，第一是坦白，不像一般滑頭論客和投機政客愛繞理論的圈子，愛立永不兌現的空頭支票，絕不肯欺騙民衆，叫民衆冒險，更不肯爲着自己的利益而無代價的去犧牲民衆，葬送民衆。第二是切切實實的以民衆的實際利益爲中心，爲謀多數民衆或全體民衆的利益，不惜遭受一切虛名的和血肉的犧牲，甚至不惜暫時拂逆所謂國民公意以達到謀民衆利益的目的；第三是法西斯蒂把握着社會進化和社會活動的樞紐，以組織主義行動主義唯力主義爲

推動社會進化的主力

胡先生舉出四個顯著的特徵，以爲這就是法西斯蒂沒落的特徵，我們却正可藉此說明法西斯蒂勝利的特徵。

(甲)「必須是絕對擁護資本主義的利益的」——共產主義者對於社會組織的認識，他們是先天的帶有一種機械的觀念，以爲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存有一條不可消滅的鴻溝，是兩個不能並存的死敵。資本主義者則又以爲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是上帝創造了兩種人類。無產階級是天然應當受飢受寒，受資產階級的壓迫。法西斯蒂則與資本主義共產主義都不相同，她反對共產主義的挑動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作無原則的鬥爭，也反對資本主義的主張資產階級的天然可以壓迫無產階級。法西斯蒂主張着澈底的協力主義，以全體社會的利益作階級矛盾的調和，剷除橫暴的鬥爭，也要消滅無理的壓迫。所以法西斯蒂的能夠適合於任何社會，通行於全世界，其主要的原由，就在於這階級的認識的正確上面。資本主義因爲對階級的認識不正確，資本主義已經走上了死路，一天一天的走近墳墓了，共產主義也因爲對階級的認識

不正確，共產主義便到東到西都打回票，現在也已走上不可實現的絕路了。

法西斯蒂在階級的認識上，不論是已經成功了的意大利德意志，或是將近成功的日本和中國，都已顯示了明確的立場，她可以拯救困苦飢寒的農工階級及失業羣衆，也可以給予產業的資本家以革命的前途。不知胡先生是太糊塗了抑是愛故意曲解事實，鼓其如簧之舌，大喊其法西斯蒂「必須絕對擁護資本主義的利益」，法西斯蒂「與資產者勾連着」，法西斯蒂「萬不能與資本制度絕緣」……我們真不知道胡先生是在製造理論上的謠言呢，抑是憑着村婦的狹隘見地，拚命謾罵以快其私意啊！胡先生非但能夠在理論上製造謠言，他還能進一步把希特勒和「巴維利亞的工業資本家阿斯脫」……明興的工業界大王馬法依斯及谷倫巴哈的工業資本家霍倫林……等「聯繫在一起，把日本的法西斯蒂與三井三菱等總裁聯繫在一起，製造了許多事實上的謠言。當然，胡先生只要在其所能想像得到的範圍之內，儘可不顧一切地振筆捷書，狂造謠言，以騙取讀者的同情，至於理論的真假，事實的有無，胡先生自然是「概不負責」了。

(乙)「必須是絕對消滅社會主義的力量的一——對於『社會主義』這一個名詞，不最道胡先生究竟是怎樣解釋？如果社會主義是一種惡意的解釋，那就不成問題，誰都要起來消滅社會主義的，如果社會主義是一種善意的解釋，那就誰都要向着社會主義這條路走，誰都沒有力量能夠消滅社會主義。法西斯蒂的革命，以嚴肅刻苦的犧牲精神求得社會的進化和改善，建立美滿無缺的社會，這美滿無缺的社會，顯然就可以說是社會主義的社會。當然，法西斯主義者不能像一切的自由主義的空想家那樣，什麼『飛躍』、『突變』，一步就可以蹈進美滿無缺的社會，一舉一掌就可以實現了社會主義的社會。法西斯蒂認為社會的飛躍與突變是不可能，而眼前的現實離社會主義還很遠，所以除了實際方面的踴躍邁進，絕不涉及所謂社會主義的空談。說法西斯蒂不事空談，自是事實，但說法西斯蒂違反了社會主義，那就只是一種無知的妄言，荒唐的預測了。

法西斯蒂是向着社會主義的前途闊步邁進的，不過她的走向社會主義不是用『飛躍』、『突變』一類的方法，而是現實的從解除社會矛盾方面入手的。法西斯蒂爲了要從事現實，就

不得不排斥一切空想，因此首先就和共產主義發生衝突了。共產主義本也只是空想的社會主義的一種，離開現實是很遠的，但因為馬克斯的粉飾的說辭，以及恩格斯考茨基等繼續加以發揮和洗練。好像馬克斯主義很有力量支配現實，大家被這「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幾個字蒙蔽着，希望社會主義的迅速實現，都很踴躍的樂於去作種種實驗了，什麼罷工咧，暴動咧，都是爲了實驗馬克斯主義而發動的。

馬克斯主義是空想的，當然不會因爲有了暴動，罷工等的表演而就增大了現實性。暴動罷工等等一次一次的失敗，早已證明了馬克斯主義的沒有現實性，等到法西斯蒂出現了，而且很快的成功了，這就好像螢火遇着炬燭，活躍的法西斯蒂的光輝把空想的馬克斯主義打入地底下去了。

有了法西斯蒂，馬克斯主義就連一點欺騙的作用都不能發生，法西斯蒂與馬克斯主義自然就變成死敵了。並且罷工，暴動，這是絕對的斲喪國家民族的元氣的舉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斷的發生暴動罷工的事情，自己先就貧弱不堪，不要等到外敵來侵襲，早已走上滅亡的死路

了，法西斯蒂既絕對以擁護國家民族的利益爲中心，這些妨害和破壞國家民族利益的暴動和罷工，當然要被法西斯蒂加以極端的排斥和打擊。

在理論上，在事實上，法西斯蒂隨時隨地都要與一切空想的社會主義作對敵，尤其與馬克斯主義共產主義不能並存。胡漢民先生不肯了解法西斯蒂的真實的內容，看見法西斯蒂反對共產主義，就居然閉目狂呼：「法西斯蒂」必須是絕對消滅社會主義的力量。」「胡先生是以三民主義裝幌子的，當然應該把他自己的三民主義看作最道地最科學的社會主義，現在因爲法西斯蒂反對了共產主義，就居然說法西斯蒂根本反對了社會主義，把三民主義的社會主義前途也幾乎抹煞了，胡先生這樣的認識和了解，真是何等淺薄無聊啊！

（丙）「必須是絕對厲行獨裁專制的政制的一——政治上公然主張獨裁專政的，一個是共產主義，還有一個便是法西斯蒂。普通稱共產主義的獨裁是極左的一派，法西斯蒂的獨裁是極右的一派，其實獨裁專政，無所謂極左，也無所謂極右，革命要表現力量，連用組織，獨裁專政就成了必然的現象。

一個組織要在社會上佔得地位，發生力量，整個組織就必須在一個人的意志指揮之下活動，奮鬥。若依着民主的方法，那末主張既不能確定，一切的活動也都以各自的個人爲中心，那就要弄成一個人多手雜的狀態，結果是一無所成。有利益，大家都是一個團體中的人，勢必斤斤較量；但遇着犧牲的時候，大家又要互相推諉，取巧躲避，好像大家都只是團體中的一份子，誰都不來督責誰的。孫中山先生努力革命，奔走了數十年，辛亥革命成功，滿清是被推翻了。可是一些急功近利之流的黨徒，不能再跟隨孫中山先生繼續革命犧牲，不肯再聽領袖的話，一個一個的都自由行動，去投奔袁世凱，投奔黎元洪，甚至去投奔曹錕、吳佩孚等大大小小的軍閥。孫中山先生受着這個萬惡的民主的牽累，不少投機的黨徒是由此走上了升官發財的道路，而整個的團體，整個的革命，却因此受累不淺，一次一次都遭受了嚴重的失敗和打擊。直到後來國民黨實行了總理獨裁制，並屢次清除了黨內的自由主義份子及投機份子，革命基礎纔漸漸鞏固起來，而得有十六年北伐的成績。

黨內民主，固然是一種浪費革命力量，使民衆徒受犧牲的鬼話。但在國家政治方面，民主制

度顯然也是一種騙人的詛語。歷來許多的所謂民主領袖，當初爲要獲得民衆的擁護和同情，弄出許多漂亮的說辭和美妙的姿勢四出鼓吹，把民主制度說得天花亂墜，可是等到自己一上台，就馬上顯出野心，抹煞民衆，而以領袖自己爲「主」了。在中國，則所謂民主更是可笑，選舉的時候，連欺騙民衆的演說也用不着，竟是直捷痛快的用金錢去收買了。民主可以用金錢收買，這種民主的價值也就可想而知。民衆都只能顧着自己的生活，對於政治，因被學識及生活條件所限，是很少興趣的。不想一般政治騙子，他們爲要滿足自己的政治野心，却又不好說自己要政權，於是硬抬出民主的幌子來，以民主做他的奪取政權前鋒隊。

胡先生對法西斯蒂的排斥議會政治，甚至排斥憲法，深致憤憤不平之氣，好似法西斯蒂對議會，對憲法太不客氣了。但胡先生如能想到每次選舉均被投機者所利用，金錢能產生議會也能製造憲法，胡先生就可以平一平氣了。法西斯蒂主張黨內獨裁，更主張黨外也要獨裁，自有其社會的及組織的原因，因爲不獨裁，革命的本身便不能發生力量，不能摧毀一切的反動敵人，不能穩固地實行建設，根本上就談不到什麼革命不革命了。獨裁爲了革命，獨裁是不會有罪啊。

的！

(丁)「必須是絕對實現其狹隘的國家觀念的」——法西斯蒂主張國家至上主義，主張民族至上主義，這祇是適應客觀環境的需要，我們並不覺得其中存有絲毫的狹隘觀念。絕對的排他的國家主義的提倡，主要的原因有二：

第一，對內因為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自由主義的狂放，民衆都只有個人觀念，只知道圖謀個人的利益；國家觀念都極淡薄，甚至已完全消失，好似國家的興衰存亡，與國民是完全沒有關係。國民忽略了國家的價值，不肯爲國家效力，國家便一定要頹廢萎敗下去，於是內亂外患相繼叢生了。法西斯蒂革命的出現，大都是在國家最混亂最衰弱最衰弱的時代，法西斯蒂要想打起拯救國家的精神，平內亂而抗外患，首先便要恢復國家的機能，使全體民衆受着中央政府的操縱指揮，於是國家纔會強大力，民族也就開始走上復興的道路了。但這裏我們如不提出強力的國家至上主義的主張，頹廢因循的民衆是刺激不起愛國的觀念來的。民衆不愛國，民衆不緊緊的擁護在中央的週圍，國家的機能顯然就振發不起的啊。

第二，對外因爲世界各國都虎視眈眈的致力於向外侵略，凡不能侵略的國家，就勢必要受外國的侵略。爲防止外來的侵略起見，一種排他性的國家主義行動是事實上所不能免的。譬如德意志和意大利，他們在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搗亂下，民氣已頹廢不堪，墨索里尼希特勒如不提出國家至上主義的口號，民衆不一致起來爲祖國效力，意德兩國的法西斯蒂怎樣也不能夠起來抵抗各強國的壓迫和侵略。又如中國那樣，整個的國家是壓在帝國主義的鐵蹄下，蠶食鯨吞，瓜分共管，領土主權是一天一天是在縮小，滅亡之禍是隨時可以出現的。可是國家危急到此地步，國民有沒有絲毫愛國的念頭呢？最大多數的無智識的農民只希望趕快有『真命天子』出來，從來就想不到國家那回事。奸商買辦則惟利是圖，甘爲洋奴，不惜亡國。一部分工人和無業流氓，聽着一般騙客的煽動，他們不認中國是祖國，而認蘇俄是祖國，爲了要擁護蘇俄，恨不得馬上破毀中國。居着領袖地位的那些黨國名流，軍人，政客，說起來更痛心，爲了爭個人的權利，可以任何犧牲都不吝惜，內戰起來動不動要耗費幾百萬幾千萬的餉糈，死傷幾十萬幾百萬的生命，內力不足，還不惜引狼入室，利用外力來摧殘本國。中國處在這種帝國主義的加緊環攻和民族

國家觀念薄弱的環境中，請問離了國家至上主義的主張，再用什麼方法來加強國家的機能，又怎樣可以有力量去反抗帝國主義呢？在口頭上，共產黨社民黨以及一般洋奴漢奸都不妨打起反帝的漂亮口號，然而講到實力的反帝，我們相信離了國家至上主義是沒有辦法的啊。

胡先生不相信要集中全體國民的力量，力量纔能夠反抗帝國主義，不相信實行國家至上主義後纔能集中全體國民的力量，就只是裝着那種假清高的態度，盡量誹笑謾罵所謂「狹隘的國家觀念」，把法西斯蒂說得比軍國主義帝國主義還不如。但不知道胡先生的「寬大」的國家觀念，究將寬大到如何程度？我們相信胡先生總不至於主張把破碎的中國直捷爽快地送給帝國主義吧？國家的組織，在相當範圍內便免不了有排他性，免不了有狹隘觀念的表演，胡先生不想接近事實，不想切實反帝，胡先生自不妨清高，不妨不負責任的盡量發揮空談啊！

五 中國的前途——法西斯蒂

資本主義的崩潰，民主政治的沒落，共產主義的碰壁，法西斯蒂的抬頭，已成了世界的潮流，

在這狂暴的潮流下面，各國都將先先後後的趨向於法西斯蒂，中國自然也不能例外的。不過中國的出現法西斯蒂的統治，當然不會是出於被動的，世界潮流的模仿，也不會是出於少數人的好奇心，而自有其內在的原因。中國本身所存在的法西斯蒂原因，形成法西斯蒂統治的客觀條件，分析起來，可以得到下列的主要各點：

第一，經濟上外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內受封建勢力的束縛，資本主義不能成功，共產主義也不能實現，民衆左奔右突而得不到出路，便不得不於資本主義共產主義以外另求生活的大道，於是經濟的國家主義，國家資本主義，都將很自然地被中國民衆所歡迎了。

第二，政治上因爲文化水平的低下，民衆既對政治不生興趣，並且也沒有干涉政治的智識和能力，與其施行掛羊頭買狗肉的民主政治，任令少數官僚政客投機取巧，朝秦暮楚，還不如由一個革命的政黨和負責的領袖去實行專政，實行獨裁。

第三，國民黨的統治已實現了六七年，但在政治上經濟上還是很少顯著的進步。當然六七年的統治不能算過長，政策上的遭受打擊也許是不能免的，但國民黨的遭受打擊並不是由於

客觀條件的阻力，主要的還是由於黨的本身組織的落後。客觀的阻力是可以希望黨的長期努力來應付，但如黨的本身落後了，若不從組織上加以嚴密的整理，事實上就很少有挽救的希望了。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理論，經濟上不承認資本主義，也不承認共產主義，政治上主張由軍政到訓政，訓政以後纔開始憲政，這種主義，這種理論，當然是完全正確，完全適合於中國的。但在組織上，十五年一月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改總理制爲委員制，當時本爲遷就環境，實在這種組織方式是很不適合於國民黨的主義的，黨外要專政，黨內却要民主，這是一個何等可笑的矛盾。難道革命是打劫，向外搶到了財物，向內却要平均分贓嗎？——這一個組織上的矛盾，對於孫中山先生的主義牽累得實在很不小，國民黨如不採用這種黨內民主制，孫中山先生的主義早就有相當的實現了，何至弄到現在的半死不活呢。

我們看了上述的三個原因，我們就知道中國一定要走法西斯蒂的路，中國纔有辦法，國民黨一定要實行法西斯蒂化，國民黨纔能夠完成他自己的使命！

不過，我們是那樣的認識了，但胡先生怎樣說呢？我們先看他在『三民主義與中國革命』

中說了的話，而在「論所謂法西斯蒂」論文中又重行得意地提出的一段吧：

「最嚴重的，是專斷獨裁的軍閥，——個人主義的寡頭政治之抬頭者。篡奪中國國民黨權之不足，還想運用其「偷天換日」之故技，去三民主義而代之以所謂法西斯蒂主義。無論是所謂「藍衣社」或所謂「救亡社」其擴展，雖然充類至盡，只能做到流氓式的偵探或暗殺爲止，然而這一個反革命勢力之孕育，無疑的是微示着三民主義前途的又一劫運。」

想不到胡先生以這垂暮的老人，却還像沒有嫁得漢子的潑婦，火氣竟那樣的重。胡先生的謾罵和隨意發洩無稽的謔言，這裏真可謂盡了狂妄的潑婦的能事。胡先生的意思，好像中國國民黨是天經地義的是屬於胡先生個人的，胡先生在南京中央長立法院，胡先生是笑顏逐開的，但胡先生一離開南京，胡先生便要憤憤然狂跳着喊「篡奪中國國民黨黨權之不足」了。其實黨權的問題很容易解答，孫中山先生沒有寫遺囑把黨權交給誰，也沒有一定的「承認」黨權的俗例，誰能負擔孫中山先生所遺留下來的使命，誰有肩起中國革命的道德和能力，誰就可以掌執國民黨的黨權，誰就可以掌執中國的政權，什麼「篡奪」不「篡奪」，這都是封建的依老

賣老的鬼話。中國的混亂，國民黨的渙散，法西斯蒂精神的運用正成了唯一的救星，然而胡先生却是那樣的頑固，至死不悟的喊着法西斯蒂「勢力的孕育，無疑的是微示着三民主義前途的又一劫運」啊！

接着胡先生說：

「三民主義的革命運動，絕對不能與法西斯蒂的反動運動並存。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要摧毀法西斯蒂的國家至上主義，牠的要求，是國家爲民族的需要而存在，而不是民族爲國家某一時一人的畸形權力發展而犧牲；牠要求全民族的共存，而不是殘酷的帝國主義之發展。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要摧毀法西斯蒂的獨裁專斷主義，牠要求全民的共治，——社會人人爲社會去服務，去管理衆人之事，而不是謳歌着所謂特出的賢明的獨裁者。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要摧毀法西斯蒂的資本主義的統制主義，牠要求社會的生存，與全民的共享，而不是要去鞏固剝削者的壁壘，使被剝削者轉輾呻吟，莫由反側，因此三民主義的革命者，便是法西斯蒂的毀滅者，一切三民主義的信徒，必須抱着堅決的信念，不與法西斯蒂共存亡。」

三民主義不能與法西斯蒂「共存亡」胡先生的見地未免太固執，太短淺了。我們試依着胡先生所提出的三點，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等對於法西斯蒂的矛盾，先分別加以簡略的答覆：

「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要摧毀法西斯蒂的國家至上主義，牠的要求，是國家爲民族的需要而存在，而不是民族爲國家某一時一人的畸形權力發展而犧牲；牠要求全民族共存，而不是殘酷的帝國主義之發展。」——民族與國家，本是兩個不可分離的名詞，兩者是時時發生着密切的聯繫的。在組織上在機能上講，國家比民族尤爲重要，國家是一切社會進化社會秩序的總樞紐。國家亡了，無論怎樣的優秀民族，就使進步到猶太人那樣，終是要做隨處受人欺侮受人壓迫的亡國奴。所以一個民族到了沒有國家的時候，這個民族將成爲怎樣的民族，就是三歲的小孩子也可以知道的。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的提出，目的正是在於反抗帝國主義，加強國家的力量，恢復民族的光榮。如果民族的意義不是加強國家力量的，那末反帝請問用什麼去反呢？難道在野政客的高調和無組織的民衆的亂動就可以打退帝國主義嗎？所以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

正是和法西斯蒂的國家至上主義是相互爲用的，兩者絕不會發生互相摧毀的矛盾，頑固的胡先生以爲民族主義要摧毀國家至上主義，這是第一個白日見鬼！

「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要摧毀法西斯蒂的專斷獨裁主義，牠要求全民的共治，——社會人人爲社會去服務，去管理衆人之事，而不是謳歌着所謂特出的賢明的獨裁者。」——專政獨裁，這在社會的組織的活動運用上本自有其一定的基礎和需要。現代實行專政獨裁的國家，前有蘇俄，後有意德，而中國則也居然虛有其表的揭起了國民黨專政的旗幟。俄意德實行專政獨裁，都已得到了成功了，中國的專政因爲有名無實，結果毫無成績。當然我們不能因爲國民黨實行專政的失敗，就根本否認了專政的價值。一黨專政與領袖獨裁，在理論上在事實上都有充分的根據，堅強的基礎，但這裏爲了節省篇幅，就只略提一點民權主義中的獨裁專政的原則吧。孫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的演講中，曾不厭煩瑣的解釋着「權」與「能」的分別，並且舉出乘車坐船諸葛亮與阿斗等等的例子。照孫中山先生的話，那末除非民衆不信任那個「特出的賢明的」有「能」的人則已，如果信任了而且選舉了，那這個「特出的賢明的」有「能」的人

老實就應該像舵手車手一樣負起責任來獨斷獨行不顧一切犧牲，實行獨裁。否則像舵手車手那樣動不動就受着乘客們三心兩意的牽掣，不單要「老大多，打翻船」，整個的國家也會因此滅亡呢？並且孫中山先生這種所謂「權」「能」「分明」的民權主義，還是要到憲政時期纔開始實行的，在軍政時期和訓政時期，則實行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民衆連「信任」「不信任」的權限都沒有，那當然是十足道地的專政獨裁制度了。胡漢民先生和一些民主的先生鬧昏了頭，只想杜撰些名詞理論來誣陷私敵，却連三民主義中的極普通而且極重要的基本常識都忘記了。有官做獨裁也好，專政也好，一旦無官，便惶惶如喪家之犬，狂吠不休！在理論上，國民黨不成問題的是應該實行專政獨裁；在事實上，國民黨從來也是實行專政獨裁。（孫中山先生逝世後，黨內行民主制，獨裁基礎不幸已動搖了。）國民黨的專政獨裁，正適合於法西斯蒂的精神，已毫無疑義，胡先生却戴着墨鏡罵青天，說民權主義要摧毀專政獨裁主義，這是第二個白日見鬼！

「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要毀摧法西斯蒂的資本主義的統制主義，牠要求社會的生存，與全民的共享，而不是要去鞏固剝削者的壁壘，使被剝削者轉輾呻吟，莫由反側！」——自由獨佔

的無政府狀態的資本主義經濟，利息的剝削和恐慌的出現，常常使中小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遭受莫大的經濟的打擊。巨大債務的拖累，中小資產階級的人們固不能有翻身出頭之日；而經濟恐慌的出現，銀行，商店，工廠的倒閉停歇，更使整千整萬的失業的無產階級斷炊絕食。在這經濟的大混亂時代，法西斯蒂主張以國家資本主義來代替自由資本主義，以統制經濟來代替無組織的經濟，當然是一種最合理的方法。國家資本主義實現，不合理的私人獨佔的事情沒有了；統制經濟實現，生產與市場的平衡可以有調整的機會，每次恐慌的出現可以有所預防，而不致坐視着束手無策。法西斯蒂的經濟實現了，剝削者既已受着限制，被剝削者也自然不致「輾轉呻吟，莫由反側」了，孫中山先生在講演民生主義的時候，不承認資本主義，也不承認共產主義，而以「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為實現民生主義的兩大綱領，這顯然是和法西斯蒂的經濟方針暗相符合。經過六七年來國民黨統治中國的經驗，實使我們感覺到民生主義的實施，尤須有法西斯蒂的精神。因為「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阻礙太多了，封建勢力，資本主義的勢力，以及帝國主義的勢力，隨處都可以打擊民生主義的經濟，國民黨如沒有強大的中央政

府和堅毅的獨裁手段，僅憑那種懦弱平庸的態度，「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的實行簡直是不可能的。胡先生不檢查理論，也不觀察事實，就只是那樣頑固地機械地喊着民生主義要摧毀經濟的統制主義，這又是第三個白日見鬼！

比蛇還固執的胡先生，什麼理論什麼事實都無暇顧及，儘只是空口胡說，白日見鬼，就難怪胡先生要得出一個荒謬絕倫的結論，如醉如狂的大喊：「因此三民主義的革命者，便是法西斯蒂的毀滅者，一切三民主義的信徒，必須抱着堅決的信念，不與法西斯蒂共存亡。」

唐詰訶德的胡先生，他是很勇敢的，同時也是很堅信他自己的。所以當大多數的真實的三民主義的信徒都或明或暗的接受了法西斯蒂的精神的今日，胡先生還能在「妙高台」上得意着，抱膝長吟：

「一切三民主義的信徒，……不與法西斯蒂共存亡。」

胡先生於痛罵法西斯蒂，曲解三民主義，曲解中國的現實社會以後，心猶未足，又還於最後

更加以一番反面的攻擊。根據着所謂「一個遠道的朋友」——其實也許不是什麼「朋友」——只是胡先生足下的一類捏造消息輕事重報以邀賞的暗探諜報——抄給我所謂中國法西斯蒂的章則。」於是胡先生的牢騷又來了，什麼「邯鄲學步，」什麼「畫虎不成反類犬，」——都發洩了出來。好似實行法西斯蒂的人都應該是了不得的西洋人，或者是後起之秀的東洋人，老大腐化懦弱的中國人，萬萬沒有實行法西斯蒂的能力。依胡先生的觀點，中國那些「做着法西斯蒂的迷夢者，」決乎「建立不起法西斯蒂的組織來，」大不了是「邯鄲學步，」大不了是「畫虎不成反類犬」而已。

胡先生這些瑣碎碎的對人不對事的說話，顯然只是在發洩個人的牢騷，報復個人的怨恨，已失了論證的價值。中國能不能出現法西斯蒂的組織，完成法西斯蒂的革命，這不是人的問題而是事的問題，一個既成領袖的反對法西斯蒂或擁護法西斯蒂，都於法西斯蒂的本身沒有多大關係，只要歷史的條件——主觀的與客觀的——具備了，中國的法西斯蒂遲早有成功的一天。工農在困苦的生活中，青年在煩悶的環境中，新的「時世」將造成新的「英雄，」新的

「英雄」也將造成更新的「世界」我們固不敢奢求既成領袖的助力，但像胡先生那樣的狂發癡言，恣意曲解，却也不能強事緘默啊。

第二輯

革命與文化問題

一 文化運動與文化組織

讀了社會新聞三卷二十期至二十三期連續登載的兩篇論文，一篇是「改造文化的急務」，一篇是「我們需要怎樣的文化？」

在這抗日潮流瀰漫全國的時期，一切報紙刊物都以爭唱高調爲能事，社會新聞能以獨挽狂瀾的態度提出文化問題來，這是值得我們欽敬的！

中國一般民衆文化水準的低落和民族精神的浮囂與渙散，這都是要從文化運動上根本着手救治的。不幸一般急功近利的官僚政客們，終日皇皇於軍事上的投機，政治上的挑撥——甚至他們偶然做着的文化工作也是爲了挑撥——對於民衆的教育，社會的文化，就好像漠不相關，視爲無足輕重的瑣事了。

社會新聞提出了應該反對的文化：

- 「1. 侵略我民族利益之「帝國主義」
2. 危害我民族生存之「共產主義」
3. 不顧民族生存專圖個己發展之「個人主義」及「個人集團」
4. 阻礙民族意識發展之「鄉土觀念」，「家族觀念」以及一切宗法社會的「封建思想」
5. 資產階級獨佔的虛偽的「德謨克拉西」——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等等濫調。
6. 消蝕民族意識之「黃色國際社會民主主義」
7. 反對民族思想的「無政府主義」與無原則的「恐怖主義」

8. 戕賊民族生命力的墮落的，淫蕩的，自殺的「頹廢文化。」

社會新聞又提出了建設革命的新的文化的四個原素：

「（一）以民族至上主義作為這一文化的最高原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民族主義的年代，如果沒有民族，就沒有社會，沒有階級，沒有一切。我們必須擁護民族的利益，作為我們生存的基礎。」

（二）必須具備有最勇敢的精神，最偉大的氣魄。這種精神，這種氣魄，是以毀滅一切，克服一切的，絕對摒棄頹廢，畏縮，猶豫，消極的傾向，以最積極的態度犧牲的決心，為民族爭生存。

（三）必須具備有流血的決心，——換言之，必須有一種空前的暴力，去摧殘一切民族的敵人，絕對排斥懦弱虛偽的人道主義。

（四）必須有一種堅強的自信，極端打擊悲觀主義，失敗主義，逃亡主義，取消主義等一切傾向。」

新中國的文化，應該反對什麼，應該主張什麼，社會新聞的論文已經很明確的告訴了我們。

現在所要注意的問題就是我們怎樣可以擔負起這一種文化的使命。我們現在已經有了明顯的進攻的對象，並且也已經有了建設的目標，我們要撲滅一切妨害民族發展的文化，我們要建立以民族利益為中心的文化。但社會是一種自然組織，我們如不先完成主觀上的原動力，而以這原動力去改變社會，社會的變遷就決不會暗中符合我們的想像。譬如損害民族利益的文化我們主張撲滅牠，但我們自己不能負擔起撲滅的責任，我們自己沒有撲滅的能力，那末損害民族利益的文化還不老老實實健在着嗎？又如以民族利益為中心的文化，我們當然很熱烈的主積極建立起來，但我們的熱烈與積極如只是空口鼓吹或徒發個人的狂熱，結果我們所希望的文化還不是一個虛幻的泡影嗎？泡影有時候是很好看的，然而並不能成為現實。

凡是一種文化的建立，要造成一種社會的風氣，必先造成一個有持續性的普遍的運動；但運動的出現，又必先有堅強的組織。中國過去的文化運動如清末的「維新」運動，民初的「五四」運動，這些文化運動的成功，表面似乎沒有什麼組織，但當時的社會給於新文化的阻力很淡薄，而事實上康有為領導的「維新」運動和胡適輩領導的「五四」運動，在他們私人感情

的聯絡上早已存在着組織的作用。目前中國的環境却完全不同，說起社會的阻力來，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赤色的共產宣傳，黃色的社會民主主義宣傳。以及一切封建遺孽和頹廢文化，任何一種文化差不多都比革命的文化高過幾倍，我們如祇憑各人的熱心從事文化上的宣傳，而沒有組織上的力量來擴大革命的新文化的影響，我們的文化最多也不過是一個狂熱的空談罷了。

文化上的空談，文化上的失敗，我們相信多少是要影響到政治上的動搖和軍事上的失利的。近年來中國不少的空頭大學教授，都在講壇上以反對國民黨為時髦，而不少的投機報紙雜誌以大談馬克斯社會主義為幌子，而國民黨對於文化非但沒有什麼統一的基礎，甚至許多負革命重責的中央委員，有的在做着社會民主主義的後櫬老板，有的在做着國際共產主義的保鏢師，有的在供奉和尙闡揚釋教，有的在整理國董主張復古……好了，國民黨本身在文化的態度是如此的五花八門，幾乎是一個無文化的組織，那末單靠一些政治的力量去防止和破壞敵人的文化，當然不會有絲毫成功了。因為本身沒有文化組織，任憑把敵人的文化打擊到如何地

步，結果還是一無所能。假如國民黨現在在文化上已有了堅強的基礎，我們縱不說肅清敵人的文化，但至少那些赤色文化的保鏢師，各種反動文化的後台老板，一切開倒車的頑固派可以不必再混入黨內，也許早已被清除而滾出去了。

對於文化的組織，社會新聞說：「中央宣傳委員會應該發動全體黨員乃至全體民衆來爲這一運動努力。一切宣傳機關，應該在統一的原則之下，總動員起來作新文化運動的先驅。」

對於文化的平面的主張，打倒一切妨害民族發展的文化，建立以民族利益爲中心的文化，這一點我們完全同意於社會新聞，但在縱的組織的活動上，我們却不得不斗膽表示異見。文化的活動，決不能單恃由上而下的努力，何況現在的黨的中央，龐雜異常，雖不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至少「道」與「魔」的勢力是相差不遠的，中央如沒有巨力肅清黨內的文化障礙物，怎能負起文化運動的重責。當然，我們不應懷疑中央，但有許多事實我們是無容諱言的啊！

我們不否認黨的中央應該有類於「文化委員會」的組織，也不否認中央政府應該有類於「國家出版部」的創立，但我們相信如沒有植基於民衆中的「文化細胞」，沒有集結社會

文化勢力的「文化同盟」等等的組織，那末一切從上而下的依賴中央的文化運動將永久不會有成功的希望。

二 改造文化的急務

一個國家的文化的興替，可以表現這一國家的興盛衰頹。因為文化乃是人類的一種精神表現，某一民族的文化，是前進的，其國家自然也強大旺盛起來。比方，二十世紀初期的俄羅斯的文化，表現出來的，都是衰敗，頹廢，淫穢，墮落的趨勢，終於使羅曼諾夫皇朝不能免於崩潰；在相反一方面，新興的意大利，俄羅斯，以及最近崛起的德意志，這些新起國家的文化，正和這些國家的運命一樣，都是表現出一種活潑的，新鮮的，勇敢的，邁進的精神。

在目前，中國文化成了怎樣一個情形呢？衰敗，頹廢，淫穢，墮落的趨勢，比之羅曼諾夫皇朝崩潰前的俄羅斯文化，沒有多少不同。目前中國文化的狀況，可以分做三種不同的模型：第一是頹廢淫穢墮落的描寫，禮拜六派還沒有消滅，更墮落的新禮拜六派又接踵而起，從小說到戲劇，從

報章到雜誌，從電影到彈詞，那些什麼「啼笑因緣」什麼「人海新潮」什麼「脂粉市場」不是「大腿」，「肉感」，「捏乳峯」，「摸屁股」便是「悲哀」，「失戀」等等充滿了沒落的無出息的哀鳴。而這種無聊墮落的文化，在目前的中國文化中，顯然佔有極重要的地位。第二是亡國大夫的高調，這些甘願亡國爲奴的高等華人，爲要盡他的帝國主義侵略的先鋒隊的作用，於是放出許多麻醉人心的毒氣，不是說我們應該袖手不動的等五十年乃至五百年，便是說二十世紀沒有亡國之禍，可以不必着急；不是高唱些開放政權，保障民權的濫調，便是弄些民主自由，人道禮教的舊東西來欺騙別人。這些「有教養」的亡國大夫，本身想做亡國之奴，而又想把大家都牽下水去。因爲他們是「有教養」的「高等」的人物，所以他們的麻醉宣傳，自然也可以起相當的作用，在目前文化上，形成一種勢力。

最後，要算共產主義的赤化宣傳，雖然共產黨在中國已到了末路窮途，雖然當局對於共產黨宣傳極力鎮壓，但赤化的宣傳，依然有擴大的趨勢。他們甚至利用了種種的出版機關，宣傳他們的赤色文化，甚至連最守舊的什麼報什麼「談」之類，也有了他們的踪跡。在「世界革命」

「社會主義」、「階級鬥爭」、「勞工解放」等等好聽的美名之下，把國家命運所寄託的民族精神，燬蕩無遺。他們現在已由祕密的進展到公開的，已由偏阻的對象，發展到廣大的羣衆中間，不僅那些最守舊的「大報」，也有他們的踪跡，甚至連電影戲劇等等各方面，也似水銀之瀉地，無穴而不入。在上海的電影事業中，他們的宣傳已經佔了最優越的地位，不僅「火燒紅蓮寺」「江湖二十四俠」這一類的影片，被他們打倒下去，現在甚至連「啼笑因緣」「都市春夢」一類的東西也被他們擠在一邊了。

以上這三種不同的傾向，同在中國文化現狀中佔相當勢力，中國的文化界幾乎有由這三者鼎足而峙的形勢。這三種傾向，雖然各不相同，乃至絕對矛盾，但其消滅民族主義精神的麻醉作用，三者是完全一致的。不怕敵人已打到了北平，不僅幾十里的地方，而禮拜六派與新禮拜六派，還是在以大腿酥胸，失戀悲哀來麻醉人心，以致邊疆烽火連天，敵騎蹂躪，而內地還是歌舞昇平，劇場八滿，不怕敵人已打到了天津，而亡國大夫還是在唱再等五十年，或開放政權，民主自由的高調，以致無論國難如何嚴重，而爭政權，爭「民主」（？）的內部糾紛，仍是層出不窮，而張

敬堯之流，也是殺不勝殺。不怕中國將被日本帝國主義吞滅，而共產主義的赤化宣傳，依然是在鼓勵階級鬥爭，社會革命；以致民族運命危似累卵，而赤匪還是殺人放火，爲虎作倀。

凡此種種現象，正足以反映這三種反動文化所造成的嚴重的結果。

我們要挽救國家的運命，在復興民族的精神，但這不僅要在軍事上政治上財政上經濟上努力，特別要在文化上努力——因爲文化運動是一切運動的基本運動，而且，文化更是一切文明現象的發動力，所以上述三種反動文化，如果不能撲滅，民族至上主義的積極的，邁進的，勇敢的新興文化，不能建立起來，縱然在政治軍事上有了辦法，也不足以挽回民族滅亡的危運，而且根本上軍事與政治，就不容易得到辦法，因此之故，毫無疑義的，改造文化的運動，是當前刻不容緩的急務。

最後，我們以爲以上這三種墮落的反動的文化，固然是復興民族運動的大敵，但如果代替這些墮落的反動的文化的新興文化不能建立起來，則徒事取締與壓迫的消極工作，是沒有意義的。所以我們要在這裏，大聲疾呼的請舉國一致注意到這方面——負起建設新的文化責任，

努力於積極的工作卽是建立以民族主義爲最高原則的勇敢邁進活潑的新興文化（社會新聞）

三 我們需要怎樣的文化？

一個民族的生命，不在乎牠的疆土的廣大，不在乎牠的人民的衆多，而在乎牠有優越的文化。因爲文化可以推進社會的進化，也可以保障民族的繁榮，所以要創造一個嶄新的社會，要建設一個強大的民族，均須首先着手於文化的改造。有了文藝復興運動，總有歐洲先進國家的發展；有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總有俄羅斯的革命。列寧史太林爲要鞏固布爾塞維克的政權，故亦首先着眼於全俄文化的改造，把舊俄羅斯所有地主的貴族的沙皇的，資產階級的，乃至右傾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文化盡情摧殘，從新建立布爾塞維克的文化，以期奠定蘇維埃的基石。墨索里尼爲要維持法西斯蒂的統治，推翻一切有礙意大利極端的民族主義發展的一切文化，而創造法西斯蒂的文化，總能使法西斯蒂的統治愈趨鞏固。最近取得德國政權的希特勒黨，也極力建

立希特勒黨的法西斯蒂的文化，乃不惜焚書毀圖，以摧殘舊有文化。因為不能燬殘舊有的文化，則新文化不能建立起來；新文化不能建立，新的理想的社會就不能存在或發展。中國歷史上迭受胡狄蠻夷的侵陵，然而中國沒有滅亡於胡狄蠻夷之手；這是因為胡狄蠻夷沒有比中國更進步更健全的文化。西歐資本主義侵略中國不足一世紀，而中國已淪為資本主義列強的次殖民地，就因為資本主義文化戰勝了中國落後的封建文化。

在目前，我們的民族國家，已瀕於死亡之線，挽救民族的危亡，復興國家的任務，是非常迫切的。這誠然有待於各方面的努力，而改造文化，毫無疑義的是許多任務中的主要任務之一，但改造文化，先要明白文化的現狀，尤其要明白那些有礙於民族的發展的文化，要給以無情的摧殘。在目前中國社會中，我們應該反對的文化，主要的有下列幾種：

1. 侵略我民族利益之「帝國主義」
2. 危害我民族生命之「共產主義」
3. 不顧民族生存專圖個己發展之「個人主義」「及個人集團」

4. 阻礙民族意識發展之「鄉土觀念」、「家族觀念」以及一切宗法社會的「封建思想」。
5. 資產階級獨占的虛偽的「德謨克拉西」——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等等濫調。
6. 消蝕民族意識之「黃色國際社會民主主義」。
7. 反對民族思想的「無政府主義」與無原則的「恐怖主義」。
8. 戕賊民族生命力的墮落的，淫蕩的，自殺的「頹廢文化」。

以上八種，是我們應該堅決反對的，因其立場與形態雖各有不同，而其為害民族則一也。我們要創造民族的新生命，首先要肅清這些妨害民族生命的微生蟲！

中國社會經過數千年的封建小農經濟的統治，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聖賢之道」成了歷史上的文化的正統。自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西歐資本主義勢力侵入中國，自然經濟佔優勢的農業小手工業的封建社會開始崩潰，於是數千年來傳統下來的封建思想，也開始動搖。但是因為資本主義在中國不能迅速的完成其歷史上的任務，不能長足的發展起來，於是社會的經濟結構中，封建成分還是很佔優勢。因而封建思想在一般的社會文化中——特別是在

農村中，還佔有特殊的勢力。封建制度的基礎，是自然經濟佔優勢的小農經濟，所以封建思想的內容，也就脫不了範圍極小的地方觀念與家族觀念。民族是什麼東西？中國民族在世界上佔一個什麼地位？這些是封建思想所不了解的。「地方觀念」「家族觀念」的發展，不僅不能成爲民族觀念，而且顯然是與民族觀念衝突的。地方觀念與家族觀念，結晶在「天下事於我無與焉」，他們祇知道「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家瓦上霜」，所以國家與民族，在他們是完全漠視的。

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挾其先進的優越的軍事經濟勢力，在中國肆意侵略，使中國民族淪於歷史上未有的悲慘境地。而且帝國主義的侵略，不僅是商品與軍艦，還帶有文化上消滅中國民族性的企圖，這就是「教會文化」與「買辦文化」在中國的發展的主因。教會文化與買辦文化的特點，除了盲目的讚美西方的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而外，就是盲目的讚美帝國主義國家的一切，而把中國一切舊有的文化唾棄殆盡。這種教會文化與買辦文化的發展，就是中國人自己不要中國，完全成爲帝國主義的洋奴，所以教會文化與買辦文化，亦可名之謂洋奴文化，經過了帝國主義的辯護士們的努力，在中國已有長足的發展，特別是在通商口岸，已隱然有戰勝

守舊的封建思想的趨勢。

在西歐先進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內部產業革命的結果，然而在中國是例外的。當西歐先進國家經過了產業革命的過程，完成了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任務的時候，中國經濟還是在落後的封建範疇內，沒有萌芽產業革命。及至西歐資本主義侵入中國，開始破壞了中國的封建經濟，於是纔有新式工業的萌芽，但這種外燦的而不是在內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出現，不能使中國完成產業革命的任務，因而那時中國除了教會文化與買辦文化而外，還沒有新興的資本主義文化，在歐洲大戰中（一九一四——一八年）帝國主義國家對於中國的侵略，無暇顧及，因而中國的土著工業得着一個千載難逢的發展的機會，而資本主義文化也就在這時候開始發展起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就是資本主義文化運動的抬頭，自從五四運動以後，資本主義的文化運動，纔算在中國有相當的發展。但是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已經是在資本主義制度行將沒落的時候，所以傳播到中國來的資本主義文化，也是不健全的帶有病態的文化。他們——例如胡適之之流——傳播一些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東西，雖然這些東西在歐美資本主

義先進國家，已經早已是腐朽的廢物，然而他們在中國却吹得很厲害。在封建意識與洋奴文化之間，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當然是比較新鮮的東西，所以也能夠欺騙一部分羣衆。但是這些在西方既早已成了腐朽的東西，到中國來能有什麼作用？在資本主義行將沒落的時候，中國不能走純粹資本主義的道路，這不是很顯然的事嗎？這些資本主義文化——自由主義，民主主義——除了消滅民族精神，使中國更深一層的受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外，是沒有別的作用。所以簡單說一句，資產階級文化與洋奴文化，是沒有多少不同之點的。

因為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時代，已經是整個資本主義制度行將沒落的時候，所以一部分智識份子，對於資本主義文化開始懷疑，而接受了社會主義的影響。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胡適之、蔡元培之流，是屬於前者資本主義文化的，而陳獨秀、李大釗之流，是屬於後者接受了社會主義影響的。中國資本主義工業不能發展，本沒有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但因為中國社會經濟之極度的貧困，所以社會主義者鼓吹貧富者的鬥爭，頗能得一般人的盲從，所以在毫無實現社會主義條件的落後的中國居然也有了共產黨，而且居然也轟動一時了。但是究竟因為中國經

濟的落後，沒有絲毫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所以共產黨不能按照了馬克思的原則做去，而成爲殺人放火的強盜的集團了。而且這殺人放火的強盜的集團，因爲中國沒有強大的無產階級之故，不依靠蘇聯就不能存在，所以中國共產黨，就在這樣的條件之下，成了蘇聯的工具，不僅在「無產階級無祖國」的藉口之下，完全拋棄了國家民族，而且很矛盾地進一步提倡「擁護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這樣，共產主義的行動與宣傳，處處成了危害民族生存的大敵了。不待說，我們對於這危害民族生存的大敵，是必須澈底地肅清纔好！

在對於蘇聯賣身投靠下的從事於殺人放火的「革命工作」（？）的共產黨，其不能成功是顯然的，而封建思想洋奴文化資產階級文化又爲一般人所不屑爲，於是就有一部分人走入無政府主義的歧途，由不滿一切而更陷入於無原則的恐怖主義的深淵。其實這是戕賊民族生命力的害蟲，也是我們必須剷除的。

封建勢力因爲資本主義侵入而開始崩潰，又因資本主義不能長足發展而還有其殘餘的勢力，已有如上述。在這樣矛盾狀態之下，產生了不顧國家民族的利益，而完全成了個人野心發

展的行動與影響。這種影響擴大起來，形成了封建割據的局面。這種建立於個人野心性發展的個人集團與封建割據。無疑也是民族強大的死敵，而必須澈底掃除的。

中國的現狀，是最混亂，最沒有辦法的時代：資本主義沒有出路，共產主義不能成功，封建殘餘無法復興。在這到處充滿了無出路的悲哀的時候，各種各樣，都拿到中國來試驗，於是除了上述幾種藥方以外，還有在西歐早已腐朽的黃色的社會民主主義。這種黃色的社會民主主義，介於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既反對資本主義的獨占，又不能仿效共產黨之殺人放火，結果只有唱些早已爲西歐工人階級所厭棄的高調，增加些消滅民族精神的麻醉作用，此外卽一無所稱。但是因爲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都沒有出路，所以一部分短視的人，也就盲目地附和着這在西方早已被唾棄了的社會民主主義。不待說，這也是與民族精神的發揚，有極大的妨礙，而應該加以摧殘的。

在一切都絕望了的混亂狀態中，就是最進步的人，也會自然而然地趨於墮落頹廢的慢性自殺的陷阱，於是頹廢文化與墮落文化，乃居然稱盛一時，酥胸，大腿，回力球，探戈舞，璇宮豔史，啼

笑因緣，這一些毒害民族生命的酖酒，到處傾流，而民族精神乃因而每况愈下。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如果不把這一切一切的有害於發揚民族精神的酖酒毒液傾諸大海中，中國民族永遠沒有復興的機會，中國民族祇有成爲印度朝鮮的繼續！

要使中國民族復興起來，要使中國免爲印度高麗之續，必須要把這些有害民族的各式各樣的文化予以無情的殘酷的打擊，不如是，則足爲民族的新生命的新文化不能建立起來，中國民族也就永遠沒有復興的可能。列寧與史太林，墨索利尼與希特勒，他們爲要創造新文化，對於舊文化也曾加以最無情最殘酷的打擊，重演了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活劇。當然的運命，是不能不如此做的。

所以，肅清一切有害於民族生存發展的上述的諸文化系統，這是目前緊急的也是神聖的任務，但單是消極的毀滅了舊的，還是不夠，我們還要積極的建設新的足爲民族的新生命的文化！也祇有爲了建設新的而毀滅舊的，纔有意義！

我們目前需要一種新的文化，作爲我們民族的新生命。這新文化必須包含有如下的幾個

原素：

(一) 以民族至上主義作為這一文化的最高原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民族主義的年代，如果沒有民族，就沒有社會，沒有階級，沒有一切，我們必須擁護民族的利益，作為我們生存的基礎。

(二) 必須具備有最勇敢的精神，最偉大的氣魄，這種精神這種氣魄，是以毀滅一切，克服一切的，絕對摒棄頹廢，畏縮，猶豫，消極的傾向，以最積極的態度，犧牲的決心，為民族爭生存。

(三) 必須具備有流血的決心——換言之，必須有一種空前的暴力，去摧殘一切民族的敵人，絕對排斥懦弱虛偽的人道主義。

(四) 必須有一種堅強的自信，極端打擊悲觀主義，失敗主義，逃亡主義，取消主義等一切傾向。

民族的新生命，必須建立在上列四個基本條件為原則的新文化之上。我們必須大聲疾呼的提倡民族主義，我們要使每個人都以民族利益為其生活的出發點。必須如此，中國民族纔有

復興的可能。毫無疑義地，我們目前迫切地需要這種新文化運動，來洗刷我們民族過去的恥辱，來挽救我們民族滅亡的悲運，但是這一運動必須朝野一致的努力。在政府與在朝黨一方面，尤其應該以最大的力量來參加這運動，發動這運動。國民黨的一切宣傳活動，應該以此爲主要前提。中央宣傳委員會應該發動全體黨員乃至全體民衆來爲這一運動努力。黨的一切宣傳機關，應該在統一的原則之下，總動員起來作新文化運動的先驅。

政府機關，尤其是教育部應該負起最大的任務來。在這裏我們不能不表示我們對於國家教育無方針的失望的痛心。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已經提倡了幾年，到如今沒有絲毫的成績。國難之發生，已經兩年，但是教育方面還是死氣沉沉，和以前沒有分別。教育行政當局僅僅是「蕭規曹隨」地做了一些完全官僚化的機械工作，他們把「會考」，「未準立案之學校否認其資格」這些瑣事，作爲唯一的工作，教育部把全副的精力，集中在審查那個學校有多少基金，那個學校未曾立案，對於整個的教育方針固然沒有確定，甚至連學校內容腐敗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反而置之不問。因此之故，當我們民族的敵人在實行「教育的總動員」的時候，而我們中國的教育

界還是腐臭冲天。這些腐敗的狀況必須根本改革。教育方針必須確定以發揚民族精神爲原則，應該對於這一根本任務上痛下工夫，而力斥以前祇重表面工作之非。國家出版部應該立刻成立起來，統一全國的出版事業，置在民族主義的管理之下。自小學幼稚院到大學，一切的教科書都應該由國家編輯發行。一切頹廢不振的學校應該立刻封閉，懷疑民族主義的人都應該逐出教育界之外。教育是文化的根源，現在中國文化之墮落，教育行政當局實應該負最大的責任。所以在這新文化運動中，教育行政當局尤其應該負起最大的責任來。（社會新聞）

國民黨的文化政策批判

一 國民黨從來沒有確定文化政策

提到國民黨的文化政策批判，我們便應當小心謹慎的把國民黨的文化政策找來看一看。但是可憐，我們那個老病牛樣的黨從來就沒有什麼明白規定的文化政策和統一的文化組織，孫中山先生雖曾盡其一生大部份的精力，從事於主義的創立，心理的建設，華四十年的努力纔立下中國革命的基礎。然而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後，中央雖盡全部的力量在做「守成」工作，企

圖保全孫中山先生所遺留下來的革命事業，那些自私自利的民主民權爲口號的領袖們却反而無微不至的圖謀破壞，於是文化運動就拋到九霄雲外去了。當然，我們不能因爲國民黨沒有規定的文化政策和統一的文化組織而就放棄文化的清算工作。社會不能沒有文化，雖最愚笨的革命運動也要與文化發生關係，有所牽連。我們縱不能找得整個國民黨的文化政策和文化活動，但我們可以從國民黨的各種行動上，找出文化活動的形跡，而加以極忠實的批判。於批判之後，再圖謀打開今後中國文化進展的道路。

國民黨的文化，一般的說起來，可說只有破壞，沒有建設和創作。並且破壞也絕無標準，中央的規定雖然較寬，中下級的執行却苛細得無微不至，一個省主席只要隨着私意尋出幾個「紅光」「階級」「流血」的句子，便可發虎威，封報館，殺編輯。內地一個小公安局長，則連罪名亦不要，一句「丟那媽」「媽特皮」編輯報館，就要殺頭關門。此外那些權威無上的軍爺們，天之驕子的黨員們，則又可於有意無意之中隨時做破壞文化的工作。那些真正腐化民族意識的報紙雜誌，妨害革命進展的淫穢麻醉的讀物，國民黨因爲無損於己，却又不去破壞牠們了。

本來，統治者自身的文化只要有相當基礎，對敵人是可以不過事破壞的。墨索里尼希特勒的文化破壞工作所以做得很激烈，那是爲本身的新興文化開闢道路，不得不如此，他們一方面破壞，另一方面却在以加倍的努力從事文化創造和建設。反觀中國，破壞工作是做得太好了，連資產階級的小丑們——如申報的自由談——也居然喊着言論思想著作不自由的幽默調兒。但在文化的創造和建設方面，充其量就只有（一）黨化教育，（二）機關刊物，（三）間歇性的宣傳，（四）個人的投機文化。教育黨化，名義自然很好聽，但事實却並沒有什麼好影響，中小學生大都對政治不感興趣，由於教師的不善，大都見了黨義就頭痛，從小對黨義就存了惡感。大學校裏則幾乎以反對國民黨爲時髦，黨義竟成了可厭的材料。雖然現在明定了不論什麼考試都有黨義的一格，但不到爲考試而考試的時候，三民主義問答民權初步之類的東西，誰個也懶得去理會牠，因此要以黨化改造教育者，却成了可憐的尾巴！公私機關刊物則都是些暮氣沉沉的「老爺報」和「老爺雜誌」，十之八九是買賄文氓安置飯碗，真正爲革命爲文化的可說絕無僅有。間歇性的宣傳本來很少文化上的作用，不過用以應付臨時發生的事變如討伐勳匪等

等罷了。個人的投機文化，則是各個私人買好敵黨的勾當，例如有些人身爲國民黨中央委員，暗中與共產黨社民黨打交道，甚至明顯的做反動政治犯和反動刊物的保鏢師，爲未來政治變動預留地步，這種投機工作，表面上好像是國民黨要人熱心文化。實際上倒成了國民黨文化的根本障礙物了。

二 國民黨文化的哲學基礎

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的演講內，不承認唯物論，也沒有承認唯心論，後來的許多黨人沒有了解孫先生的意旨，甚至還有人誣譏孫先生不懂哲學，於是國民黨在哲學上失掉了依靠，東倒西歪而無所歸宿了，國民黨數年來內部的紛擾和意志的渙散，主要的原因就在於哲學上的沒有中心立場。一部分頑固的老朽分子不知不覺中歸向着唯心論，另一部分左傾分子則抄襲了半部唯物論，唯心論的三民主義自然只有整個兒的投機，向着復古和沒落的路上走。那自命左派的左傾分子被半部唯物論拖累着，既無法實現民三主義，又不敢走共產主義，唯物論的三

民主主義就成了個不三不四的怪物，表面上是左傾，革命，實際上却永遠只有破壞，搗亂！

三民主義的創立，自有三民主義的現實基礎和哲學立場，無須庸人自擾的向着唯心哲學唯物哲學去亂鑽亂碰，也無須眼花撩亂的一忽兒作資本主義的投機，一忽兒又作共產主義的投機。我們只有認清孫中山先生所指定的立場，認清孫中山先生所指定的路線，勇猛精進完成革命。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心，也沒有絕對的物，一切唯心或唯物的概念，都只是各個個人的心理形態。宗教是唯心的，但宗教的產生也是根據於現實的，那末宗教難道就能說牠完全沒有唯物的概念嗎？又共產黨自詡是唯物主義者，可是幾千百次的暴動都失敗了，可憐的勞苦工人雖然流血犧牲了，却至死還要以最後的勝利屬於無產階級自慰，這種宗教的迷信精神，難道不是唯心嗎？世界不能存在於絕對的唯心或唯物，所以孫中山先生不承認心，也不承認物，而只承認心與物所交織成功的「一生」了。世界有了生，世界所以能夠進步，能夠發展，能夠產生人類的永無窮期的歷史。

孫中山先生於民生主義中提出了以民生爲中心的革命觀，提出了唯生論的哲學概念。但

哲學是比較深奧的學問，孫先生未及加以較詳的解釋，但曾以巨大的精力創立「知難行易」的學說，「知」是哲學，也是科學，這便形成了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唯心論與唯物論，這都是純理念的存在，專憑個人的意志發展以個人的私意去解釋一切，往往忽略着社會的實際情形。唯心論者夢想天堂，他們不問實際如何，現世不能實現，就等待着死後去進天堂。唯物論者迷信階級，以為窮人都是給富人害的，只要把資產階級打倒，無產階級便都可以進天堂過快樂日子，於是一味暴動暴動，否認理性之存在，數千數萬的工人都盲目的被暴動犧牲了。

國民黨不承認絕對的心，也不承認絕對的物，只承認人類為生存進化而奮鬥。人類要生存，纔需要奮鬥，奮鬥了人類纔能進化。但這裏的所謂奮鬥，不是宗教式的頹廢的迷信，也不是機械化的盲目的暴動，這裏需要「知」，需要有科學。有了科學的幫助，有了「知」的發展，人類的生活纔能改善，社會纔能進化。中國人有一個傳統的信仰，就是「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中國人整個的忽視了「知」和科學的價值，堵塞住了人類改善進化的大門，整個的民族便因順苟且頹廢懦弱，一方面放任着少數軍閥政客官僚豪紳買辦奸商胡作妄為，禍國殃民，一方面又造成了

各個帝國主義的恣意侵略，摧殘壓迫，領土被佔領了，主權被劫奪了，中國政府固無可奈何，中國民衆也不過是一時的氣憤，氣憤過後，大家又去歌舞昇平，快樂享福了。

中國民族的無組織，中華民族的因循苟且，這都是由於中國傳統的頹廢的文化所造成的。中國人困守着「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的牢籠，被圍於保守性的文化中而不思長進。要推進中國革命，首先便要打破因循頹廢的舊文化，創立革命的新文化。但這裏所謂新文化，不能單純的建立在唯心的基礎上，也不能單純的建立在唯物的基礎上，而要依着孫中山先生所指定的唯生的路線去進行。有了「知」的發展和科學的幫助生存纔能進化，同時有了整個民族的生存纔能有各個個人和各個階級的生存，否則整個民族也亡了，個人的生存和階級的生存更從何去求得呢？中國有中國的歷史，中國便自有中國的文化，文化絕對要受民族性的限制，是不能夠隨便去販運或移植的啊。

三 肅清各派反動文化和建立三民主義文化

五四運動五卅運動以後，中國首先在文化上植立了反帝反封建的基礎。有人說，十六年國民黨北伐的成功，正是繼承了五卅運動反帝的高潮，這在文化的意義上說，我們是應當承認的。社會的缺陷，首先會在文化上反映出來。由文化的波動產生出革命的思想，而後社會的政治經濟都隨着發生轉移，革命便在遑潮流下面爆發出來。中國民衆於水深火熱的生活中掙扎反抗，從五四的學生運動，到五卅的全體民衆的反抗運動，經過了長期的醞釀，國民革命纔爆發而成功了。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國民黨十六年北伐的成功，早已在文化上得了自然形成的堅強基礎，使國民黨的革命得到許多順利發展的條件。但北伐成功，而國民黨因內部的紛爭，既沒有餘暇予帝國主義的文化和封建的文化以充分的打擊，復又讓共產黨去擴展文化勢力，六七年來，的文化怠工，國民黨在五卅及五卅以前所有的文化基礎差不多都完全倒坍了。耶穌教在中國至今還佔着巨大的潛勢力，教會學校在中國教育上還佔着重要的位置，這證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文化侵略還是根深蒂固的。九一八，一二八以後，大刀殺敵見了效力，章太炎馬相伯之流，大談掌故救國，國術大大的被人提倡，而何鍵陳濟棠等又通令尊孔讀經，這又證明中國的封建文

化還仍有重行抬頭的企圖。

中國革命在事實上除了國民黨外已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帝國主義和封建制度中國民衆是要誓死抵抗的。共產主義的空想制度雖然適合於一部份空想學者的胃口，但事實以及湘鄂贛一帶土匪流寇式的紅軍實行了兩三年的燒殺，終於成了民衆的敵人。所以國民黨事實上已成了中國革命的勝利者；這勝利的造成，不是由於國民黨的軍事力量，也不是由於國民黨的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而只是由於三民主義的適合於中國的客觀條件。我們相信孫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的時候，他的力量和清廷比起來是相差很遠的，然而滿清終於被推翻了。我們又相信國民黨在屈處廣東的時候，國民黨的政治經濟軍事力量更遠不能與孫傳芳張宗昌曹錕吳佩孚等軍閥相比擬，然而國民黨也終於很快的掃除了這許多大大小小的軍閥，建立了自己的政權。這裏我們可以相信國民黨在沒有強固的政治經濟軍事力量以前，國民黨已經能夠藉着主義的力量壓倒一切的敵人，現在國民黨已經有了統治的權力，這對於怎樣去肅清他的敵人，當然更不成問題了。這裏我們所要注意的，就是國民黨藉三民主義的適合於現實條件而破壞了

敵人的政權，創立了自己的政權，但於自己的政權創立之後，怎樣滿足民衆的慾望，實現革命的建設，便成爲當前急待解決的問題。各派反動份子反動集團，他們在實際的社會雖然失了依據，但他們却可以利用文化作武器，大發其不滿現狀的論調，而達到煽動搗亂的目的。國民黨對於這許多的各黨各派的反動文化宣傳，當然要用各種力量去打擊，破壞，不過主要的還是建立國民黨自己的文化，以革命文化的建立去肅清一切反動的文化，其效果當然比利用各種政治力量去破壞反動的文化要大得幾萬倍了。

四 怎樣展開國民黨的文化運動

復興中國的文化，現在已爲國民黨當前的急務。不過所謂復興文化，並不是徒託空言就能實現，也不是高高在上的黨或政府的統治機關簡單的下幾道命令就可以成功。文化是社會活動的綜合，經常在活動着，而且經常在改變中，她不能像歷史文明和國家法令那樣常常停留而固着下來。文化停留下來，文化就要落後了。國民黨文化在長期的停留落後狀態中，中國

的文化已經衰頹不堪，在這衰頹不堪的基礎上打起復興文化的口號，當然是一件困苦艱難的事情！

要復興中國的文化，要先問領導中國革命的國民黨怎樣展開她的文化運動的使命。每一個文化運動的展開，必須具備有兩個工作上的基本條件：第一是正確的文化政策，第二是嚴密的文化組織。然而黨除政治經濟軍事有時可以見到一些比較完全的決議和規定外，對於文化問題向來就抱着放任的態度，黨的中層下層不必說，就是那些中樞負責的中央委員，對文化也是抱着絕對自由的態度，有的依賴着自己的地位公然作各種反動文化的掩護人，有的懷疑着國民黨政權暗中作各種反動文化的後台老板，在上者行之，在下者效之，國民黨的文化自然不堪問聞了。黨內有文化的自由行動出現，主要的原因當然由於黨對文化政策從來沒有完全的規定，黨如產生了整個的文化政策，那末全體黨員可以有整齊的陣線與各派反動文化作戰，同時也可以有集中的努力來建立自己的文化。

至於文化政策怎樣規定，文化組織怎樣成立，這當然不是記者所能臆臆詳及的。不過我們

需要在這裏提請注意幾點，陳述於下。（甲）關於文化政策方面應當注意的：一，應絕對以三民主義爲文化的中心，並爲三民主義文化的迅速實現和實際執行起見，應當極端的容納法西斯蒂的精神，排斥文化上一切非組織的自由主義的現象；二，應以國家至上主義民族至上主義爲現階段三民主義文化運動的中心力量，在文化上樹立強固的反帝反封建的基礎，一切妨害國家和民族利益的文化都應該絕對排斥；三，應明確的規定革命文化與反動文化的目標，並努力消除民衆對於三民主義文化的模糊現象和懷疑現象，凡有助長一切反動文化的人或物的標的，當不計代價而使之破壞消滅；四，應注意到文化的活動性，並深入下層，黨應利用文化的工具多與民衆接觸，建立黨與國民的密切關係。（乙）關於文化組織方面應當注意的：一，爲文化活動的便利和統一指揮起見，黨的中央應該有文化委員會的組織，或在黨的領導之下成立「文總」的組織。文化組織統一了，黨的文化管理工作也就容易建立了。二，黨應該盡量領導一切自發的文化組織，絕端排斥各種委派的文化組織。三，一切的文化的組織及活動，應取公開態度，使民衆容易了解，並有便利參加的機會。四，文化組織的嚴密，應先從黨內開始，黨員不論參加文化

工作與否，均不許有非組織的或自由的表現。黨內完成了文化統制的基礎，再在社會的各文化組織內建立黨團作用，使文化在黨內的統制影響擴大到黨外，可以更進而完成全體國民的文化統制。若黨內和文化的上層組織尙不能做到嚴密的程度，則下層的嚴密是不能成功的。

國民黨的文化統制運動

一 建立中國的民族文化

一個國家的文化，整個的代表着這個國家的生命。如果一個國家沒有獨立的民族文化，或者牠的文化是飄搖不定的，那末這個無文化的國家便一定要歸於滅亡。中國自從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以後，舊文化已被推翻，新文化尙未建立，於是在一種文化的東依西靠狀態下，中國的社會就混亂不堪，好像一盤散沙了。中國現在急須建立新文化，但所謂新文化究竟以什麼爲標

準呢，是不是要仿效歐美的資本主義文化？要仿效蘇俄的共產主義文化？或者是機械的仿效復古的「孔孟文化」？——這三種文化，顯然都不適合於現代的中國。中國處於嚴重的帝國主義的包圍中和殘餘封建勢力的作祟下，中國的民族資本萬萬沒有抬頭的可能。自胡適之以至於買辦洋奴們雖然日夜在歌頌着美國如何，「請去看看美國，」好像中國只要實行資本主義，中國就可以得救了。但我們對美國已經認識得很清楚，中國非但沒有仿效美國的可能，並且自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恐慌出現後，美國自身也已發生了許多無法解除的矛盾。

中國的民族資本不能抬頭，中國自身的生產不能發達，中國顯然也不能形成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對立的勢力，布爾什維克的英雄們雖然力竭聲嘶的高喊着蘇俄如何，「請去看看蘇俄，」好像中國只要實行共產主義，中國也就可以得救了。但我們對蘇俄也已經認識得很清楚，蘇俄承着世界大戰的餘波，無產階級的暴動雖然傲倖取得了政權，最後列寧還不得不高喊「犧牲一切的主義，」毅然執行新經濟政策，復活了資本主義的制度。中國的布爾什維克的英雄們，雖可不惜用一切欺騙麻醉手段，驅使中國民衆毫無準備的去作帝國主義的砲灰，但在帝國

主義的殘酷的摧毀之下，誰能担保中國不滅亡呢？

又在這激烈競爭的世界中，列強都憑着先進的科學國家的力量，不惜用一切毒辣的手段來侵略中國，復古的先生們卻還憑着閉關自守的見地，大做其「唐虞盛世」的美夢。他們以為有了一「順民」就一定會有「聖君」，殊不知環伺四週的帝國主義的鐵掌，隨時都準備着來乘機宰割，恐怕復古先生們的順民聖君還沒有出現的時候，中國早已被帝國主義宰割完了。

中國不能仿效美國，不能仿效蘇俄，也不能恢復「唐虞盛世」，中國有中國的歷史，中國更有中國應走的道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固然一方面是繼承着中國民族的正統精神，一方面也主張吸收先進列強的科學精神，但這裏僅僅是「繼承」與「吸收」而已，絕對沒有主張要復古，要機械地仿效外國啊。中國固有的文化我們是應該絕對寶貴的，但我們的寶貴並不是固步自封，而要以進取的精神推動固有文化的進步。歐美的文化我們應該盡量吸收，但我們的吸收西洋文化只是用來幫助中國社會的進步，並不因此就主張中國民衆都去做西洋物質文明的奴隸。

日本的維新運動，祇有數十年工夫就臻於強盛的地位。中國的革命，若本着孫中山先生迎頭趕上去的精神去做，中國的強盛當然是沒有問題的。三民主義的政權已經成立了很久，國民黨已經統治了中國六七年，中國爲什麼還是那樣的四分五裂，一盤散沙，這就是因爲中國被各種資本主義文化，共產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拖累着，全國民衆沒有本着迎頭趕上去的精神共同一致的奮鬥的緣故。中國的新文化沒有確立，中國民族在精神上便沒有自立的基礎，於是有的羨慕着美國的繁榮，有的憧憬着蘇俄的進步，有的又縈迴着過去歷史上的太平盛況，民族在精神上既未能實行團結，那末所謂共同一致的努力當然是夢想了。中國如希圖存在於世界，不願做第二的朝鮮印度，中國便應該有進步的活躍的民族自立的文化，激勵民族的精神，發揮民族的生命。發揚中國固有的文化，以振起民族自立的精神。更進一步接受二十世紀的科學思想，以作中國民族進化的資糧。那末中國革命的文化，我們可以很明白的決定，第一爲加強國家組織的機能，在中央的有力領導之下，使全國四萬萬五千萬民衆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的起來反抗帝國主義，起來履行革命的建設，這便須提倡國家至上主義，提倡民族至上主義，國家與民族

是兩個相互爲用的東西，有了民族的同仇敵愾的心理，國家的機構纔能堅強活潑，有了國家的健全組織的活動，民族的力量纔能充分發揮。第二爲安定社會的秩序，滿足民族的生活，中國還需要科學，科學是發展生產的工具，同時也是繁榮民生的工具。榮養不足的民族，決不能建立強盛的國家，民族至上主義和國家至上主義的提倡，雖能增進國家的機能，但國家所給予民衆的祇是組織的力量，決不是生活的資料。所以國家的強盛，需要國家至上主義和民族至上主義的提倡，但講到民生的繁榮，民衆生活的滿足，我們又不得不提倡科學。中國自廢科舉設學校以來，對於科學雖已經提倡了數十年，但實際上運用科學的地方還是很少，一切機器和科學用品的製造固大半仰給於外國，而且除少數都市和通商口岸以外，大多數的民衆生活仍在半原始狀態中，還離科學很遠呢。

我們如將上述的兩種新文化的中心思想加以引伸，那末在國家至上主義和民族至上主義的影響下，中國民族便要鼓起團結的精神和自立的精神，什麼階級文化頹廢文化，一切都要歸於自然淘汰；在科學的影響下，中國民族便要鼓起駕御自然的精神，鼓起奮鬥前進的精神。

切深入民間的封建觀念迷信觀念，也將掃滅無餘了。

二 完成三民主義文化的統制運動

在中國社會的現實情況上說，中國必須有統一的文化，同時在中國革命的發展前途上說，中國又必須有自立的民族文化。文化是社會實際生活的反映，是一種民族精神的延續，在這一方面說，文化的保守性有時候是很濃厚的；可是我們如能夠明顯的承認文化是社會進化的先導，是訓練國家，民族以至於任何國民的工具，在這樣的地方，文化又具有着充分的革命性了。中國需要統一的文化，需要自立的民族文化，這樣的文化當然不是爲了保守，而是爲了革命，爲了促成社會的進步。

中國數千年來的文化，在一貫的帝皇專制和尊崇孔子的主張下，中國文化上的保守主義已經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基礎。如不是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閉關自守的城壁，受了世界的洗禮，也許中國文化至今仍在強固的封建勢力包圍下，充分的發揮着保守主義的作用呢。不幸世界

的潮流不能允許中國繼續保守下去，封建的舊文化摧枯拉朽地崩潰了。當時的社會對於這舊文化的崩潰，祇是將過去盲目的賤視「洋人」的心理一變而為盲目的崇拜「洋人」，外國的東西都是好的，外國的學說都是對的，却把建立民族新文化以繼續崩潰的舊文化的任務完全忽略了。二十年來的中國，一切不合於實際社會的民主主義共產主義都隨着機器洋布奢侈用品被搬運了進來，於是上至國家政府的設施，下至商人小販的生活，都盡着所有的力量「洋化」起來了。以十八世紀的手工生產，競效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生活，又以盲目的崇拜「洋人」的心理代替了民族自立的精神；中國的不亡，要不是因為歷史太長和疆土太廣的緣故，實在也是天幸了。

在這民主主義共產主義拚死掙扎而不能成功，封建文化雖躍躍欲試而終不得抬頭的現在，中國正急待着一種能夠自立的統一的民族文化產生出來。孫中山先生本着四十年奮鬥的經驗，纔完成拯救國家拯救民族的三民主義，那末這所謂自立的統一的民族文化，顯然只有在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下面纔能有成功的希望。同時我們如承認「文化是社會進化的先導，

是訓練國家，民族以至於任何個人的工具，「那末爲完成三民主義的革命，實在也有首先完成三民主義文化的必要。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有資本主義的文化，蘇俄共產主義的國家有共產主義的文化，那末三民主義的中國自然也應該有三民主義的文化。

從歷史的縱的方面講，現階段的中國應該實行三民主義的文化，從社會的橫的方面講，現階段的中國文化又必須包含着兩個成分，第一是國家至上主義和民族至上主義，第二是科學。——中國需要怎樣的文化，應該建立怎樣的文化，我們已經有相當的認識了。不過怎樣就可以求得這些文化的實現，却仍舊是值得注意的問題。文化是社會精神的產物，我們與其說文化是自然產生出來的，還不如說文化是人力產生出來的比較適當。三民主義的文化，我們如等待牠自然產生，那真不知要到何年何月。若以革命的力量來推動，以人力的統制來促進，以犧牲和毅力培植文化的新生命，這種努力的成功雖不能用數目字來計算，至少精力是沒有浪費的。新文化的產生如要成爲一種革命的運動，當然就有一種組織，有一種「力」，但所謂組織和「力」不能從天上掉下來，也不能從地上變出來，老實是從一種統制中產生出來的。離了統制，就沒有

「力」組織也只成了一個喪失了靈魂的軀殼。目前中國的文化統制，事實上的分類可以有宗教，教育，藝術，出版，社團等五項。但現在能夠真正實行統制的，就只有教育一項藉着政治上的行政勢力收得若干統制的功效。其餘什麼宗教，藝術，出版，社團可說完全沒有收到統制的功效。第一宗教：耶蘇教寄託在帝國主義的勢力之下，佛教道教寄託在各種封建勢力之下，回回教則其本身具有殘酷的排他性和堅強的組織性，耶佛道回各教都各有其立足的勢力，於是他們的外表雖然很和善的盡力敷衍着政府，但三民主義的統制力量沒有深入宗教的内部，宗教對於社會的腐蝕作用仍舊根深蒂固的保存着。本來孫中山先生從來沒有反對任何宗教，三民主義的本身又是一種爲社會服務爲人羣犧牲的宗教教理，孫中山先生如早生在二三千年以前，孫先生的革命精神老實就會成爲一個偉大宗教的始祖。要統一中國的文化，那些五花八門良莠不齊的宗教勢所難免的要加以統一的管理。主張「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三民主義，與任何宗教的教義都沒有抵觸，所以任何宗教如要貫徹教義，達到爲社會服務爲人羣犧牲的目的，便應該以進步的精神接受三民主義的道德的管理和統制。第二藝術：藝術在中國不被目爲「清高

無上，」就被目爲「彫蟲小技，」與政治文化幾乎從來不發生直接的關係。但藝術對社會的影響終究是很大的，那些誨淫誨盜的小說，春宮裸體的穢畫，幾乎把整個的中國弄得萎靡不振，日趨墮落了。這些萎靡墮落的小說穢畫，具着無限的誘惑人心的魔力，牠們的存在實是藝術進化的大障礙，不加以有力的統制和管理，進步的藝術便永久無法產生，頹廢的藝術便永久腐蝕着我們的民族，那末我們這老大的民族還有什麼希望呢？第三出版中國的出版界向來就是漆黑一團，書賈們祇知圖利，不知什麼是民族，什麼是國家，利之所在，什麼誨淫誨盜反動腐化的東西都拚命出版。若無利可圖，則關係民族存亡的文獻也會置之不顧。甚至有時還會不顧國家存亡，甘爲反動勢力張目。出版是文化上最主要的事業，混亂的中國出版界又不是一些單純的統制力量所能成功，所以政府必須自行負擔出版事業的責任，成立國家出版部。國家經營的出版事業當然純以文化爲中心，同時因爲有國家出版部的存在，書賈們的壟斷圖利的現象也可以肅清了。第四社團：社團本來在政治上的關係很大，在文化上的關係比較輕微。但中國民衆的文化水準低落，不少的社團都操縱在民主棍子的手裏，這種虛偽的民主現象，不單在政治上是一

個致命傷，同時在文化上也是一個巨大的障礙物。中國如要發動文化統制運動，對於社會各階級的社團統制當然也不能避免。

中國革命的經濟政策

第一 導論

一

許多人，常常爲中國國民黨革命着急。大多數的領袖們只懂軍事學，長於殺人，而缺少政治修養。比較少數的領袖們懂演講學，長於說謊話，長於做政治騙子。大家把革命最重要最根本的

經濟問題丟在腦後，於是國民黨革命雖然取得了政權。但因經濟問題不能解決，致使六七年來的統治權，終究還在動搖不定中。「革命」在形式上雖然已經成功，取得了政權，但在實際上却已成為可怕的被民衆所厭惡的名詞了。

奪取政權是革命的手段，經濟問題乃是革命的最後目的，如忽略了這一點，任何革命都是要失敗的。革命在初步的努力是建築理論上的基礎，喚醒民衆，推倒反動的統治階級；待到掌握了政權，便須立即努力於發展社會經濟的任務。民衆所需要於革命的，是爲了解決生活問題，若一個政黨在其未上台前以解除民衆痛苦爲號召，既上台後，而把先前所號召的話完全拋棄了，遲早是要倒台的。

我們深信孫中山先生在理論上在行動上從沒有放棄社會經濟問題的任務，但我們對於現在的國民黨祇承認只剩下國民黨的軀殼，已失去了國民黨的精髓，不能繼承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尤其不能繼承在經濟方面所負擔的使命感了。

國民黨自十三年改組到現在，因爲隨着社會的惰性作用的轉移，組織上存留了不少的買

辦士豪劣紳和大小軍閥，走上了封建性的絕路，沒有轉變，便很難在革命的大道上再移動一步。但其他所謂國家主義派，所謂社會民主黨，所謂共產黨等等，却是更加不合實際，不能完成中國革命。完成中國革命的，將仍然是中國國民黨。但這裏的所謂國民黨，必須是能夠負擔發展社會經濟使命的國民黨；像陳公博所倡導的「走向資本主義之路」以繁榮中國，也只是一個空中樓閣，萬萬不能實現。資本主義世界已到了沒落時期，而猶希望資本主義能在中國復興，這不是夢話嗎？

目前有所謂憲政運動，只是一班士大夫階級對革命失望的情緒的表現，是國民黨在軍權籠罩下民衆所有的反感，憲政運動的結果只能亡黨，絕不能使黨「復興」。憲政實現後，充其量也不過做到曹錕那樣，——說不定還一蟹不如一蟹——仍舊不能發展中國經濟，不能對中國革命有絲毫的幫助。

目前中國的革命，已陷在極大的危機中，國外帝國主義的侵略，國內封建勢力的復興，以及由於飢荒所釀成的共產黨暴亂，都已到了極點；而在革命的本身，則民生凋敝，革命力量渙散。這

一切，都是鐵的事實，我們無法否認。在這革命遇到了危機的情勢下，我們將用什麼方法挽救革命呢？社會的事實是早已決定了我們的行動了，挽救革命的方法，唯一是決定全國一致的革命的經濟政策，發展社會經濟，完成革命的根本任務。

決定和實行革命的經濟政策，這在革命是根本重要的任務。革命在未取得政權以前，所謂經濟政策只還是一個口頭宣傳的理論，待取得政權以後，必須立即把這理論轉變成行動。國民黨在孫中山先生存在的當時，在幾次北伐的時候，關於經濟方面的宣傳，都叫得震天價響。但等民國十六年政權奪到了手裏——因為國民黨革命的領導權纔從共產黨篡竊的手中奪回來，又陷入自相排斥分崩離析的局面中，致使過去所宣傳所號召的經濟政策絲毫都未實現，於是民生問題不得解決，民生主義不得實現，國民黨革命在民衆方面失掉了信用，湘鄂贛豫皖等十幾省的共產黨得到機會便建樹起勢力來了，國民政府調動了幾十師大兵，一次，兩次，三次，四次，以至於十幾次的圍剿，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成功。

單憑殺伐的手段去希望勦滅共產黨，恐怕一輩子也不能成功。從解決經濟問題和失業問

題方面着手，那解決共產黨是很容易的。民生主義一實現，共產黨任憑有天花亂墜的理論，有進步的新式的紅軍，也決不能促起中國民衆的暴動。如果民生主義不實現，民衆的痛苦不解決，那末不論共產黨的理論怎樣幼稚，共產黨的軍隊怎樣惡劣，而那些在三民主義下掙扎着仍總不能得到生路的民衆，都會很輕易的成爲共產黨了，自國共分裂後，大家都感覺到共產黨越殺越多，事實並不是越殺越多，只是一方面雖然在殺，另一方面新生長出來的却比殺掉的還來得快啊。我們如把共產黨生長的根本原因解除了，那末共產黨不等我們去殺去勦，也是要絕跡的。

共產黨生長的根本原因是經濟衰落民生凋疲，解決這根本原因的方法當然是發展經濟，繁榮民生。要發展經濟，繁榮民生，在目前的情勢下，唯一的方法是實行國家資本主義。除了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外，非但整個的國民黨得不到出路，就是整個的中國革命，整個的中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也都得不到出路。

孫中山先生是反對共產主義的，但同時他是反對資本主義的，他的「節制資本」和「平

均地權」實實在在是限制私人資本發展，國家資本以實現民生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政策。我們如不是喪心病狂，或是瞎了眼睛，決不會承認「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是資本主義的經濟政策！

二

講到國家資本主義，在中國已經有很多人提倡過，但都只把牠當做口頭上宣傳的理論，一到行動的時候，便連國家資本主義這個名詞都忘記了。過去周佛海在「三民主義的理論的體系」中似乎提起過，改組派也有一個時期主張過國家資本主義。可是一遇到實際，要行動的時候，例如陳公博做到了實業部長，便大聲喊着「走向資本主義之路」把所謂國家資本主義丟在毛廁裏了。

陳公博向來是以熟悉經濟號召國人的，這次出長實業部正可說是適材用於適所。但真不幸得很，陳公博不相信自己是個空虛的經濟學者，祇會炫耀名詞，大着胆子去做實業部長；做了

實業部長，他得意的「大作」第一部是發行公債五千萬，第二部是籌借外債×千萬，第三部是提撥庚款×千萬，陳公博這樣的東借債，西借債，以爲這樣就算是籌設發展國家經濟的資本，就算是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就算是實行民生主義了。其實真可憐，陳公博這個「空架子」能否借得到錢做國家的資本是第一個問題，借到了錢能否真正用在發展實業上是第二個問題，這幾千萬幾千萬的小數目是否真正有力量發展中國產業是第三個問題。陳公博的實業計劃既蘊藏着這樣多的問題，還說什麼國家資本主義，還說什麼民生主義呢？陳公博在南京實業部的作爲，老老實實便是沒落的資本主義者的作家，或許一個起碼的資本主義的企業家的手段還比陳部長高明得許多，一個起碼的企業家還能自由借債，並且多少也能夠使他的事業實現一部分或全部分，陳公博這個空頭的資本主義的實業計劃却毫無實現的可能。

三

國家資本主義是一個怎樣的東西，孫中山先生早在民國元年的「救亡策」——錢幣革

命論——的初期著作中已經顯現了端倪，後來的民生主義的演講稿和節制資本及平均地權的經濟政策，則更確立了國家資本主義的基礎。孫中山先生不滿意資本主義，但同時又反對共產主義，就必然經過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而走上民生主義也就是社會主義的社會。不過國家資本主義這個名詞，一直等到蘇俄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纔在蘇俄革命的導師列寧的口中特別嚴重而有意義地叫了出來。

國家資本主義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唯一必經的路線，不單是生產落後如中國和蘇俄那樣的國家要經過國家資本主義過渡階段，就是歐美產業發達的國家，恐怕也不能跳過這個階段，而一脚跨上社會主義的社會呢。所以中國人不必存着恐怖的心理說國家資本主義是第三國際共產黨的辦法，儘可依着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的既成路線放胆走去。同時國家資本主義是孫中山先生早已建立下了的經濟基礎，共產黨的人不必擔憂三民主義政權下不能實現國家資本主義。革命是爲着全中國的民衆求生存是爲着全世界的人類求出路，並不是爲着共產黨，也不是爲着國民黨，列寧在提倡新經濟政策的時候，既不惜「犧牲一切的主義」實行國家

資本主義的新經濟政策以求國內經濟的穩定和發展，那末爲什麼共產黨員還要緊守着馬克斯的半空想的社會主義的死路呢。

爲全世界人類的利益，服從真理，並且擁護和執行真理，那纔是一個世界主義者，那纔是一個社會主義的革命者。如若堅執先入之見，迷信着一個非真理的思想，結果必走上個人主義的末路。試想，革命而不能服從真理，不能忠實於全國民衆和全世界人類的利益，而至死不悟的忠實於一個黨，迷信着一個半空想的馬克斯主義的思想，我們雖不敢冒昧說這樣的人仍舊沒有脫掉個人主義的劣根性，但可以大胆說這樣的人乃是愚蠢的宗教的信徒，絕不是一個革命的信徒。

孫中山先生既首先在錢幣革命和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等政策中立下了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列寧在晚年施行新經濟政策時代，則不惜「犧牲一切的主義」服從國家資本主義，那末國家資本主義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必經的階段，是社會革命的唯一真理，毫無疑義了。又列寧常說蘇俄社會主義革命的是否能夠成功，這與佔世界人口絕對多數的中國革命和印

度革命有極大的關係，蘇俄必須時刻注意和幫助中國及印度的革命。中國與印度，同處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地位上，中國與印度如欲脫出帝國主義的經濟囚籠，希望反帝的革命成功，便必須實行國家資本主義。蘇俄如希望中國革命印度革命成功，便必須幫助中國和印度實行國家資本主義。民國十六年國共分裂以來，蘇俄一心扶助着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這實在是幼稚的錯誤的策略。數年來中國共產黨的活動，把中國中部富庶之區的農村社會都市社會的秩序完全擾亂了，食糧和茶紙等的生產完全停頓了。過去中國的食糧和茶葉可以大宗出口，現在中國却已成爲帝國主義者銷售食糧的主要市場，這不是承共產黨世界革命的賞賜嗎？幫助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擴展市場，削弱中國在經濟上反帝的力量，這那裏是幫助中國革命，促進世界革命，老實是在開倒車，破壞世界革命罷了。

中國與蘇俄，實在是世界革命過程中兩個唇齒相依的同盟國，並且，孫中山先生和列寧兩個領袖一個是中國革命的導師，一個是蘇俄革命的導師，這兩個導師在國家資本主義方面的主張既完全相同，那末凡是孫中山先生和列寧的信徒，都應該擁護而執行國家資本主義的。若

懷着偏私的見識。懷疑國家資本主義的重要性，致使世界革命延緩下來，這樣的人非但不配做孫中山先生和列甯的信徒，事實上這些掛羊頭賣狗肉的主義販子，倒是他們的叛徒呢。我們知道，孫中山先生和列甯是一時一刻都系念着世界革命的利益，所以當初蘇俄與中國的攜手，以及共產黨的加入國民黨革命，這都是他們在佈置世界革命的行程上所應有的表現，待兩大導師相繼棄世，由於一些叛徒們的作弄，同時因為人類個人主義的劣根性終難肅清，於是共產黨惟恐國民黨革命成功，國民黨也惟恐共產黨形成勢力，積不相下，就互相攻擊內鬥起來了。我們如站立在孫中山先生和列甯世界主義的立場上去了，了解世界革命，我們便不得不赤誠地接受孫中山先生和列甯所親手釐定的計劃和方法，盡所有的力量，努力促成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使中國能在經濟上形成反抗帝國主義的勢力，中國只要在經濟上有了反抗帝國主義的力量，那末此外的政治侵略和軍事侵略的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成功，就是中國的革命成功，在中國革命成功的時候，世界革命的問題就已經解決了大半了。所以中國的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不論蘇俄，不論第三國際，不論在中國

的共產黨，假如他們正確是列寧主義者，正確是社會主義者，便都須積極起來幫助。否則實行國家資本主義是中國實際社會所需要，第三國際共產黨縱使下了絕大的決心從中破壞和搗亂，結果也徒勞無功。

四

記得孫中山先生曾說過，國民黨第一步工作是推倒滿清皇朝，第二步便是剷除曹吳等軍閥。辛亥革命，滿清已被推倒了，十六年北伐，曹吳等軍閥也已經剷除了。現在要實行第三步工作，這便是繁榮社會經濟，發展國內生產力，施行國家資本主義，實現民生主義，完成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革命在取得政權以前，牠當前的任務是圍攻敵人，推倒統治階級，既取得政權以後，牠當前的任務便是解決社會經濟問題，實現民生主義。民生主義在過去，在未取得政權以前不過是口頭號召的理論，現在國民黨已取得政權，國民黨已成了中國的統治階級，那末過去所口頭號召

的民生主義的理論，必須開始轉變爲手頭實施的行動了。革命如單憑口去鼓吹而不用手去實行，這不就成了革命騙子？

中國革命現在要打倒的對像，皇帝和軍閥這兩個大敵都消除了，現在第三個敵人便是「飢荒」。國民黨從來對於皇帝，對於軍閥，都是舉國一致，拚死進攻的，但對於「飢荒」却不能一致進攻，這實是嚴重的錯誤。我們應該知道飢荒對於革命的危害，實在比軍閥比皇帝要嚴重，軍閥和皇帝已經失去時代性和社會性，遲早要死亡，飢荒則有一定的規律性，從社會最下層最多數的民衆中生長出來，力量極端偉大，而且充滿着爆裂性，牠能夠摧毀革命的基礎，牠能夠使革命功敗垂成。目前共產黨紅軍的無法消滅，致使整個的中國混亂鼎沸，無法自拔，便是建築在這飢荒的基礎上的。

蘇俄革命爲着撲滅飢荒，列寧「不惜犧牲一切的主義」，要全國一致實行新經濟政策。蘇俄因爲有列寧的指導，全國一致的向飢荒進攻，拚命實行五年經濟計畫，於是蘇俄的社會纔能穩定繁榮起來，連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都比不上了。全世界都爲飢荒這個惡魔蹂躪着。黃金國家

的美國尙且有失業人口一千萬，德國日本英國法國等就更不必提，可是蘇俄恰恰相反，大革命後幾千萬的失業人口都已有了職業，連體力薄弱的女子也都有職業了。

蘇俄革命，因為是走的馬克斯的不完全的路綫，中途遇到飢荒，逼得要「犧牲主義」以實行新經濟政策。何況在中國，用國家資本主義的方法，用民生主義的方法去撲滅飢荒，是孫中山先生早已規定了的路綫呢？民族主義叫我們去打倒滿清皇帝，打倒帝國主義，民權主義叫我們去打倒跋扈的軍閥，打倒無恥的政客，最後的民生主義則很明白的叫我們去打倒飢荒。而且孫中山先生又親自規定了打倒飢荒的方法，從錢幣革命論（下文尙須詳細說明）起，到實業計劃，以及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等，這都是孫中山先生一貫的打倒飢荒的路綫。我們既一致自承爲中山主義者，矢志要完成中國革命，那末我們對於孫中山先生的完善正確的主張應如何堅決執行呢？

革命纔走到半途，同志們便就把革命根本重要的任務忘掉，把民生問題棄置不顧，惟個人權位是爭，各執着半截槍桿子互相毆殺，這痛心的現象，我們不敢罵誰是孫中山先生的叛徒，批

判誰是反革命誰是不革命但我們可以正確明瞭的斷定，歷史的車輪將要把這些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者碾爲粉碎了。

第二 銀行政策

—

中國要消滅飢荒，解決民生問題，只有從發展生產，解決普遍的失業現象着手。但講到發展生產，當前最困難的問題便是資本，沒有資本是什麼事都不能做的。

在社會經濟落後的時代，資本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有了勞力，土地，原料，便可以從事生產。但自從社會脫離了封建經濟制度，脫離了自給自足的經濟以後，這個資本二字所代表的便不是勞力，土地，原料，而是在代，表貨幣了。現在人們談起缺少資本的話，便是指缺少貨幣，決不是指缺少勞力，土地，也不是缺少原料。

現在的中國，生產落後到萬分了，可是說到勞力，土地，原料的話，却還是很豐富。四萬萬的人

口中，有一萬萬以上的人在賦閒着，那就是中國。現在有一萬萬人以上的勞力在廢置着。至於土地，則至少有數百萬數十萬方里的土地在荒廢着。原料則中國處在溫帶和鄰近熱帶上，植物多，鑛藏亦多，原料真是豐富得很。中國既有這樣多的勞力土地原料閒置着，那末爲什麼還說發展生產沒有資本呢。這中間的道理很簡單，因爲沒有貨幣去聯絡牠們，不能使牠們互相發生關係，於是雖有着衆多的勞力，廣大的土地，豐富的原料，但終不能從事生產。換句話說，就是中國有許多勞力土地原料的生產條件，但因爲沒有貨幣這個經濟紐帶，於是生產被限制着一步，都不能發展了。

貨幣本是政治性的經濟產物，是應着社會的需要而產生的。「社會的勞動的分工」完成了堅強的基礎，社會開始走入商品經濟制度，便必然有貨幣出現。從古代物物交換起，到現代嚴密的金融制度止，這其間，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出貨幣變遷的歷史。人類最早的貨幣是龜貝獸皮以及其他各種金屬器具，其次是各種鑄成定型的金屬物，最後則有紙幣出現。我們如欲把貨幣的歷史劃分出階段來，那末可指龜貝獸皮以及金屬器具爲自然物貨幣時代，各種鑄成定型

的金屬物爲鑄金貨幣時代。紙幣流通爲信用貨幣時代。

貨幣是社會經濟的紐帶，社會上有了這個紐帶在作用着，於是社會的生產與消費纔能平衡發展，社會的經濟組織纔能順利地進步。在自然物貨幣時代，每一個經濟組織祇狹小地限於一個部落或一個地域，水澤的捕魚部落以龜貝爲經濟紐帶，高原的獸獵部落以獸皮爲經濟紐帶，這些部落中的勞動，因爲有龜貝獸皮的流通作用存在，分工便漸漸精密，而生產工具及生產技術也得有進步了。不過以自然物爲貨幣的時代，貨幣的交換價值寄存于貨幣的自身，很少人爲的拘束。待人類的政治組織到相當完備的時代，人們覺得自然物貨幣的流通諸多不便，便有鑄金貨幣出現。鑄金貨幣時代的社會經濟組織，比較自然物貨幣時代的社會經濟組織，範圍當然擴大得多了。在某一種政治勢力所達到的地方，某一種鑄金貨幣便也流通到這個地方；不論地域有若何阻隔，生活有若何的差異，在一個政治勢力統治之下的地方，總是流通着一種貨幣。鑄金貨幣流通了一個長時期後，一方面人類的生產力已極度發展，消費力也增高了，另一方面則人類經濟組織的範圍擴大，由一個國家以內擴大到一個國家以外；貨幣需要的數量激

增起來，但自然界所能供給的金屬物質却極有限，於是根據信用的原理，而有紙幣出現了。紙幣只是一張紙，牠的本身毫無一點價值，牠比不上一塊金子，比不上一塊銀子，甚至比不上一張獸皮，一個貝殼，但因為信用的關係，這印着花紋的紙頭却可以在市場上兌換貨物。以紙幣為社會的經濟紐帶，那便是信用貨幣時代了。

貨幣由自然物貨幣進展為鑄金貨幣，更由鑄金貨幣進展為信用貨幣，這些變遷都是隨着社會的需要而出現的，並沒有什麼上帝在暗中主持，也沒有什麼鬼神在其間播弄。倒是人類如不能隨着社會的需要把經濟紐帶——貨幣——時時改變以求適應，人類的經濟反要發生混亂的現象呢。

自從『產業革命』以後，機器的生產工具出現，『社會的勞動的分工』日趨精密，生產力突飛猛進，商品經濟張開血盆大口把整個的地球都吞下了，於是鑄金貨幣這個經濟紐帶因受物質的限制，再也維持不下這廣漠無邊的市場，鑄金貨幣不足以供需要，便走上信用貨幣制度，以紙幣為流通工具了。可是現代紙幣的信用建築在現金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築在物品的基礎上，

因之社會的商品價值與貨幣價值相差過於懸殊的時候，信用恐慌仍不可避免的要出現，經濟秩序就仍要發生混亂了。現在世界各國大都以金爲主幣，各國的商品當然都以金價計算，商品在各國是日夜不息地在趕造出來，但金礦的開採却很少了；這樣，商品的產量很快的上升到一千以至於一萬的數量，而金子的產量則始終徘徊在一百的數量上，這樣數量相差懸殊的金子，大家還硬把牠當作流通商品的經濟紐帶，還會不發生恐慌或混亂嗎？一尺長的紗帶去圍二尺粗的物，體紗帶尚不免於斷裂，何況以一寸的金子紐帶去約束一丈以上的商品，這紐帶會不斷裂而現出恐慌來嗎？

在這『資本主義第三期』的世界，要免除恐慌，只有澈底實行信用貨幣制度。依着社會經濟的需要，以商品（黃金和白銀也作爲商品）作保證發行充分的紙幣，俾貨幣這經濟紐帶能夠發生充分的作用。否則就使蘇俄，五年或十年以後也仍要鬧着激烈的經濟恐慌呢。

作者因說到『中國有這許多勞力土地原料的生產條件，但因爲沒有貨幣這個經濟紐帶，於是生產被限制着，一步都不能發展了，』便把貨幣的原理冗長地敘述了一下，現在可以把話

頭拉回來了。中國既有勞力，有土地，有原料，生產條件可說完全具備了，但爲什麼還鬧着經濟衰落，物質不足的飢荒呢？說中國「沒有貨幣這個經濟紐帶」，那實在是冤枉，中國不是同樣流通着貨幣，不是同樣使用着貨幣嗎？「經濟紐帶」是有的，不過太脆弱，太微細，對於社會經濟的作用太不充分罷了。

中國貨幣在制度上既沒有統一，「兩」與「元」並用，「大洋」「小洋」「銅元」早晚市價各有上落；在地域上則更不統一，北方有老頭票，南方有香港票，老頭票與香港票都比中國票通行；雲南的幣制與四川不同，四川與廣東不同，廣東與上海又不同，西藏蒙古則簡直不要說起，幣制紛亂到這般田地，我們慨憤地說中國沒有貨幣也可以。前面說過了，貨幣是社會經濟的紐帶，是發展生產的要素，中國要解決社會經濟，要發展生產，第一步必先解決貨幣問題。貨幣問題，中國早已有很多人注意了，但因認識的模糊，誰都拿不出具體實行的辦法。「廢兩改元」咧，「金本位」咧，「萬國複本位」咧，「鬧得烏烟瘴氣，眼花撩亂，可是這始終是鬧鬧而已。任憑馬寅初李權時口齒靈利，筆頭生花，但理論是理論，事實還是事實。國民政府爲了幣制問題，還特別聘請

了幾個外國顧問，但外國顧問也沒有三頭六臂，貨幣問題仍是解決不了。

孫中山先生在「錢幣革命」中說：「錢幣之革命者何？現在金融恐慌，常人皆以爲我國今日必較昔日窮乏，其實不然，我之財力如故，而出產有加，其所以成此窮困之現象者，錢幣之不足也。錢幣爲何？不過交易之中準，而貨財之代表耳。而代表之物，在工商業發達之國，財貨溢於金銀之千萬倍，多以紙票代之矣。然則紙票者，將必盡奪金銀之用而爲未來之錢幣，如金銀之奪往昔布帛刀貝之用而爲錢幣也。此天然之進化，勢所必至，理有固然；今欲以人事速其進行，是謂之革命，此錢幣革命之理也。其法爲何？即以國家法令所制定之紙幣爲錢幣，而悉貶金銀爲貨物，國家收支，市廛交易，悉用紙幣，嚴禁金銀。其現作錢幣之金銀，祇准向紙幣發行局兌換紙幣，不准在市面流行。如此，則紙幣一出，必立得暢行無滯，財用可通矣。」

這裏，我們可以明瞭孫中山先生解決貨幣問題的方法，他沒有斤斤於「元」「兩」之爭，「本位」之爭，直捷痛快的就是主張打消鑄金貨幣制度，實行信用貨幣制度。一切元兩問題，本位問題，都只是皮相的爭論，只有澈底實行信用貨幣制度，纔是根本的解決方法。

劉有莘在中央半月刊第十六十七兩期發表「革命與幣制」一文，他說：「如果我們要想根本改革現行貨幣制度，第一要使用一種永遠不受物質生產量的支配的東西，來做真正交易中準的貨幣本位，將現有的制度一律廢除，第二，便是要把交通運輸大宗生產分配和消費及調節需要與供給的事件，都給國家去管理指導或支配。要是這樣，纔有辦法，纔使幣制合乎幣制原理與國民經濟的要求。」

劉氏第一的主張是明顯地主張實行信用貨幣制度，第二的主張則是明顯地主張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因為不實行信用貨幣制度，幣制便不能「不受物質生產量的支配」，不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健全的信用貨幣制度便無從開始，無從成立。同時不實行信用貨幣制度，國家資本主義也只是一個空名詞，因為資本既無從調集，那末國家發展生產的話不是「紙上談兵」嗎？

二

對於一個新制度的產生，我們絕不能認為是一紙命令或幾句空話所能成功。尤其貨幣問

題是經濟方面的任務，完全建築在物質的基礎上，決非政治權力所可一手包辦，更非單純的政治權力所能支配。貨幣是經濟方面的東西，經濟方面的東西自然非用經濟的權力去支配不可。直接用政治權力去支配貨幣，社會徒然惹起紛擾，結果一無所成。雖然貨幣是政治性的經濟產物，但我們相信在政治未握有充分的經濟權力以前，政治萬萬沒有權力去干涉或支配經濟。中國幣制的混亂和幼稚是有目共睹老幼咸知的事實，國民政府對此也未嘗不想改革，但終以國民政府的經濟權力太薄弱，雖欲加以支配干涉，改革，而事實上不可能啊。

既不能直接用政治權力去支配，而改革貨幣制度，那末用什麼方法實現信用貨幣制度呢？關於這個，我們仍得從貨幣本身的歷史和中國的經濟現狀去檢討。最初的貨幣只用作交換工具，在原始經濟時代，在封建經濟時代，貨幣唯一重要的作用是作交換工具，作為調劑生產與消費的經濟紐帶，待轉入商品經濟時代，轉入現代的金融經濟時代，則貨幣兼任做生產資本了。在前一時期，貨幣只是消費資本，在後一時期，貨幣兼作生產資本了。社會經濟愈進步，社會的財富愈增高，貨幣的任務便愈擴大，其數量的需要也愈澎漲了。社會的貨財價值超過貨幣價值幾十

倍以至幾千百倍以上，社會感覺貨幣的缺乏，經濟不便流通，便自然而然的出現了信用制度，如借貸，抵押，賒欠，期票等等，這些信用制度都是因為貨幣不足而出現的。隨着信用制度的出現，社會便跟着成立了許多特別的經濟機關如當舖，錢莊，銀行等類。當舖，錢莊，銀行不是生產機關，也不是商品運輸或分配機關，更不是什麼國家的政治機關或教育機關，而是一種調劑金融的信用機關。我們如說國家的政府組織是政治權力所寄託的機關，那末這些當舖錢莊銀行的信用組織便是經濟權力所寄託的機關了。剛纔說政治權力不能直接干涉改革幣制，現在發現了這些有經濟權力的信用機關，對於解決貨幣問題便有了線索了。

當舖是農工小商人的信用機關，錢莊是小中資本家及地主的信用機關，銀行則是大資本家及金融資本家的信用機關，中國這三種信用機關，錢莊銀行處於互相抗衡的地位，當舖只是一種從屬的信用機關而已。當舖對下雖有力量各自去支配一部分農工小商人，但在整個的經濟權力的上講，則當舖的權力却是很微弱，必須依附於銀行或錢莊。

錢莊至今還能和銀行抗衡，這很明顯的證明了中國的封建經濟還自有其根深蒂固的基

礎。錢莊放款的利息並不低，再經過兩與元的往返折合，簡直與高利貸者差不多，但一般中小企業者因資本短少，除向錢莊告貸外實無他法。錢莊放款的利率既高，其吸收存款的利率自然也比較的高，因之錢莊在營業上仍舊可與銀行有競存的餘地。許多銀行垂涎而要沾染高利貸的利益，還與錢莊暗中聯合呢。

中國的銀行制度現在還極幼稚，雖有政治上及經營上的各種便利，如特許發行紙幣經營債券等等，但終因客觀條件的產業落後和其主觀條件的組織不普及與資力薄弱的關係，還未能形成巨大的經濟權力。在國際間不能與各外國銀行競爭，在國內也不能和錢莊銀號競爭，在生產上更說不到什麼集中管理或支配的話了。本來銀行的基礎完全建築在信用制度上，銀行離開信用便一天都不能立足，非馬上倒閉不可。可是中國的信用制度並沒有完全為銀行所利用，第一因為不平等條約的壓迫，外商運用可怕的鉅大的資本在中國開設銀行，一方面吸收了多量的存款，一方面又發出多量的外國紙票，差不多把中國的信用制度利用了十分之五以上；第二因為國內經濟的封建勢力的殘留，高利貸的錢莊當舖仍佔優勢；第三因為政治混亂，軍閥

橫行，產業衰落，交通阻塞，銀行事業更隨在遇着障礙；所以現在中國的銀行所能運用的信用力量，非但不到十分之一，也許還不到百分之一呢。中國的銀行如能夠充分地運用信用的力量。那末牠的經濟權力毫無問題的可以統御全國，並在國際間佔得重要的地位。

要改革貨幣制度，必須有統一而強大的經濟權力，有了一個統一而強大的經濟權力的機關，那末由這個機關去實行改革的計劃，國家制定貨幣的法律，從旁用政治權力去幫助，改革幣制便很容易實現了。中國現在這樣的經濟權力的機關還沒有，錢莊當舖是行將沒落的東西，銀行則都很幼稚，如要創造這樣的統一而強大的經濟權力機關，並且要這機關將來不違背民衆的利益而常常受着國家和民意的支配，須從整理現存各銀行及各信用機關入手：

- A 用科學的合理化的方法，在政府管理監督之下，實行銀行統一政策。
- B 設立普遍全國的銀行網。
- C 確立信用制度，實行信用貨幣制度。
- D 銀行管理並監督交通運輸生產及分配機關，實行國家在社會經濟及發展生產方面

的任務，並助理國家財政事業及公共事業。

上述四項，都是決定銀行政策所不可缺少的骨幹，缺少了任何一項，銀行就不能成爲社會的經濟權力的機關，就不能充分的調劑金融發展生產了。現在再逐項加以補充，說明於下：

A 「用科學的合理化的方法，在政府管理監督之下，實行銀行統一政策。」調劑金融，這原是關係整個社會利害的事業，像交通事業的郵電鐵路一樣，照理是應由國家專營的。但因爲習慣的關係，現在各國除蘇俄外，銀行都准許人民私營，中國是產業後起的國家，對於銀行許人民私營的事當然也不能例外。可是銀行由私人經營，有兩個最大的弊病：第一，私人經營的目的專於牟利，很少適應社會的需要；第二，私人經營，必然造成多頭競爭的無政府的狀態，同一事業分割着許多機關（上海有銀行錢莊二百家）執行，徒然多費開支。一九三〇年世界經濟恐慌出現，美國銀行經不起打擊而倒閉的有二千餘家。最近美國經濟恐慌，全國銀行都奉命暫行停業。上海近年來頗盛行銀行熱，銀行銀公司風起雲湧的成立起來，這投機潮遲早總要引起大混亂。爲銀行本身的前途打算，爲中國的社會經濟打算，中國的銀行必須實行合理化，歸併各錢莊銀

號銀公司及銀行爲一個大銀行，實行統一銀行組織，成立一個總行，這大銀行便作爲國家銀行，將現有各銀行各銀號一律作爲國家銀行的分行。國家銀行除規定由國家撥入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的股本外，其餘均由人民投資，但銀行業務所得的純益，須以國家爲主體。人民的股份除支付官息外，紅利規定以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二爲限，多餘的純利即作爲國家的收入或擴充爲國家在銀行中的股本。國家銀行的董事十分之二或三由政府委銀行專家及經濟學專家充任外，其餘當然由股東會選出。中國成立統一的國家銀行，如按照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需要，其股本至少須五十萬萬元，五十萬萬元的股本或有人驚爲太大，擔憂集合不起來，其實中國雖窮，祇歸併各銀行莊號的股本，也許就已經超過此數了。中國有此雄厚資力，對內既可充分的力最調劑金融發展生產，對外也可以免強和帝國主義的金融勢力抗禦了。

B 「設立普遍全國的銀行網。」 銀行是調劑社會經濟的金融機關，牠的工作是便利人類的經濟生活，那末爲社會人羣的福利計，爲銀行業務的發展計，銀行必須隨着人類足跡所達到的地方設立分事務所。中國在目前，因爲政治混亂關係，銀行幾乎完全集中在上海、廣州、天津

這幾個地方，此外如新疆、青海、西藏、蒙古等省簡直就和外國的荒島一樣，一個銀行都沒有。試想，銀行是經濟的中心機關，沒有銀行的地方，產業會發達嗎？英國是資本主義較老的國家，英國銀行的分行數目在一九一〇年就有七千一百五十一個，現在當然更多了。中國的人口比英國多幾十倍，土地也大幾十倍，那末分行的數目至少也要和英國相等。中國有二千多縣城，加上各重要市鎮及通商口岸，國家銀行設立銀行網，成立五千個分行實是最低限度的數目。中國現在內地人口過庶，急欲移民邊疆，對於邊疆各地的銀行網就更為重要，因為資本的足跡所到的地方，人口總是隨着湧過去的。淺見的銀行家常以為荒疆無利可圖，殊不知把荒疆變成熱土，獲利纔真大得無可計算。香港是個人烟絕跡的荒島，但英帝國主義把香港開闢成熱土，把香港變成繁華的市場，誰能計算得清英國人在香港所得的利益呢？銀行在人口庶密的地方所獲得的只是蠅頭微利，在巨荒絕域的地方纔能獲得無限的寶藏。所以中國國家銀行不設立銀行網則已，如欲設立銀行網，設立邊疆的分行，是不可忽略的。又全國設立五千個分行，驟然看去似乎驚其太多而不易成功，但事實上把各地錢莊歸併起來，決當超過此數，國家銀行除添設若干邊疆的分

行外，在內地只要把各錢莊銀號改造一下就好了。

C 「確立信用制度，實行信用貨幣制度。」 銀行的基礎是信用，最要的任务便是調劑金融，發展生產，作支付的中人，把不活動的貨幣資本變為活動的貨幣資本，把不活動的生產條件（勞力，土地，原料）變為活動的生產條件，使社會上一切無價值的東西變為有價值的東西，不生產的東西變為生產的東西。銀行的機能是很偉大的，但視我們巧妙地運用而已。中國號稱窮乏的國家，國富總數三八二八九百萬元，每人平均不到百元，是世界上最枯窘的國家，連英國的殖民地印度（一三八元）都比不上。如能確立信用制度，使國家銀行得盡量發揮其機能，國民經濟得盡量發展，那末不要幾年，中國的國富一定能上升幾倍。中國確立信用制度的辦法，在國家方面是清理債券，確定預算，劃一稅制，在人民方面是消滅高利貸，國家銀行設立普遍的低利的當舖，厲行生產合作消費合作。不過，確立信用制度要點在於國家銀行，國家銀行根本的信用機能又在發行紙幣。中國要驟然完全用紙幣去流通市面，取締一切的現金，驟然實行信用貨幣制度，那顯然是不可能的。中國國家銀行要實行信用貨幣制度，第一步是確定十進位（照數學

原理，則十二進位就更好。）分，角，元，「孫」的幣制，取消「兩」及其他小洋銅元等雜幣的流通；這事件的實行，是一方面由國家制定公佈幣制的法律，銀行則依社會的需要發行一分的銅幣，一角一元的銀幣，「孫」五「孫」十「孫」的金幣，和五分一角五角一元五元一「孫」五「孫」一及十孫」的紙幣。金銀銅幣及紙幣的印造，當然由銀行自己去執行，政府和人民祇有監督的權限。幣制統一以後，待社會行使便利而發生了信用，那時再由國家改訂貨幣的法律取消金屬貨幣，行使紙幣，而實行信用貨幣制度，便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了。

D 「銀行管理並監督交通運輸生產及分配機關，執行國家在社會經濟及發展生產方面的任務，並助理國家財政事業及公共事業。」社會是由兩種組織的交互錯綜而構造成功的，一種是政治組織，一種是經濟組織，前者如教育機關倫理機關公安機關而國家為其總樞紐，後者如生產機關運輸機關分配機關而銀行為其總樞紐。政治組織是着重於人類精神生活方面的組織，經濟組織則是着重於人類物質生活方面的組織，社會的這兩個組織是交相為用，並行不背的。國家的組織須有政治基礎，同時也須有經濟基礎，但歷來的國家都有一種錯誤傾向，就

是專重政治而把經濟忽略了。作社會運動的人因憤於人類物質生活的沒有保障，遷怒於國家，無政府主義者根本主張不要國家，共產主義者則主張國家逐漸衰落而死亡，其實這都錯誤了，人類的經濟組織政治組織只有愈趨愈嚴密，而國家的基礎也是愈趨愈鞏固的，除非地球消滅了，國家的組織纔不得不消滅。中國革命無疑義的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那末中國的國家無疑義，更便須兼負起社會經濟方面的任務，走上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中國現在的國家驟然要管理社會的經濟組織，顯然不可能，如用政治權力去強行干涉經濟事務，也徒然惹起騷擾，無補於事，但用銀行去管理經濟事務，用銀行去管理各種經濟機關，那却是輕便簡捷的道路。一切經濟事務都需要資本，銀行正是資本的淵源，一切經濟機關逃不了金融的支配，銀行正是金融的中心機關。銀行自有歷史以來，就無時不站在管理並監督社會經濟組織的地位上了。更明顯的例子，則是歐美各金融資本主義的國家，政府並沒有授與銀行管理社會經濟機關的權力，但事實上少數銀行巨頭已經利用其金融勢力支配着全國的生產機關了。銀行的管理社會經濟組織，就和國家的管理社會政治組織一樣，已成爲不可逃避的事實。同時，銀行與生產也是相依爲命的，

銀行離了生產便不能發揮機能，便不能生存；生產沒有銀行，便不能發展，便不能進步。中國是產業最落後的國家，要想把中國從大饑荒中救出來，自非利用銀行這個偉大的機關去發展生產不可。

近年來中國困於天災人禍，產業衰落到極點，各地都在鬧着大饑荒，於是很多的先生們羨慕蘇俄的新經濟政策，亂紛紛的三年計劃五年計劃六年計劃以至於十年計劃簡直充滿了耳鼓，大有應接不暇之勢，可是沒有資本，這些計劃都成了畫餅充飢，紙上談兵。又有些人抄襲了孫中山先生經濟主張的後半段——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要大借外債來發展生產。可是這夢想的不能實現，就如天上美麗的繁星不能移植到地上來一樣，永遠是個夢想，永遠救不得中國！

第三 交通政策

一

社會上一切的文化與經濟的流通，都靠着有各種交通機關。交通機關的對於社會，就如筋絡的對於人的身體一樣，筋絡發生阻礙，血液便不能暢流，人體便不能強健；交通有了缺點，文化與經濟便不能順利流通，社會便不能發達了。現代的社會，一切都離不了組織，在組織的原理上講，離了交通，組織就談不到了。社會沒有各種的交通機關，社會的一切將都成爲絕緣體，人與人以及集團與集團之間不論在文化上在經濟上不能互相溝通，一切的社會組織都將土崩瓦解，社會就只有死亡了。尤其是在社會的經濟組織方面，沒有健全的交通機關，產業的發展便會受着意外的損失和阻障，生產與消費之間不能發生平衡的調劑作用。中國的雲南和東三省邊境等地方，有因無法消納而把糧食焚燬或當作肥料的，可是另外却有因災荒而食糧飛漲無法購買，整千整萬的人民坐待餓斃，凡這種種怪異而慘酷的現象，在交通便利的國家是沒有的事，在中國則因爲交通腐敗的緣故，已成爲習見的平常的故事了。

交通的腐敗和幼稚，實在是中國經濟衰落不能進步的大原因。中國要發展生產，其第一個問題必須解決的是資本問題，可是有了資本，沒有便利的交通機關去供給運輸，生產仍舊不能

發展的中國號稱窮乏的國家，然仍有大批游資蘊集在上海，銀價低落，而洋釐則更低落，這實在是交通阻滯，產業難於發展的象徵啊！歷年的內戰除直接摧毀了許多產業外，對於交通方面鐵路及江河航輪等的損失更難於計算。平漢津浦等路除內戰所毀壞者外，尚有一千數百餘輛的機客貨車被張學良劫奪出關，現在則爲日本南滿鐵道所有了。革命成功則現在六七年了。政府不能乘機起來興築什麼交通幹線，舊有幹線反任其腐敗毀壞，產業焉得不衰落呢？

二

中國談交通，各鐵路及道路的建築規劃固然重要，但各種江河航運也是很重要的。航運一方面與水利有關，同時是發展農業商品的主要工具。

孫中山先生在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畫書中，規定「運輸交通之開發」爲六項：

甲 鐵道一十萬英里。

乙 舖石馬路一百萬英里。

丙 修濬現有運河。

(子) 杭州天津間運河。

(丑) 西江揚子江間運河。

丁 新開運河。

(子) 遼河松花江間運河。

(丑) 其他運河。

戊 治河。

(子) 揚子江築堤，濬水路，起漢口，迄於海，以便航洋船直達該港，無間冬夏。

(丑) 黃河築堤，濬水路，以免洪水之泛濫。

(寅) 導西江。

(卯) 導淮河。

(辰) 導其他河流。

已 增設電報綫電話及無線電（郵政局）等，使普遍全國。

孫中山先生對於運輸交通的規劃，在實業計劃中有具體的解說，我們無須多攪雜意見。孫中山先生的計劃實在太偉大了，如全部估算所需的資本，數目字之大恐怕大得難於計算。可是我們不要以為資本太大而畏縮不前，在口頭上帶着封建觀念「總理，總理」喊不絕口，而在行動上把孫先生的一切主張和計劃都無期擱置下來。

孫中山先生全部計劃所需的資本數目雖然甚大，中國有不能舉辦之勢，但我們如審察緩急輕重，估計資本力量，逐漸去實行，那是很容易的。在緩急輕重上講，國防的交通線與經濟的交通線是並重的，絕不可專注內地而忽於邊疆。在資本方面講，為避免腹斷起見，當然以國營為原則，不過在財政困難舉債度日的現狀下要拿出這樣鉅大的資本來，實是不可能，不得不利用外資和允許私人經營。不過沒有政府的具體設計和領導提倡，而希望外國來投資，希望私人來經營，那是夢想！

中國發展交通，比如鋪石馬路和修濟運河及治河等類，除了新開運河及揚子江黃河的開

濬以外，大都可以由中央設計而交由地方政府去執行。與水利有關的河道與省縣村市等的交通要道，地方政府去開濬和建築，原是不可推諉的義務。電報郵政則中國現在已有基礎，將來的發展可以沒有困難。唯一困難的，那是建築鐵道。依孫中山先生的計劃，全中國建築鐵路十萬英里，實在不能說是太多，中國土地之廣和人口之衆，十萬英里的鐵道原是最低限度的數目。不過十萬英里的鐵路，如任其自然的發展，恐怕五十年一百年都不能完成，必須由政府定好整個的計劃，分期策動，纔能實現。

在孫中山先生所規劃的十萬英里鐵路中，國防線佔極少數，經濟線差不多佔百分之九十以上。經濟線大都有利可圖，政府祇須有完美的設計，外國和私人一定樂於投資經營，所以對於經濟線的鐵路的建築和經營，應完全開放，任外國投資或私人經營，但在政府與經營者訂立的合同上規定國家應享的權利，規定不得妨礙國家在經濟上的發展，並不得有壟斷或妨礙社會福利的行爲。至於國防線，大多數經過荒疆絕域，毫無近利可圖，私人和外國一定不願意經營的。雖然在若干年後殖邊成熟，國防線也能變成經濟線，可以獲得鉅大的利益，但外國和私人決不

肯投下這久遠的資本，同時爲國防的安全計和轉移國內軍人對內（內爭）發展的目標轉向對外，國防線鐵路的建築，不得不由國家和地方政府合作經營。國防線交給私人或外國經營，事實上既不能實現，而且就使實現了，也於國防有損無益，所以經濟線可以採取開放政策，國防線則須打斷依賴的妄想，堅決採取國營政策。

三

在統一全國金融機關的銀行政策實現後，發展交通當然也是國家銀行的重要任務之一，對於鐵道及其他交通要具的設計和資本的籌集，國家銀行當能盡鉅大的領導作用。例如設立造船廠，設立機關車客貨車製造廠，設立大規模的輪船局發展外洋及江河航線，這些在國家銀行的領導下，都是不難實現的。

濬導江河及建築一百萬英里的石馬路，可以利用裁兵從事建設。中國有兵二百萬，照人口比例或不能嫌其太多，但這些國防不足內爭有餘的軍隊，不努力裁汰，中國真是不能得救的。爲

國防計，中國應實行徵兵制，爲澄清政治消弭內亂計，中國必須裁汰老弱及腐敗軍隊。但裁兵有兩個主要的難題，一是裁兵的經費，二是兵士被裁後怎樣不使其淪落失業流爲盜匪，如中央與地方政府合作，編練被裁士兵去從事築路和濟河，一方面士兵被裁後既不致失業，而經費也不難解決了。

四

交通是一切經濟文化及國防的基礎工具，凡是交通便利的地方，資本與人口都必然的會繁殖起來，社會的經濟與文化也自然會發展的。交通不便利的地方，任你有鉅大的資本，有繁庶的人口，但這一塊與社會與世界絕緣的土地，始終無從開發。中國與世界各國不同的地方，便是世界各國的交通都已極便利，而中國的交通則至今仍極隔絕，外人都在向外開拓富源了，中國則連本身的富源都無從發展。外國因爲交通已經很發達，所以在解決經濟問題的時候，很少提到發展交通，但在中國，交通還是和原始時代一樣，如不求得根本解決的方法，什麼政治經濟文

化國防都無從談起

第四 農業政策

一

目前一般人談起中國的經濟問題來，總是斤斤於土地問題，好像土地問題得到解決，其他的經濟問題都不難解決了。事實上，這是不正確的，目前中國的農村經濟的日趨破產，農村社會的日趨混亂，並不是土地制度本身的原因，而是由於外來的襲擊。外來的襲擊除內戰災荒外，第一因為世界經濟的恐慌的關係，各國都發生普遍的農業恐慌，中國所僅有的少量的農產品，其價格也不得不大跌特跌；第二因為國內交通阻塞的關係，過庶的人口被困於故土，無法移殖，馴至失業增加，盜匪遍地，農村社會便陷入暴亂狀態中去了。所以目前解決農村經濟的主要點，第一是整頓全國的金融，避免恐慌的襲擊，第二是開發全國的交通，俾得便利移民。確定了整個的

銀行政策和交通政策以後，那時纔提到農業政策，解決農民問題。這裏並不是說土地問題農村問題不重要，不過在金融問題交通問題沒有解決以前，任何三頭六臂的大神怪，也沒有能力解決土地問題，解決農村經濟問題。

中國土地制度的複雜，簡直是世界的縮影，至於濃厚的封建色彩和原始色彩，更是世界所無的。地主與佃戶之間的關係，既各地不同，就在同一地方，也有差別。在宗族觀念較深的社會，土地所有權十分之五甚至十分之七以上操在姓氏祠堂手裏，租種祠堂土地的則又大半是本姓子孫，在這種情形下，佃戶與地主（祠堂）之間的關係，當然糊模到了萬分。而且這些佃戶大都握有若干半自由的主權。祠堂既不純然是藉剝削地租謀生的地主，而各祠子孫也不純然是藉種租田謀生的佃戶，這樣，中國的地主與佃戶之間正面的關係簡直無法確定了。同時因為人口過庶，一部份農民求種租田而不可得，祇得出外幫工。可是僱用幫工的又未必全是自耕農和地主，却大部份是佃戶兼自耕農的大農中農及富農。這些大農中農富農在經濟較好的時候自然可以多用幫工，但在不景氣的時候就不得不少用幫工甚至不用幫工了。因之在不景氣到來的

時代，佔鄉村人口大部份的貧農與僱農只有坐待餓斃，若更加以災荒的侵襲，那就連中農小農甚至富農也加入飢民的隊伍中去了。

拯救中國的農村，決非單純的改革土地制度所能解決，中國有人口過庶的熟土，同時更有大批的無人耕種的土地，「土地國有」也好，「土地私有」也好，都沒有什麼問題。你說要土地國有嗎，荒廢了的土地儘多着，不說邊疆，就是在內地人口過庶的地帶，「官荒」及「無主廢地」就已經不可計數了；國家如需要土地，這些「官荒」「無主廢地」及邊疆無人耕種的土地，儘夠收用了。你說要土地私有嗎，現在就是行的土地私有制度，墾熟的土地雖然不夠耕種，但大批的「官荒」只要農民出很微細的手續費去認領，但農民都觀望不前。農民最富於保守性，又富於私有觀念，不把有利的事實放在他們面前，空空洞洞的去改革制度，那對革命毫無幫助，徒然惹起糾紛而已。蘇俄十月革命後和實行新經濟政策後的土地政策，其失敗與成功，可以作中國土地問題的龜鑑。中國的土地矛盾遠不如沙皇時代的俄國，俄國地主與農奴的衝突是有歷史性的，以這樣的基礎去施行共產黨的土地國有政策，農民仍不免於普遍的怠工，那末在土地制

度這樣複雜土地矛盾這樣模糊的中國希望以改革制度來救濟農村，那不是夢想嗎？

二

革命的根本任務在於救人而不在於殺人，如革命徒以找尋「對象」施行殺伐為任務，那革命就成為人類互相殘殺的現象，而不是為人類求取出路了。雖然在大多數人民被困壓於兇殘的偶像和吃人的制度下的時候，革命必須以撲滅這些偶像和制度為急務，可是中國的農村，目前並沒有一致的明顯的反動的偶像和制度，但廣大的農民羣衆仍困在飢寒之中，那我們去撲滅什麼呢？革命當然不能以無可撲滅的「對象」而停止或怠工，——中國一般自命革命的統治者，怠工已多年了。——中國的農村雖沒有什麼反動的偶像和制度可供我們去撲滅，但仍有一個明顯而全國一致的革命的對象放在我們面前，那便是橫掃全中國的「飢荒」。打退了「飢荒」把二萬萬以上嗷嗷垂斃的農民救出來，這不是偉大的革命工作嗎？

在原則上，孫中山先生及晚年的列寧（新經濟政策以後）所釐定的土地制度和農業政

策是無可改變的，我們如要在孫中山列寧以外去尋覓什麼農業政策，去另外創造什麼土地制度，那不單是多事，也是徒勞無功，白費精力。列寧對於俄國所定的農業政策，由於斯大林及其黨人的努力，已逐漸實現而走上勝利的前途，現在蘇聯的國家資本已成立了根深蒂固的基礎，土地國有制度的實行將來是沒有什麼障礙了。可憐的只是中國，國民黨雖成立了六年的統治，黨的取得政權只是完成了少數人的升官發財，以及黨人的自相殺伐，把孫中山先生所手定的解放中國農民的土地政策農業政策無期擱置下來了。現在中國的農民問題是越弄越糟了。中部各省整千整萬的農民被逼誘着加入共產黨，使共產黨很輕易地成立了紅軍，國民政府調了數十師軍隊去圍剿，結果仍沒有消滅的希望。土地革命如長此怠工下去，那末中國的農業危機和「飢荒」只有一天一天的擴大開來，由中部擴大到南部北部，擴大到揚子江的上游下游，那時領袖們縱再欲爭奪權位，恐怕也無權位可爭了。

現在，中國的農業危機和「飢荒」已成了深入的普遍的災象，農村基礎與孫中山先生當時所見到的遠不相同了，但我們說這樣的話並不是要放棄孫中山先生所定的土地制度和政

策，而是要追求補救的方法，爲孫中山先生的主張建築一個鞏固的永久的基礎。所謂補救的方法，便是打倒「飢荒」撲滅危害革命的「飢荒」。

三

應付目前土地革命的補救方法，在對象方面是打倒「飢荒」撲滅「飢荒」在方法方面則可分爲：

- 一 成立國家農場；
- 二 厲行農業合作制度及保險制度；
- 三 厲行農業信用制度；
- 四 造林及發展漁業；
- 五 發展礦業。

有了這五項撲滅「飢荒」的土地革命的基礎，同時實行孫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權政策，這

樣，走上土地國有制度便毫無困難了。茲逐項解說於下：

一、成立國家農場。中國現在有兩個嚴重的問題，第一是一萬萬以上的農村失業人口，第二是食糧及衣料缺乏，去年外貨入超達六萬萬兩，衣料食糧却佔大多數。中國號稱以農立國，照理要有鉅額的食糧及衣料供給外國，現在反而仰求於外國，這不是國本根本動搖了嗎？如果讓這情形繼續下去，外國雖然不出兵來亡中國，中國已等於滅亡了。因為農村失業，紅軍和土匪遍地開展，食糧及衣料缺乏，帝國主義的經濟鐵錘把中國每一寸土地都敲打遍了。中國要解決這兩個嚴重的現象，除了國家自己起來經營農業成立農場以外，一切空口的號召甜蜜的煽動都是泡影，在歷史之前奮興狂歡，在歷史之後垂頭喪氣，共產黨不合實際的左傾的土地革命，其結果比過去的國民黨怠工的土地革命並不高明多少。

國家農場需要大批的農業工人，這是解決農村失業人口的生力軍；國家農場經過短期的墾種以後，便可收穫相當的農業產品如食糧棉花之類，那對於食糧衣料的缺乏多少也有解救了。中國如能決心開闢國家農場，如以九方里或二十方里為一個農場面積單位，每農場容納五

百或二千以上的農業工人，其出產每年當在五萬兩或十萬兩以上，那末全國每年平均成立五百個農場，每年便可減少數百萬的農村失業人口，增加數萬萬兩以上的農產品，祇要五年或十年以後，中國的土地革命便可以成立鞏固的基礎了。

成立國家農場的基本條件是農業工人，土地，耕種工具和流動資本四種。中國有一萬萬（？）以上的失業農民，農業工人的招用當然不成問題。全國十八萬萬（？）畝的耕地面積，祇合全國土地面積百分之二十左右，如用新式的方法去墾種，至少還可得到二十萬萬畝左右的耕地，那末土地也不成問題了。至於耕種工具，本國原有的加以改良外，可向美國或蘇俄各國現購或賒購各種農業的機械，更由本國設立新式的農具廠，耕種工具可以不難解決。至於流動資本，那在銀行政策實現國家銀行成立以後，籌集的時候決不致發生困難。

二，厲行農業合作制度及保險制度。成立國家農場，祇把已經破產的僱農佃農貧農和一部份小農吸納了進去，換句話說就是國家農場祇解放了僱農佃農貧農和一部份小農的痛苦，而富農中農及一部份不願意離開故土的小農則被革命放棄了，富農雖然手頭或有若干資本

可以勉強維持下去，但困疲的中農和小農則簡直一無辦法，祇好坐待淘汰。革命對於任何民衆的痛苦都不能坐視不顧，中農小農和富農自然也要積極與以援助。援助的辦法便是由政府的幫助和黨的領導，中農小農——富農自然也可以——一律參加生產合作消費合作的組織成立合作農場，由國家賒購耕種的機械並發給種籽。合作農場的土地除社員所自有的以外，地主（自己不耕種者）的土地一律由國家收買，或強迫低價租給合作農場。

合作制度以外，保險制度也是必須的。農民經濟力量軟弱，因為怕遭失敗的緣故，常常不敢經營較大的事業和添置鉅價的工具，政府必須有完善的保險制度，如牲畜保險，住宅保險，倉庫保險，風災水災及種植保險，耕種機器保險，完善的保險制度實行起來，農民就可以放膽去發展農業了。

三，厲行農業信用制度。中國農村自有歷史以來，從來就是輾轉困頓在高利貸的壓迫下面的。禁止高利貸，表面上雖是幫助農民的辦法，可是實際上只是割斷了農民信用活動的生命，高利貸的制度，不過由公開轉變為祕密罷了。禁止或取締高利貸，於農民有損無益，真正與農民

有利益的，乃是政府設法去抵制高利貸，使農民有活動金融的機關，不必再去仰求於高利貸者。確定農業信用制度的方法，那便是國家銀行成立普遍全國深入農村的銀行網，但國家銀行當然不能在每一個農村都去設立一個分行，但國家銀行各縣分行可以有担保的放款給合作農場以及各信用合作社。各縣分行更可應事實的需要，在各農村中心的市鎮設立當舖，以月息一分左右的低利典押借款於中小農民。

四，造林及發展漁業。中國每年的外國進口貨，不單食糧衣料及工業品有可驚的數目字，就是木材，紙和海貨也是進口的大宗。木材和紙，須從造林入手。收回海貨進口的利權則須從發展漁業入手。在這造林與漁業兩方面，經濟上既可有鉅大的發展，而對於社會上也可以減少很大的失業人口的數目字。中國海岸線雖不長，但漁業充分發展後，自給自足是有餘的，目前閩浙蘇魯一帶漁權盡被日人偷竊，實在很可惜。造林是防止水旱風災的根本事業，近年來中國各地年年都鬧着水災旱災，這便是森林衰落的嚴重象徵。要免除水災旱災，除治標方法的瀋河築堤以外，根本辦法便是造林。造林除消滅水旱風災外，其本身也是有厚利可獲的東西。如松杉是造

紙的原料，白楊是製火柴的原料，此外建築及交通方面需用的木材更多。中國充分造林以後，所挽回的利權每年至少當在數萬萬兩以上。至於造林的辦法，在內地附近國家農場或合作農場的荒山瘠地，這些地方的造林儘可作為附近農場的副業。如在邊荒或附近沙漠地帶，則可作為畜牲場或植棉麻農場的副業。其餘沒有附近農場可以依賴的林場，而可以廣植白楊松杉或菓林的，可設立國有林場或私家林場。至於防災及治安的森林，當然由國家管理比較相宜。但重要的事情，便是一切林場均須有經常負責管理保護的人，森林纔有造成的希望。近數年來國民政府提倡的造林，每年在植樹節日舉行一次造林運動，上至國府主席，下至縣長警察，都慎重手植一株樹苗，官吏們的樹苗既植得不多，但這不多的樹苗也在兩天或三天以後就被人踐踏或枯死了。這樣的造林，是沒出息的官僚們玩的把戲，真正造林不是這樣的一曝十寒，只見運動不見事實！

五、發展礦業。發展礦業，是應當在工業政策中提出的。但發展礦業有兩點和農民間題及農業政策相關聯：第一，發展礦業需用大批的礦工，這對於解決農民失業問題是一個不小的幫

助，因為礦工大都是由失業的農民去補充的。第二，煤鐵礦的廉價開採和廉價供給，這對於交通的發展和農村機械化的發展都有極大的幫助。否則煤鐵價格高昂，並且產量不足，中國不能自製耕種的機械，長久仰賴外國供給，那是很危險的事情。既然發展礦業，第一可以幫助農民失業的解決，第二可以鞏固將來農業發展的基礎，我們在討論農業政策的時候，自然不能不加以注意，但詳細的解說，還是留待工業政策中討論罷。

四

中國現在社會經濟問題最嚴重的是失業和飢荒，在這失業和飢荒之前的兩個嚴重問題是金融枯塞和交通阻滯，中國如不能同時解決這四個問題，那末中國在目前這激烈的國際戰場中，除滅亡外簡直一無辦法。但我們又相信，中國如有決心力求自拔，那末中國非但可以自救並且還可以救世界。——中國農業政策的實行，在本國的價值不必說，對於世界的貢獻，雖未必能夠永遠撲滅世界的經濟恐慌，但這尖銳到了極度的世界經濟恐慌得到中國農業政策的援

救，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至少可以移後十年了。中國的農業政策實行，中國農村的產業將普遍而根深蒂固的發展起來，根本肅清封建的經濟勢力。中國社會能逐漸剷除經濟的封建勢力，國際間對這個廣大淵博的農場的開發，恐怕十年也還開發不完吧。

第五 工業政策

一

從來的人討論社會經濟問題的時候，總是集中其注意力在工業問題上，好似只要工業上沒有矛盾，其餘的一切社會經濟問題就都解決了。其實這樣的觀察是錯誤了，工業組織只是社會經濟機構中的一個環，如果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單只有工業一個部門很發達，而沒有其他的農業交通商業等經濟部門作輔助的基礎，這樣的國家或社會，他的經濟組織便很少獨立性。雖然現代的許多工業畸形發達的國家如英日等等，不論經濟上政治上在國際間都很佔優勢，

這是因爲有強大的軍備在作各種侵略——政治的和經濟的——的工具；如果英國或日本失去了那強大的軍備，那就會一敗塗地，政治失了優勢，經濟便必然走上被動的地位，而不能再繼續操縱或壟斷了。

在經濟上沒有獨立性的基礎，而單只有一個畸形發展的工業部門，這種國家雖可以工業的國家或資本主義的國家自豪，然而因其本身組織脆弱的關係，其自身固不時的要暴露出恐慌的破綻來。若萬一與一個矛盾的對手國發生衝突，對手國不要用武力來抵抗，祇需實行經濟封鎖的政策，這個在經濟上沒有獨立性的基礎的國家便有根本崩潰而瓦解的危險了。一九一四年前的德意志總算是英雄一世獨霸全球的強國了，可是自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爆發，各國在軍備上在武器上雖然敵不過德國，但因爲各國厲行經濟封鎖的關係，掙持了四年工夫。終究因爲各種經濟恐慌的重重發生，尤其是普遍全國的「飢荒」的現象，不得不向對手的協約國求和了。

社會主義的革命唯一的目的是解決社會經濟問題，而以政治爲達到目的的手段。可是無

論用怎樣巧妙的手段，單只注意於工業部門，單只去煽動勞働階級起來奪取政權，這種方法雖然在政治上或者可以倣倖獲得勝利，但在經濟上的勝利則毫無希望。蘇俄的十月革命，奪得政權的前鋒隊伍雖然是工人，但如沒有集體農場的成功，獲得廣大農民羣衆的同情和擁護，沒有國家資本主義制度的成功，獲得金融統制的鞏固基礎，那末誰都不能擔保蘇俄無產階級革命的最後勝利。列甯是唯一的馬克斯主義的承繼者，可是在蘇俄革命後生了嚴重的危機的時候，也逼得大聲疾呼，「不惜犧牲一切的主義，」積極主張實行新經濟政策了。新經濟政策的作用，便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平衡作用。新經濟政策對於直接發展工業的效用並不顯明，可是新經濟政策立下了平衡的發展經濟的基礎，這對於工業部門的發展却收到了極大的效果。

像中國這樣生產落後的國家，只有少數幾個通商大埠稍具有工業經濟的雛形，大部份的地方都還停留在原始經濟時代或封建經濟時代，工業經濟的形態可說還沒有完成。革命對於社會的經濟問題有兩個任務，一是剷除人與人之間的經濟制度的矛盾，二是剷除人類對於自然間生產力量的矛盾。目前中國革命的經濟任務，改革經濟制度當然是重要任務之一，但更重

要的則是改革生產方法。人與人之間唯一的經濟矛盾是「恐慌」，人與自然之間的經濟矛盾却是那可怖的「饑荒」，「恐慌」的襲擊固然可怕，但「飢荒」的襲擊却更可怕！現在的中國，「恐慌」的現象很輕淡，但「飢荒」的現象却已普遍全國，成爲唯一嚴重的經濟問題了。

在前篇「農業政策」中，我們已把「飢荒」的問題有了相當的解決。但有一點我們必需注意，就是中國農業是否將永遠保存手工生產的方法，抑是必需努力走上農業機械化的前途。本來工業的作用是改變農業所生產的原料爲各種各樣的供給人類的消費品，可是農業機械化完全成熟以後，農業與工業的分界便很淡薄，到了那時候，可說農業也已變做工業了。

我們在這裏的說話，並不是主張中國革命不需要發展工業，但對於社會經濟不能平衡發展的工業，畸形的單獨發達的工業，則中國非但沒有這樣的需要，也沒有這樣的可能。在目前的世界，各國爲了爭奪原料，爭奪市場，大戰隨時都有一觸即發之勢，中國在這潮流中也想來畸形的發展工業，希望與英日等帝國主義來爭奪原料，爭奪市場，這實在是夢想。工業的畸形發展，正是帝國主義成長的先天的經濟基礎，因爲工業畸形發達的國家如強行抑制着不向外國

施行侵略政策，那末畸形發達的工業非但要立即萎敗，結果連整個的國家組織也要根本崩潰呢。中國革命是社會主義的前途，中國不需要步英日法美的後塵做帝國主義者，當然也不需要畸形的來發展工業，不需要這樣的工業來作對外經濟侵略的工具。至於在經濟地理上的優點，把本國的生產品與外國相交換，那是爲了人類生活上的需要，不能說牠是帝國主義性質的經濟侵略。

二

在目前激烈的世界經濟恐慌的漩渦中，在各帝國主義的傾銷政策的包圍下，也許有人擔憂中國的工業沒有發展的可能，這實在是杞人憂天了。中國如企圖步資本帝國主義的後塵來發展工業，那無疑是不可能的：但如中國以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階段的方法來走入社會主義的前途，組織了全國的經濟能力來發展工業，那就是輕而易舉。中國雖然窮窮，可是因爲鑛藏和各種工業原料的豐富，勞動力的廉價和衆多，土地的廣大和適宜於種植，發展工業的自然條件

極充分，祇要向外國購買若干機器和訓練若干新式技術的工業人材，中國的工業便可以走上順利發展的道路。

煤和鐵是主要的近代發展工業的自然條件，而中國對於煤鐵的鑛藏却特別豐富。據美國德拉克的估計，我國的煤鑛儲藏量如下：

省名	儲煤量（單位噸）
山西	七一四、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湖南	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四川	八〇、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雲南	三〇、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貴州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河北	二二、六六八、〇〇〇、〇〇〇
河南	九、二七五、〇〇〇、〇〇〇

山東	七〇八三〇〇〇〇〇〇
甘肅	五、一二九〇〇〇〇〇〇
江西	三、三九五〇〇〇〇〇〇
蒙古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陝西	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廣西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安徽	一八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湖北	一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福建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浙江	二四、七〇〇〇〇〇〇
江蘇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合計	九九六、六一二、七〇〇、〇〇〇

鐵礦的儲藏量據前北京農商部地質調查所調查的結果，全國各省的儲藏量如下：

省名	儲鐵量（單位噸）
河北	九一、四七九、〇〇〇
遼寧	三八七、五八〇、〇〇〇
山東	二九、九二〇、〇〇〇
河南	三、四〇〇、〇〇〇
安徽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江西	一八、〇〇〇、〇〇〇
湖北	五二、六六〇、〇〇〇
江蘇	三五、〇〇〇、〇〇〇
福建	七、五〇〇、〇〇〇
浙江	二、三〇〇、〇〇〇

合 計

六六七、八九九、〇〇〇

煤藏佔世界第二位，鐵佔世界第五位，石油儲量至少亦可敵美國總儲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此外如錫，鈾，金，銀，鉛，汞，鋅等工業必需品的鑛儲量也都十分豐富。中國有這樣多的鑛藏，所以中國要努力製造機器，發展農業的國家爲工業的國家，那是有充分的基礎的。

至於工業原料方面，絲，棉，豆，麥，羊毛等類的出產在世界各國從來就佔很重要的地位，不過近年來因爲國內政治混亂和世界經濟恐慌的關係，有許多原料品的生產比率都或急或緩的下降了。

三

中國的鑛藏和工業原料品既這樣的豐富，那末創立五金工業，創立重工業的工廠，創立生活必需品如衣食住行等的製造廠，就都沒有困難。比較困難而必須討論的，那是經濟制度和經營方式的問題。在經濟制度方面，比較有現實性的可分兩種：一種是自由資本主義，另一種是國

家資本主義。前者完全是個人主義的沒有組織性的經濟制度，不論生產分配運輸等經濟行動，都陷在無政府的狀態中。後者則是較近於集團主義，而是有整個統制計劃的經濟制度，不論生產分配運輸等等，一切人類在經濟方面的行爲，都成爲有組織的活動。

在經營方式方面，可分爲國家經營，私人經營和准許外人經營三種。這三種經營方式，不論在國家資本主義制度下或在私人資本主義制度下都能存在，其不同的一點，只是生產資本的存在，前者以國家爲主體，而後者則以私人爲主體。在私人資本主義制度下，所謂國營事業只是輔助私人資本的發展；在國家資本主義制度下，容許私人經營或外人經營，那却是輔助國家資本的發展了。有許多人鑑於私人資本主義制度下官營事業的腐敗，常常把國家資本主義和官營事業混合在一起，以爲國家資本主義不能成立。其實國家資本主義和官營事業是絕然不同的兩個東西：國家資本主義以發展國家資本爲手段，而以解決人類生活走入社會主義的經濟前途爲目的；官營事業則是爲維持私人資本主義的秩序防止獨佔及調和私人競爭這是毫無前途的。

中國生產落後，資產薄弱；用自由資本主義的方式來發展工業，因為主觀力量的薄弱，萬不能抵抗環繞四週的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經濟上只有永遠處於被動的地位。但如用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嚴密國內的金融組織，集中全國的經濟力量來發展工業，對內固然有了雄厚的資本，對外亦可以勉作抵抗了。以一個幼稚的中國資本家的力量來和一個外國資本家抗爭，那是以卵投石，中國資本家必碎無疑；若以廣大的全中國的經濟力量來和一個外國資本家抗爭，外國的資本家反而會變做卵一樣的脆弱，不能抵禦中國，不能再向中國進行侵略了。

在國家資本主義制度下，為生產發展的順利起見，其初期經營生產的方式將仍和私人資本主義時代一樣，保存着國家經營，私人經營和外國投資的三種形態。其不同的地方，在國家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私人經營和外國投資的事業須受國家最高經濟設計機關——最高經濟委員會或最高經濟計劃委員會的統制，絕對不許作不合理的自由競爭的行為，國家必須絕對有權力去統制全國的工業。

第六 商業政策

商業在社會經濟組織中佔怎樣的地位，現在還有許多人在各持成見，爭論不決。有人說商業是不生產的，但有人則說商業是生產的。其實社會現象不能有絕對的永遠不變的真理，商業對於社會的經濟組織是否有價值，是否能有生產的作用，這要觀察各時代不同的環境而決定。在原始時代，人類生產幼稚，慾望簡單，一個人所生產的物品剛夠一個人自己消費，同時一個人的慾望也決會超過一個人的生產量以上，在這樣的時代，人們都是自給自足，當然無需乎商業。但經過相當時期以後，由於生產的進步，每個人的生產的自給自足，外還可以有剩餘，另一方面新的慾望也增添了出來，在這樣的時代，商業制度便必然要出現，成爲社會經濟組織中必需的部門了。

我們試看社會經濟的流程序：農業部門成功了各種各樣的原料，原料經過加功而成爲供給消費的物品，可是堆積在工廠貨棧中的物品不能直接就供人類消費，必須經過商業的運

輸和分配作用，這些物品纔能成爲有價值的消費品。如果工廠中的物品是日夜不息地生產出來，沒有各種商業機關把這鉅量的物品運輸而分配到社會各層階去，那末這些物品將長期存放在貨棧中霉爛，結果變成無價值的東西了。

當然，商業在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可以有種種不同的形態：有原始的物物交換的形態，有封建的行會制度的形態，有產業革命後自由貿易的形態，有近代資本主義完全成熟以後的獨佔性的形態，將來社會經濟更發展下去，商業或要歸國家專營，漸漸形成社會主義制度的商業基礎。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社會的勞動的分工」當然只有更進步，生產的分工制度既然不能消滅，那末「有無相通」「交互慾望」的商業制度當然也仍舊要存在的。不論商業的形態如何，其所處的時代如何，各有其流弊，而且也各有其作用，一定的經濟時代必然產生一定的商業制度，那是無可推翻的事實。

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前，一般的商業形態可說完全是封建性的，甚至原始式的物物交換的地方也很多。定期的「趕集」「趕場」固然是當時農村間主要的商業方式，而城鎮的「商行」

則是以「賤買貴賣」的目的，使農村與都市發生經濟的聯繫。比較發達的都市，纔有專門經營商業的店鋪，纔有專門製造手工藝品的工匠，商業組織中心則操在所謂「同業公會」「同行公會」的手裏。這些同業公會同行公會除了各奉有一個神而以神廟為會所外，其組織與規律等等與歐洲中世紀的「基爾特」可說完全相像，凡加入行會的鋪戶，纔可以向各地城鎮經辦貨物，並以之銷售於各大都市。可是自從鴉片戰爭以後，歐洲各產業先進的國家挾其雄厚的經濟勢力湧入中國，於是中國各種固有的商業形式便逐漸被破壞了。

中國封建性的商業制度的破壞，並不是像歐洲產業革命那樣產生了新的制度，舊的制度纔被淘汰了。中國社會自身並沒有產生新的商業制度，只是因為外來的經濟侵略的關係，舊的經濟制度根本被摧毀，新的制度無從成長起來，於是中國社會的經濟便陷入飄泊無依的形態中，現在則簡直成爲金融帝國主義的經濟附屬物了。在帝國主義的經濟鐵蹄下，中國將永遠做帝國主義國家排泄過剩生產物的尾閘，中國民族資本將永遠不能抬頭，中國民衆的生活也只有一天苦似一天，永遠陷在飢寒的牢獄中。

半殖民地的中國，要想脫離帝國主義的經濟壓迫，求得一光明的出路，必先求解放商業制度的束縛。工業以市場爲生命，沒有市場，工業便不能發展，所以中國要想發展工業，要想發展民族資本，奪取市場和解決商業上的矛盾實是唯一要着。說到奪取市場，說到解決商業矛盾，便須看商業政策如何決定了。

商業政策的決定，可分對內與對外兩種，對外是國際貿易，對內是國內貿易，現在試與這兩個問題，分述於下：

一 國際貿易政策

社會經濟組織發展到現代，已經衝破了一切人爲的天然界限，——民族的界限，地域的界限等——整個的世界被納入一個系統中了。經濟本來沒有國界，但在近代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人類自私心的發展形成了吃人的帝國主義的惡魔，結果在世界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國界的存在成了發展世界經濟的障礙物。在以謀利爲目的的經濟制度下，個人與個人之間固存

在着剝削關係，而產業先進國家對於產業落後國家的剝削關係則更爲明顯。產業先進國家憑藉着雄厚的軍備用武力征服了落後的國家，在政治上或則造成宗主國的地位，或則訂立種種不平等條約。帝國主義在政治上成立了侵略的基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的經濟便永無抬頭之日了。

中國在閉關時代，直目空一切，以所謂「夷狄」對待外國。鴉片戰爭，義和團戰爭和中日戰爭等失敗以後，於是失地，賠款，締結不平等條約等等，一切產業先進國侵略殖民地國家的條件都先後成立了。

外國貨品輸入中國祇准抽輕稅，中國貨品輸入外國則須抽重稅，這樣，中國非但不能在外國取得市場，連本國的市場也保不牢。加以國內的封建勢力至今不能肅清，本國產品因苛捐雜稅的拖累，本國貨的成本比外國貨的成本反要大數倍，苛虐的釐金名目上雖已取消，但特稅暢銷稅等等新名目的繁興，實比釐金還要繁重，外貨進口只抽單一稅，本國貨的流通則捐稅重重疊疊，結果外貨在中國市場，因不平等條約的壓迫和封建勢力的作祟，立下了根深蒂固的基

礎。中國民族資本陷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中，中國的商業當然要變成帝國主義經濟的附庸了。

因歐洲大戰及歷年來的一「排貨」運動的刺激，中國貨品得了一些恢復市場的機會。可惜這些外來的偶然的刺激，自身並沒有鞏固的基礎，所以民族資本屢次步入萌芽時期，又屢次被摧毀而回頭了。帝國主義者摧毀中國剛剛萌芽的民族資本，第一步利用不平等條約的非法權利，第二步用跌價競爭或製造中國內亂——軍閥戰爭——的方法，第一第二兩個步驟不能收到美滿的成功，便不惜第三步用砲艦政策來實行轟燬中國新興的產業了。最近九一八和一二八事變的暴發，便是日本帝國主義在白熱化的經濟恐慌中，作最後一次的掙扎，希望藉這次的暴行，從根本上摧毀中國的產業，佔有中國的市場，而維護其商業的侵略政策。

中國的經濟革命除對內肅清封建勢力，建立堅強的革命政權外，對外的反帝的任務更是萬分急迫。中國革命不實行澈底的反帝的工作，中國將永遠不能擺脫國際間政治的和經濟的束縛，革命的現象不過是曇花一現而已。不是革命被反動力量所撲滅，便是革命的團結陷入於腐化反動。革命的經濟基礎不鞏固，革命的勢力也就不能長久保持了。反帝主要的工作是取消

不平等條約，取消不平等條約本是孫中山先生生平所極力主張的。可惜國民黨取得政權以後，歷年的內爭，災荒，和共禍竟累得把反帝的工作完全擱置了。

商業是一切經濟侵略的前鋒，工業和農業尙只是經濟戰的後營而已。雖然後營的工業農業不穩固，前鋒的商業也不能得到勝利，但中國如不能先抵禦着帝國主義者的經濟前鋒隊，爭取一部份市場，那末後營方面工業和農業的鞏固便根本是夢想。講到爭取市場，講到抵禦帝國主義的商業戰線，其具體的現實，便是整個的國際貿易政策的決定了。

國際貿易是帝國主義者經濟侵略的大本營，也是經濟侵略的前鋒隊，中國必須在這方面築成堅強的防禦線，本國被束縛着的產業纔有舒展發達的可能。所謂國際商業的防禦線，積極的方法是增高進口稅率，實行保護關稅政策，消極的方法是抵制外貨，鼓起民衆的愛國觀念爲本國產品獲得市場。但因中國的積弱，關稅自主不能馬上成功，而排貨運動則是一時的感情作用，不能持久。關稅自由是獨立國家的主權之一，排貨運動能相當幫助本國產業的發展，這兩者，我們當然是不能放棄的，可是這仍舊不能成立國際商業的防禦線，必須實行國家專營的國際

貿易政策，進口出口事業一律歸國家專營。國際貿易歸國家專營，那末對外可以利用國家的政治經濟力量，調動和集中國內的農產品與工業品，作有組織有計畫的出口事業，這樣中國在外國的市場便可以得到相當的擴大。至於對內，因商業制度的改革，外貨進口必須經過政府的直接或簡接的控制，政府便很容易加以適當的操縱和支配，對於壓迫中國產業的外貨，可依事實的需要抬高其價格或竟拒絕採辦。這樣，帝國主義者便不能繼續運用不平等條約，便不能繼續霸佔中國的市場了。

自帝國主義者運用其堅利的砲艦政策和優勢的經濟力量衝破了中國的城壁，非但國內市場為帝國主義者所壟斷，即各種土產輸出的機會也都為帝國主義者剝削乾淨了。外商在中國設立銀行，擁有鉅大的銀行資本——五四三，〇〇〇，〇〇〇日金；一一，〇〇〇，〇〇〇金磅；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兩；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一八二，〇〇〇，〇〇〇戈爾登——這鉅大的外國銀行的資本，遠遠超過於本國銀行資本的總數十倍以上，外商藉這些銀行資本的作用，於是一切採購原料，開發礦產，建築鐵路，發展航線，設立工廠，都可以得心應手操縱自如了。如限制國際

貿易歸國家專營，那末出口貨的利權可以收回，而外國資本在中國的瘋狂行爲也將失却憑藉。實行國家專營的國際貿易政策，帝國主義者所加於中國的種種不平等條約的鎔鑄將完全失去效用，鉅大的外銀行的資本也再不容許有發狂的投機的侵略行爲了。

二 國內商業政策

中國因受了國際資本主義的影響，商業經濟已漸具雛形。不過這些雛形的商業的成長，並沒有給中國的社會經濟以良好的影響，祇做着國際帝國主義商業前鋒隊的附屬品罷了。在世界經濟好況的時候，中國得承些許餘瀝，商業一時興盛起來。世界經濟剛有點不景氣的氣象，中國商業便立即退向萎謝的道路。加以苛捐雜稅和高利貸制度的繼續存在，中國商業對外雖受到國際資本主義的提攜，在國內却常要遇到一些封建勢力的摧殘，不能有基礎的成長起來。二十年來的軍閥混戰連年不息，交通破壞，田產蕩然，民生凋疲，財源枯竭，中國的商業更如風雨殘燭，時時刻刻都有潰敗的危險。

年來帝國主義者的商品，幾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大到每一個都市，每一個城鎮，小到三家村的窮鄉僻壤，深山絕域，都已擁擠着洋貨的足跡，烙上了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印鑑。外貨能夠普遍地深入中國每一塊土地，外商自己並沒有在中國內地設立大小的商業機關，倒是中國的大小商店做了替外商推廣和販運貨品的商業機關。我們如調查一下本國各種大小商店的營業統計，那末洋貨至少當佔全數的十分之五以上。這樣看來，中國人的商店不是中國貨品的經銷機關，倒是外國貨品的經銷機關罷了。中國商店專做外國貨的經銷機關。財富一天一天向外流，結果中國的社會一天窮一天，市場一天狹一天，商業也就只有一天一天銷沉下去了。

商業的興盛有兩個必要條件，一是發展生產，一是發展民衆的生活慾望，由這兩個條件的平衡發展，商業的興盛便毫無問題了。中國現在的生產事業只有一天一天衰落，而民衆生活的慾望却受着國際資本主義的刺激，一天一天向上伸展，外貨擁進金銀外流，中國的社會經濟成了無底洞，只有去路，沒有來路，商業當然不能興盛了。中國除了帝國主義的商業侵略外，同時封建剝削的商業制度去蘊藏着很多的矛盾，賤買貴賣，買入的價格幾乎要比賣出的價格小得幾

倍，根本上形成一種社會剝削的基礎。其次無政府的盲目的自由競爭，單以市場的變遷去限制生產，而不以消費的需要來調劑生產；商業上多頭競爭的繁興，這實是社會經濟行爲上的一種浪費。革命後的中國商業，當然要以調劑生產與消費爲目的，未來的商業制度當然不能再建築在封建的或資本主義的基礎上，而要建築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了。在「國家專營國際貿易政策」之下，中國對外已成立了反抗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商業防禦線，帝國主義者不能再繼續侵略中國，那末只要設法消滅國內的自相剝削的關係，完成調劑生產與消費的基礎，中國的商業便可以走入永久繁榮的前途了。

在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下，國家不單在對外的商業上要努力，就在對內的商業上也應當要努力的。中國國家目前在對內商業上的努力，可以分爲下述三點，一是統一商業機關，二是厲行消費合作制度，三是厲行生產合作制度。

1. 統一商業機關，這可以免除多頭的自由競爭的浪費，成立穩固的繁榮的基礎。並且商業機關統一後，社會可以有一個具體組織的偉大力量去調劑生產與消費，永遠保持生產與消費

之間平衡發展的關係，至於統一的方法，除各產業部門成立各種社會主義性的托拉斯的組織外，更可以成立各級國家批發所，由國家採辦了各種商品，然後再普遍地有組織地分發給各商業機關去銷售，去供給消費；遇到必要或可能的時候。國家還可以擇地設立省縣市鎮各級大規模的百貨商店呢。

2. 厲行消費合作制度，可以使民衆得以便宜的金錢去按照批發的價格購得商品，不致再受舊式商店「貴賣」的損失。同時消費合作制度普遍的成立了後，一方面是有組織的去供給消費，另一方面則正是有組織的去開闢市場發展生產呢。

3. 厲行生產合作制度，可以免除私人操縱經濟的流弊，平民的小資本的生產者不致再因急求脫售而把物品價格盡量降低，遭受舊式封建商行「賤買」的損失。並且實行生產合作制度以後，生產因得了合作的基礎，生產的發展更加猛進了。

中國錢幣革命論

——並對黨執方案批判及對於魚鱗爭論的意見——

一 錢幣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及錢幣制度變革的歷史

「錢能通神」「金錢萬能」——錢幣這個東西在一般社會人士的目光中，簡直成了一個高深莫測的怪謎了。數千年來的人類都把金錢當作「神」，當作「萬能」，好似上帝除創造了宇宙，創造了人以外，又創造了金錢來供人類使用，叫人們來利用着金錢來創造這個繁榮的

而又痛苦的社會。目前這個社會，憑良心說，全部的經濟繁榮和進步是錢幣制度造成的，但反過來則那許多貧富懸殊，生產與消費不能平衡的痛苦，却也是錢幣制度造成的。

人們因為對於錢幣的觀念太過於神祕，以為錢幣是神造的，於是人類對於錢幣制度不思改進，錢幣對於人類的利益一天一天消失下去，而對於人類的禍害却就一天一天增加劇烈起來了。人類在金錢之前歌哭膜拜，人類在金錢之前憂傷喪亡，金錢對於人類的權威啊，上帝的權威乃是虛構，而金錢的權威才真正在呢。

金錢的權威誠然是大極了，但在這幽久的歷史經驗與痛苦之下，我們不能再相信「金錢神造」，而應該相信錢幣制度是為着人類社會生活的需要，由人類自己在深長的經驗中創造出來的。人類為什麼一定要創造錢幣制度，後來雖備受了金錢的痛苦而仍舊不能廢除錢幣制度，這中間自然有錢幣制度的作用和原因。原來錢幣制度的成立，牠的兩個最大的作用便是聯絡生產和節省浪費。常人往往只知道錢幣是交易的中準，是市場的媒介，而把聯絡生產及節省浪費的兩大根本作用忘記了。其實錢幣作交易的中準，作市場的媒介，這祇是錢幣的表面作用，

如果錢幣祇有這些表面作用而沒有更進一步的作用，那錢幣真是可有可無的東西，人類儘可保持着物物交換或日中爲市的舊制度，大可不必有現在那樣複雜嚴密的金融組織和金融制度啊。錢幣作爲交易中準，作爲市場媒介，藉以便利人類消費手段的完成，這誠然是不可忽略的錢幣的作用，但因爲有了錢幣，社會生產得以造成更大的聯絡與分工，使社會節省了許多無謂的浪費，社會經濟由此而造成順利發展的基礎，那才真正值得我們加以嚴重的注意呢！

在錢幣制度沒有完備的成立以前，當時的社會經濟不單是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其實那時候也無所謂國家，無所謂民族）的自給自足主義，甚至每一個個人或每一個原始家庭都在保持着自給自足的狀態。用低劣的生產方法，生產得多便多消費一點，生產得少便少消費一點，譬如今天打到一頭鹿，今天一天便會把這頭鹿吃完，明天却什麼都沒有獵到，也許明天就會餓一天，人與人之間幾乎如禽獸一樣各不相顧，經濟也絲毫沒有什麼關聯。後來人類日漸開化，個人的自給自足主義漸漸打破，於是有了物物交換以至於龜貝獸皮等自然物的錢幣制度出現，從此人類不單在消費方面得到了很大的便利，同時在生產方面也得到了一層保障。人們工

作所得，不論是一天獵得了一頭鹿或十頭鹿，都可以送到市上去換得龜貝獸皮等類的自然物錢幣回來，有了龜貝獸皮等的錢幣放在家裏，以後想要消費什麼，就祇要把龜貝獸皮等類再拿到市上去換東西好了。在這樣的一個原始的經濟的往來之中，我們可以看出雖然就只是這一些原始的龜貝獸皮的自然物錢幣，牠却也已具有了三個作用：

第一，人們祇要在需要的時候，便可把龜貝獸皮送到市上去換得消費的目的物回來，這是便利了人類的消費；

第二，人類開始了互易有無，生產不必再為自己的消費量所限制，打得一頭鹿剛夠自己一家人消費，打得五頭鹿十頭鹿則可以送到市上去出賣，免得像過去的打到了一頭鹿便即停止工作，或將多得的鹿置於腐壞拋棄，這是節省了人類許多無謂的浪費；

第三，人類的買賣制度成立，生產趨向於專業化，每個人從事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供個人自己的享用而是要提出供給社會去發賣，各人都以進步的分工的專業方法從事生產，各種各樣的生產便大量發展，大量增加了，幸有龜貝獸皮的在社會上流轉往還，用買賣的方法把各種

各樣的生產都聯絡起來，使人類的生產與消費得藉流通而造成平衡的發展。否則孤立的生產雖進步發展到任何程度，這種與消費脫離關係的生產終究毫無價值。所以人類的分工專業能夠有猛烈的進步，而各種大量的生產發展並不至陷於孤立狀態，這就是因為有錢幣在發生聯絡生產的作用。

惟其因為錢幣除了作交易的中準與市場的媒介的便利人類消費的作用以外，還有節省浪費和聯絡生產的兩個更大的作用，錢幣成了促進生產發展經濟的重要工具，所以錢幣的本身制度也就常常有着巨大的變更和進步了。現在中國各地的苗獠民族以及世界各處的未開化民族，他們只知以錢幣來便利消費，不知道錢幣還有發展社會經濟的作用，所以他們到現在數千年來，還是保持着自然物的錢幣制度，有的以牛羊為錢幣，有的以粟粟為錢幣，有的以茶鹽為錢幣，他們的錢幣制度不求改革，他們的社會經濟也自然不會有什麼進步了。

爲了錢幣制度有發展社會經濟的作用，同時社會經濟的發展又能夠帶動着錢幣制度的進步，因之錢幣制度本身的變革也又可以分作三個時期：

- 一，自然物錢幣時代；
- 二，鑄金錢幣時代；
- 三，信用錢幣時代。

錢幣制度的進化歷史既分成三個階段，有自然物錢幣時代，鑄金錢幣時代，信用錢幣時代的分別，一般人以為這是人類貪圖便利而才發生的變革，例如金元銀元比較龜貝獸皮甚至金塊銀塊使用起來便利得多，而紙幣鈔票又比金元銀元便利得多。但事實上，人類的貪圖便利，也許是使錢幣制度發生變革的直接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却還是由於社會經濟的需要，在舊有的錢幣制度不能再對當時的社會充分的盡聯絡生產及節省浪費的作用，舊的錢幣制度便要被淘汰，另一種適合於社會經濟的需要的新的錢幣制度就產生出來。

譬如在自然物錢幣的時代，龜貝獸皮菓粟茶鹽等類的錢幣，牠們所表現的價格既不能正確，牠們本身的產量又毫無標準，通行的地域也沒有一定，往往龜貝通行於一個很小的地方，獸皮菓粟茶鹽等則又通行於另外若干狹小的地方，這些自然物錢幣的使用，在一個很小的地域

內雖然可以收得若干作用，在比較廣大的地域內就無法通行，更說不上什麼聯絡生產，節省浪費的作用了。人類是智慧的動物，是政治的動物，當人類的相互交接關係擴大到了更廣大的地域，人類成立了完備的統治的形式，有統領，也有類似的政府組織的時候，比龜貝獸皮菓粟茶鹽更進步的錢幣制度就被規定出來，創造出來了。

在政治制度完備的國家，錢幣的行使不單依着自然的演變，並且還有着人力的律法的推進和保障，鑄金錢幣制度的成立，便是在這種環境下面產生的。菓粟茶鹽獸皮之類的錢幣，祇在衆人的默認與習慣之下保存其自然價值，鑄金制度的錢幣，却除了自然的本身的價值以外，還有着法定的絕對的價值。菓粟茶鹽獸皮可以在某地通行，在另外一個地方就不通行；由法律規定出來的錢幣，就祇要是在同一的統治之下，不論生活習慣有何不同，交通地域有何隔離，却一概可以通行無阻。這樣，鑄金的錢幣制度，就把在同一個統治之下的生產都聯絡了起來。

鑄金的錢幣制度，牠的本身的變革當然又有一個很長久的期間，由鐵幣銅幣銀幣以至於金幣，這中間相隔的時期可以延長到數千年以上，也可以縮短到數百年以內。如歐洲若干國家，

他們因為交通便利科學進步的緣故，生產力猛速發展，很快就進步到了金幣制度；中國却在周秦之後就有銅鐵等類的鑄幣，但因為生產落後的緣故，數千年來還只是保持着銀幣制度，直到最近中央政府下令廢兩改元，銀幣制度才算統一了。

鑄金的錢幣制度到了使用金幣，以黃金為鑄造錢幣的材料，可說是已經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了。過此以往，錢幣制度為想更求發展，就只有在鑄金制度以外另闢一條新道路。這一條新道路並不是於現在所熾盛的黃金本位以外另立其他更好的金屬本位，乃是現在各國已在開始醞釀成長中的信用錢幣制度。如現在各國各種證券債票的發行，銀行紙幣的通用，便是開始走入信用錢幣制度的道路。證券債票雖然祇是一種活動的借貸，不能直接說牠是錢幣，可是銀行的紙幣我們却老實可以直接就稱之為錢幣呢。

一般人說起紙幣來，以為一方面是節產貴金屬在社會上流通磨損的浪費，另一方面則是金融業者想從中取利。其實這不能說是全部的理由，因為講浪費，紙幣的印刷發行也同樣需要相當的費用；講金融業者想從中取利，則祇限於單方面利益的制度在社會上決計行不通。其實

紙幣的通行，屬於私人利益的固所不免，然而最大的能夠通行的理由乃在於社會的需要。原來金銀的生產是有限制的，但人類生活日高，消費日增，生產隨着一天一天的擴大，錢幣的需要便也一天一天的激劇的加高，於是金銀的鑄幣感到缺乏，只好發行紙幣來補充了。錢幣是社會經濟活動的紐帶，沒有錢幣，整個的社會經濟將停滯起來；錢幣缺少，社會經濟就會發生恐慌而凍結起來。所以在社會經濟發展到了相當程度，生金銀不夠供給，金錢紐帶感覺到緊狹，就只有以紙幣爲續了。

不過現在各國所通行的紙幣，並不能算是完全的信用錢幣制度。以現金保證發行的紙幣，牠的信用祇是對現金而言，除了代表現金以外，紙幣在法律上仍沒有獨立的地位。一家祇發行百萬元紙幣的銀行，他的財產雖在千萬元以上，但沒有百萬元紙幣的保證存放在金庫裏，這家銀行的紙幣就會全部變成廢紙。紙幣發行了，而紙幣的信用還是不完全，仍舊限於現金的保證，這樣的錢幣還是逃不了自然物（金，銀）生產量的限制，還是不能充分適合於社會的需要，結果一個社會生產發展到了某一種限度的時候，黃金作祟的信用恐慌就在各國循環出現了。

真正的信用錢幣制度，真正富於伸縮性而能適應於社會需要的錢幣制度，紙幣的信用決不應僅限於黃金而應該普及於一般的商品，這樣錢幣的數量可以自由伸縮而再恢復聯絡社會生產的作用，使社會的生產與消費之間再次得到平衡，並將維持永久的平衡。雖然黃金仍不妨作爲「信用錢幣」（紙幣）的擔保品，但也應與一般商品歸於同等的地位；祇有法定的信用的錢幣，金銀鑄幣應該絕對的離開錢幣的地位。一元信用的法定錢幣，牠可以適應着各種商品不同的時價而定其交換物的容量，譬如銀貴米賤的時候，可以定銀七錢值一元，米一斗二升值一元；在銀賤米貴的時候，可以定銀八錢值一元，米九升值一元。如以金銀爲例，則金貴銀賤時可以金五厘值一元，銀八錢值一元，反之則可以金八厘值一元，銀七錢值一元。這種絕對信用的法定主義的錢幣制度，與許多社會主義者的主張發行「能力券」「勞動券」「消費券」的思想內容相同，就是與最近在美國所發現的技術統治（Technocracy）在原則上也完全相同。現在半信用的錢幣制度還緊緊的拘束着社會的經濟，世界各國的錢幣制度都需要有一個澈底的革命的行動，不過在方法上在時間上也許有緩急先後的不同吧。

二 中國的經濟現狀及必須實行錢幣革命的原因

提起中國的經濟，我們恐怕除了一片黑暗與悲慘的感覺之外是不會再有別的什麼了。在百年來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與經濟圍攻下，加以萬惡的滿清專制和入民國以後的軍閥官僚政治，中國實已陷於萬劫不復，成爲國際帝國主義共同宰割同共剝削下的十八層地獄。真正的殖民地國家，只有一個國家來侵略，民衆只要供給一個強國的剝削，同時要想反抗也只要反抗一個國家，這種殖民地國家的民衆生活可說要比次殖民地民的中國民衆來得寬鬆，同時民族反抗運動也容易爭得勝利。試看次殖民地的中國，自五四，五卅，五七，以至現在的九一八，一二八的反抗運動，每次的運動都是悲壯熱烈，再接再勵，但是每次都只是支持到了若干時候，最後總是不能達到目的而失敗了。就是抵制外貨，抵制英貨，抵制日貨的運動也不止一次了，結果也只是經營外貨的商人受些無名損失，經營國貨及改換外貨商標爲國貨商標的商人取得若干意外利益，最多支持個一年半載，短則一月兩月，最後也是失敗了。

中國民衆的民族反抗運動一次一次都慘遭失敗，許多人都很風涼似的說中國人沒有持久的抵抗性，只有「五分鐘熱度」。其實這都是抹煞事實的說話，講中國民衆的抵抗帝國主義，世界各處的被壓迫民族也都不過如此，試看最近的淞滬長城各抗日戰役，成千成萬的民衆不惜犧牲身家性命，踴躍輸助軍餉，加入義勇軍，這難道也要說中國民衆是五分鐘熱度嗎？以中國政府的懦弱，軍隊的幼稚，經濟的貧弱，而說若干民衆的各自爲戰的抵抗就可成功，帝國主義的國家就會讓步，這實在是可笑的可笑。

一切政治，軍事，科學，文化的發達進步，第一個缺少不得的條件便是經濟液汁的培養。任何國家的政治，軍事，科學，文化，要是在經濟方面培養不足，那末不問怎樣的雄心宏願結果都會變成泡影。中國的發奮圖強，以中國這樣優秀的歷史與偉大的民族，誰都相信是很容易的。不過在政治上沒有絕對的民族精神的團結，下層民衆是一盤散沙，上層領袖只知各爭私利；在軍事上軍隊是那樣的幼稚，全國的軍隊又絕不統一，至於科學文化則更可以說是沒有絲毫基礎，像這樣的形勢，徒責民衆的五分熱度有什麼用呢？

抵抗須有抵抗的基礎，中國的抵抗第一個便是經濟問題。經濟如沒有獨立的發展，那什麼抵抗都是鬼話。中國的經濟如一個貧血症的病人，帝國主義的經濟控制力已使中國經濟完全失去了獨立性。國際帝國主義的控制中國經濟，有三個是殺了人而不見血的，第一是過去用暴力所獲得的不平等條約，第二是雄厚的金融資本，第三是進步的科學與技術，除了這三個以外還有最後的一個，那便是飛機大砲毒瓦斯坦克車的武裝摧殘。中國受着這種殘酷的摧殘與束縛，中國經濟自然永久不會有發展繁榮獨立的希望了。

在不平等條約，金融資本與先進科學的控制下，中國唯一可以利用之以保護本國產業的關稅政策不能採用，而帝國主義國家則可以在中國開設銀行，攫奪礦山，把持交通，設立工廠及經營進出口貿易。可憐中國什麼權利都沒有，祇有在金融帝國主義商人的宰割之下，走狗買辦在屠刀上可以舐得一點血，又有若干人在帝國主義商人經營的餘隙中創立一些小本經營。可是在這屠刀上舐得的血和在那些餘隙中的小本經營，根本就說不上創立獨立的中國經濟基礎，更說不上與帝國主義經濟圖謀對抗。

中國國內的帝國主義的銀行，礦山，航輪，工廠，商店等等的剝削，我們暫且不去計算，並且計算也很困難，但我們為檢看歷年來的國外貿易，我們就可以知道中國的經濟是怎樣的萎縮下去。據申報年鑑所載「七十年間輸出入貿易額表」：

年	次	輸	入	輸	出	入	超
同治三年		五一·三九三·五七八	五四·〇〇六·五〇九	(十)二·七一二·九三一			
九年		六九·二九〇·七二二	六一·六八二·一二一	七·六〇八·六〇一			
光緒六年		七九·二九三·四五二	七八·八八三·五七八	四〇九·八七四			
十六年		一二七·〇九三·四八一	八七·一四四·四八〇	三九·九四九·〇〇一			
廿六年		二一一·〇七〇·四二二	一五八·九九六·七五二	五二·〇七三·七七〇			
卅一年		四四七·一〇〇·七九一	二二七·八八七·一九七	二一九·三二三·五九四			
宣統三年		四七一·五〇三·九四三	三七〇·三三八·一六六	一〇一·一六五·七七七			
民國元年		四七三·〇九七·〇三一	三七〇·五二〇·四〇三	一〇三·五七六·六二八			

三年	五六九·二四一·三八二	三五六·二二六·六二九	二一三·〇一四·七五三
六年	五四七·五一八·七七四	四六二·九三一·六三〇	八四·五八七·一四四
九年	七六二·二五〇·二三〇	五四一·六三一·三〇〇	二二〇·六一八·九三〇
十年	九〇六·一二二·四三九	六〇一·二五五·五三七	三〇四·八六六·九〇二
十五年	一·一二四·二二一·二五三	八六四·二九四·七七一	二五九·九二六·四八二
十六年	一·〇一二·九三一·六二四	九一八·六一九·六六二	九四·三一·九六二
十七年	一·一九五·九六九·二七一	九九一·三五四·九八八	二〇四·六一四·二八三
十八年	一·二六五·七七八·八二一	一·〇一五·六八七·三一八	二五〇·〇九一·五〇三
十九年	一·三〇九·七五五·七四二	八九四·八四三·五九四	四一四·九一二·一四九
二十年	一·四三三·四八九·一九四	九〇九·四七五·五二五	五二四·〇一三·六六九

(備考) (1) 單位海關兩

(2) (十) 號爲入超

七十年來我國的外國貿易，就只有同治三年有二百餘萬兩的出超，此後一年一年便都是入超了。入超的數目，也只有光緒六年比較少，是四十餘萬兩，此後就一年比一年多，由數百萬兩數千萬兩，一直到三萬萬兩四萬萬兩以上，到了民國二十年就竟達到五萬萬兩以上的數目了。中國本是一個窮乏的國家，再加以每年四五萬萬兩的入超，那不是窮上加窮，只有坐待枯萎死滅下去了嗎？那些鉅大的數目字，國際資本主義者並不是和我們開玩笑，而要我們把燦爛發光的金子銀子輸送出去的啊。金子銀子本是饑不能食寒不能衣的東西，除了若干化學上工藝上的需用，對於民衆的日常生活幾乎不發生關係。但是現在，我們却不能妄自誇口，金子銀子是鑄造錢幣的唯一原料，而「萬能之神」的錢幣又是人們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衣，食，住，行，教育，娛樂，沒有一項不需用錢，一個人沒有錢，他是可以馬上凍死餓死，不能繼續維持生命，因之世界上除了禽獸或未開化民族，就沒有一個人不與金錢發生生死相依的關係。中國的金子銀子每年要大批的幾萬萬兩幾萬萬兩的輸送出去，那末中國的金錢也自然只有一天一天的減少下去了。

中國的金錢一天一天減少下去，直接的現象是中國民衆的生活一天一天枯窘，間接的現象却就是中國經濟所藉以活動的經濟紐帶（錢幣——金融）一天一天縮狹了。金錢減少，金融塞滯，不成問題的便會發生市場蕭條生產停頓的現象，因而影響到整個的經濟問題，在都市裏工廠停歇，商店倒閉，在農村裏就農產跌價，田地荒廢，而工人農民的失業，則成爲都市與農村完全一致的嚴重問題了。現在全國人士差不多衆口同聲的在高喊復興農村，發展民族資本，可是這決不是空口高喊幾聲就能成功的問題。現在中國還沒有突然一步踏到社會主義廢止私有制度的路上去，那末復興農村和發展民族資本，事實上還不能忽略資金這個東西。一般政客官僚，高喊口號，那是不費本錢的，復興農村也可以，發展民族資本也可以，好在誰都不能禁止誰去呼喊的。並且貧瘠的農村，蕭條的城市，廣大的失業，鉅大的入超，正需要利用復興農村和發展民族資本的兩個方法來解決啊。可是實行起來，復興農村則置辦耕種機要錢，購買種子要錢，創立農民銀行創立農業合作亦要錢，發展民族資本則設立工廠要錢，設立商店要錢，購買機器原料亦要錢。沒有錢，一切事情都將無從說起，我們不能儘是空口講白話啊。中國歷年外溢的金錢，

一切對外的公私債務及外國的在華資本且不去說，就是最近五十年來出口的現銀，據海關報告已經有六十餘萬萬元，這還是民國十六年的統計，若在現在，恐怕又不止此數了。中國的現金，本來不夠供金融流通的需用，現在又更有這鉅大的出口，存金劇烈的減少，對於金融流通當然就更不夠供給了。據張公權氏的計算：「全國的現貨，若是算他二十二萬萬元，吾敢說其中可認為流通資金的不足四分之一，在六萬萬元左右。」試問中國土地這樣廣大，人口這樣衆多，二十二萬萬元的錢幣本來就不夠活動，復加以信用方法及金融組織的不完善，真正可以認為流通資金的又不足二十二萬萬元的四分之一，那就無怪乎中國金融的枯窘和產業的阻滯了。

現在談發展中國的經濟，共產主義那種機械的空想的方法根本上是行不通，若干資本主義者的保守的聽天由命的方法也將是死路一條，我們爲不願在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下坐待死亡，或者聽任共產主義者來代爲支配，我們就應當急起努力，奮謀經濟上的獨立發展，以挽救民族垂亡的生命。中國經濟的獨立發展，前面早說過了，金融是這樣的枯窘，發行內債已無濟於事，舉借外債則牽掣太多，請問將從何處求得這鉅大的發展經濟的資金呢？孫中山先生在民國元

年的時候，發表的「錢幣革命」通電，這裏就正好指示給我們一條平坦大道了。

「錢幣爲何？」在人民個人保有錢幣的目的上講，誠如孫先生所說：「不過交換之中準，而財貨之代表耳。」在其參加流通的過程中，又得以發生便利消費，聯絡生產，節省浪費的作用，然而在牠的本身却寒不能衣，飢不能食，可說一無用處啊。孫中山先生錢幣革命的主張正是將錢幣原有的作用保存而擴大起來，另將錢幣的無用的部份置之有用之地。經濟上所需要的流通的錢幣以紙幣來代替，且可自由伸縮增多發行，而將現金現銀都節省下來，使之還原爲普通的商品，向外國去交換機器及發展各種生產上所必需的用品，或者償還各種急須清償的外債。

中國實行了錢幣革命，真可以說是在一舉手之間，對內根本解決了一切金融問題，從此中國經濟可以得到自由發展的平坦大道；對外則一切購買機械購買原料的資金都不成問題。甚至在這恐慌的世界，中國還簡直要成爲世界的救星，因爲中國的錢幣革命如實行有效，世界各國也跟着做做起來，那末全世界的黃金都將回復到商品的原位去了。世界常常爲了黃金發生爭執，發生戰爭，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是黃金作祟，現在正醞釀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也是黃金作祟，現在我們實行對錢幣發動大革命，將有限制的黃金白銀都離開錢幣的地位，黃金不能再作祟，那就不單是中國的勝利，世界和平也從此加增了一層保障了。

三 劉冕執方案批判

孫中山先生提出錢幣革命的主張，實是危亡之秋的中國的對症良藥，而且是中國唯一可以走得通的大路。不幸孫中山先生因困於種種急須應付的革命問題如政治，軍事，黨的本身組織訓練等等，在辛勤繁忙之中未及規定出詳盡的實行方案。同時又因為當時全國人士目光短淺，對孫先生的主張很少響應。所以民元通電之後，在建國方略的「心理建設」中及三民主義的講演中，雖也常常提到錢幣革命的問題，但終究沒有能夠見諸實行，這對整個的中國革命說，也許是一個最大的損失吧。

劉冕執先生本着孫中山先生的遺意，提出能力主義和錢幣革命實行的方案，並公表能力主義與能力本位制和錢幣革命實行方案彙覽兩部大著。在這主義遺教束之高閣，口喊「總理」

便膺祿位的時代，劉先生能具老當益壯獨挽狂流的精神，將國人十數年來所早已忘記得乾乾淨淨的錢幣革命的主張重行具體的提出來，鼓吹宣傳不遺餘力，這種堅毅勇敢，為國家社會服務的精神，實在是值得我們欽佩敬仰的。

劉先生的主張，劉先生闡揚孫中山先生錢幣革命的理論，我們真可以說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信仰到十二萬分。不過我們為了佩服與信仰的誠意，希望錢幣革命的主張，也可說是希望劉先生的主張的立即實現，不得不在錢幣革命實行的方法上有所獻議。愚者千慮或有一得，這也許是劉先生所樂於接納的吧？

一切社會制度的改革，第一須要注意的是思想內容和主觀力量，第二須要注意的是歷史條件和現實基礎；思想是進步的，主張上的力量也有了，但如忽略了歷史，忽略了現實，這種改革的運動，結果必仍歸於失敗。錢幣革命既是一種社會制度的改革，顯然也不能逃此規律。我們仔細研習劉先生所規定的方案，我們深覺劉先生對於上述必須注意的兩點忽略得太利害了。劉先生似乎太過深信了自己的主張，以為只要是進步的思想，一定能夠求得實行，於是一切歷史

條件，現實基礎，甚至主觀上的力量等等都不去注意。其實「知難行易」「能知必能行」在革命的歷程上是指一般社會法則而言，並不是一個人「知」了就全部社會都可以實行。否則偉大的三民主義在四十多年前早已被革命的導師孫中山先生所明白知道，爲什麼還要到四十餘年以後，到了民國十六年才開始得到成功呢？這老實就是進步的思想必須得到多數人的信仰，組織成功主觀上的力量，而後更適應着本國的歷史和現實，實行發動革命，最後才能得到成功。劉先生的主張，孫中山先生早已創之於前，現在我們實無理由可以非議，可是劉先生那種但憑主觀的方案，却不得不大膽提出商討。

劉先生在十九年提交全國工商會議的提案上所提的辦法，謂：

「本案辦法有三大要點：其一鈔券由政府印刷，（例與郵票歸政府印刷相同）管理由政府設局，（例與郵政由政府設局相同）無論何人，皆可發券，（按此係吾國舊有習慣）但均須向管理局請領，不得私印私發；其二由政府頒布保證委員會條例，（按與議會選舉法相同）人民按照條例，推選保證委員，（按推選比較投票選舉容易）經管理局認可，給以證書，（按與議

員當選證書相同）領券時由保證委員署名蓋章（按與普通一切債權借務契約租佃雇傭及法庭訴訟等保證相同）政府及地方公益機關發行額，至多以歲入十分之五爲限，（按銀行鈔票仍可照舊發行，惟不願再發鈔票而願發代用券者，亦可照公益機關例額發行，則利益比較鈔票尤大，至政府與地方機關所發行者，正與公債社債及國庫券流通券軍用票等略同）人民發行額，至多以財產價值或工作收入十分之一爲限（按此係大概標準，可以略有出入）其三每券通用十二個月，發行人至期滿時，以同額之券，繳還於原發行局，免除兌現手續，（按此與商家之撥兌抵銷，及外國手形交換相同，不過政府管理其撥抵手續而已，繳還即與已往兌現無異）其繳還之券，不必拘於本人所發行，亦不必拘於本局所發行，無論何人及何局發行者均可。持券人遇期滿之券，亦可向所在地之管理局，兌換未滿期之券。（按如此則無論何人所發行之券，均可流通全國）其方法之要點已盡於此。至於詳細辦法，特擬訂國幣代用券條例草案，國幣代用券發行局條例草案。國幣代用券發行局保證委員會條例草案三種。）

（附註）所有括號內之按語，均係原作者自加。

中國是一個世界無比的窮國，據張公權氏估計全國只有二十二萬萬現貨，照劉先生的辦法實行起來，「政府及地方公益機關發行額至多以歲入十分之五爲限，」「人民發行額至多以財產價值或工作收入十分之一爲限，」那末全國公私機關及人民發行起來，頃刻之間弄出四五千萬萬元的現貨是不成問題了。由二十二萬萬元的現貨立刻增加到了有四五千萬萬元的現貨，在我們這些窮花了眼睛的老百姓看來那是何等可喜而又可驚啊。可是劉先生這種突然致富的辦法，我們覺得離開現實太遠了。本來孫中山先生的所謂「非常之方，」原是用之以應「非常之變，」在其通電中也只說「其法當設兩機關，一專司紙幣之發行，一專司紙幣之收繳，」絕對沒有規定一切公私機關，人民個人，都可自由發行。其後孫先生在廣東成立革命政府，孫先生本人也並沒有把先前錢幣革命的主張完全忘記。孫先生在執行大元帥職權時代也並不是不能實行錢幣革命，不過鑒於當時的環境，把錢幣革命另外用一個形式來實行，不可那便是中央銀行的成立了。孫先生未嘗不希望錢幣革命立刻見諸實行，但因為種種歷史條件和現實基礎所限，頑固執行一定沒有好結果，所以就只從金融制度從銀行本身組織中去進行整理。

了。

以中國產業的凋零和金融的紊亂，世界各國都因生產過剩鬧恐慌，中國却因生產不足鬧飢寒，在這種基礎上，外國的通貨膨脹政策（並非實行錢幣革命）自可挽救困難於一時，但中國也跟着來這麼一套變相的膨脹通貨，難道是爲着替外國人推銷貨物嗎？劉先生的主張，國幣代用券政府可以發行，地方公益機關可以發行，人民私人也可以發行，這種分散的自由的發行方法所得的現貨——國幣代用券——大多數將流之於消費之途，置之於生產的將是絕對少數，試問這樣的自由主義氣味濃厚的錢幣革命對中國實際的經濟問題會有什麼幫助嗎？恐怕沒有實行劉先生方案以前的中國是金銀太少現貨枯竭，實行劉先生方案以後的中國將是金銀絕跡，一切財富也消費完了。

劉先生主張國幣代用券由政府設局管理，無論何人皆可發行，這是劉先生的方案根本將錢幣的發行脫離了現社會原有的金融機關金融組織。世界各國的先例，不論紙幣或金銀幣的發行都須借手於社會的金融組織。現在劉先生於社會原有金融組織金融機關之外，另行成立

發行機關，另行成立一種國幣代用券的流通組織，請問這是合於經濟原理，是可以施之於事實的嗎？

其次保證委員會的制度，施之於固定的契約或一般債務關係，執行上尙不免時有流弊，抑且煩瑣不堪，現在更施之於流動的國幣代用券，這難道又是可以行得通的嗎？

據「國幣代用券條例草案」第二條：「發行局設總局一所，其餘分局，列爲四等。凡券額在千元以上者至一等局請領之，千元以下百元以上者至二等局請領之，百元以下十元以上者至三等局請領之，十元以下者至四等局請領之。」照劉先生這樣的組織規模，總局雖然只有一所，然而其下的一二三四等的分局却多得可怕。譬如四等局一項，夠領十元以下券額資格的恐怕就是一個普通的村鎮中也有百十來個，那是每一個村鎮中便應該有一個四等分局，推而上之，每一個大鎮市中又必有若干四等分局和一個三等分局甚至還有一個二等分局，若在大小縣城以至通商口岸中心都市，那就必至大大小小的發行局節比林立，蔚成巨觀了。中國本患消費機關太多而生產機關太少，國幣代用券的本身並不能生產一根毛，那末我們爲什麼弄那樣多

如牛毛的消費機關來加重民衆的負擔呢？

又劉先生的方案最引爲自豪的，那是發行上的保護委員會的制度。國幣券的發行是否要以任何個人來擔保，擔保是否有效，這在事實上本是一極大問題。但我們對未來的事實都不去問，先想全國四萬萬人口，每四人中有一人可領發國幣券，則全國當有一萬萬人領發國幣券；每一百發券人如須一保證委員，則全國又當有一百萬保證委員。做保證委員的人大概都須有相當的資望和能力，老實就是中國的優秀份子。中國因爲教育文化的幼稚，有資望有能力的國民實在太少了，却是劉先生爲了要發行國幣券，需要人來做保證委員，於是一百萬的優秀國民，爲着要做國幣代用券的保證工作，別的生計工作就只好放棄了。社會上有靠訴訟吃飯的律師，有靠查賬過活的會計師，劉先生的方案實行後，中國社會又將憑空添出百數十萬靠保證國幣券吃飯的保證委員了。中國的律師會計師現在最多也不過數萬人，保證委員一來便是數十萬百餘萬，「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流弊所及，也許劉先生做夢都不會想到吧？

「國幣代用券發行局保證委員會條例草案」第二十一條劉先生規定保證委員是有薪

俸的：「保證委員之薪俸，每屆保證券額期滿繳還後給發，其一等委員薪俸，按照保證額千分之五支給；二等委員之薪俸，按照保證額千分之十支給；三等委員之薪俸，按照千分之十五支給；四等委員之薪俸，按照保證額千分之二十支給。」——在中國，我們相信一定是領發十元以下或百元以下國幣券的人民佔百分之七十或八十以上，我們可以大膽地估定保證委員的平均薪俸爲保證額的百分之十五。其次我們再預計國幣券的總數，據申報年鑑載中國國富總額爲一〇六三五二百萬元，每人平均爲二二四元，按十分之一發行國幣券，則人民方面的國幣券額爲一〇六三五五百萬元，此外國家政府公益機關銀行工廠商號以及人民中以收入爲標準所發行的券額又當與上述數目相等，然則全國總發行額至少當在三百萬萬元左右。三百萬萬元的總額，照千分之十五的保證委員薪俸計算，則總計薪俸當有四萬五千萬元。保證委員們的總薪俸要四萬五千萬元，加上全國林立的各發行分局的經費，就算與保證委員們的薪水相等，（事實上是要超過的）那末兩筆數目加起來就有九萬萬元。我們屈指計算國民政府二十二年度的歲出預算，經常的六萬六千萬餘元，臨時的是二萬四千萬餘元，兩共總數還只有八萬九千萬

餘元一個政府的經費只有八萬九千萬元，劉冕執先生的國幣券經費却要九萬萬元，劉先生的方案一實行，中國的民衆無故又增加了一個政府經費的負擔，可怕哉！

劉先生製定方案的始意，我們相信他的目的，一定是爲了救濟中國民衆的疾苦，發展中國衰落的經濟，但結果分散的自由的國幣券發定方法，祇利於消費而不利於生產，對中國經濟發展前途非但無益而反有害；繁費不堪的保證委員制度非但不能使民衆享受到絲毫的經濟利益，却徒然使水深火熱中的民衆加了兩個政府經費的負擔，這樣禍國害民的錢幣革命，有何可貴呢。

四 對於焦秦爭論的意見

最近上海錢業領袖秦潤卿和中委兼立法委員焦易堂爲了劉冕執方案，用兩牘的形式在報紙新聞上大發表其意見。剛剛湊巧的是焦秦兩位先生這相反的意思，正代表了兩個不同的立場，秦先生是錢業領袖，也可以說是錢業中的帝皇，在經濟上是保有着莫大的既成勢力，焦

先生却是孫中山先生的信徒，是國民黨的中委，是立法院法制委員長，在經濟上不感痛癢，但他却熱烈的希望中國經濟有辦法，所以就飢不擇食的拚命擁護劉冕執方案了。在焦秦兩先生的本身利害及其思想途徑上說，我們真敢相信秦潤卿先生將成爲反對錢幣革命的急先鋒，而易堂先生自應始終矢忠孫中山先生錢幣革命的主張，並進而掩護劉冕執的方案。不過我們所可以深信的，革命絕不爲任何個人的私利所變易，同時一個社會的首領也絕不應以個人的私利去蒙蔽自己的思想和意識。若是爲整個民族整個國家的出路設想，如秦先生焦先生等領導羣倫的人，一定會放棄了個人私利而爲國家社會努力的。

對於焦秦爭論的意見，因爲時間所限來不及詳細盡寫，我想把下面比較重要的結論接上，就使本文暫告結束。好在錢幣革命的確是中國的一根本大問題，「將來一定會有一個足夠的磋商時期，討論的機會正多着。急就的方案既不能使錢幣革命馬上成功，盲目的反對也未必就會把錢幣革命的事實打擊下去呢。」

五 結論——中國究應怎樣實施錢幣革命

中國的錢幣革命既是勢所必行的事實，那末究將怎樣開始實施，當然是我們急須知道的。作者在前兩年曾有中國革命的經濟政策的寫作，其中第二章的「銀行政策」便整個的是以實施錢幣革命為中心的政策，作者至今仍未改變此項主張，為免重行複述起見，特轉引其末一節於下：

「對於一個新制度的產生，我們絕不能認為是一紙命令或幾句空話所能成功。尤其貨幣問題是經濟方面的任務，完全建築在物質的基礎上，決非政治權力所可一手包辦，更非單純的政治權力所能支配。貨幣是經濟方面的東西，經濟方面的東西自然非用經濟的權力去支配不可。直接用政治權力去支配貨幣，社會徒然惹起紛擾，結果一無所成。雖然貨幣是政治性的經濟產物，但我們相信在政治未握有充分的經濟權力以前，政治萬萬沒有權力去干涉或支配經濟。中國幣制的混亂和幼稚是有目共睹老幼咸知的事實，國民政府對此也未嘗不想改革，但終以

國民政府的經濟權力太薄弱，雖欲加以支配，干涉，改革，而事實上不可能啊。

既不能直接用政治權力去支配而改革貨幣制度，那末用什麼方法實現信用貨幣制度呢？關於這個，我們仍得從貨幣本身的歷史和中國的經濟現狀去檢討。最初的貨幣只用作交換工具，在原始經濟時代，在封建經濟時代，貨幣唯一重要的作用是作交換工具，作爲調劑生產與消費的經濟紐帶，待轉入商品經濟時代，轉入現代的金融經濟時代，則貨幣兼任做生產資本了。在前一時期，貨幣只是消費資本，在後一時期，貨幣兼作生產資本了。社會經濟愈進步，社會的財富愈增高，貨幣的任務便愈擴大，其數量的需要也愈澎漲了。社會的貨財價值超過貨幣價值幾十倍以至幾千百倍以上，社會感覺貨幣的缺乏，經濟不便流通，便自然而然的出現了信用制度，如借貸，抵押，賒欠，期票等等，這些信用制度都是因爲貨幣不足而出現的。隨着信用制度的出現，社會便跟着成立了許多特別的經濟機關如當舖，錢莊，銀行等類。當舖，錢莊，銀行不是生產機關，也不是商品運輸或分配機關，更不是什麼國家的政治機關或教育機關，而是一種調劑金融的信用機關。我們如說國家的政府組織是政治權力所寄託的機關，那末這些當舖錢莊銀行的信用

組織便是經濟權力所寄託的機關了，剛纔說政治權力不能直接干涉改革幣制現在發現了這些有經濟權力的信用機關，對於解決貨幣問題便有了線索了。

當舖是農工小商人的信用機關，錢莊是小中資本家及地主的信用機關，銀行則是大資本家及金融資本家的信用機關，中國這三種信用機關，錢莊銀行處於互相抗衡的地位，當舖只是一種從屬的信用機關而已，當舖對下雖有力量各自去支配一部分農工小商人，但在整個的經濟權力上講，則當舖的權力却是很微弱，必須依附於銀行或錢莊。

錢莊至今還能和銀行抗衡，這很明顯的證明了中國的封建經濟還自有其根深蒂固的基礎。錢莊放款的利息並不低，再經過兩與元的往返折合，簡直與高利貸者差不多，但一般中小企業者因資本短少，除向錢莊告貸外實無他法。錢莊放款的利息既高，其吸收存款的利息自然也就比較的高，因之錢莊在營業上仍舊可與銀行有競存的餘地。許多銀行垂涎而要沾染高利貸的利益，還與錢莊暗中聯合呢。

中國的銀行制度現在還極幼稚，雖有政治上及經營上的各種便利，如特許發行紙幣經營

債券等等，但終因客觀條件的產業落後和其主觀條件的組織不普及與資力薄弱的關係，還未能形成巨大的經濟權力。在國際間不能與各外國銀行競爭，在國內也不能和錢莊銀號競爭，在生產上更說不到什麼集中管理或支配的話了。本來銀行的基礎完全建築在信用制度上，銀行離開信用便一天都不能立足，非馬上倒閉不可。可是中國的信用制度並沒有完全為銀行所利用，第一因為不平等條約的壓迫，外商運用可怕的鉅大的資本在中國開設銀行，一方面吸收了多量的存款，一方面又發出多量的外國紙票，差不多把中國的信用制度利用了十分之五以上；第二因為國內經濟的封建勢力的殘留，高利貸的錢莊當舖仍佔優勢；第三因為政治混亂，軍閥橫行，產業衰落，交通阻塞，銀行事業更在在遇着障礙；所以現在中國的銀行所能運用的信用力量，非但不到十分之一，也許還不到百分之一呢。中國的銀行如能夠充分地運用信用的力量，那末牠的經濟權力毫無問題的可以統御全國，並在國際間佔得重要的地位。

要改革貨幣制度，必須有統一而強大的經濟權力，有了一個統一而強大的經濟權力的機關，那末由這個機關去實行改革的計劃，國家制定貨幣的法律，從旁用政治權力去幫助，改革幣

制便很容易實現了。中國現在這樣的經濟權力的機關還沒有，錢莊當舖是行將沒落的東西，銀行則都很幼稚，如要創造這樣的統一而強大的經濟權力機關，並且要這機關將來不違背民衆的利益而常常受着國家和民意的支配，須從整理現存各銀行及各信用機關入手：

A 用科學的合理化的方法，在政府管理監督之下，實行銀行統一政策；

B 設立普遍全國的銀行網；

C 確立信用制度，實行信用貨幣制度；

D 銀行管理並監督交通運輸生產及分配機關，實行國家在社會經濟及發展生產方面的任務，並助理國家財政事業及公共事業。

上述四項，都是決定銀行政策所不可缺少的骨幹，缺少了任何一項，銀行就不能成爲社會的經濟權力的機關，就不能充分的調劑金融發展生產了。現在再逐項加以補充，說明於下：

A 用科學的合理化的方法，在政府管理監督之下，實行銀行統一政策。調劑金融，這原是關係整個社會利害的事業，像交通事業的郵電鐵路一樣，照理是應由國家專營的。但因爲

習慣的關係，現在各國除蘇俄外，銀行都准許人民私營，中國是產業後起的國家，對於銀行許人民私營的事當然也不能例外。可是銀行由私人經營，有兩個最大的弊病：第一，私人經營的目的專於牟利，很少適應社會的需要；第二，私人經營，必然造成多頭競爭的無政府的狀態，同一事業分割着許多機關（上海有銀行錢莊二百家）執行，徒然多費開支。一九三〇年世界經濟恐慌出現，美國銀行經不起打擊而倒閉的有二千餘家，最近美國經濟恐慌，全國銀行都奉命暫行停業。上海近年來頗盛行銀行熱，銀行銀公司風起雲湧的成立起來，這投機潮遲早總要引起大混亂。爲銀行本身的前途打算，爲中國的社會經濟打算，中國的銀行必須實行合理化，歸併各錢莊銀號銀公司及銀行爲一個大銀行，實行統一銀行組織，成立一個總行，這大銀行便作爲國家銀行，將現有各銀行各銀號一律作爲國家銀行的分行。國家銀行除規定由國家撥入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的股本外，其餘均由人民投資，但銀行業務所得的純益，須以國家爲主體。人民的股份除支付官息外，紅利規定以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二爲限，多餘的純利即作爲國家的收入或擴充爲國家在銀行中的股本。國家銀行的董事十分之二或三由政府委派銀行專家及經濟學專

充任外，其餘當然由股東會選出。中國成立統一的國家銀行，如按照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需要，其股本至少須五十萬萬元；五十萬萬元的股本或有人驚為太大，擔憂集合不起來，其實中國雖窮，祇歸併各銀行莊號的股本，也許就已經超過此數了。中國有此雄厚資力，對內既可充分的力量調劑金融發展生產，對外也可以免強和帝國主義的金融勢力抗禦了。

B 設立普遍全國的銀行網 銀行是調劑社會經濟的金融機關，牠的工作是便利人類的經濟生活，那末為社會人羣的福利計，為銀行業務的發展計，銀行必須隨着人類足跡所達到的地方設立分事務所。中國在目前，因為政治混亂關係，銀行幾乎完全集中在上海，廣州，天津，這幾個地方，此外如新疆，青海，西藏，蒙古等省簡直就和外國的荒島一樣，一個銀行都沒有。試想，銀行是經濟的中心機關，沒有銀行的地方，產業會發達嗎？英國是資本主義較老的國家，英國銀行的分行數目在一九一〇年就有七千一百五十一個，現在當然更多了。中國的人口比英國多幾十倍，土地也大幾十倍，那末分行的數目至少也要和英國相等。中國有二千多縣城，加上各重要市鎮及通商口岸，國家銀行設立銀行網，成立五千個分行實是最低限度的數目。中國現在內

地人口過庶急欲移民邊疆，對於邊疆各地的銀行網就更爲重要，因爲資本的足跡所到的地方，人口總是隨着湧過去的。淺見的銀行家常以爲荒疆無利可圖，殊不知把荒疆變成熟土，獲利纔真大得無可計算。香港是個人烟絕跡的荒島，但英帝國主義把香港開闢成熟土，把香港變成繁華的市場，誰能計算得清英國人在香港所得的利益呢？銀行在人口庶密的地方所獲得的只是蠅頭微利，在亘荒絕域的地方纔能獲得無限的寶藏。所以中國國家銀行不設立銀行網則已，如欲設立銀行網，則設立邊疆的分行，是不可忽略的。又全國設立五千個分行，驟然看去似乎驚其太多而不易成功，但事實上把各地錢莊歸併起來，決常超過此數，國家銀行除添設若干邊疆的分行外，在內地只要把各錢莊銀號改造一下就好了。

C 確立信用制度，實行信用貨幣制度 銀行的基礎是信用，最要的任务便是調劑金融，發展生產，作支付的中人，把不活動的貨幣資本變爲活動的貨幣資本，把不活動的生產條件（勞力，土地，原料）變爲活動的生產條件，使社會上一切無價值的東西變爲有價值的東西，不生產的東西變爲生產的東西。銀行的機能是很偉大的，但視我們巧妙地運用而已。中國號稱窮

乏的國家，國富總數三八，二八九百萬元，每人平均不到百元，是世界上最枯窘的國家，連英國的殖民地印度（一三八元）都比不上。如能確立信用制度，使國家銀行得盡量發揮其機能，國民經濟得盡量發展，那末不要幾年，中國的國富一定能上升幾倍。中國確立信用制度的辦法，在國家方面是清理債券，確定預算，劃一稅制，在人民方面是消滅高利貸，國家銀行設立普遍的低利的當舖，厲行生產合作消費合作。不過，確立信用制度要點在於國家銀行，國家銀行根本的信用機能又在發行紙幣。中國要驟然完全用紙幣去流通市面，取締一切的現金，驟然實行信用貨幣制度，那顯然是不可能的。中國國家銀行要實行信用貨幣制度，第一步是確定十進位（照數學原理，則十二進位就更好。）分，角，元，「孫」的幣制，取消「兩」及其他小洋銅元等雜幣的流通。這事件的實行是，一方面由國家制定公佈幣制的法律，銀行則依社會的需要發行一分的銅幣，一角一元的銀幣，「孫」五「孫」十「孫」的金幣，和五分一角五角一元五元一「孫」五「孫」及十「孫」的紙幣。金銀銅幣及紙幣的印造，當然由銀行自己去執行，政府和人民祇有監督的權限。幣制統一以後，待社會行使便利而成立了堅強的基礎，那時再由國家改訂貨幣的

法律取消金屬貨幣，行使紙幣，而實行信用貨幣制度，便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了。

D 銀行管理並監督交通運輸生產及分配機關，執行國家在社會經濟及發展生產方面的任務，並助理國家財政事業及公共事業。社會是由兩種組織的交互錯綜而構造成功的，一種是政治組織，一種是經濟組織，前者如教育機關倫理機關公安機關而國家爲其總樞紐，後者如生產機關運輸機關分配機關而銀行爲其總樞紐。政治組織是着重於人類精神生活方面的組織，經濟組織則是着重於人類物質生活方面的組織，社會的這兩個組織是交相爲用，並行不背的。國家的組織須有政治基礎，同時也須有經濟基礎，但歷來的國家都有一種錯誤傾向，就是專重政治而把經濟忽略了，作社會運動的人因憤於人類物質生活的沒有保障，遷怒於國家，無政府主義者根本主張不要國家，共產主義者則主張國家逐漸衰落而死亡，其實這都錯誤了，人類的經濟組織政治組織只有愈趨愈嚴密，而國家的基礎也是愈趨愈鞏固的，除非地球消燬了，國家的組織纔不得不消滅。中國革命無疑義的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那末中國的國家無疑義的便須兼負起社會經濟方面的任務，走上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中國現在的國家驟然要管理

社會的經濟組織，顯然不可能，如用政治權力去强行干涉經濟事務，也徒然惹起騷擾，無補於事，但用銀行去管理經濟事務，用銀行去管理各種經濟機關，那却是輕便簡捷的道路。一切經濟事務都需要資本，銀行正是資本的淵源，一切經濟機關逃不了金融的支配，銀行正是金融的中心機關。銀行自有歷史以來，就無時不在管理並監督社會經濟組織的地位上了。最明顯的例子，是歐美各金融資本主義的國家，政府並沒有授與銀行管理社會經濟機關的權力，但事實上少數銀行巨頭已經利用其金融勢力支配着全國的生產機關了。銀行的管理社會經濟組織，就和國家的管理社會政治組織一樣，已成爲不可逃避的事實。同時，銀行與生產也是相依爲命的，銀行離了生產便不能發揮機能，便不能生存；生產沒有銀行，便不能發展，便不能進步。中國是產業最落後的國家，要想把中國從大饑荒中救出來，自非利用銀行這個偉大的機關去發展生產不可。

近年來中國困於天災人禍，產業衰落到極點，各地都在鬧着大饑荒，於是很多的先生們羨慕蘇俄的新經濟政策，亂紛紛的三年計劃五年計劃六年計劃以至於十年計劃，簡直充滿了耳鼓，大有應接不暇之勢，可是沒有資本，這些計劃都成了畫餅充飢，紙上談兵。又有些人抄襲了孫

中山先生經濟主張的後半段——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要大借外債來發展生產。可是這夢想的不能實現，就如天上美麗的繁星不能移植到地上來一樣，永遠是個夢想，永遠救不得中國！

我們對於錢幣革命，主張在如上所述的A B C D的四項方法去求得實現。蓋錢幣革命，絕不能像劉冕執先生的方案那樣可以脫離一切現實社會的經濟關係，而孤獨地執行起來。尤其不能擅行脫離銀行組織的關係，脫離了社會現存的金融機關；否則錢幣革命非但沒有獲得成功的希望，根本上就是一個無法動手的空想去義。

劉先生在「國幣代用券暫行條例草案說明書」中恣意發揮着忽視銀行的作用的言辭，說：「銀行之在今日，已成強弩之末。况吾國銀行，本無一定之組織，既不採英法日意之中央銀行制度，復不採美國之國民銀行制度。其準備之不依法則，尤屬駭人聽聞。今即欲改革而籌設最完善之銀行，於事實上亦有最大之難關，甚難補救。蓋銀行必須發券，發券必須準備，準備必須現金，固非可全恃保證為準備者也。」

我們真不知劉先生是什麼見解，爲什麼中國一定不能採用中央銀行制度？爲什麼銀行發券的準備一定要現金？爲什麼像劉先生那樣的國幣代用券不能由銀行去發行，而一定要節外生枝，寧可耗費了九萬萬元的民衆的血汗去製造遍國林立的發行局，弄出多如牛毛的保證委員呢？這裏，我們相信劉先生非但忽略了銀行組織金融組織的作用，甚至連一點普通的社會經濟的現象都沒有注意到。歷史上錢幣制度的產生，根本上是爲了便利消費，聯絡生產和節省浪費的三個作用，錢幣是靠着社會經濟的存在而存在，靠着社會生產的發展而發展，錢幣本身並不能有獨立存在的條件，也沒有獨立發展的可能，所以我們所主張的銀行政策，主張：

「用科學的合理化的方法，在政府管理監督之下，實行銀行統一政策；」

「設立普遍全國的銀行網；」

「確立信用制度，實行信用貨幣制度；」

「銀行管理並監督交通，運輸，生產及分配機關，實行國家在社會經濟及發展生產方面的任務，並助理國家財政事業及公共事業。」

我們這樣的主張，就是要在社會經濟的發展與生產的進步中，同時更在社會金融制度金融組織的健全成長之中，求得錢幣革命的美滿的成功。銀行政策的成功，既可以幫助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時又可以很經濟的去推行劉先生那樣的國幣代用券，這是平庸易行的方法，而且也一定是成功的方法啊。不過我們這裏的所謂方法，還只是提出了幾點原理原則，或者可說是一些極模糊的模型。至於最後到了實行的時候，所需用的什麼規例條例，什麼章程細則，什麼統籌計劃，那應該到了實行的時候再說。中央如果真有執行孫中山先生的錢幣革命的決心，不好意思再延長民衆的痛苦日子，當然會召集什麼「金融代表會議」，成立什麼「錢幣革命委員會」，那時候人多才衆，具有真實價值的章則條例自然會產生出來。若杜造了一個方案而求人必行，擲着羊肉當狗肉賣，那就不是信仰孫中山先生的主張，而老實只是給孫先生以一種污辱了。

中國的土地問題

一 目前土地問題的嚴重性

翻開中國歷史，每一次朝代的變換和社會大動亂的發生，差不多沒有一次不是從農民羣中暴發出來。從陳勝吳廣到最近太平天國的洪楊之亂，動亂的主體總是農民；同時能夠把握住當時農民的力量，他便能夠平定動亂，建立統治。

農民是決定中國政治唯一的主體，這當然是以農立國的國家應有的現象。不過農民對於

政治雖然有着主要的支配的作用，但本身却很自然地受着另一種關係的支配——農民的生命是完全寄託在土地上面的。土地決定農民的生活，農民又決定國家的政治，那末農業的中國，土地問題的急待解決，實在是一件非常緊要的事。

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對農民運動的決議案，曾說：「中國尚在農業經濟時代，農民生產佔全生產百分之九十，其人數佔百分之八十，故中國之國民革命，質言之，即是農業革命。吾黨爲鞏固國民革命之基礎，惟有首先解放農民；無論政治的或經濟的運動，均應以農民運動爲基礎。黨之政策，首先須着眼於農民本身之利益；政府之行動，亦須根據於農民利益而謀其解放。」

又孫中山先生十三年八月在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演講說：「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來參加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礎。國民黨這次改組，要加入農民運動，就是要用農民來做基礎……大家能夠擔負這個責任，聯絡一般農民，都同政府一致行動，不顧成敗利鈍，來做國家的大事業，這便是我們的基礎可以鞏固，我們的革命便可以成功。如果這種

基礎不能鞏固，我們的革命便要失敗。」

既然「中國之國民革命即是農民革命，「中國的革命須首先得到農民都來參加，才能夠成功。那末我們現在試想一想，自十六年北伐國民黨統一全國，經過大革命破壞後的中國農民得了什麼解放，得了什麼救援呢？水災，旱災，蟲災，匪災，兵災，苛捐雜稅，農民由土地所得的是微乎其微，甚至一無所得，但負擔却是一重一重的加上去，逼得賣妻鬻兒，有的挺而走險加入盜匪，搶劫綁架等案件層出不窮，這正證明了飢餓垂斃的農民除了冒生命的危險以外就沒有生路可走了。

更嚴重的如湘鄂贛各省的匪共，數千百萬的農民被不合中國實際社會的共產主義麻醉着，於是一切奸盜搶劫，殺人放火的行動都公然活躍起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部各省數萬萬民衆固因共匪的騷擾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政府却也因幾次的南昌告急長沙失陷，感受着生死存亡的威脅，雖有軍事當局的苦心應付，得免大患，然而危亡之禍，實已迫諸眉睫了。當然，在成千成萬的共匪之中，主動的百不獲一，脅從的却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可是我

們試想那廣大的農民羣衆，如不到了忍無可忍，而有一線生路可走的時候，共產主義不論怎樣美麗好聽，他們也決不肯活生生的走上死路啊。現在徼倖經過長期的圍剿，政府耗費了不可計數的兵力財力，匪共是行將掃滅了。不過我們不要以爲這次剿滅了，就可以高枕無憂，長享太平；因爲匪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剿滅了就不會再有，如果不先解決土地問題，不改善農民生計，那末農民還是無路可走，征伐雖能奏效於一時，然而日久以後，能保證這種禍害不再生長出來嗎？

中國農村所以會陷入如此破敗衰落的地步，害得廣大的農民羣衆失掉生路，而逼得爲匪作盜，加入共匪隊中，當然自有其根本的原因。現在我們試將那些杜絕農民生計的根本原因，扼要地探述出來：

第一，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與國內封建殘餘勢力的聯合進攻，前者要把中國造成最有利的商品傾銷地和原料供給地，造成模範的殖民地的農業國，最後侵略的對象自然是痛苦無告的農民了；後者則蔭蔽在帝國主義的勢力之下，取着一種趁火打劫的姿態，流氓，地痞，軍閥，土匪，

奸商，高利貸主，一個個都踏着農民的四顧「稱孤道寡」，做着好漢，種一畝地要抽上三五十種，一二百種正附稅，預徵三五十年錢糧，甚至不種鴉片要收「懶捐」，種了鴉片更要繳納比田賦大十百倍的「特餉」，這樣農民在軍閥統治之下固已左右都是死路，不是軍閥統治的地方也到處都是流氓，地痞，土匪，高利貸主，和各色各樣的賤買貴賣的奸商。重重疊疊的侵略剝削，農民有什麼辦法呢？革命的政府如果懶惰下來，智識簡單的農民除坐等餓死凍死以外，便只好挺險去做強盜土匪，或者受了共產黨的欺騙麻醉去當共匪了！

第二，中國農民的科學智識太欠缺，死守着數千年來祖傳的一點農業智識，什麼都聽天由命，不求改進，這也是中國農民陷於絕境的一個原因。一個進步的農民和一個落後的農民，他們雖使用一塊同樣的土地，但對於這塊土地的關係，從這塊土地上所得的收穫，却是遠不相同的。進步的農民因為智識豐富，技術精良，對於土地可以支配自如，一切水旱蟲災都有方法預防，收穫量却特別加多；落後的農民什麼都聽天由命，智識淺薄，技術拙劣，保持着陳舊的迷信觀念，水旱蟲災一味都去求神，不講改進，結果生產落後，生活自然痛苦不堪了。尤其是自與外國通商以

來，中國農民的一粒穀一張葉都變成了商品，商品當然要有市場有價格；中國的農民根本連耕種的智識都不完全，那些商場和經濟的智識當然更不會有了。農民沒有一點商場和經濟的智識，那末農民所得的產品即使遇到了大豐年，沒有銷場，不能賣到往常的價錢，但租稅不能不繳，償欠不能不還，這樣，荒年的農民固然不得死，豐年的農民又何嘗有好日子過呢。

第三，中國內地交通的阻塞，這也是中國農業不能發展，農民生活不能改善的一個大原因。本來在生產發達社會進步的世界，農民的生活已不應拘限於自己所佔有的土地，應該利用社會進步的工具和肥料，以幫助發展自己的耕種事業，同時也可以將收穫的盈餘去交換享樂品。再不然的話，人口庶密的地方還可以向人口稀疏的地方移殖過去，使土地得到一種自然的調劑。但是在中國呢，因為交通的阻塞，沿江沿海一帶交通便利人口庶密的地方，每年要從外國輸入一二萬萬元以上的食料品；內地却有着很多的食糧，因為產地偏遠，交通阻塞，無法運送出來，結果就只好餵牲口，甚至燒成灰炭當作肥料了。還有許多廣漠肥沃的地方，數千數萬方里的土地荒廢了無人耕種，也因為交通阻塞，無法移民，人口過庶地帶的農民除了不得已的投入都市

作乞丐苦工以外，就只好困守家園坐待死亡了。

上述那三種惡勢力的壓迫，只要有了一種，就夠使農民受累無窮，痛苦不堪。中國的農民却集世界所有的災害壓迫於一身，跌入最黑暗最悲慘的深淵。世界如果有奴隸，那中國的農民真是最低下的奴隸，世界如果有地獄，中國的農村也就是最殘酷的地獄，奴隸們最需要革命，而地獄中是最容易暴發革命的！

二 中國農村中的階級鬥爭問題

對於土地革命的問題，我們不敢說誰的觀念太淺薄了，但一般人討論到土地問題，動不動就把階級鬥爭連在一起。共產黨提起了土地問題，總是機械似的抱着一個觀念：

「平分一切的土地！」

試想，平分了一切的土地，中國的土地問題就算解決了，中國的農民就算得救了嗎？俄國新經濟政策前的土地革命早已失敗了，中國匪區平分土地的口號雖曾騙倒了一般淺見的農村

的游民流氓，但自私心比什麼都深厚的農民層，平分土地的制度實行，農業生產便驟然降跌，過去食糧豐盛大批出口的区域，變成匪區以後，就連自給的食糧都不夠了。

共產黨爲唯物的機械觀念所拘囿，一切問題都要用階級鬥爭來解決，於是談到農業革命，談到土地問題，便也必須在土地上面巧妙的構造對壘的階級，藉以發動土地革命的階級鬥爭了。可是自承與共產黨相異的思想家，以孫中山先生信徒自命的理論家，於「解救農民」「復興農村」等空洞的口號叫倦以後，提到行動和實施的辦法的時候，却又會抄上整篇整部的統計圖表和數字——正確不正確當然不問——說中國的地主有多少，一貧如洗空無所有的農民又有多少，「貧農」怎樣「需要土地」，「大地主」怎樣「是農村崩解的因素」，好像要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只要跟着共產黨來一手「平分土地」，消滅一切地主，給貧農以土地——在那些大理論家看來，一畝兩畝甚至三分五分也好——農民就一個一個都富有了，農村也一個一個都復興起來了。中國的土地問題這樣的容易解決，共產黨雖然失敗，三民主義的政府却不妨借用一點階級鬥爭的妙法到農村裏去用一用，就有意想不到的效力，這真是妙到極點了。

但是不幸極了，把階級鬭爭搬到農村中去運用，祇是形式上變換一下土地制度，用強權去侵擾一下人民的土地佔有權；並不能夠擴大農業的生產量，給農民以真實的利權，農民依然窮困，依然飢寒。所謂解放與復興的話，實在只是一個投機取巧的惡夢啊。

機械地搬弄統計數字的先生們，他們是會說（十六年武漢土地委員會報告）一畝到十畝的小農佔全國農戶的百分之四四·四五的比率，佔有的土地却不過佔着百分之六·一六；反之，百畝以上的大農，戶數只佔百分之五·三三，土地竟有百分之四三·〇〇，土地分配的不平均已到了極點，要趕快平均一下纔好。中國土地分配的確不平均，但實際的土地情形我們也不能完全不顧呢。老實說，中國沒有真正的地主，更絕對不能和帝俄的地主比擬，舊俄地主在政治上佔着地位，對農奴的摧殘壓迫剝削可以任所欲為；中國在橫徵暴斂的軍閥統治下，人民幾視土地為禍水，地主力量的貧薄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於中國土地的集中，也並不是集中於少數個人之手，而是集中於若干種團體的手裏。這些團體如宗祠、寺廟、教會——學田屯田，也可以列入——之類，在中國的數目真是難於統計，恐

怕佔着全耕種地的三分之一，實是中國唯一的地主，不過這些所謂地主。除了新起的教會對待佃戶比較苛刻，其餘如宗祠、寺廟等類的土地租給佃戶都有相當的歷史關係，租宗祠的土地的大都就是本祠的子孫，租寺廟的土地的大都就是本廟的「施主」，這中間地主與佃戶的階級關係非常抽象。革命以來中國受着世界潮流猛烈的衝激，人民的宗族觀念迷信觀念逐漸消滅，宗祠寺廟的土地已有被分散的趨勢，如政府不再下令「保護祠產」「保護廟產」這佔有全耕地三分之一的地主也許就在短時期中自然解決了。

「貧農需要土地」這句話當然是天經地義的，不單佃農僱農貧農需要土地，連那小農中農也需要着土地呢。可是他們所需要的土地，倒不是被舊俄式那樣的大地主佔着，而是不知不覺的隱藏在荒廢之中了。照專家的意見，中國的可耕地約達全國總面積的百分之五十，現在耕地面積還不及百分之二十，墾殖程度已經很低了。但這樣低的耕地面積，還在逐年減低下去，荒地一年一年增多起來，據前北京農商部的調查：

甲 耕地統計表

年份	耕地面積
民三	一、五七八、三四七、九二五畝
民四	一、四四二、三三三、六三八畝
民五	一、五〇九、九七五、四六一畝
民六	一、三六五、一八六、一〇〇畝
民七	一、三二四、四七二、一九〇畝

乙 荒地統計表

年份	荒地面積
民三	三五八、二三五、八六七畝
民四	四〇四、三六九、九四七畝
民五	三九〇、三六一、〇二一畝

民六 九二四、五八三、八九九畝
民七 八四八、九三五、七四八畝

民國十九年國民政府內政部統計司根據二十一省五百六十七縣的呈報，荒地就竟增加到了一、一七七、三四〇、二六一畝：

省名	報告縣數	荒地面積總計
江蘇	三五	一〇二五、九〇三畝
浙江	三五	一五六、八一九畝
福建	一四	一六、七七 畝
安徽	三七	五四〇、五四八畝
江西	四二	二二三、四七七畝
湖北	九	一、〇二七、〇六四畝
湖南	八	三九四、三一三畝

遼東	一四	四、六九四、八六四畝
貴州	八	一三、三〇五畝
山東	六五	九、一一八、六一〇畝
山西	一〇五	九、八六二、八五八畝
河南	七二	三三一、七七七畝
河北	六	三、〇八七、二四〇畝
遼寧	六	一五、五一八、九五三畝
吉林	二七	一九、九五四、四九〇畝
黑龍江	五三	五七七、五八〇、〇〇〇畝
新疆	六	六、七八二畝
熱河	四	九、七四六、〇〇〇畝
察哈爾	四	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畝

西康 八 四五六、六六一畝

綏遠 九 三、一六三、八三六畝

總計 五六七 一、一七七、三四〇、二六一畝

中國荒地不完全的統計起來，已達到十二萬萬畝的數目，要是全數都統計進去，恐怕和耕地相等了。將來如能採用科學的耕種方法，發展水利和林墾，則可供耕種的土地至少還有兩倍以上。

我們現在認明了農村土地的情形，中國由土地佔有權上所顯出的階級分界是那樣的模糊，而荒廢的土地又是那樣的廣大，就知道中國農村的枯窘破敗自有歷史的原因，決非機械地發動階級鬥爭所能解決的。由土地關係所發生的階級鬥爭，祇能擾亂農村原有的生產秩序，使農村更陷於破敗的境地，絕不能使農民生計得到一點解決，使農村顯出絲毫復興的氣象。

三 厲行協作制度與改進農業技術

我們如明瞭了中國土地問題的癥結所在：第一是帝國主義經濟勢力與封建殘餘勢力的聯合進攻，第二是農民科學智識的欠缺，第三是內地交通的阻塞，那末我們就知道中國目前的土地問題，最急切的任務不是與地主鬥爭，也不是與富農鬥爭，而老實是與自然鬥爭，與帝國主義鬥爭，與軍閥、土匪、奸商、高利貸主鬥爭。中國的農民如不能戰勝自然，戰勝帝國主義，戰勝軍閥、土匪、奸商和高利貸主，即使分給了土地，在嚴重的水旱蟲災之下，固然籽粒無收；在軍閥與土匪的轟擊搶掠燒殺之下，也會有家歸不得，有地不能耕；徼倖遇到了大豐年，但稻、麥、絲、茶在賤買貴賣的奸商侵蝕之下，在帝國主義經濟的壟斷之下，還不夠償還債欠的什一。這樣，無地農民固然無路可走，有地農民的生活也未嘗有所保障啊！

目前中國農民革命的對象既是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勢力，科學智識的欠缺以及內地交通的阻塞，那末真正能夠有力量復興農村，解除農民痛苦就只有兩條路：第一是厲行協作制度，第二是改進農業技術。實行這兩個辦法，農民纔能夠造成力量，用以抗禦自然，抗禦帝國主義，抗禦封建殘餘勢力。

把問題分辨得更簡單明瞭些，則我們可以說中國土地問題最急切的任務乃是整理與經營。這個經營與整理的任務，如交通、水利、植林等重要工作，革命的政府自然要盡極大的努力，邊遠的荒地，農民在開始的時候一定都觀望不進，政府便應該自己去開闢農場積極經營。又如農產品的推銷，——尤其叫向國外的推銷——改良等等，農民自身也沒有這種力量，聽任商人自由經營則危險很大，這也應該由政府負統制管理以及經營的責任。

土地的經營與整理，政府要竭力盡監督與輔助的責任，但主體終還是農民自己。可是我們早就說過了，一般散沙的衰弱的中國農民，掙扎眼前的生命已經力不暇給，如何還談得到經營整理的話，這就非厲行農村協作制度不可了。譬如在某一個農區或農村中，種植稻麥蠶桑已經沒有利益，而要改營別種如烟草棉花茶葉或其他工業原料品，個別的枯窘的農民一定無力舉辦，全區全村的農民聯合起來協力經營，更得到政府或其他機關——如銀行——的幫助，就很容易舉辦了。又譬如改進農業上的某種技術或工具，藉以節省成本增加產量，個別的農民也往往無法舉辦，協力聯合起來便輕而易舉了。

中國的協作事業，尤其是農村協作事業，因為文化程度低，民衆智識淺，所以到現在還是一點基礎沒有。雖然自國民黨統一全國以後，政府對於協作事業的提倡指導不遺餘力，各省各縣成立了不少的合作社，不過能夠切實生效的寥寥無幾，大都有名無實，能夠粗具形式已經不容易了。破敗衰落到極點的中國農村，需要的是能夠切切實實在農業經濟上發揮協作力量改進農民生活的合作社，却不需要那些有名無實有形式無實際的合作社做累贅的點綴品，這樣的點綴品對政府並沒有什麼光榮，祇在農民的頭腦中種下深刻的反感。

協作運動的沒有成績，農民智識的欠缺固有關係，主要的原因還在於沒有全盤的計劃和嚴厲的策動。政府視協作運動爲民間的私人事業，甚至視爲慈善事業，由若干社會公團名流去做。協作的目的要推進社會經濟，改善農民生計，策動的力量却只是一些公團名流的各自爲戰，地方政府的指揮輔助，真是所望太奢而所費太輕了。世界協作運動的先例，英美法德荷蘭瑞典等國因爲經濟發達民智進步，又有長久的歷史基礎，雖然仍視爲民間事業，還能夠對社會經濟發生相當的良好作用。革命後的蘇俄就完全不同，合作社的組織已經全國造成一個整體，政府

對於合作社也差不多視爲自身的重要責任，合作社的各種金融、運輸、營業問題，政府都有極週詳極完密的輔助和保護。中國經濟落後民智低劣，協作事業的推行當然不能比擬英美，若由國民黨專政的政體看來，則與蘇俄的性質很近；協作運動當然應該取法蘇俄的當然，我們這裏所說的取法蘇俄並不就是機械地去模倣蘇俄，不過在大體的規模上以及政府對待合作社的態度上看來，中國應該猛然覺醒而急起直追啊！

並且蘇俄的協作運動因爲政制的不同，共產黨政府不過用以調整國民經濟藉爲國家經濟造成安全的基礎。中國的政體則與蘇俄完全不同，非但目前解決土地問題復興農村經濟必須厲行協作制度，而「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等等的實行，也急切地需要民衆協作的經濟組織的幫助呢。中國能夠厲行協作制度，非但土地的經營整理問題可以得到迅速美滿的成功，就是所謂移民墾荒振興實業，使農業的國家漸進而爲工業的國家，也可以有着確實的把握呢。

四 從平均地權到理想的土地制度

農村協作制度的厲行，目的無非是用合理的手段復興全國破敗的農村，造成國民經濟的一個強韌普遍的基礎組織。中國厲行了農村協作制度，首先將發生兩個偉大的作用，第一是發展了農村經濟，第二是使全國的經濟造成一個最下層的組織的聯繫。不過這祇是農村中一個經濟上的活動發展和組織的要素，牠本身並不就是土地革命，中國的土地革命，最正確的方策當然還是孫中山先生所親手規定的「平均地權」。關於「平均地權」的問題，孫先生曾經有過不少的解釋，現在將重要一些的話引證於下：

「中國今日民窮財盡，所患在貧；而各國之所患在不均。以予觀之，貧富問題，卽分配不均問題。欲謀救貧之法，同時須先將不均問題詳加研究。故民生主義必不容緩，否則三十年後，產出多數資本家，其害殊非淺鮮。第就吾國現勢而論，此民生主義爲預防政策，但須研究對於將來之資本家加以如何之限制，尙不必遽學各國須資本家悉數掃除。因吾國尙鮮大富豪，將來縱或有之，果使先事預防，其弊亦不如歐美之甚。預防之法維何？依余所見，不外土地問題與資本問題，對於土地問題，宜先平均地權。此與中國古時之井田同其意而異其法，

法之大要有二：一爲照價納稅，一爲照價收買。（軍人精神教育第三課）

『由土地問題所生的弊病，歐美還沒有完善的方法來解決。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要趁現在的時候，如果要等工商業發達以後，更是沒有方法可以解決。中國現在受歐美的影響，工商大變動，不但大家貧富不齊，就是同時有土地的人，也生出不齊，比方甲有一畝地在上海黃浦灘，乙有一畝地在上海鄉下，乙的土地如果是自己耕種，或者每年可以得一二十元。如果租與別人，最多不過得五元十元。但是甲在上海（黃浦灘）的土地，每畝可租得一萬幾千元。由此便可見上海的土地可以得到幾千倍，鄉下的土地只能夠得一倍。同是一畝地，便生出這樣的不平。我們國民黨的民生主義目的，就是要把社會上的財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也就是共產主義。不過辦法各有不同。我們頭一個辦法是解決土地問題。解決土地問題的辦法，各國不同。而且各國有很多繁雜的地方。現在我們所用的辦法是很簡單容易的，這個辦法就是平均地權。（民生主義第二講）

孫中山先生說中國患貧，非患不均，現在看了普遍的農村破產的情形，便確切的得到了一

個證明。厲行協作制度能夠整頓並發展農村經濟，但我們如專門注意於農業生產方面的整頓與發展，貧富問題不先事預防，致將來「產出多數資本家，」反而做着革命的大害。所以於農村經濟的開始發展之前，同時就應當實施「平均地權。」平均地權的意義及實施步驟，中國國民黨黨員訓練大綱中說得很明白：

「對於最終目的土地公有入手的辦法，在第一步是打破現在土地分配不平的制度，而主張平均地權，由政府規定地價，其辦法由地主自己報價，政府則按價徵稅。地主以多報少，政府則照價收買，如以少報多，政府照價抽稅。自報價之後。若土地因政治的改良社會的進步而增加地價，則其利益即歸公有，以預防土地為少數地主壟斷的種種弊端。第二步實行耕者有其田。第三步實行土地國有，以達到人民共享土地所生一切利益的理想。」

從平均地權的「照價收買照價抽稅，」進到「耕者有其田，」更進而到人民共享土地一切利益的「土地國有」的理想，很明白的表示了「平均地權」便是達到理想的土地制度的一條平坦大道，同時也表示了「平均地權」是中國土地革命的最正確最平穩的辦法。「平均

地權」不像蘇俄那樣獎勵懶惰的暴民，也不像英美那樣的偏袒大資本家和大地主，實是最公平最穩當的土地革命，也可說是最理想的土地制度。

中國的土地制度，在歷史上就比較的合乎理想，不像歐美國家那樣在土地上面也會形成嚴重的階級對立來。所以孫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權政策，並不是從什麼外國搬來的，而是依照着中國土地制度的歷史規定出來的。

中國土地制度的歷史，雖然變遷繁多，情形複雜，但從制度上分析起來，可有下列的五種：

第一是井田制度，井田制度是中國比較有史可攷的最早的土地制度。周代的井田，土地為全國所公有，平均分配給各家耕種。一個井字形的田莊，中間的一區是公田，大家共同的種而歸公家收穫，人民不要再納任何捐稅；週圍的八區便分給八家耕種。人民都有使用土地的權利，但所有權屬於國家，不能自由處置或私相接受。人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無顧慮，快樂度日，這真是中國土地制度的黃金時代。

第二是王田制度。周末井田漸趨破壞，商鞅佐秦，許人民自由買賣田宅，政府不再負授田責

任，井田制度便完全消滅了。土地許人民自由買賣兼併，結果使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幾無立錫。漢沿秦制，兼併強霸之風更甚，王莽毅然想恢復井田的精神，收全國土地爲「王田」，禁民買賣，規定每家八口田佔不得過一井九百畝，餘田分給鄉黨九族。

第三是均田制度。王莽想以王田制度來恢復井田的精神，但結果很快的失敗了。後來從北魏到唐初，土地私有制度才又受了打擊，而有均田制度出現。均田制度是一種計口授田的制度；政府授田，人民都有耕種土地的權利。不過中唐以後，人口繁殖甚密，土地不足，均田制度又破壞了。

第四是官田制度，到了南宋時代，土地情形日漸複雜，學田，義田，職田，官田等等名目不一。所謂「官田」是國家將所有屬於公家及沒收來的土地，設立「官莊」「官田」「募民耕種，或租給農民去耕種。但私有土地則仍舊存在着。

第五是限田制度。限田制度是中國土地最後的一種辦法，井田均田都已破壞，又沒有一個比較能使人滿意的土地制度出來，於是元明清諸代就有限田的倡議，限制人民私有土地不得

超過一定的數量，超過的田應即分贈或出賣，否則政府要來沒收。不過這終祇是一個理論，提倡的人雖然很多，政府只是因襲舊制，並沒有切實施行。

中國土地自從「井田」「均田」「破壤」「王田」「官田」都無成效，「限田」又未能切實施行，於是千餘年來嚴重的土地問題就一直無法解決了。直到孫中山先生提出「平均地權」的辦法來，國民黨又掌握了全國的政權，千餘年糾紛難解的土地問題這纔走上一條解決的新途徑了。平均地權的方法，在實行上不涉一點空想，在內容上則兼有「官田」「限田」種種的長處，將來實行成功以後，我們相信世界上最合乎理想的土地制度一定會在中國出現啊！理想的土地制度，井田制度便是一個最好的先例，但我們如要把名詞規定得漂亮時髦一點，那末就說牠是社會主義土地制度也無不可。不過我們應該尊重現實，努力實際，未來的事實用不着先事誇耀呢。

社會主義的現實

——社會主義月刊發刊宣言——

一 歷史

社會主義這一名詞出現於一八三〇年間，在十九世紀末期的歐洲成爲盛極一時的運動。當時，聖西門，傅利葉，歐文各派的社會主義思想，正如雨後春筍，澎湃了全歐洲的現實社會。各派都以社會主義相號召，於是聖西門派，傅利葉派，歐文派等各式各樣的新村運動也就在這時候

社會主義的現實

出現了。

社會主義的名詞雖然在一八三〇年間纔出現，但這一思想的内容却遠在數千年前就已經有了端倪。柏拉圖的共和國，孔子在禮記中所記載的「大同」思想，這些都可說是社會主義思想的最早的模型。其後如陶淵明的桃花源，穆爾的烏托邦，康帕內拉的太陽國，培根的新西世界，哈林頓的大洋國，莫勒里的巴細利亞德，這些理想社會的描寫，可以說都是社會主義思想的作品。不過這種理想社會的追求，祇是一些空想的藝術家的抽象的創造，他們都沒有想到要從醜惡的現實中去創造出美滿的理想社會來，這種思想我們如一定要用社會主義的命名，那末可以稱牠爲「文學的社會主義」。孔子的「大同」思想和老子「無爲無爭」思想，也是合於社會主義的内容的，我們可以稱牠爲「哲學的社會主義」。聖西門，傅利葉，歐文各派的新村運動，便是上述「哲學的社會主義」和「文學的社會主義」的現實化，使社會主義從純然空想的階段，發展爲接近現實的階段。

可是在各種「哲學的社會主義」和「文學的社會主義」之前，還有一種社會主義的思想

想，這便是各派宗教家的社會主義了。耶穌教和回教，於現實的痛苦社會以外，另有一個快樂的美滿的天堂，佛教則於惡濁的人間世界以外，另有一個清淨的西方極樂世界。這些所謂天堂，所謂極樂世界，也可說是社會主義的典型社會。

耶教，回教，佛教，都以信仰一種神爲達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手段，只要人們信心堅定，人們準能進入那美滿快樂的天堂，進入那清淨的極樂世界。文學家與哲學家是比較宗教家進步了，他們從「神」的本位改向「神化的人」的本位，把迷信的心理改爲鑑賞的心理，用藝術手段創造出共和國和烏托邦等等的理想社會，把寄託在神身上的社會主義現實化了。

社會主義在名詞上沒有重要的爭論，但牠在人類觀念中和思想上變遷的歷史，我們可以列成如下的系統——

- 第一個階段：神學的社會主義；
- 第二個階段：哲學的社會主義；
- 第三個階段：文學的社會主義；

第四個階段：形式的社會主義；

第五個階段：科學的社會主義；

宗教的出現，耶穌教，佛教，回教，回教的成立，雖然在柏拉圖與孔子之後，（中國道教的發源始祖老子，則與孔子同時，甚或較早。）但人類的迷信神（拜神）與迷信物（拜物）實早於任何哲學與文學之前。人類迷信的開始，正是人類文化的開始；拜物教的圖騰社會，我們雖然不能知道牠確實的發生的年代，但我們知道牠至少要比封建的哲學社會與文學社會早數百年甚至數千年呢。

科學是最後出現的東西。哲學從神學中產生出來，科學則又從哲學中產生出來，所以我們依着人類思想與學術變遷的形跡來排列社會主義的發生和變遷的歷史，神學的社會主義應該冠在最前，而科學的社會主義則要殿在最後了。

二 理論

在宗教時代，人們相信美滿的社會主義社會要於另一個世界，要於神的世界中求得。至於人的世界，人們都相信牠是個惡濁世界，那種美滿的社會主義社會決不能實現，人們也不希望牠實現，這是神學的社會主義的理論。

在哲學時代，人們相信社會主義社會在人的世界也可以有，不過那種人與普通的人不同。可是這種社會主義的完人究竟在什麼地方却成了一個謎。有的說人類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只剩下一些「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人類；有的則說這種「完人」是有的，不過不和我們居在一起，他們早已離開我們這惡濁世界，逃到什麼「山」什麼「洞」去了。

在文學時代，人們把哲學的思想弄得更具體更美妙起來，把現實淨化着，藝術地描摹着，將哲學上的「黃金時代」或「別有洞天」說得栩栩如生，一若確有其事。

在形式時代，人們就真想來試一試了。聖西門傅利葉歐文各派的人都努力新村運動，想創立一個文學上的「別有洞天」的美滿社會，來與那些惡濁世界分開。在這時代以前，所有的社會主義只是口頭說說，社會主義這個東西祇隱隱約約的藏在人們的腦子裏，到了聖西門各派

的人出來，纔努力要把那些隱隱約約的東西，使牠進爲有形式有實體的東西。

形式的社會主義到了馬克斯恩格斯手裏，真是開遍了美麗的花朵。聖西門派等的孤立的形式，單獨的創造新村，馬克斯恩格斯認爲這是不可能的，除非社會到了整個的變革時期，社會主義的形式纔會普遍地互相關聯地出現於世界，那時社會主義纔能成功。這就是說明社會主義社會不能於「惡濁世界」以外去創造出來，而要在「惡濁世界」以內「辨證地」形成。

馬克斯恩格斯所合力成立的社會主義思想，世人普遍地稱爲「科學的社會主義」。可是我們如澈底的查究其內容，則我們可以相信馬克斯主義祇是把「形式的社會主義」擴大化，發展到了最高度而已。聖西門傅利葉歐文各派用新村的手段去追求社會主義的形式，而馬克斯則以唯物史觀辨證論哲學來綜合了政治與經濟的原理，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去追求社會主義的形式。聖西門派與馬克斯派所根本不同是的地方，只是新村運動的社會主義形式孤立於現實社會以外，階級鬥爭的社會主義形式則植基於現實社會以內。

以哲學（唯物史觀辨證法）的方法綜合政治與經濟等科學來決定社會主義的理論，以

階級鬥爭的手段來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看來馬克斯的社會主義一定是科學的現實的社會主義思想了；可是我們一考察實際，就發現馬克斯在理論方面已走上了宿命論的前途，在手段方面成了偏狹觀念的自殺政策。

三 宿命論的馬克斯社會主義

善良的制度，美滿的社會，這些都需要人類用自己的力量來創造的。雖了人類自己的力量，非但善良的制度和美滿的社會無從實現，就是惡劣的制度，腐敗的社會也不能存在。馬克斯忽略了人類主觀的創造力的作用，依着他的宿命論的社會進化的法則，說社會主義這一組織是歷史上必然實現的東西，好像原始部落社會成長到熟爛了，必然有封建社會出現，封建社會成長到熟爛了，必然有資本主義社會出現，資本主義社會成長到熟爛了，又必然有社會主義社會出現。這種由成長，熟爛和必然出現的唯物辨證論的邏輯，在善的方面講，「必然論」固是教士堅固其信徒的信仰心的法寶，但在惡的方面講，「必然論」就成了悲觀的宿命論。試問在所謂

「歷史的必然性」尙未成熟的地方，如目前世界各個資本主義尙未成熟而熟爛的國家，那末社會主義只好暫時與他們絕緣了。

不論在善的方面在惡的方面解釋，馬克斯這種機械的「必然論」都是走不通的。在善的方面講，馬克斯主義成了宗教的教義，勞動者對馬克斯主義只要像信仰神一樣的堅定，像信仰神一樣的至誠，勞動者就會像基督徒進天國般自然而然的走進那「神祕的必然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在惡的方面講，馬克斯主義就考實成了躲避革命的洞窟，一部份積極的勇敢的勞動者猛進着上前去流血犧牲，另一部份消極的取巧的人們（勞動者也有）則躲在一邊，靜候着「歷史的必然性」時期的到來。結果把馬克斯主義當做宗教教義的人固未求得社會主義，而那些等候着「歷史的必然性」的人更連社會主義的影子都沒有看見。

現在馬克斯主義已成了全世界社會主義思想的權威，好像中世紀歐洲的基督教一樣。馬克斯主義不單在蘇俄成立了政權，而且在全世界的勞動羣中植下了深刻的影響，在地球的每一個角落，凡太陽光照到的地方，差不多都有馬克斯的信徒。牠不單在蘇俄成了絕對的思想界

的統治權威，就是在別的反馬克斯主義政權的國家，凡所有溫和派或左傾的政治家也沒有一個敢明目張膽的反對馬克斯，甚至在無可奈何中，都要標着馬克斯的幌子作拉攏羣衆的工具。如果我們現在把一本中世紀思想權威的聖經和二十世紀思想權威的資本論同樣地陳列在一個公共場所，任人信仰，那末，毫無問題，膜拜聖經的只有一些少數衰弱無力的老夫老婦，膜拜資本論的將擁擠不堪，而且都是大多數的強壯勇敢的中年人和青年人。可是我們不要驚駭，我們如能翻讀中世紀歐洲的歷史，就知道聖經在中世紀的受人膜拜，實比現在的資本論還要熱盛幾十倍幾百倍啊。我們如知道了歐洲中世紀基督教繁榮的歷史，那末對於資本論的受人膜拜就絲毫不值得驚異。

人類意識的向上性的發展，總是自然地傾向於比較真實和高深的理論。這不是哲學問題，也不是神學問題，而是人類意識發展的問題。雖然拜物，拜神和拜人都同是利用人類的意識活動，可是神學把人類的意識引向世外去發展，而哲學又把人類的意識引向空虛中發展，終究都成了歷史上的陳跡，都隨着宿命論沒落了。在最初的時候，拜神的宗教比拜物的宗教在人類意

識的作用上是比較的高深，同時在社會活動的作用上也比較的真實，並且拜神教比拜物教有統一性和普遍性，這便是基督教在中世紀時代能夠成爲歐洲思想界絕對權威的科學基礎。我們試再用同一的方法去觀察馬克斯主義，去觀察赫格爾哲學，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見馬克斯主義與赫格爾哲學較基督教教義更具有高深的理論內容，同時在社會活動的作用上也比基督教更具有統一性，普遍性和真實性。

聖經與資本論這兩個思想，在歷史上所以能成爲絕對的權威，各有其科學的現實的基礎。我們對於歷史上的事跡，只要明瞭其基礎與構成原因，一切神祕的迷戀的心理應該掃除開去。對歷史發生神祕或迷戀，那是危險的墮沒真理脫離科學的現象。

現在我們所要注意的，便是純宿命論的拜物與拜神的宗教及其教義已被人完全放棄了，以宿命論爲基礎的唯心哲學也被人放棄了，却擁戴那回復了拜物教精神的一唯物史觀辨證法」的馬克斯主義；馬克斯用右手打倒了唯心論，又用左手把宿命論扶植了起來，所以那可怕的宿命論，現在在思想界仍佔着絕大的權威，做着社會主義現實的障礙。社會主義不離開宿命

論的鏡鑄，社會主義是永遠沒有現實的希望，縱使各時代各地域的馬克斯教徒——勞動者——不怕犧牲，前仆後繼，成千成萬甚至幾千萬幾百萬的生命犧牲下去，結果也都是白犧牲。施行階級鬥爭而可以實現社會主義，實和捨身基督而求進入天國是同樣的蠢事。迷信唯物史觀辨證法而靜候歷史的必然時期的到來，也和那在教堂中誦讀聖經求得上帝的脫苦赦罪是同樣的沒有前途，是同樣的葬身於宿命論的圈套之中。

四 階級鬥爭

馬克斯主義因被困於宿命論的圈套，便常常有喪失其革命性的危險。列寧常常說，誰要放棄階級鬥爭，誰要躲避暴動，誰便不是正確的馬克斯主義者，這不是無因的說話。放棄了行動，馬克斯主義便乾脆地只剩下一個消極的宿命論的前途，毫無意義可言了。那些無恥的取巧的智識份子，自考茨基以至於現在那些反布爾什維克的馬克斯主義者，一方面用盡種種方法緩和階級矛盾，避免暴動，一方面抄盡了馬克斯恩格斯列寧的話語，以標榜自己是真正老牌的正統

馬克斯主義者，這本是無恥，同時也是無聊。棄去了馬克斯主義的革命的一面，保存了馬克斯主義的消極的宿命論的一面，這種「真正老牌」的正統的馬克斯主義，其價值的低微和人格的喪亡，我們是可想而知的。

可是，我們不要以為馬克斯主義有了「暴動」這一針奮興劑，馬克斯的社會主義便能勝利。事實上，暴動給與社會主義的賞賜只是一個殘酷的犧牲和慘暗的破滅！歷史上暴動是從來沒有勝利過一次的，從歐洲的巴黎公社到中國的廣州公社為止，我們如不是閉着眼睛，我們總可以看到這些暴動那一次不是自己去惹起統治者的殘忍性，釀成巨大慘暗的流血犧牲，致使社會中暗滋潛長的一點社會主義的根芽，經不起一陣狂風暴雨便完全破滅了。

傅利葉歐文輩於另一個世界去創立新村，求社會主義的現實，這固然是行不通；可是馬克斯放棄了整個的社會，而要在無產階級中創立起社會主義社會，這也同樣是一條死路。社會主義是要人類共同建設的，資本主義社會到了熟爛的時期，無產階級固將不能生存，資產階級却也要同樣受着社會生活的威脅，在這整個社會秩序崩潰沒落的時期，對於社會認識得最清楚

的人提出完善的解決方法，主張社會制度的改革和社會組織的合理化，將困厄被圍的人類拔登於完善快樂的境域，這不單無產階級歡迎，就是資產階級也要默然首肯而熱心擁護的。馬克斯迷信着歷史的必然性，迷信着無產階級的偉力，毅然將社會劃成兩部分，以爲只要無產階級去消滅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就穩穩到手了。殊不知階級這個組織是最抽象的東西，牠只有利害相同的形式，而沒有密切相關的組織內容，橫梗於階級之前的有基於感情作用的民族組織，國家組織，友誼組織，家族組織；當無產階級尙未組織成力量以前，爲馬克斯宿命論所決定的「必然死亡」的「資產階級早已在防備着，遇着機會，便來一個大屠殺。這裏，我們能怪所謂資產階級的殘忍嗎？資產階級不願意迎受「死亡」——其實就是無產階級也決不願意迎受——「死亡」——不甘心坐待「死亡」在無可奈何中拚命掙扎，以宿命論的手段還施之於宿命論的主動者。每次暴動後無產階級的被慘殺，如果我們相信資產階級的暴行是出於不得已，是出於宿命論的報復，那末我們就會感覺到這種暴行的責任不應歸之於資產階級也不應歸之於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暴動也是困於宿命論的圈套不得已而發動的——我們只好把這責任

歸之於宿命論的完成者馬克斯！（宗教的宿命論定在前世與來生或在渺茫的天國，唯心哲學的宿命論建築在形式上的玄想中，至馬克斯纔將歷史上世外的與空想的宿命論推之於現實，所以我們稱馬克斯為宿命論的完成者。）

資產階級對於社會的勞績，牠的前期是推倒封建社會，牠的後期則成爲建設社會主義的一支柱石。馬克斯主張以暴動逐出資產階級，撲滅資產階級，這顯然是自損力量。當然，馬克斯主義暴動的出發點除哲學與經濟的出發點外，其主要的原則由政治上的見解。馬克斯對於國家的認識，「貨真價實」的是半無政府主義的立場。二者不同的地方只是時間上的差別，無政府主義者要於「二十四小時」內否定國家，取消政治組織，馬克斯主義者則把「二十四小時」延長爲數年或數十年。他們的否認國家，否認社會的政治組織，實異途同歸，毫無二致。

國家的成立，是應着人類社會生活的需要而出現的，統治階級雖有時利用之爲壓迫民衆的工具，但其主要的藉以維持生存的任務則在謀全體人民的利益和整個集團社會的發展。社會的政治組織與經濟組織之間，自有其相互發展的基本作用，經濟組織不能獨立存在，政治組

織也不能獨立存在。目前政治組織的腐敗，非但對經濟組織不能有發展的助力，差不多連政治組織的本身也難於維持了，可是我們不能因這暫時的變態便加以根本的否認。人類如能把國家組織恢復到合理的健全的狀態，那末政治組織對於社會的進化，對於經濟的發展，仍具有不可動搖的偉大的價值。馬克斯因其宿命論的哲學基礎，對於政治有了錯誤的認識，於是把國家的存在作為無產階級暴動的理由了。

五 蘇俄的十月革命

一般短視的人，或者會提出蘇俄的十月革命來，說十月革命是馬克斯社會主義勝利的證明。以為暴動畢竟取得了政權，宿命論畢竟現實了。事實上，這樣觀察是完全錯誤了，因為蘇俄十月革命的成功，非但不能證明馬克斯主義有現實的基礎，反而把馬克斯主義的矛盾性完全暴露出來了。由蘇俄十月革命這一歷史的事實，證實了如下的幾個馬克斯主義的矛盾：

一、推翻了唯物的宿命論——依照馬克斯唯物史觀辨證法的決定，社會主義革命的發生

和成長，首先應當出現於英德法等資本主義的先進國家，像俄國那樣生產幼稚經濟落後的國家，無產階級革命萬萬沒有發動和成功的可能。馬克斯在許多地方的言論，也說無產階級革命將在資本主義成熟了的國家「必然地」發動起來，至於經濟落後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馬克斯自己也不敢有把握地出來主張。可是經濟落後的俄國，社會主義前途的十月革命竟出于馬克斯的意外發動了，而且成功了，把宿命論的馬克斯辨證法的預言根本推翻了。

十月革命的成功，顯然不是馬克斯社會主義的成功，而只是由於列寧及其黨人的努力。列寧及其黨人在理論上雖然仍穿戴着馬克斯主義的衣帽，但在實行上則完全是以列寧主義為中心。在十月革命的前階段，列寧首先利用議會政策和和平政策建立布爾什維克在政治上的基礎，這一時期的努力，實是列寧的創造；雖然議會政策和和平政策不難在馬克斯恩格斯文獻中找得若干理論的根據，却都是極不完全的。列寧先造成布爾什維克的普遍的政治勢力，取得了在民衆意識上的政治領導權，然後以暴動的形式來獨佔全盤的政權，這種暴動與馬克斯宿命論的暴動是絕不相同的。馬克斯迷信着「歷史的必然性」，不知道社會變革的循環性與前進性，

單純的機械的，以暴動和鬥爭來號召，結果到處碰壁，不能實現。

在十月革命的前期，列甯尚不得不從馬克斯恩格斯文獻中引用若干字句以作實行上改正馬克斯主義的論據和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出發點，但到了十月革命的後期，試行馬克斯主義經過了種種困難和失敗以後，列甯不能再引證馬克斯的著作來在行動上作改正馬克斯主義的根據，在主張新經濟政策的時候，斷然喊出了「不惜犧牲一切的主義」的口號。所謂「犧牲一切的主義」當然不能是犧牲無政府主義資本主義或其他主義的，確不移的是犧牲宿命論的馬克斯主義。所以十月革命的成功，除其中暴動的一點與馬克斯主義有若干形似的地方，其前期和後期的布爾什維克的行動以及這一事實的本身，都把宿命論的馬克斯主義推翻了。當列甯喊出「我們不惜犧牲一切的主義」的時候，又顯明的把馬克斯的一切理論也推翻了。

有許多人恣口替馬克斯辯護，說列甯主義只是馬克斯主義的發展，這實在是和歷史開玩笑，用辨證法的矛來攻辯證法的盾。假如我們承認改正了宿命論的列甯主義是馬克斯主義的發展，那末我們何妨承認改正了唯心論的馬克斯主義是赫格爾主義的發展，更何妨承認由唯

神論改正爲觀念論的赫格爾主義是宗教教義的發展呢？在前期理論的列寧主義，我們承認列寧只和恩格斯考茨基同樣的只做了發展馬克斯主義的工作，在後期列寧主張了新經濟政策的列寧主義，這就不是簡單的發展的工作，而是改正的工作了。誰要不了解列寧主義與馬克斯主義的劃時代的差別，誰便不能了解列寧主義的偉大，誰便不能了解蘇俄十月革命的歷史意義！

二、打破了無產階級偉力的迷信觀念——十月革命的前期，即是蘇俄克倫斯基政權成立到十月革命發動這一階段，布爾什維克根本是依賴着資本主義的權力而存在的，若不是列寧適當的運用議會政策與和平政策，使克倫斯基無法先事防止或摧殘，否則現在漂流世界的三百餘萬的苦難白俄，何嘗不是現在誇耀世界的赤俄的榜樣！十月革命後，共產政策着着失敗，全國生產平均跌到戰前百分之二十以下。

蘇俄生產指數比較

一九一三 一九一八 一九一九 一九二〇

工業生產總結數	一〇〇	三五	二六	一八
鐵生產指數	一〇〇	一二·三	二·七	二·四
鋼生產指數	一〇〇	四二	二九	二七

附註：農業生產無從統計，但其跌落的程度當不亞於工業生產。且農民曾激烈怠工，其跌落的程度或十倍於工業，那就不及戰前生產百分之二或三了。

看了上表，我們可以明瞭馬克斯迷信無產階級偉力的失敗了。十月革命後蘇俄是依着迷信無產階級偉力的觀念去決定經濟政策的，不幸這經濟政策一開始，蘇俄的生產便只有步步降，跌到全國人民都在煎熬飢寒的待死狀態中，若不是列寧的積極主張犧牲馬克斯主義，放棄了「無產階級萬能」的觀念，則蘇俄經濟的全盤失敗更變成政治的全盤失敗，當年煊赫一時的十月革命現在怕只成爲一個悲壯的革命故事了。

三、證明了資產階級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責任——對於列寧主義的新經濟政策，資本主義學者說這是列寧對資本主義的屈服，共產主義者則說這是暫時的過渡階段——痛快些說，

是共產主義者暫時利用資產階級以作經濟建設的過渡階段，——其實這兩個說法都不是列寧主義新經濟政策的真正內容。新經濟政策的正確的解釋，在經濟上的意義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協力建設社會主義，在政治上的意義是以集團意旨與政治權力去發展社會經濟；所謂集體生產，所謂統制經濟與計劃經濟，所謂國家——社會——資本主義，這些都是在上述這兩個意義下面產生的。

蘇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性的農民協力，早於十月革命前後就開始執行了。後來土地國有政策及其他經濟法令公布施行，無產階級的排他性充分表演了出來，於是蘇俄工人與農民在經濟上便不能繼續協作，發生背道而馳的現象了。感覺敏銳和認識深入的列寧，首先發現這種無產階級（主要的是工人）與資產階級（主要的是農民）不能繼續協力的現象，便以先知者的勇敢精神，不怕被人詈為馬克斯的叛徒，毅然喊「不惜犧牲一切的主義」，號召全國同志及人民起來執行新經濟政策。我們萬萬沒有理由說新經濟政策是共產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屈服，更不能說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利用，明明白白的只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協力，

協力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新經濟政策非但是蘇俄國內工農兩階級的協力，並且還會和歐美大資本家實行協力政策，各種大實業的出租，各種工具及原料的交易和賒欠，吸收國外過剩的工程師和技術工人，這都足以證明蘇俄的協力主義，從國內擴大到了國外。現在蘇俄幾到處敲着小鑼，鼓吹「互不侵犯條約」及切實裁軍，目的便是建立國際間協力主義的初步。偏狹的人們大家會爭着喊：

「這是屈服！」

「這是利用！」

可是我們目光放遠一點，就應該喊：

「這是協力啊！」

惟其是協力，蘇俄國內的經濟努力和國外的互不侵犯條約纔有社會主義的前途。否則蘇俄一切的努力都是虛偽而可恥的。

馬克斯與列寧根本不同的地方，便是馬克斯始終固定在宿命論的圈套中，認為資產階級

始終是反動的反社會主義的東西，立志要打倒牠，寧把地球浸入血海裏，資產階級則非殺不可！
列寧在晚年則有了澈底的覺悟與勇敢的改過，認為資產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中自有其不可放棄的責任，而且非有資產階級的熱忱參加，社會主義革命便不能成功！

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恐慌開始以來，生產的不安揪動了全人類的意識，全世界的資產階級民衆如農民與大小工業資本家——中國可以黃任之史量才一派作代表，申報及生活週刊是其理論中心——都躍躍欲試的企圖負起社會主義的責任。這一現象證明協力主義的列寧主義是正確的，宿命論的馬克斯主義被打入歷史的漩渦中去了。

四、證明國家將永遠存在——關於這一證明，因為注意國家問題的人現在還很少，討論的材料因此也很少。列寧對此最具體的著作有國家與革命，但這著作在早年所完成，道地的是「發展馬克斯主義」的著作，在後期則簡直沒有具體討論過。目前證明國家將永遠存在的論點只有三個：

第一是協力主義的新經濟政策實行後，國家的善的作用充分地表演了出來。原來社會的

有政治組織與經濟組織，並不是空虛的無用的東西，也不是自然的或上帝的東西，而是人類爲着社會生活的需要從認識的領域中和歷次的試驗中創造出來的。自從蘇俄實行國家資本主義，蘇俄的政治組織對於發展經濟組織實收了意外的功用。觀於這一事實，我們敢確信政治組織是經濟組織的中心，離了政治組織，經濟組織將立即崩潰而無法存在。國家則是社會的經濟組織與政治組織的集成機關；國家消滅，政治組織便首先解體。而社會的經濟組織也就不能保持了。關於這一點，暫時還沒有事實可作證明，不過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曾極力主張社會生產發展到最高度，社會就只要保留經濟組織，不再需要政治組織和國家，我想蘇俄經過三個「五年計劃」以後，那時蘇俄的生產力至少比現在的美國高出五倍，他們的生產總算發展到最高度，總可以廢棄國家，消滅政治組織了，我們試靜俟着素稱勇敢的布爾什維克屆時將如何開始這一行動，或再來喊一聲列寧的口號：

「不惜犧牲一切的主義，繼續維持蘇俄的繁榮！」

第二是列寧派與斯大林派對托羅茨基派的爭論，列寧派與斯大林派主張在一個國家內

可以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托羅茨基派則主張在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的社會不能實現。這兩個不同的主張，無疑是托羅茨基派的主張失敗了。既然在一個國家內可以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那末就使社會主義社會實現以後，爲國際環境所逼迫，國家的組織必將仍舊保存着，以維護社會主義社會的生命。這樣說起來，社會主義的社會沒有國家的說法已經否定一半了。

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社會成立以後，世界各國必將絡繹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形成全世界全人類統一的國家。不問這種國家的形式如何，爲全人類全世界的發展前途起見，這種世界國家的組織，創造，並且永久保存下去，那是必要的。

第三是社會安定以後，人口的激烈增加將不能免。十月革命後蘇俄雖犧牲了不少人口，參加歐洲戰役也犧牲了許多很多的人口，可是現在迅速繁殖，已追及戰前的紀錄甚至超過了。生活資料與人口增加的比率，在自然中決難逃過馬爾薩斯的定律，那末實現社會主義以後，人口將迅速增加，弄得大家過生活資料不足的生活，不又是人類的災難嗎？照全地球的水陸面積，就使充分利用以後，至多可供比現在多五倍的一百萬萬人口的生活，但過此以後，人類又如何生活呢？

現在已有人憂愁地下的礦藏開採完了以後，怕沒有石油石炭等燃料了——關於這些，人們的答覆將是「科學上有不斷的新的發明。」

人們如知道科學上的發明的重要，那末問題就在這裏解決了。科學有不斷的新發明，這便要歸功到社會的形成經濟組織和政治組織，歸功到國家。宿命論的馬克思常把科學的發明歸功於資本主義，實是錯誤的觀察。資本主義不是什麼神祕的東西，只是人類在歷史生活中所體驗出來的東西，我們與其把科學的發明歸功於資本主義，倒不如把資本主義的出現歸功於科學的發明好。因為沒有亞丹斯密自由主義的經濟科學的成立，沒有瓦特蒸汽機的發明，沒有美國新大陸的發現，沒有遠東近東等市場的出現，現在這個被人愛戴又被人咒罵的資本主義真還不知躲藏在什麼地方呢。

國家機關，政治組織，經濟組織，既同是科學的維持者和保護者，既同是科學的母胎，而一切社會的進化與生活的改善又都依賴着科學，科學的本質和牠的重要就可想而知了。社會進化不能停止，生活改善也不能停止，人類要謀自身永久的繁殖，將永久不能離開科學，那末便永久

不能離開政治組織，經濟組織，將永久保存國家這個社會組織的集成機關。

六 結論

——怎樣實現社會主義——

社會所有一切的歷史現象，都是從人類在宇宙間自然界的認識和經驗中不斷的發明，不斷的創造出來的。不論是拜物教也好，拜神教也好，唯神哲學也好，唯心哲學也好，唯物哲學也好，科學也好，總之，一切都是從人類的認識與經驗中發明和創造出來的。大到組織國家，組織國際團體，創造大砲海艦飛船，成立壟斷全世界市場的大托拉斯，小到組織家庭，組織商店，製造鑿刀和斧頭，或者一羣小孩子在曠場上做捉迷藏的遊戲，也都可以說是人類從認識與經驗中發明而創造出來的產物。推而廣之，那末封建思想，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等等又何嘗不是人類的發明呢？

發明有空想的，有現實的，必須現實的纔能成爲事實，空想的發明則無論你具有何等勇敢

的創造精神，結果却永久是個空想，對於自然界的東西，就使這個發明是空想，也不妨用種種方法去試驗，試驗越多，認識與經驗也越充分，最後空想的發明便成爲現實的發明，造成事實了。可是人類自己，那就有了困難，自然物可以放進實驗室或化驗室，任你高興，一天試驗幾次都可以，同時分成幾組去試驗也可以，但整個的人類，整個的社會，却不能拿進實驗室或化驗室去這樣試驗。人類要想求得對於社會的認識和經驗，求得對於社會的智識，唯一的方法只有去看書本，從書本中了解社會的歷史，把握社會變遷的途徑；可是單有這些空洞的智識還不夠，這些空洞智識只是研究社會問題的初步基礎，要自己的智識成爲實用，還必須參加實際社會的活動，求得整個社會的實際情形；一知半解的單只知道社會的光明的一面沒有用，單只知道黑暗的一面也沒有用。單只知道社會光明面的，便一味歌頌功德，單只知道社會黑暗面的，便一味咀咒罪惡，結果前者做了統治階級的走狗，後者專門想暴動推倒政府，兩者都弄不出什麼成績，至多不過留下幾部文學作品。

社會所以發生黑暗現象，自有其原因，這原因應該是全機構或局部的機構有了不合理的

缺點，我們要創造新社會，便要把不合理的缺點去掉，而在合理的領域中求發展。社會主義的思想自有歷史以來，大概可以分做四類：第一類是宗教的，天國和極樂世界誰也不希望牠在人間實現；第二類是文學的或哲學的，「大同」「世界和共和國」「桃花源」「烏託邦」等只供精神上的鑑賞取樂，也沒有人求牠實現；第三類是聖西門傅利葉歐文等的新村，他們求實現，但他們只想創造光明的一面，把社會黑暗的一面忘去了；第四類是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他們也求現實，但他們又只知道剔除社會的黑暗面，甚至用報復殘殺的手段去剔除黑暗面，而把發展光明這一面的任務又放棄了。所以上述這四類的社會主義，都沒有顧到實際社會的全機構，結果都不能成爲事實。

馬克斯主義者自稱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其實這是誇大，馬克斯主義雖較天國極樂世界共和國大同世界及各種新村和無政府主義接近現實，可是決不是科學的方法。科學的方法應該有步驟有計劃，馬克斯主義從來不談這些，馬克斯主義者只要顧今朝，明天的事情就不去想牠，因此暴動的時候只講暴動，暴動以後如何是不問的，罷工的時候只講罷工，罷工以後如何也是

不問的。馬克斯主義者常以「只想將來不顧現在」這句話嘲笑一般空想的社會主義，甚至以此在大衆之前自豪；可是我們反過來問一句：「只顧現在不想將來的方法，這就算科學嗎？」

馬克斯主義者自以爲「只顧現在不想將來」的勇敢的試驗是最忠實的科學的態度，可是我們不能同意啊。科學的最後任務是在於「創造」，所謂「試驗」並不能包括科學的全過程。宗教家，文學家，哲學家，對於社會主義從沒想到試驗這一回事，聖西門、傅利葉、歐文等的新村運動屢次試驗而屢次失敗，馬克斯的暴動也都是失敗；不過馬克斯的暴動雖然失敗，但因為有「科學」的「三個字裝在頭上」，徒衆終是堅信不疑，希冀在宿命論的圈子內碰碰運氣，獲得這個「科學」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不幸馬克斯的方法完全不講步驟和計劃，只是盲目的去「試驗」去「暴動」，取了科學的皮毛，拋却了科學的純粹。

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這問題我們現在不能再學馬克斯那樣放棄不問了。創造電燈的人不明瞭電燈的概念，決不能創造出電燈來，從事社會主義運動的人不明瞭社會主義的內容，也決不能創造出社會主義的社會來。第一我們要從事社會主義運動，我們先要明瞭社會主義的

根本概念

社會主義的定義是：人類實行協力主義的共同生活，共同推進社會發展生產，使社會全體都得到自由幸福，過美滿快樂的生活。這裏，唯一的中心便是協力主義的問題，協力主義就是未來社會的骨幹。現在的社會完全不是人類互相協力，而是人類互相攻擊摧殘，資產階級拚命摧殘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也拚命摧殘資產階級。我們要創造社會主義，那末我們將用什麼方法消滅相殺的社會，恢復協力的社會？

國家的組織本是維持社會協力的機關，但因為人類自私性的發作與個人主義的活躍，往往使這個協力的機關變成壓迫的機關。馬克斯以為國家純然只是壓迫的機關！他實在只說了國家的後半截。當一個政府淪入個人主義的專制魔王之手，這種政府將完全失去社會的協力性，失去了社會協力性的國家是不能生存的，於是就有新的協力主義的政府要抬頭，這種新舊交替便就是革命的現象。所謂革命，也不能完全機械地去瞭解。革命有時候有形式，有時候形式上却看不出，但實質上已經改變了。譬如資本主義革命，法國把封建的皇帝推翻，英國日本的皇

帝却仍舊存留着；譬如社會主義革命，蘇俄是經過了暴動的形式，但其他歐美有進步性的政府如能作合於時代的改革，那末就是不經過暴動的形式也一樣可以走入社會主義的前途。形式上的改變是次要的，主要的問題只在於失了社會協力性的舊政府，是否有決心回復到協力主義的基礎上去？如果能夠斷然回復協力主義的精神，那自然沒有形成另一個新政府的可能。但如要繼續壓迫下去，那就沒有問題，另一個富有社會協力性的新政府將代之而起了。所謂協力，並不是新政府與舊政府的協力，也不是幾個政黨領袖的協力，乃是整個國家機構和全體社會民衆的協力，在目前，就是所謂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協力。

「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怎樣會協力呢？」馬克斯主義者一定要這樣的帶問帶譏笑。

馬克斯主義真是鐵錫的宿命論，總以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是生死冤家，永久只有互相壓迫互相殘殺，萬萬沒有協力的可能。其實事情是很簡單的，要知無產階級怎能與資產階級協力，只要去問英國和日本的封建的貴族皇室怎能與資產階級協力就得了。

現在因為市場限制的關係，社會經常存在着兩個矛盾：一是生產品過剩，二是勞動力過剩。

馬克斯說這是循環出現的「經濟恐慌」，其實這不是循環出現而是經常存在着，不過有時激烈，有時緩和罷了。資本主義制度的開始，解放了成羣的封建奴隸，本有協力的基礎，所以奴隸們都逃出封建領主的約束而投入資本主義的懷抱，不久市場充塞，生產窒息，現實上生出了矛盾，資本主義制度就失了社會的協力性了。這時人類如要繼續前進，便須放棄矛盾的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另外創立一種合理的協力的社會資本主義制度。

改革資本主義制度，列寧主義的暴動——不是宿命論的馬克斯主義的動暴——固然也是一種手段，但根本的方法則是解放市場——生產合理化與關稅壁壘祇能加深市場限制——的限制。解放市場的方法便是改革有限制的鑄金貨幣制度為活動的信用貨幣制度，同時改革無政府的個人主義的生產方式為有組織的集團主義的生產方式，這樣，人類就可以仍舊回復協力主義的精神了。經濟上回復了協力主義的精神。政治上要回復協力主義便毫無困難。人們如迷信着馬克斯的宿命論，迷信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是不兩立的鬥爭的死敵，不相信兩者有協力的前途，那末人類就只好永遠混亂，永遠黑暗，等待「末日」降臨！

世界經濟學導言

一 經濟學與社會的經濟組織

人類結合的關係是極其複雜的，但各個關係之間也並非全無分別，所謂社會科學如道德，倫理，政治，法律等等，便是固着於其中之一種結合關係而成立的科學。譬如道德學是以社會的道德的結合關係為基礎，倫理學則以倫理的結合關係為基礎，政治學則以政治的結合關係為基礎，法律學則以法律的結合關係為基礎。雖然在其形式上，如道德與倫理，政治與法律，或有若

干相似之點，但其成立的基礎與任務却絕不相同。

經濟學是社會科學中的一種，那末經濟學的成立當然也不能獨異於其他的社會科學，牠也是根據於一種人類社會的結合關係的基礎而的成立。馬克斯稱社會的經濟結合的關係爲「下層基礎」，而稱其他的道德、倫理、政治、法律等的結合關係爲「上層建築」。這非但把經濟學本身存在的意義弄得模糊不清，並且也使別的社會科學憑空添了許多糾纏。在所謂「唯物史觀」的立場上說話，當然以社會的經濟結合爲其他一切社會關係的下層基礎比較可以得許多辯論方面的便利。不過這種「經濟中心論」的社會學說，「唯物史觀」者說來總多少還有點牽強附會，因爲經濟現象並不是單純的物質變化，而是人類意志發展與生活演進的混合的結晶，硬說這是單純的「物」的關係，理論上就不免要常常引用詭辯的方法。但「經濟史觀」者主張這種「經濟中心論」的社會學說，那就便當得多，他們可以比唯物史觀者省一層詭辯的麻煩，他們祇要說明社會進化以經濟爲中心，不要再說明經濟就是物質，或說明經濟的中心是物質。

社會是個複雜的種種關係的結合體，這裏面有政治的關係，有經濟的關係，又有法律道德倫理風俗習慣的結合關係。這許多關係，互相關聯，互相發生影響，那是事實；但我們如認定經濟關係是其他一切社會關係的中心，是其他一切社會關係的下層基礎，那實在是一種武斷。我們知道，社會的組織關係一般的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政治組織，另一種是經濟組織。政治組織爲國家組織，法律組織，倫理組織，教育組織，經濟組織爲金融組織，生產組織，運輸及分配組織，在這兩個政治組織與經濟組織的組織關係之中，經濟組織對於政治組織固有重大的影響，但反過來，則政治組織給與經濟組織的影響却更大。

社會經濟秩序的成立，社會經濟關係的穩固，以及經濟秩序成立和經濟關係穩固之後所得的種種繁榮，這一切莫不建築在政治基礎之上。如果政治組織不存在，經濟秩序便不能發生，經濟關係也就不能穩固，那末什麼經濟繁榮的話都是無聊的噱語。

經濟學上各種學說中有偏向於觀念的心理學派，有以物質爲中心的唯物論派，又有以經濟爲中心的經濟史觀學派。當然，我們不能抹殺各種學派的立場，說他們毫無真理，不過他們所

把握的真理都是片面的而已。人類因爲是意識高度發展的動物，所以人類能夠造成社會，造成種種的組織，又因爲這些社會與組織的發展，所以人類可以有力去對抗自然，改變自然，依着人類自己的意旨，創造適合於自己生活的環境。前者關於社會方面組織方面的科學，便是社會科學，後者關於認識自然改變自然的科學，便是自然科學。經濟學只是社會科學中的一種科學，牠自己當然不能成爲一切社會科學的中心，也不能依任何學者的高興，更爲經濟學創立一個超越一切社會科學以上的論據。

★

★

★

★

在不同的經濟條件下，形成不同的經濟組織，社會經濟組織在歷史上的變形，往往就成了人類物質生活的進步或變遷的原因。可是經濟條件，並不純粹是經濟本身的產物和現象，却和政治一樣，牠的客觀條件常常爲別種原因所造成。譬如生產力的擴大，生產工具的改善，常常是由於自然科學的進步。譬如經濟組織範圍的擴大，人類經濟關係的改善，常常是由於政治科學的進步。

政治組織的客觀條件也和經濟組織一樣，國家組織的嚴密與強固是基於財政的發達，財政的發達是基於人民經濟的繁榮；又國家權力的強大，對於軍備也有關係，而軍備則根本是自然科學發達的產物，假如自然科學不發達，種種防禦工具與侵略工具是無從成功，無從改善的。同時，自然科學的客觀條件也和政治組織經濟組織一樣是別種原因所造成，其本身不能獨立發展。沒有政治組織的發達產生完善的教育制度，自然科學不能保存；沒有充分的經濟條件，社會上沒有巨大的剩餘生產物和富裕的生活資料，自然科學家的長期研究與偉大的試驗也決不能成立。

科學間的相互關係，社會組織間的相互關係，我們如不先有深切的了解與認識，那末我們把一個科學單獨在研究的時候，定會陷入嚴重的錯誤之中。自然科學家把自然科學當做社會上最可尊貴的東西，經濟學家把經濟科學當做社會上最可尊貴東西，政治學家把政治科學當做社會上最可尊貴的東西，這種「惟我獨尊」的現象，一方面固是由於人類自私心的發作，常常要偏愛自己的東西，但主要的原因則由於對於社會認識的不深切和了解的不澈底。假如我

們明瞭社會政治組織與經濟組織間的相互關係，明瞭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間的相互關係，我們就決不至於迷信經濟中心論的經濟史觀，迷信物質中心論的唯物史觀，或迷信政治中心論的唯心史觀。這些武斷的偏見，既沒有力量去統一科學，同時也沒有力量去統一社會啊。

人類文化的開始，社會組織的萌芽，其最根本的原因是由於人類意識的發展。人類意識的發展有兩個偉大的作用，第一是人類對於自然的認識，開始了人類的文化；第二是人類對於自己本身的認識，開始了人類的組織。這兩個認識的成立，便開始了人類對於自然的御用和人類相互間協力的現象。人類對於御用自然的現象，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懷疑，但對於人類相互間協力的現象，簡直危機四伏，每天都在動搖過程中。其實協力是人類最根本的東西，人類如不能夠協力，人類非但不會有力量去御用自然，也將不會有力量來組織社會。那一天停止協力，人類的社會就在那一天死亡，而人類的文化，人類的科學，也就在那一天消滅。

人類協力的事實隨着人類的歷史便已存在，但協力的科學的發生，各種社會科學的成立，則是較後的事。科學的發生，總是應着事實的需要，人類不能先懸想出一種科學，然後再來創造

出關於這種科學的事實。

人類先做了長期御用自然的事實，縱使生活幼稚到「茹毛飲血，穴居野處」，但這種下意識的御用自然的事實，現在終於產生了有意識有目的的自然科學。人類先經過了長期的協力生活的事實，縱使幼稚到原始羣集生活，原始部落生活，但這種下意識的協力生活的事實，現在終於產生了有意識有目的的社會科學。可是事實的發生雖先於科學的成立，但科學成立以後的事實則較科學成立以前進行得更為順利而且更為完善了。

爲了要明瞭科學的性質，還須先了解科學的歷史，我們現在來觀察一下社會演進的歷史吧：

科學程度	政治組織	經濟組織	社會協力的範圍
蒙昧時代	人類無統率。	分工協作現象未發生，人類和其他動物一樣，生活於自然之中。	

<p>拜物教時代</p>	<p>人類過羣集生活，每一羣集爲一老者或有力者所統率。</p>	<p>以打漁或獵獸爲生。</p>	<p>每羣自數十人至百餘人。</p>
<p>前期拜神教時代</p>	<p>部落生活，以野蠻強力之酋長爲統率。</p>	<p>遊獵生活，男司狩獵，女製弓矢，爲分工協作之開始。</p>	<p>百餘人或數百人的移動的部落。</p>
<p>次期拜神教時代</p>	<p>封建部落成立，酋長須用智謀，使自己成爲神的替身或神的象徵，完成內部和平的統治。</p>	<p>狩獵，畜牧與種植並存，開始協力的生產。但消費方面仍是分配的，方式，不是交換的方式。</p>	<p>協力的範圍擴大至五六百人或數千人。</p>
<p>拜神教完成時代 1. 神學已完成理</p>	<p>成立固定封建國家，不論教主或君主均</p>	<p>狩獵已不重要，畜牧與農業則極繁盛。生</p>	<p>協力的範圍有宗教的組織，官吏的組織，</p>

<p>初期哲學時代</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哲學為宗教所利用。 2. 唯心的哲學與唯神的神學未分開。 3. 宗教師有若干科學智識如酸酒, 天算醫術等。 	<p>論的根據。</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2. 哲學在神學中產生。
<p>封建制度完備, 各種開明專制出現, 神的統治將轉變為「神化的人」所統治。政治組織漸嚴密, 警察及常備軍在此時出現。「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規定在法中, 政治組織開始維護經濟組織。</p>	<p>知以和平為使命。非但對內和平, 即對外亦主和平, 非至萬不得已時, 不濫用武力。</p>
<p>除遊牧部落外, 畜牧已不重要, 主要生產為農業, 手工業發生。物品交換, 用一種自然物為媒介, 如龜貝獸皮及銅鐵金銀等金屬塊等均具有貨幣形態, 為自然物貨幣時代。</p>	<p>產品私有, 生產工具亦私有, 但山林及土地不能私有。原始物物交換開始, 協力主義在經濟上已有基礎。</p>
<p>協力範圍大為擴大, 每一國家有若干城市鄉村, 人數增至數萬或數十萬。社會顯分等級, 組織更嚴密。</p>	<p>人民則專務農業。組織的人數增至數千人或萬餘人。</p>

後期哲學時代

- 1. 宗教漸失信仰，或被政治家利用為愚民政策。
- 2. 唯心哲學脫離唯神論的束縛而獨立存在。
- 3. 許多宗教師的科學智識流入民間，人民研習醫藥種植算數天文氣節等事，科學開始幫助社會經濟的發展。

國家統一度量衡制度，統一貨幣制度，制定各種法規。此時政治組織漸具統治經濟組織的權力。

農業改良，手工業發達，簡單的機械被運用。鑄金貨幣制度成立。

各個國家行和平的或武力的合併，協力範圍更擴大，人數多者至數百萬。

<p>中期科學時代</p> <p>1. 神學與宗教完</p>	<p>初期科學時代</p> <p>1. 宗教失去信仰，政治上已無重要地位。</p> <p>2. 唯心哲學漸趨衰落，唯物哲學有抬頭趨勢。</p> <p>3. 自然科學發達，發明與創造，給與社會經濟以最大的發展原素。</p> <p>4. 社會科學萌芽。</p>
<p>宗教受政治取締或限制，自由思想受打</p>	<p>政教分離，教權下落，自由思想高漲，不自覺的國家組織變為人民自覺的國家組織。國家非但維護社會經濟，且進而維護科學，各種科學上發明的專利權在法律上成立根據。國家且知注意教育。</p>
<p>各種生產已極度發達，電氣蒸氣代替各</p>	<p>農業生產已擴大到最高度。蒸汽機發明，大工業出現，工錢勞動制度漸受國家的管理與保護。鑄金貨幣制度極進步，除黃金外，其餘銀銅鐵等金屬漸從貨幣的地位退出，還原為商品，銀行等類的金融機關出現。</p>
<p>在前一時期已有經濟上協力之趨勢，現</p>	<p>經濟上已開始全世界人類的協力，但侵略主義與支配主義的政治現象，使經濟不能順利發展。又因自由思想高漲，個人主義的橫決常超出於人類協力範圍以外，大規模的科學的戰爭，此時期常有發生。</p>

全沒落，若干宗教須依賴別種社會勢力而存在。

2. 唯物哲學極盛時期，殘餘的唯心哲學對於社會不發生作用。

3. 自然科學已完成體系。

4. 社會科學發達。

擊，國家主義或社會主義代替自由主義。國家開始整理社會秩序，依人類協力生活的原則，改訂各種政治的與經濟的法規。

種動力從事生產。因市場受種種限制，生產量遠過於消費量。銀行組織極盛，黃金缺乏，各種借貸的信用制度盛行，公私債票證券亦加入產業活動。鑄金貨幣制度危機四伏，動搖不已。信用貨幣制度已出現，但以現金為保證的鈔票仍未完全脫離鑄金貨幣制度的拘束。故鑄金貨幣制度動搖崩潰，此種半信用貨幣制度的鈔票亦隨之動搖崩潰。

在則政治上亦已開始圖謀協力，各種國際政治團體盛行，祕密外交受打擊，各國雖拚命擴張軍備，但武力已不是國際間最可靠的權威，不敢輕啓戰禍。

科學完成時代
 1. 神學與哲學消滅，科學統一了世界。
 2. 自然科學合理的運用於發展的生產。
 3. 社會科學完全成立體系的社會科學合理的運用於組織社會，完成人類的幸福生活。
 4.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統一，完成整個的科學的體系。

民族的國家組織進展為世界的國家組織，全世界各國的政治法規與經濟法規漸趨統一。國界消滅。

全世界經濟組織統一，信用貨幣制度成立，黃金及銀銅等金屬全數退出貨幣的地位，降為商品。鑄金貨幣制度消滅，市場的限制亦消滅，生產與消費趨於平衡。生產社會化，遺產制度取消，社會公有財產，社會上貧富階級消滅，代之以能力高下的階級。

全世界二十萬萬人共同協力，實現世界社會主義的社會。因協力與組織關係，社會上雖仍有階級存在，但這種階級不是為了壓迫而是為了互助。

看了上面的表，我們可以知道現在的人類纔只在「初期科學時代」脫離出來，經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大戰的摧殘，再經過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九年十年間的經營，世界恢復了空前的繁榮，又因為市場的限制，恐慌打遍了全世界，「中期科學時代」的社會條件也已有了。人類如不願再來一次大戰，把歷史再循環地迴轉一次，我想人類是應當決心而且大膽地預備轉入「科學完成時代」了。現在固早已有一般大言不慚的人在大喊「科學世界」，說科學已經完成了。其實這是一般忠心於哲學的人，爲了要保存哲學的殘命，不願意哲學死亡，便不願意科學真正的完成起來。因為科學到了真正完成的時候，科學發展到佔有全世界的時候，哲學便要死亡，哲學便要消滅，那末藉哲學以圖謀生存圖謀光榮的人，便也只好死亡，只好消滅了！

★

★

★

★

向來的經濟學常依其研究對象與目的而規定其名稱爲：私經濟學，國民經濟學，國家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或資本主義經濟學，社會主義經濟學。此外奇怪的名稱還有很多，一時記不了許多，當然各有其社會的與時代的價值。不過抱着偏見專去指摘別人未必有辦法，解決現實問題

纔是我們努力的目的呢。

現在，經濟學的對象與目的，應為整個的世界，因為現在的社會經濟組織事實上已經擴大為全世界了。侷限在一個地域或一個國家的私見去研究經濟學不會得到什麼好結果，抱着一個階級或一個集團的偏見去研究經濟學也不會得到什麼好結果。所以我不自量力地以世界的對象與目的來研究經濟學，又不自慚愧地以『世界經濟學』來命名自己的著述。疏陋與錯誤不能免，那末外間的諷刺與譏罵也不能免，好在存心是光明的，我們的努力也向着光明！

二 經濟學的對象和目的

什麼是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和目的。歷史上的解說很不少了。不過各人各派的目的不同，基本概念不同，那末解說也就不會完全相同。本來，凡是科學都應該有統一性，並且這些統一性的成立決不致被任何偏見或怪癖的學者所攪亂。經濟學既是科學，那末經濟學當然也應該有統一性。

我們如永抱着偏見來研習一切學問，那末「人是上帝創造的」這句話將永久存在於世界。好在科學家不像美國基督徒那樣蠢，他們相信人是動物，而且是脊椎動物的哺乳類，不願聖經怎樣說，科學方面對於人的解說終於統一了。要使經濟學成爲真正的科學，實現經濟學的統一性是必要的。實現經濟學統一的路徑，當然不會是現在一般人所愛用的「武力統一」、「政治統一」、「經濟統一」，以至於「多數統一」，最正確的路徑首先在認清出發點，認清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和目的，否則出發點一錯，所得的結果就會錯誤到不知幾千萬里。「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出發點的差異縱極微細，結果定會遠離到可驚的程度。

我們要破除一切偏見，排開一切顧慮，說明白簡單的話，斬釘截鐵地在經濟學研究的對象與目的上下一個明確的解說。我們不能抱資本主義保守派的偏見，也不能像辨證法家固意用螺旋式的意義模稜的話句，什麼東西都要簡單，明瞭，真切的答復一個「是」或者「非」，保守派常援用歷史上的「非」來遮飾現在的「是」，辨證法則又依着辨證法的邏輯說「是中有非，非中有是」這些無「是非」的解說，我們應該決心放棄，不再顧慮現在我們把經濟學研

究的對象與目的分次來看：

1 經濟學的對象

經濟學的對象是社會的經濟組織，這和政治學以社會的政治組織爲對象和各自然科學以自然物爲對象是同樣簡單明白的道理。經濟學對社會的經濟組織實施研究，就要注意到社會經濟組織的兩種現象：第一是這個組織體的構成情況，第二是這個組織體的活動情況。

講到社會經濟組織的構成情況，第一要追究構成的條件如：（一）歷史條件，（二）政治條件，（三）科學條件，（四）自然條件……；第二要追究構成的原因和基礎。人類爲謀共同生活的發展，從協力主義的活動中實現分工協作制度，這便是社會經濟組織構成的原因。至於社會經濟組織構成的基礎，無疑是建築在統治的原理上面。一般人或許覺得統治的話在政治學上纔談得到，在經濟學上不應該談。其實這是錯見，我們講到組織，不論大如組織世界組織國家，小如組織三個人的團體，都離不了統治的方法。學術上用嚴密組織的方法去研究纔有進步，工業上用嚴密組織的方法去經營纔有成功，社會經濟組織爲了要求前途的順利發展，所以

統治這句話也不得不講。不過歷史上的家長統治——家庭子弟和奴隸一樣的從事生產——封建統治——君長或酋長屬下的農民也和奴隸一樣的從事生產——各種經濟上的統治現象，學者們沒有注意到。其後自由主義的工錢勞動制出現，把統治的關係隱藏在工資之下了。近代主要的兩派經濟學者——共產主義者與資本主義者——們，一派諱言統治，另一派則盡力反對壓迫，把統治的真相忽略了。可是事實不能爲學者們的忽略所抹殺，學者們雖然不注意，雖然忽略，事實終還存在；社會的經濟組織自發生到現在，不知幾千萬年，統治的事實從未有一天的停輟，就是將來，也永遠會延續下去，存在下去。

所謂社會經濟組織的構成條件，則（一）歷史條件如過去主奴壓迫而轉爲自由主義的工錢勞動，目前因爲貧富壓迫將轉爲社會主義的工錢勞動可作例證；（二）政治條件如過去規定「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因而產生「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目前蘇俄規定「不勞動者不得食」的法律因而產生「社會——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可作例證；（三）科學條件如因蒸汽機發明而社會生產力擴大，電氣發明而社會生產力更行擴大可作

例證；（四）自然條件如美國處地富饒，經濟基礎自然鞏固，日本處地瘠薄，經濟基礎便極脆弱，可作例證。此外如民族，氣候，地理，文化，道德，風俗，習慣等等也都是社會經濟組織構成的條件，不過有許多不重要，有許多已包括前述四項中，不詳述了。

關於社會經濟組織的活動，這又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個人——即社會經濟組織的細胞——受自由意志支配的活動，一種是整個社會經濟組織的活動。個人受自由意志支配的活動可以簡稱爲個人活動，整個社會經濟組織的活動可以簡稱爲社會活動。過去的和現在的一般經濟學者稱前者的個人活動爲「經濟行爲」，後者的社會活動爲「經濟現象」。但這是不適當的，個人活動可稱爲「經濟行爲」，社會活動也同樣可稱爲「經濟行爲」，又社會活動是一種「經現象」，個人活動却也是一種「經濟現象」。兩個名詞的形式雖異，含義却完全一樣。學者們也許以爲個人有生命有肢體是能動的，所以用「行爲」二字去命名；社會無生命無肢體不應該動，牠的動態只好用「現象」二字去命名，結果兩個名詞的含義都夾纏不清了。其實，個人能動，社會也一樣能動，這和人體內十五萬兆細胞能動，整個的人體也能動是一樣的道理。

任何組織體只要組織健全，不論其大到如何程度，小到如何程度，這個組織體總是能夠活動的。小到數十兆數百兆細胞的小孩子這組織體能夠活動，大到數萬兆數十萬兆細胞的大人的組織體也能夠活動；社會組織和人體組織相同，小到漁獵時代數十人數百人的社會組織體能夠活動，大到世界聯邦時代數十萬萬人數百萬萬人的社會組織體也能夠活動。總之，我們應該把社會當做有機體的組織看待，不要把社會當做無生命無目的機械的組織看待，這樣我們纔能真明瞭社會存在的價值和經濟活動的內容，否則單就在名詞方面的混纏，也就夠我們痛苦了。

個人活動一般的說來是受支配於各個人的自由意志，但另一方面，則個人在經濟上的活動却又受支配於社會的共同意志。人類的意識活動能力比其他一切動物都進步，發展的速度也特別快，所以對於物質生活方面能夠發出一種支配能力，這種支配能力的表演，便成了個人在社會上的經濟行爲。原始時代人類過打獵生活，小獸沒有了，集合衆人去獵巨獸，巨獸獵到了，便大家共同分配享受；農業經濟時代人類過耕種生活，藉耕種獲得生活資料，滿足生活慾望；近世工錢勞動制成立，人們過勞動生活，先藉勞動獲得工錢，再用工錢去購買生活資料；這種社會

個人圖謀生存的活動，便是個人活動。個人活動有兩個限制：一個是個人活動不能違背社會的公共意志，一個是個人活動不能離開社會的協力基礎；前者如個人縱慾損害別人或社會的行為，後者則如魯賓遜漂流孤島完全得不到社會協力的行為。所以個人活動的出發點雖是個人自由意志或「指導意志」的意識發展的支配物質生活的行為，但這行為必須建築在社會協力主義的基礎上，第一不能放縱個人的意志，第二不能離開社會而生活。

社會活動是個人活動的組織體，好像軍隊一樣，分離開來都只是些平常的武士，組織起來却就成了有力的軍隊。社會的經濟組織和軍隊一樣，組織起來纔有力量，纔能發展，否則社會不能進展一步的。雖然現在社會經濟組織的存在，主要的是政治力量，如經濟秩序的保持，社會事業的發展，都須仰賴於國家的領導，但社會經濟的本身却也有其組織的骨幹，譬如在組織協力方面，有工程師，有管理員，有農民，有工人，有商人……在組織的工具方面，有貨幣——近代各種金融組織及公私債票證券等是貨幣的發展——有各種度量衡制度。這許多協力的分工和組織的工具，任何經濟社會都不能免，而且分工越進步，工具越完備，這個社會的經濟便發展得

越快。那些分工簡單，工具惡劣的經濟社會，譬如現在的落後民族像非洲美洲的土人和中國的 獠族，他們的歷史雖然也和我們一樣的幽久，可是他們的生活却還是古代一樣簡單惡劣。

社會的活動一般看起來，交易交換的現象是現在一般人所注意的。可是交易與交換，只是社會經濟活動的形式，主要的社會經濟活動却是人類在生活總過程中各種組織與工具的改善和進步。如人類最早的經濟組織只有男女分工，消費方面實行家長分配制度；後來人類就有牧者，農民，手藝人等分工組織，和物物交換制度。更進則有農，工，商以及更精細的分工，物物交換變成了貨幣交易，嚴密的度量衡制度也出現了。至於現在，更是進步得驚人了，生產力比原始人大了幾十萬倍，交易範圍擴大到全世界了。當然，上述這些許多進步，決不是個人活動的結果，而是有組織的社會活動的結果。中國在五千年前漢族的祖先和獠族的祖先是一樣，各個人活動的能力也是一樣，但在五千年後的現在，漢族和獠族却完全兩樣了。在生理上，漢族和獠族完全一樣，有許多地方獠人還比漢人強，但因為漢人的經濟有組織，經濟上除了個人的活動以外還有社會的活動，所以漢族的濟經進步得很快，獠族則因為社會的經濟組織太簡單，經濟上祇有

個人的活動而沒有社會的活動，所以他們的經濟還和四五千年前一樣，絲毫沒有進步。更進一步把中國漢族和歐美白種人比較，則漢族的人又似乎遠不如白種人了。在一千年或二千年以前，我們相信漢人比白種人生活好得多，但自從歐洲科學的發達，政治的進步，加以種種市場的出現，造成了產業革命大轉變，歐洲經濟組織轉入更新更完美的階段，於是白種人的生活一天一天追到了漢人，又超過了漢人，現在把白人來比漢人，我們只好慨嘆望塵莫及！不過蘇俄新經濟政策施行後，蘇俄的經濟組織又較其他白人轉入了更新更完美的階段，蘇俄的經濟沒有浪費，也沒有「恐慌」，社會經濟勇猛發展，英美日本落在背後也是望塵莫及。總之，像上述許多的進步和成功，便都是社會活動的結果。所以我們在研究社會活動的時候，絕不能僅以研究交換交易分配勞動及工資等外表的現象為滿足，必須嚴密注意到經濟社會內部活動的情況，否則任你共產主義也好，資本主義也好，一切都無辦法。

2 經濟學的目的

說經濟學沒有目的，這實在是妄人說的一句妄話。不要說是一個由歷史事實演成的科學，

就是一個極簡單的事實能在社會上存留下去，也一定要有牠的目的，否則便是偶然的曇花一現，決不能延續下去。鑛物學的目的在於採鑛，採鑛的目的在於獲得金屬或燃料，經濟學也和鑛物學一樣自有牠的一定的目的，這個目的便是經濟科學存在的生命，如經濟學是沒有目的的科學，那末不客氣，經濟學恐怕連名詞都消失了。

現在解釋經濟學的目的的人可以有三派：第一派是自由資本主義學者，他們以為經濟學的目的是替人類「謀生」或「營生」的科學；第二派是共產主義學者，他們把經濟學當做認識社會經濟矛盾的工具，用這個工具去推倒資產階級，解放無產階級；第三派則介於前述兩派之間，他們不承認經濟學的目的是「謀生」「營生」，又不承認牠是階級鬥爭的工具，以為經濟學的目的只在叫學者們明瞭社會經濟的情形，研究一下「經濟行爲」與「經濟現象」就算了事，結果這一派變成沒有目的了。

說經濟學是人類謀生或營生的科學，這等於未加解釋一樣，因為一切科學不管是鑛物學，種植學，化學，醫學，以至於神學，哲學，天文學，地理學都是人類謀生或營生的科學，所以謀生或營

生的目的是一般科學的總目的，不能爲經濟學所單獨佔有。經濟學的目的，應該在總的科學的目的下面另有其任務，這好像鑛物學的採鑛，地理學的交通，工程學的建築，種植學的收穫，都各有其專門目的，並不能簡單的以謀生或營生二字了之。

說經濟學是階級鬥爭的工具，目的在於認識資本主義的矛盾，打倒資產階級的統治，這也是不對的。認識矛盾也許可以作爲改良社會的張本，至於打倒資產階級的統治，那就簡直把經濟學當做政治學了。社會的發生矛盾或走入新的轉變，絕不是一個階級或少數人能做到，而自有其整個的社會的原因。共產主義者顯然沒有明瞭現在社會經濟矛盾的原因，以爲只要能打倒資產階級萬事都了，社會可以順利發展了。殊不知資產階級自有其獨立的責任，機械地打倒資產階級，機械地解散社會的經濟組織——階級是社會組織過程必有的現象，反對階級等於解散組織——社會的矛盾只有更加深，社會的缺陷只有更擴大，這事實我們只要看共產主義時代的蘇俄就可以知道。

第三派以「無目的」爲目的，單以研究爲滿足，以認識「經濟行爲」與「經濟現象」爲

滿足，那是在開玩笑，好像一個人學醫藥，只要嘗嘗各種藥品的味道，受受各種病症的痛苦，就算學醫藥的目的達到了。這一派人又於科學之外，別立一個什麼「實學」，好像要實學纔能求實用，科學只供大家研究和消磨光陰之用。沒有目的，不求致用。試想，這不是笑話嗎？科學之外，別有實學，這簡直是宣告了科學的死刑。因為自有歷史以來，凡是事實都能產生科學，而凡是科學都須求實用，無用的科學和沒有事實做根據的科學——如神學與哲學——遲早都是要消滅的，現在我們別立一個「實學」的名詞，便說科學的目的只在研究而不求致用，這是何等狂放啊！

研究經濟學而須認識社會的經濟結構，認識經濟活動的情況，以至於認識所謂「經濟行為」與「經濟現象」，那是經濟學者當然的任務。如果自稱經濟學者而不知什麼是社會的經濟結構，什麼是社會的經濟活動，那就等於自稱醫生而不明瞭藥品的性質，不明瞭病症的原因，等於木匠不知道自己的斧頭有什麼用處。可是單是明瞭或認識還是不夠，醫生必須更進一步用藥品去醫病，木匠必須更進一步去製造用具，經濟學家就必須更進一步去發展社會經濟。在經濟上尋求「出路」使社會經濟得以順利發展，使人類物質生活得有共同的美滿的進步，這

不是妄想，也不是笑話，切切實實的正是經濟學的目的，正是經濟學的任務。資本主義學者以爲經濟學的目的在於謀生，在於營生，共產主義學者以爲經濟學的目的在於推倒資產階級，在於階級鬥爭，這都是離了社會協力基礎的說話。因爲人類的協力生產，因爲人類的交互消費，社會纔能形成經濟組織；現在資本主義學者與共產主義學者都離開了最重要的社會協力的立場，抱着個人主義的偏見，資本主義者只顧各自謀生或營生，只顧各自去「發財」；共產主義學者滿懷嫉妬和憤恨，爲了自身生活的不滿，發怒於那「發財」的人們，一心要打倒資產階級。殊不知貧與富同是社會的產物，任何個人都不能獨力求得，社會經濟組織破毀了，人們既無從謀生營生或發財，而勞動者簡單的生活也將無法維持了。事實上社會經濟發生了恐慌以後，非但勞動者的生活感到不安，資本家的生活也同時陷入於痛苦中呢。——經濟學的目的不是別的，便是追究這些矛盾的生產原因，並且用怎樣解決的方法，可以解除人們生活上的不安與痛苦，使社會生活可以根本改善。使社會經濟可以順利發展，我們不能學那些偏見的人，把經濟學當做發財或鬥爭的工具，也不能學那些有閑的人，把經濟學當做不求實用的消磨光陰的玩具，甚至

把科學和所謂「實學」對立起來。

我們主張，經濟學是實用的，經濟學是站在人類協力的基礎上，解決組織上的矛盾，並求得社會經濟的合理的順利的發展，使全社會人類的物質生活，從欠缺的惡劣的階段推進到更滿更幸福的階段。要這樣，纔是進步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學！要這樣，纔是和平的世界主義的經濟學！

三 經濟學的方法

經濟學既和其他的一切科學一樣，目的在於求「致用」並不是在於「消閒」，那末牠在方法的方面就有兩種趨向，一是研究，一是創造。研究與創造，這是兩個絕對不可分離或忽略的方法，假如我們忽略了這兩個方法的相互關係，或分離了其中的任何一個方法，那就是死路一條，經濟學變成了沒有出息的玄學或消閒學。

研究的目的是在於認識現實，創造的目的就在改變或改造現實；這是兩個在經濟學的方法

論上必不可免的步驟。離了創造一切的研究便是白費工夫，離了研究一切創造便是玄想，不能實現。經濟學自有歷史以來，學者們都爲社會的事實所逼迫，對於經濟學的對象和目的，紛紛聚訟，主張龐雜，在方法方面則很少致意，好似模糊的認識論的方法已夠學者們運用，不必求深進了。認識論在理論方面雖然只求認識，但到了與現實接合的時候，人們的意識的發展，多少總含着一點創造的意味。單純的認識論沒有絲毫價值，可是把認識論搬到實行上去，人們就會下意識的被逼出一些創造精神來，這樣的認識論就有若干價值了。

經濟學的方法論，在所謂形式邏輯時代或其較早的時代，特別加以注意是從來沒有過的事。到了馬克斯手裏，他纔特別要人注意，這好像「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沒有好的方法，決不會有好的成績。馬克斯提出辨證法來，一方面把經濟學的對象變成活的機體，一方面又把經濟學由研究的領域逼入創造的領域，使有閒的無目的的經濟學變成現實的發展的經濟學，把經濟學上空想的認識論變成現實的認識論，這實在是經濟學的一個絕大的進步。但這裏有一個問題，馬克斯雖把辨證法從唯心論的牢獄中救了出來，但辨證法的幾個先天的缺陷却始終

有解除：

沒一，辨證法沒有統一性；

二，辨證法只有模糊的認識，沒有確定的創造的前提；

三，自然界的動態是物質的本性，這動態不能作為人類創造的規律；

四，唯物辨證法為拜物教的神祕性所限，初入門的學者不能實際運用，並且不容易了解。

辨證法因有上述這四個根本缺陷，所以辨證法自始至終只被少數有天才的領袖作為詭辯的法寶，作為鎮壓下層抗議的工具。在理論上發生了重大糾紛的時候，辨證法簡直就是基督教的十字架，佛教的老菩薩，只要把牠請出來，什麼混亂都得鎮壓下去，好像中國人的鍾旭畫像一樣有治邪的作用！

辨證法的不適用於經濟學已如上述，這裏我們就不得不採用被馬克斯主義學者指為形式邏輯的演繹法與歸納法。演繹法與歸納法在任何條件之下，不論有無天才的人，不論經驗與學識深淺的人，都可以了解，運用。演繹法與歸納法在研究的時候可以運用，在創造的時候也可

以運用，不像辨證法那樣充滿着拜物教的神祕性，一切都聽命於自然的變化，繞着自然追求，兜圈子。

辨證法如加以善意的辯護，那是將歸納法與演繹法，研究與創造，盡融冶於一爐，甚至將自然活動與社會活動亦融冶於一爐。可惜人的世界決無此八面俱到的怪物，神學時代上帝決定一切，哲學時代玄想決定一切，辨證法不過是神學與哲學的混合產物，馬克斯希冀染以現實——唯物論——的色彩，仍以之來決定一切，實在是辦不到的事情。科學上一般的方法，自然科學除運用演繹法與歸納法外尚可更進一步去試驗或實驗，甚至可有種種機械——如顯微鏡望遠鏡——來幫助；社會科學除運用演繹法與歸納法外，既不能試驗，又沒有可以利用的機械。在一般文化進步的國家，猶可利用種種統計和調查，但在文化落後的國家，則連此亦不可得。馬克斯抱絕大的慷慨態度，把自然科學上的試驗和實驗精神與辨證法滲和起來用之於社會革命，使社會不斷的遭遇空前犧牲，迭次暴動慘然失敗，便是由於他的方法論的原因。

社會科學既不能用試驗或實驗來幫助研究，又不能用種種機械來解決認識問題，那末我

們就只有盡可能的運用演繹法與歸納法，以從事研究與創造了。

1 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一切科學的目的都在於創造——發明，發現，整理等也屬於創造的範圍——但創造之前必須先有深切的研究，否則創造既無從着手，也不會有現實的基礎。所以我們在一開始經濟學的任務的時候，第一便要注意到研究，同時社會經濟每天都在變動和改革的過程中，學者們如要求現實的創造，不致為時代的落伍者，便須不斷的繼續其研究現實的任務。否則於那一天停止研究，便在那一天與社會隔閡，便在那一天終絕了他的經濟學的生命。

大概在經濟學的研究的路程上，一般的說，演繹法的運用較多於歸納法，譬如我們要分析現實，認識現實，從模糊簡單的範疇進展到顯明複雜的範疇，這就必須用演繹法。但在很少的機會，譬如運用統計數字之類，有時必須用歸納法。當然，在論理學上邏輯學上的許多定律和方法，為一般科學所遵守或運用的，經濟學也必須遵守着，並且盡可能的運用着，不過一般的在研究經濟學的任務上，演繹法是主要的。

在第一節講「經濟學與社會的經濟組織」的時候，我們就認定經濟學是「固着於社會中的一種結合關係——經濟關係——而成立的科學」那末我們開始研究經濟學的任務，首先便要認識這種社會的經濟結合關係，而明瞭社會經濟組織的內容。可是我們驟然間提起這些話，問什麼是經濟關係？什麼是經濟組織？什麼是古代經濟？什麼是現代經濟？我們會茫然不知所對。因為沒有運用演繹法的分析的認識以前，社會上一切的事物存在於我們腦筋裏的，只是一個混沌而模糊的影子，要從這個混沌模糊的影子得出明白的答覆來，那當然是件難事。

人類對於宇宙的認識，人類對於自然的認識，老實說便是一個演繹法的過程。人類最初是個拜物教的唯物論者，腦筋裏唯一的東西只是一個具有無限魔力的物，具有無限權威的物。繼而拜物教唯物論的認識基礎運用演繹法，人類對於宇宙所得的新的認識便是拜神教的出現，因為人類覺得物並不怎樣有魔力有權威，真正有魔力的東西應該是物以外的神。繼而神論的認識基礎運用演繹法，人類又於神以外尋出一個心來，因為神的魔力，神的權威，人們感覺到不大真實，於是宇宙間真正有魔力有權威能夠創造宇宙的應該是心了。繼而唯心論的認識基

礎運用演繹法的分析，那時便應該得出科學的認識論的結果，把宇宙活動的現象解釋得更具體更真實，可惜不幸得很，赫格爾出來，辨證法的活躍把人類演繹法的認識基礎完全抹殺了。馬克斯又把唯物的宇宙動態論和辨證法併成一家，這樣一來，辨證法就更神祕更萬能，牠有了拜物教的物質基礎，牠有了拜神教的宇宙動力，牠有了唯心論的認識方法，牠又有了科學家的現實思想，於是辨證法的複雜和神祕簡直不能爲一般人所了解，祇爲少數有天才的領袖所運用。至於領袖們運用的是否得當，那是另一問題。例如列寧和恩格斯，他們的「科學家的現實思想」比較濃厚，所以列寧與恩格斯的辨證法比較合乎現實，比較的能夠運用於實行上面；托羅茨基是個大天才的怪人，由於他的「唯心論的認識方法」的揮舞，一切的客觀和現實都會被他

的詭辯與詞藻打入地獄；考茨基的辨證法初期是馬克斯的正統，後期却有些偏陷於拜物教與唯心論了。我們不要以爲馬克斯，恩格斯，考茨基，列寧，托羅茨基，赫格爾等的辨證法各不相同是神祕的事，我們如運用被人放棄被人誣讒的演繹法來解剖那高貴的辨證法，我們就可以看見赫格爾的辨證法是完完全全的「唯心論的認識方法」，馬克斯的辨證法是「拜物教」，「宇

宙動力論，「唯心論的認識方法」和「現實思想」的混血兒，恩格斯，列寧，德波林諸人的辨證法是馬克斯的混血兒向「現實思想」方面的發展，考茨基向唯心的認識論方面發展，托羅茨基和考茨基差不多，但他把自己的天才發揮到了瘋狂的狀態，又有些像拜物教下面的英雄了。除上述諸人，其餘世界各國的學者的辨證法更多得不勝繁數，不能一個一個的請出來解剖，但總結一句，終不外乎是下列四方面的畸形發展或平衡發展：

1. 拜物教性的靈物崇拜，以物質為一切宇宙及人類社會之起源，抹殺人類自身的主觀力量；
2. 拜神教性的宇宙動力論，但為唯物論的色彩所遮飾，神祕性的動力往往解釋成爲平凡的動力了；
3. 唯心的認識論把現實解釋成精神的附庸，武斷的論調常常超出現實以上；
4. 科學的現實論在唯物的神祕性中不自覺的連用演繹法的認識論，並且不自覺的流露
出創造精神，——這方面發展的辨證法對於馬克斯主義常獲得可驚的成功。

我們既已明瞭辨證法的神祕性與複合性，在演進的理論上沒有科學的統一的基礎，那末我們在研究經濟學的時候當然不能再拖着辨證法那付鏽桔了。

我們用演繹法的認識論的方法來研究經濟學，認識的最初的出發點當然是經濟社會，經濟社會決不是突然產生的，牠有牠的歷史，同時歷史也決不是一條線，歷史是分時代和階段的，各個時代各個階段的經濟社會，有不同的組織，有不同的關係。我們初次和經濟社會這個名詞接觸，經濟社會這東西存在於我們腦筋裏只是一團混沌的影子，除掉黑漆一團的影子以外幾乎什麼認識都沒有，但是我們如加以分析，就能知道經濟社會有歷史，並且牠的歷史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進步。在社會經濟的歷史上加以分析，那末我們又知道各時代有各時代的經濟組織，各時代有各時代的經濟關係；我們更在這些經濟組織的構成和經濟關係的結合上加以分析，我們又可以明瞭：

1. 在組織的構成上有科學家，工程師，經理員和管理員，工人，農民，商人，教員，以及其他公務員和藝術家等分別；

2. 在各個成員——或經濟細胞——的結合關係上，有協力主義的統治關係，有資本主義的統治關係，有暴力主義的統治關係；

3. 在社會經濟活動的工具上，有馬克斯稱爲「經濟組帶」的貨幣，有各種維持社會經濟秩序的經濟制度，有便利社會貿易的各種度量衡制度；

4. 在社會經濟流通的現象上，有生產，運輸，分配和消費等事；

5. 在生產，運輸，分配，消費——或統稱生產總過程——等事項的進行上，有生產條件如勞力，土地，原料，工具等的配合關係，有生產與市場——消費——的相互關係；

6. 在各經濟階段的交替關係間，我們又能看出前經濟階段的矛盾點和後階段經濟所以出現而代替前階段經濟的原因；

7. 以歷史觀察的結果來與現實的經濟社會實行歸納法的比較，實行再分析的觀察，那末我們又可以重行釐定現實，努力於新的創造了。

2. 經濟學的創造方法

科學的經常任務在於研究，但其終極的目的却是在於創造，如果一個科學只顧研究不願創造，科學便毫無價值，簡直是一種人類精力的浪費行爲。一個經濟學者從事經濟學的研究也許需要很長的時間，十年二十年都說不定。我們知道原富和資本論都不過是歷史的產物，是一些歷史事實的分析或綜合，可是就這樣的兩部書已經耗盡了亞丹斯密與馬克斯半生的心血。但這兩部大書，還只是亞丹斯密和馬克斯研究經濟學的記錄罷了。現在，社會日進，人事日繁，學者們對於研究的日程事實上要縮短，同時教育的進步與印刷術等等的發明，研究上得到許多便利，研究的日程事實上也可以縮短了。當學者們結束了研究的日程而去到社會上實行，去與現實結合，便不免的要在行動上表演出模仿或創造的行爲。對於舊制度的不滿，對於舊方式的矛盾，模仿往往爲一般人所厭惡，可是厭惡也沒有用，當你沒有能力創造的時候，不模仿又怎樣辦？

革命根本是集合許多不願意過矛盾的平凡的模仿生活的人，來推倒舊制度舊方式以創立新的合理的制度，創立新的合理的方式，可是你如果不具有創造的能力和勇氣，這種革命縱

使做倖取得了政權，結果也是去掉一個暴虐再來一個暴虐，或者是去掉一個矛盾再來一個矛盾，去掉一個平凡再來一個平凡。在個人主義的立場上談革命，取得政權自然算是革命成功了，只要自己有權有福，管他以暴易暴，以矛盾易矛盾，以平凡易平凡！可是在社會主義的立場上，少數領袖拚着幾千萬民衆的血肉——中國自一九二六年大革命到現在犧牲的民衆直接間接恐在一萬萬左右——以攞得高位，權已在手而猶不能開始創造工作，這實在是奇恥大辱！

現代在政治與經濟方面兩個偉大的創造者，一個是蘇俄革命的導師列寧，一個便是中國革命的導師孫中山。列寧在政治方面的創造是蘇維埃制度，孫中山在政治方面的創造是五權憲法。關於經濟方面，則列寧的創造是蘇俄新經濟政策所根據的「社會——國家——資本主義」，孫中山的創造是「錢幣革命」。

列寧創造社會資本主義的經濟當然不是偶然的，他繼承了馬克斯及其他社會主義學者的全部研究，經過蘇俄十月革命後長期共產主義經濟的試驗，纔有了偉大的社會資本主義經濟的創造。列寧能有這樣偉大的創造，主要的原因自然由於他有獨特的天才和精神，但沒有那

前期的研究學識和實際經驗，後期各種應着現實的創造決沒有成功的可能。

孫中山的錢幣革命向爲一般黨人所忽略，大多數人都致力於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其實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只是一種調和方略，還不是真正創造。對於革命的要求，這種調和政策決不能使民衆滿足，經濟上也決不能收效。只有錢幣革命纔是經濟上的偉大創造，因爲貨幣制度與金融組織的改善，可以轉移生產，調劑消費，這樣便可以開社會資本主義的先路，完成中國民族資本發展的基礎。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孫中山錢幣革命的方法並未具體，尙待加以發展——發展的最好範本便是其友人列寧的社會資本主義。中國經過長期的危難以後，現在已有人注意到錢幣革命，主張自由主義的紙幣政策的著作在出版界已有發現了，有組織的研究機關則有「中華錢幣革命協進會」。那些自由主義的紙幣政策，都是歐美資本主義國家腐臭了的東西，中國因爲沒有嘗過資本主義的味道，腐臭了的東西自然能爲一般嗜痂者所愛好。但全國人民爲生活所困，並不都有嗜痂之癖，這裏可以不論。這裏我們把以發展錢幣革命重任自負的中華錢幣革命協進會討論一下吧。

中華錢幣革命協進會在其開第一次籌備會就已很惹人注目，到會的有中委，又有各團體各機關的代表，在學術史上可說是少有的盛會。但不幸得很，我們試看該籌備會的報告：

「改革錢幣政策，分四點：一，票由政府印製，人人可以財產或收入十分之一作保發行，仿照郵局辦法，分設一二三四等局，代為管理，至政府則可以歲入十分之五作抵，儘量發行；二，由政府頒布保證委員會條例，在全國各省縣鄉村，一律組織保證委員會，保證員不限名額，以財產多寡分等，如財產在五千元以上，可為四等局保證員，十萬元以上可為一等局保證員，人民發行票額，須由保證員担保；三，發行票額不必兌現，以十二個月為滿期，滿期後即由原發行人，以另票或現款交由各局，將原票收回；四，組織國際匯兌銀行，將現金集中，實行對外用金銀，並可隨時將金銀存放外國收利……」（二十一年九月五日申報專電）

「不必兌現」的鈔票，「人人可以發行」，那是何等痛快的事啊！政府又「可以歲入十分之五作抵，儘量發行」鈔票，那又是何等痛快的事啊！中華錢幣革命協進會諸公真可謂極盡痛快的自由主義紙幣政策的能事了。自然，這政策的施行，各大中小產業資本案將歡忻慶祝，政府

當局在睡夢中也要笑出眼淚來。可是憑空添出了這許多鈔票，究竟對於中國產業有什麼裨益呢？紙票不是財富，我想沒有常識的人也可以知道，中華錢幣革命協進會却要以大批紙票來富中國，這是怎樣一個異想天開的致富之術啊！

紙票的價值是信用，信用的基礎建築在產業的活動上面。中華錢幣革命協進會諸公想超出於產業活動和超出金融組織以上，企圖以神乎其神的大量紙票來富中國，這不是夢想嗎？中山的錢幣革命爲了適應當時的環境，規定不兌現，規定發行局和銷燬局等機關，染有濃厚的離開現實的色彩，然而並不因此就掩沒了他的理論上的光輝。中華錢幣革命協進會在理論上沒有加以絲毫發展，在策略上却以空想的自由主義的污泥來塗抹孫中山的錢幣革命，這實在是一種對孫中山最痛心的誣蔑！

胡適之以「知難行亦不易」來污辱孫中山的尊重創造的主張，協進會諸公却以一些「模仿」的自由主義的醜行來代替孫中山的創造，這實在是中國革命的一段可恥的歷史啊。我們不能像申報那樣取消錢幣革命的主張：

「孫中山先生錢幣革命論，本爲痛感急切而發，然其前提亦必在孫中山先生理想社會現實之後。」

但我們也決乎不能把錢幣革命拉向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方面發展啊！

列甯於長期的研究和奮鬥之後，直到晚年纔有社會資本主義的創造，蘇俄爲實現這一創造，由全體人民過長期的節衣縮食忍苦耐勞的生活纔獲得五年經濟計畫的空前成績。孫中山的創造——錢幣革命——則爲勇於內爭的黨人們長期的束之高閣，到現在反爲黨內黨外許多投機者加以自由主義的侮辱。這可知創造的艱難了。

——爲了引證兩個經濟上創造的先例，文字的說明逸出了範圍，現在仍舊拉回本題討論經濟學的創造方法吧。將理論變爲現實，不外兩條路，一是模仿，一是創造，前面早說過了。創造必先有理論基礎，沒有理論的行動我們雖不能否認牠是創造，但至少是一種自然性的行動，而不是目的意識性的革命的創造。凡是創造，應該先有理論，有了創造的理論，然後纔有創造的行動。尤其是社會經濟發展到全世界變成一個系列的現在，不有全世界人類普遍的認識，任何個人

都沒有完成經濟上創造的能力，所以對於創造的理論就更爲重要了。

創造的方法，一般的講起來是運用綜合的歸納法，也許可以說是演繹法的還原，但所謂演繹法的還原，我們不要誤會是把一個時鐘拆開來又裝回去那樣的簡單，這只是重複的模仿，不是革命的創造。在創造基礎上的演繹法的還原，形式上雖然是還原，但實質上已經完全不同了。好像一個機巧的鐘錶技師，他拆了許多舊式的時鐘，細心地加以檢閱，經過長期的研究，時鐘的構造上有了發明，另外造成一個新的時鐘。這個新的時鐘在形式上可以說是舊式時鐘的還原，但實質上和舊式時鐘完全不同了。舊式時鐘常常發生窒礙，行走起來忽快忽慢，新式時鐘則因爲機件進步，什麼弊病都沒有。當蘇俄實行新經濟政策，改正了各種經濟組織和經濟關係，把原有的經濟條件重行配合起來，於是歐美資本主義學者就歡忻鼓舞，說是蘇俄把資本主義還原了。現在則小孩子也能夠認識清楚，就是蘇俄的社會資本主義與歐美的自由資本主義形式雖然相似，內容却完全不同。這裏我們可以明瞭，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是社會經濟的創造，絕不是資本主義的還原。

我們研究社會經濟，我們把各種經濟組織和經濟關係運用分析的演繹法去一個個局部的觀察，要和觀察時鐘一樣連一個不重要的螺絲釘也不肯輕易放過。經過這樣的長期研究和觀察以後，我們就能夠知道資本主義經濟的種種缺陷：第一生產的浪費太大，第二生產與市場的關係常常脫輻鬧恐慌，第三因私人剝削關係形成貧富階級……我們知道了這許多資本主義經濟的缺陷，我們就應該求進步的方法，重行創造一個合理的完善的經濟來代替。

一個善良的鐘錶技師要求舊式時鐘的進步，決不是把舊式時鐘的不良機件拆去就算完事，必將更造一個新式時鐘來代替。馬克斯在這一方面的工作，實連一個善良的鐘錶技師的工作都沒有做成，他把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容真是看得很透明了，可是他只像一個愚蠢的鐘錶匠一樣，要一鐵錘把不良機件都打碎，結果暴動以後的社會經濟反不如暴動以前。裝着不良機件的時鐘還勉強能行走，被打碎了不良機件的時鐘却不能動了。馬克斯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經濟，這原是原始經濟的模仿，也就是被打碎了不良機件的時鐘，這種經濟當然不能實現，除非人類都願意下血海，進地獄！列寧的社會資本主義經濟，這與自由資本主義不同，與共產主義也不同，

而是從自由資本主義經濟更進一步階段的創造。

列寧的社會資本主義不是什麼辨證法，運用辨證法是無論如何得不出這樣的結論。列寧老實是於澈底的運用分析的演繹法之後，接着便運用綜合的歸納法，將舊有各種自由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條件，加以進步的鍛冶和改鑄而重行配合成爲社會資本主義的經濟。這與馬克斯那樣愚蠢的鑄錢匠的方法不同，也與一輩子過模仿生活的資本主義學者不同。

其次在創造方面應當注意的事：

第一，不能脫離現實基礎；

第二，不能脫離政治與科學間的關係。

創造不能脫離現實，脫離了現實也無所謂創造。一些經院學者死鑽在書堆裏，引經據典，十句話有八句是引用列寧以前諸人的成文，但這是在考證，不是革命，更不是創造。有許多想像力豐富的人，憑空描寫出「理想國」「烏託邦」一類的理想社會，但這是文學的創造，不是經濟的創造。深入現實的方法，並不是在論文中多引證一些統計數字就算完事；必須參加社會實際

的革命運動，認識整個的現實社會，由此得有機會了解一般社會生活的痛苦和社會經濟窒礙的所在點。

創造不能脫離政治與科學間的關係，這是最嚴重的事實問題，然而現在的一般學者們竟忽略此點，有許多學者提出來的經濟主張竟完全脫離了政治事實和科學基礎。當然，在馬克斯宿命論的哲學基礎上，經濟幾乎是超政治超科學的靈物，好像一切事態都以經濟為轉移。殊不知經濟對於政治與科學的依賴關係也是很密切的，列寧為討論蘇俄革命便利起見，曾有下面的一個公式：

蘇俄蘇十電氣化——……

這一個公式的具體解釋，蘇維埃便是代表政治，電氣化便是代表科學，蘇俄的社會資本主義經濟的基礎便是建築在這上面。如果我們要解釋得更明白更具體的話，還可以依着列寧的公式，改演如下：

社會經濟條件十蘇維埃十電氣化——社會資本主義經濟

看了上面的公式，我們就可以相信經濟並沒有什麼超然的地位，牠離開了政治與科學，一天都不能存在。社會經濟越進步，對於政治與科學的依賴關係便越深。科學與政治固然也依賴着經濟，但我們決不能因此便迷信經濟能夠超絕一切，而在經濟的創造方面忽略這些事實。

Technocracy 與法西斯蒂

一 引論

技術統治 (Technocracy) 這個名詞出現了並不很久，然而在她的發源地美國竟鬧成了極大的狂熱，報章雜誌，甚至電影新聞，一切都在狂熱的鼓吹着。就是在文化幼稚，思想落後的我國，大多數的報章雜誌甚至愛時髦的大學教授，也都已風起雲湧的研究過，討論過，並且發表過意見了。

美國的技術主義者對於這個學說當然揄揚得無微不至，把技術統治簡直說得是萬能之神了。他們不承認一切主義，不承認政治，甚至除保留一些工程師技師以外，還想不承認科學。

這個新學說到了中國，却不像美國蘋果「花旗」橘子那樣受人歡迎，成羣的煽動性的學者都操着列寧的筆法，於羅織的分析之餘，再加以一頓痛駁，痛罵。中國在維新潮流開始熱盛的時候，外國人放的屁到了中國也是經典，現在時代變遷，思想上出現了反動，什麼外來的學說都要加以懷疑，還要進一步加以反對了。因為不如此，不足以誇示自己的進步。某大學者在某大雜誌上於大罵了「美國人的好處……」「廣告術」……「吹牛術」……之後，接着便斷定技術統治主義正就是「廣告術」，正就是「吹牛術」了。可惜某先生沒有先看看他自己，沒有看看他自己在怎樣的運用着自己的煽動的才幹，在大施廣告術，大施吹牛術。又沒有回頭看看中國人的「好處」，看看蘇俄人的「好處」，某先生是中國人，而且曾遊歷過蘇俄，對於蘇俄與中國當然都應該很熟悉，爲什麼不又看看中國人的「廣告術」，「吹牛術」到了什麼程度，蘇俄人的「廣告術」，「吹牛術」到了什麼程度呢？可憐空頭學者的近視，他沒有看見不吹牛不廣

告的中國人把東北四省送給了日本，又有不吹牛不廣告的軍閥分割了統一，只剩下一些煽動家空頭學者在吹牛，在廣告，自以為中國得救了。

一個主張或一種學說的出現，要得到人們全體一致的承認是沒有的。孫中山先生也會被人諷爲「大炮」，可是在孫中山先生的主張和學說下面終究推翻了滿清，打倒了封建軍閥。「大炮」只要能夠現實，「大炮」是沒有恥辱的啊！某先生說技術統治是美國人的「廣告術」，是美國人的「吹牛術」，但如技術統治能有現實的前途，那末所謂「吹牛術」所謂「廣告術」還不是某先生罵了自己嗎？

我們對於技術統治本不願意急乎來多發表意見，第一因爲這學說還只是片段的理論，第二她在發源地的美國也正在成長時期，並沒有什麼確定的形態。所以我們以爲除了深切的注意和研究以外，過早的發表意見是隔靴抓癢，攻擊是無聊，擁護也是無聊。我們堅信協力主義組織主義的法西斯蒂，但我們並不因爲信仰了法西斯蒂就要反對技術統治。法西斯蒂在現實的行動上因爲組織的關係也許比其他政黨更有濃厚的排他性，可是在思想上，在精神上，法西斯

蒂是虛懷若谷，最能運用智慧而排除一切心理上的魔障的。技術統治在經濟發達科學進步的美國已有了十二年的潛心研究，集了三數千人的精力進行活動，這當然不會是簡單的「廣告術」與「吹牛術」將自有其堅強的基礎。不過現在尚在幼稚時期，尚不能像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那樣趨時，因之淺見的人們不覺得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是在廣告吹牛，反覺得技術統治是「廣告術」是「吹牛術」了。

法西斯蒂與技術統治並沒有什麼關聯，甚至技術統治者(Technocrats)還想否認法西斯蒂呢。但法西斯蒂的虛心和法西斯蒂的智慧能夠容納技術統治，而法西斯蒂的組織和法西斯蒂的毅力更能夠幫助技術統治。技術統治的現實與幻滅，也許正决定着美國社會發展的前途，國家主義呢？社會主義呢？世界主義呢？無政府主義呢？共產主義呢？法西斯蒂呢？技術統治者也許要回答一切都不是，他們似乎只想着天堂，只想着樂園，可是我們在現實與幻滅的支點上着想，我們就覺得技術統治還不會有她自己的靈魂。技術統治者說技術統治只是一種科學，但他們並沒有注意到科學是人類的科學，科學是社會的科學，科學自己不能存在，科學自己並沒有靈

魂呢。技術統治者的頭腦如不爲機械的轟動聲所擾亂，保持着冷靜的常態，注意一下現代掀動世界的法西斯蒂勢力，這掃蕩全球的法西斯蒂是現代的靈魂，是科學的靈魂，也就是所謂技術統治的靈魂呢。

二 技術統治的思想基礎

技術統治和各種從唯心哲學或唯物哲學上產生出來的什麼主義是完全不同的，她好像完全是從統計與實驗中產生出來的一種「社會計劃」。從事於這個「社會計劃」的人的心目中沒有什麼唯心的觀念，也沒有什麼唯物的觀念，他們祇覺得社會的矛盾非如此便不能解決。

技術統治者積了十二年的埋首試驗室中的工作經驗，動員全體到全北美各處去搜尋實證。他們做過了三千餘種的試驗，製成了三千餘張的圖表，有這種種的真憑實據，便覺得他們所提出的這條假定的「社會計劃」用不着去向什麼主義上什麼哲學上建立思想基礎了。

技術統治者不知道什麼是困難，不知道什麼是挫折，埋頭努力做調查和研究的工作，在社會的事實中着手調查，着手研究。這種努力，當然自有她的不可忽略的價值。歷來的許多思想學說，政治經濟上的主張，都只是一些唯心的或唯物的空想，不顧事實如何，只知照着他們的哲學邏輯應該如此。雖然是一個空想，一個唯心的或唯物的空想，可是在那頑固的哲學家手裏，却要硬把空想定爲事實。技術統治者雖也很堅決的把技術統治的假定指爲事實，但技術統治者絕不依賴空言或詭辯，而以統計與調查來作論證的根據，那當然比較沈醉於空言和詭辯中的什麼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真實得多。

反對或誤解技術統治的人，看見技術統治的反對資本主義的貨幣物價制度，便說技術統治是變相的共產主義；看見技術統治要發行「能力券」，便又說技術統治是變相的發行「勞動券」的歐文主義，這實在是膚淺的觀察。世界上沒有一件絕對全新的事物，但我們不能說世界上就沒有新的事物。輪船與帆船比較，輪船的構造原理有不少的部分和帆船相同，火車與獨輪車比較，火車的構造原理也有不少的部分和獨輪車相同，但我們能說輪船就是帆船，火車就

是獨輪車嗎？在哲學上說，世界上的確沒有一件是全新的事物，可是在科學上說，每一件進化的事物都是新的事物。

如果我們相信十八世紀歐洲的「產業革命」是人類生產力的第一個大轉變，那末我們相信這二十世紀的美國的技術統治也許就是人類生產力的第二個大轉變了。歷史上人類所消費的生活資料，最初是和其他動物一樣全靠自然力供給的，自然界生產什麼人類便消費什麼，「茹毛飲血，穴居野處」，人類對自己的生活可說不能有一點主觀的意志。後來自然力的供給不夠了，人類進化到用人力來從事生產，於是畜牧農業手藝工業等慢慢的就都發明出來了。人力生產，在歷史上是佔了很長久的時期，直至十八世紀歐洲「產業革命」以後人力纔不再爲人類的主要生產力，人力的生產逐漸爲機械力的生產所代替了。

機械力代替了人力，機械生產的社會除需用少數的人力去盡管理的責任外，大多數的人力被廢置着，於是大多數的人都失業了。亞丹斯密與馬克斯都承認勞動力是財富的淵源，這在封建社會確是如此，但在資本社會與原始社會就不對了，原始社會沒有人去用勞力生產，資本

社會則主要的生產都是用機械力。技術統治對於財富的解釋，對於生產力的解釋，既與馬克斯不同，也與亞丹斯密等人不同，對於失業現象的解釋便也不同了。馬克斯派——共產主義——說失業的造成在於剩餘價值的剝削和累積，亞丹斯密派——資本主義——以為失業是自然現象，技術統治的解釋則認為是機械代替了人力，被廢置下來的人力便賦閒失業了。

人類的生產有機械來代替，失業本來沒有多大關係，我們不看見社會上有好許多養尊處優吃了飯不管事的閒人在和失業着一樣嗎？機械能代了人力從事生產，人類當然可多節省一點勞力，節省了時間從事遊戲，或者研究學問。

社會上到了機械極度發達的時候，照理人們只要盡極少的勞作就可以有極豐滿的享受，但現在經濟進步機械發達的國家，像美國那樣，機械確實是發達了，生產也確實是進步了，但為什麼反會有一千多萬的人沒有飯吃呢？美國的生產是很豐裕的，每一個貨棧倉庫都是堆積得滿滿的，問題就只因社會被物價制度限制着，這一千多萬失了業的人手裏沒有貨幣，貨棧倉庫雖然堆積得滿滿的，却沒有方法去享受。

一個嚴重的恐慌到來的時候，先是貨棧倉庫充滿得無處排洩，接着生產停滯，機器停止了，土地荒廢了，於是就有成千成萬的工人農民失業了，挨餓了。正在一九二九年後的世界經濟恐慌關得激烈的時候，美國便出現了技術統治這個怪物。

技術統治是什麼，切實的說，則正是迎着資本主義的矛盾，應着美國的經濟恐慌而產生的一種科學，——或者說是一種學說。現在技術統治似乎還沒有完全成熟，不能有什麼作為。技術統治不是什麼宗教上的天堂樂園，也不是什麼哲學上的理想國，却可說是一種現代的思想，這思想和現代進步的科學發生着密切的關係，更明白的說，技術統治的本身也許就是一種科學吧。

三 技術統治的經濟構造

技術統治承認機械代替人力是社會進化不可避免的現象，技術統治非但不反對機械，並且承認機械越發達，人類便越幸福。資本主義社會所以會釀成激烈的普遍的失業災象，癥結乃

在於貨幣和物價制度。資本主義社會因爲有貨幣和物價制度的障礙，生產與消費之間便常常失去平衡，失去聯繫，恐慌的現象使出現了。生產離了消費，生產便不能繼續，消費離了生產，消費便根本無從說起。

技術統治不反對機械，技術統治的目的正就在取消機械發達的障礙物，在生產與消費之間做着障礙物的貨幣和物價制度打消了，人類從此可以永免恐慌的災難，而機械從此也可以永遠發達下去了。

但貨幣和物價制度這是社會經濟組織的中心，牠雖然妨害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們並不能因此就連經濟組織的問題也放棄不顧。技術統治對於貨幣和物價制度，正找了兩個適當的替代的東西，替代貨幣的便是「能力券」，替代物價制度的便是由國家控制或國家管理的分配制度。——分配由國家控制或管理，生產權當然也會漸漸轉入國家手中；這樣，技術統治的未來經濟構造，正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雛形了。所以說技術統治是變相的共產主義的說話，這不是共產主義者的自誇的說話，便是資本主義者誣蔑技術統治的說話。在手段上，技術統治與共產

主義的手段既根本不同，共產主義唯一的手段是暴動與階級鬥爭，技術統治所運用的手段則在加緊人類的協力關係。共產主義傾向於暴亂，技術統治傾向於和平，她們的外貌根本不相同，我們怎好說技術統治是變相的共產主義呢？

技術統治未來的經濟構造會走入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與現在的蘇俄的經濟構造很相像。但我們也不能因此就證明技術統治是共產主義，因為國家資本主義是否是共產主義中應有的過程，還是很可懷疑的。當蘇俄開始進行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政策的時候，列甯大聲疾呼「不惜犧牲一切的主義」，那末蘇俄目前的經濟構造究竟是共產主義抑是資本主義，正大可懷疑了。技術統治的前途偶然與蘇俄有一二相像的地方，就說技術統治是變相的共產主義，那不是太淺見了嗎？

一切新的都是從舊的進化得來，技術統治的經濟構造雖然是新的，但她却不能完全拋棄了舊社會的基礎。十八世紀產業革命開始後，從封建經濟中蛻化出來的資本主義經濟已成立了不可忽視的基礎，共產主義者不明白怎樣去改造資本主義的經濟構造，却一心只想撲殺資

本主義，打倒資本主義，但到最後蘇俄革命還不得不從改革資本主義的經濟構造入手。技術統治不像共產主義那樣的愛煽動，愛破壞，她將一開始就運用協力主義的和平手段，從改革資本主義的經濟構造以達到革命的目的。

技術統治主張改革資本主義的經濟構造，主張以「能力券」來代替貨幣，以國家控制生產和國家管理分配來代替無政府狀態的物價制度，技術統治的性質當然也與資本主義完全不同了。可是也許又會有一部份淺見的人，以為技術統治對待資本主義太和緩了，高嚷出技術統治就是變相的資本主義。共產主義者甚至會操着輕囁的口吻說技術統治就是資本主義的巧妙的變形。事實上，技術統治將自有其獨特的形態，她不同於空想的共產主義，也不同於沒落的資本主義。在現實的表演上，技術統治也許可以說是一種由帝國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革命，也可以說是一種和平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這種轉換資本主義經濟構造的革命如能完滿成功，便老實是帝國主義國家在世界主義過程中的一條出路。

四 技術統治的現實與幻滅

在思想，在經濟上，我們都已看出了技術統治的真實的價值。現在我們所要討論的，就是技術統治怎樣可以成爲現實，抑是這個怪名詞經過一個狂熱的時期以後便趨於幻滅，成爲泡影？活動的世界，一切都是變幻不定的，一切事物都蘊含着正與負的兩極，須視活動的方式如何，纔能知道牠的結局趨向於正的方面抑是負的方面。譬如社會主義這個名詞，已經經歷了好幾個世紀的活動，可是一次一次的都是幻滅了，一直到了偉大天才的列甯墨索里尼希特勒和孫中山先生手裏纔有了點現實的端倪。

技術統治的計劃，一個人只要每星期工作四天，每天工作四小時，這樣的從二十五歲左右到四十五歲左右一共做了二十年，他就平均可以每年有二萬元美金的享受，而且一生吃着不盡。假如每個人的平均壽命是五十歲，那末技術統治下的國民每個人一生就要享受一百萬元美金，合我國四五百萬元，一人如此，全國如此，美國的全國國民都成了「多閑」的資產階級，美

國簡直就是人間天堂了。

未來的社會究竟圓滿到如何程度，除專事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外，凡忠實於現實的人是沒有誰敢去私心妄想的。馬克斯派的共產社會主義者，他們只要人們注意現實的痛苦，在各種社會的痛苦中醞釀階級的仇恨，製造階級的鬥爭；他們忌諱空談未來，因為未來多半是些甜蜜的希望和空幻的快樂，這些希望與快樂的唯一的作用便是麻醉人們的意識和遮蔽現實的痛苦，妨礙了社會鬥爭的爆發。馬克斯主義的革命是以鬥爭為生命的，鬥爭不爆發，革命就根本無從實現了。

一般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只能空談未來，馬克斯主義者竟怕談未來，然而技術統治者却竟和經營工廠經營商店一樣，根據一些調查，統計，圖表，作了一次計算，就像預計工商事業的贏虧般打算着未來的技術統治社會要如何如何了。

技術統治對於未來社會的預計，承認機械力的生產代替人力的生產是必然的現象，並且認為機械的合理發展非但不加害人類，還會造成幸福的社會，技術統治下的國民每一個人

能在物質生活上有與現代中上資本家相等的充裕的享受，而在精神生活上却又沒有現代資本家因為社會矛盾所累及的種種痛苦。技術統治這樣明確的估計未來社會，決定未來社會，那當然是一種大膽。這種大膽可以成爲革命的堅毅基礎，促成技術統治的成功；但另一方面，技術統治者如過於迷信這種大膽而忽略了現實困難，那末所謂技術統治者的預測也許會變成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狂妄而誇大的預言呢。

我們相信技術統治有充分的現實性，可是我們也相信在一種狂妄與誇大的空氣中，却也蘊藏着危險的幻滅性，在目前，美國的技術統治就已經有兩種趨向於幻滅的弱點：第一是技術統治者忽略了社會組織的性質，只見社會上的人對物的關係，只見一個一個的人對物的關係，而把人與人之間及社會與自然之間的複雜關係看模糊了。第二是技術統治者忽略了政治對於經濟的影響，以爲社會的經濟組織經濟制度的變換可以對政治不生關係，甚至覺得政治是無用的贅疣，有如共產主義的見地，人類只要有經濟組織和經濟統治，政治組織和國家組織，遲早是可以消滅的。

技術統治者從調查中，從統計中，從圖表中，好像建築師打樣造洋房一樣。也許是要等到把「打樣」等的工作都辦完竣了，然後纔開始實行建造技術統治的新社會。不過所成爲問題的，就是建築洋房的材料都是些死東西，在工程師們的指揮與調集之下，一座洋房就可以如期完成了；但組織社會的成分却都是些活東西，而且這些活東西都各自有各自的意志，技術統治者是否也能得心應手的去指揮調集，把人像甗瓦一樣的去堆疊起來呢？

五 技術統治與法西斯蒂

技術統治有幻滅性，技術統治也有現實性，人們如承認技術統治是一種進步的社會思想，人們當然希望這一個思想能夠實現。

技術統治在美國的社會基礎上，原可說是一種必然產生的思想。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在發達到了成熟的頂點，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便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擴大向外發展的力量，由國際經濟戰爭轉爲血肉犧牲的世界大戰；一是開闢向內發展的道路，整理國內的社會關係，剔除

國內的社會矛盾，——技術統治正是適合於後者的性質。美國的全部產業資本家和全國的智識份子，他們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可怖，而美國因為經濟發達的關係正成了全世界圍攻的中心，於是美國一方面極力擴充軍備佈置世界大戰，一方面却又不得不盡力設法，企圖避免那可怕的戰爭。技術統治的成爲掀動全美掀動世界的狂熱，正因為她替美國帝國主義開闢了一條向內發展的不坦大道，且又能給與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以同等的利益。戰爭開始了，全世界的人都遭禍，除少數軍事工業資本家和少數直接的統治者外，遭受犧牲是不分什麼階級的。——共產主義者說戰爭只是無產階級受犧牲，那是戴着顏色眼鏡的說話。——和平則不單無產階級有利益，資產階級也有利益，何況技術統治於和平之中正包含着發展的前途呢。所以技術統治的成爲狂熱的潮流，自有她的理論的和現實的價值，決不是什麼簡單的「吹牛術」和「廣告術」啊。

不過技術統治要成爲現實，還必須在社會組織政治組織方面有切實的發展，這就多少要適合着法西斯蒂的精神了。法西斯蒂活動於被壓迫民族的國家，都是由嚴重的民族高壓力產

生出強韌的民族反抗力，有如意德和中國的法西斯蒂革命一樣。但帝國主義國家的活動，就不能利用民族的反抗力，而要和平的用組織主義協力主義的力量來完成革命的任務。

美國的革命，主要的是怎樣清除金融資本家跨下的自由主義勢力，這正和現在彌漫世界的法西斯蒂的革命任務是完全相同的。

如果我們以極虛心的態度承認技術統治是偏重於社會經濟方面的科學思想，那末我們敢說法西斯蒂便是偏重（？）於社會政治方面的科學思想。偏重於政治及偏重於經濟的兩種社會思想，——法西斯蒂與技術統治——在學理上講起來也許可以有同等重量的價值，但講到現實，講到行動，偏重於經濟的技術統治雖然說得很好聽，但牠要是得不到一個政治上的靈魂，便永久只是一個「好聽」的故事而已。

法西斯蒂一開始便以着力於政治為行動的第一步驟，在着力於政治這一個階段的時候可說少有餘暇去致力經濟問題。但這並不是法西斯蒂放棄了革命的經濟任務，而是法西斯蒂不好空談，除非現實急切需要解決，而且在主觀上有解決的力量時候，法西斯蒂纔會把她的

智慧和毅力向這方面發揮，美國的技術統治司考脫主任(Howard Scott)所主持的北美能力研究所的工作差不多完全限制於經濟方面；對於社會思想力的作用，對於國家政治力的作用，技術統治者非但忽略着，甚至還持着反對的態度，否認一切思想一切主義，更進而否認政治。

技術統治者否認思想否認政治，這顯然是技術統治的自絕生路，技術統治者盡十二年甚至二十四年的力量所造成的美妙的計劃和神祕的預測結果將變成幾十部大書，像柏拉圖的理想國那樣「置之高閣」，或者流誦民間，技術統治的宏願終將歸於幻滅。

技術統治如希望成爲現實，技術統治者首先須轉移其努力於社會思想和政治方面，在荆棘的環境中打出一條現實的道路，然後纔能在實際的社會中切實發揮技術統治的志願，實施技術統治的計劃。依着目前美國的現實基礎，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是不成問題的是沒落了，共產主義被宿命論的階級鬥爭的色彩拖累着，也絕對不能形成勢力。唯一的能夠形成勢力而進抵於成功的，那是組織主義協力主義的法西斯蒂。組織主義將排斥一切個人的自私自利的自由主義，完成有發展前途的美國國家主義；協力主義將排斥一切損人利己的階級壓迫主義，完成

美國的國家社會主義，並進而完成美國對世界社會主義的基礎。

美國是科學發達文化進步的國家，這樣的國家難於爲感情所煽動，只有理智的毅力的法西斯蒂纔能發動而完成美國的革命。技術統治在美國經過了暴風雨似的狂熱之後，或將趨於沉寂幻滅，在現實的壁障之前徘徊歧途。但我們相信聰明的美國民衆於狂熱的技術統治的潮流過後，終將蹈入現實的法西斯蒂之路。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月初版

法西斯蒂與中國革命

每册實價三元六角
外埠酌加寄費

版

權

所

有

著者 周 毓 英

發行者 周 毓 浩

發行所 民 族 書 局

上海局門路吉桂里十五號

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審字五七二號

77

77

2)

77

5710192
8.00
2

77
29

2355
327